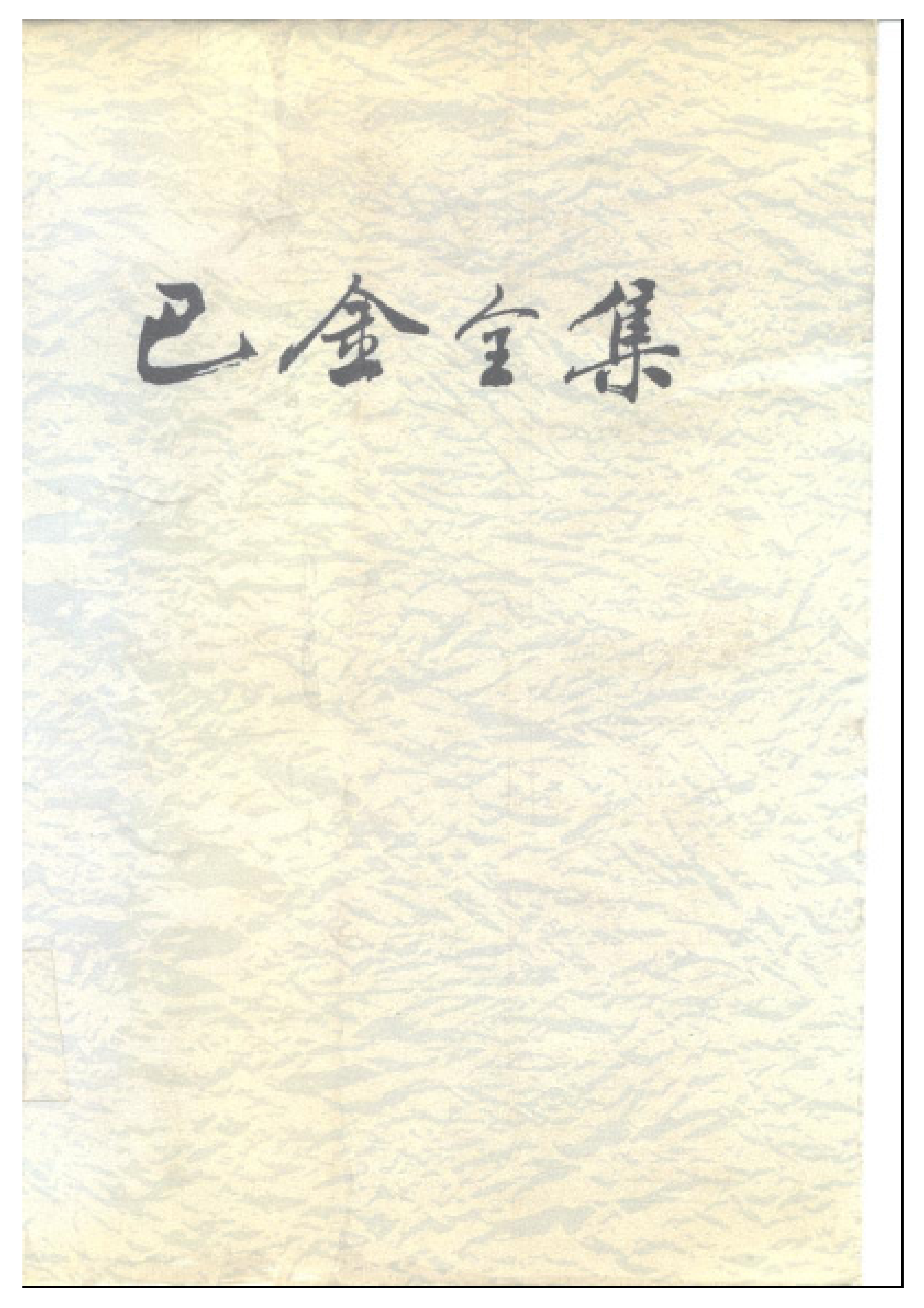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十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巴金全集

（第十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北京第1版

1990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038-5/Z·18

定价 7.65元

目　录

友谊集

新声集

创造奇迹的时代

赞歌集

倾吐不尽的感情

贤良桥畔

熘火集

友 谊 集

《友谊集》，一九五九年九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

热烈的、衷心的祝贺(代序)

我拿起笔就没法制止我的手的颤动，我的心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喜悦之情，我向苏联的朋友们问好：在这个无限美好、无限欢乐的节日里，请接受我的热烈的、衷心的祝贺。今天世界善良人民的心一致地向往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钟楼上彻夜发光的红星吸引了全体进步人类的目光。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正在环绕地球运行，向全世界宣告人类征服宇宙的伟大开端。六万万中国人民为着他们的苏联"老大哥"的辉煌成就齐声欢呼歌唱。四十年前在俄罗斯黑土上发生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像初升的太阳似地照亮了当时乌云蔽天、杀声四起的世界，给人类开辟了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苏联人民脚踏实地，历尽千辛万苦，在人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乐园，而且一步一步地向着共产主义的前途迈进。四十年来苏联人民创造了多少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迹，完成了使整个世界震惊的光荣事业。甚至在战争蹂躏着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在饥饿、寒冷和瘟疫使一部分人类受苦的时候，苏联始终是保卫和平的巨大力量，苏联人民一直不倦地为着人类美好的未来工作。苏联是和平与幸福的象征，是文明和进步的旗帜。不说在朝鲜的山村，在中国的工地，在越南的

田上，在蒙古的包内，甚至在美国的黑人区，西德的大工厂，南洋的橡胶园，东京的贫民窟，人们一想到苏联，就充满了希望，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尤其是对于今天还被剥削、受压迫、过着奴隶生活的人，吃不饱、穿不暖、在失业中憔悴受苦的人，苏联人的形象永远鼓舞着他们，苏联人放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在他们的眼前。在苏联人身上他们看到了崇高的理想的光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上他们找到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领导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民走上进步的道路，多少万人受到了苏联的鼓舞，推翻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开始站起来作自己的主人。今天在各种不同的语言里，"苏联"和"十月革命"这两个专有名词包含了说不尽的亲爱的感情，和讲不完的动人的故事。

不论是访问过苏联或者从未到过苏联的人，他们一样地看得见这个伟大国家的惊人的成就和无限美好的远景，而且会感觉到这些成就和远景跟他们个人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连那些很长的数字也像音乐的符号用激动人心的乐曲引起他们的共鸣。第一次走进苏联国境的人也不会感觉到陌生，他们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不仅因为苏联人对待朋友像对待自己的兄弟，而且因为在苏联他们找到一个和平幸福、充满朝气、丰富多采、变化万千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梦想在这个国家里变成了现实，他们的个人的感情融化在那么普遍、那么自然、那么深厚的"同志爱"里面。每一个来到苏联的客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幸福的感觉，就像一滴水放进海洋里一样。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七年来我三次踏上苏联的

黑土，每一次我都像是回家一样。在任何地方我都听见爽朗的笑声，看见亲切的笑容。连默默注视的眼光里也含着深的友情。一次紧紧的握手就把两颗心拉近贴在一起，甚至第一次见面的人都恨不得把他的最好的东西交给你带回去。我生活在苏联朋友的中间就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里，彼此非常了解，没有一点拘束，仿佛从来就在一起生活，并无语言的隔阂。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我无处不看到：严肃的工作，负责的态度和献身的精神。全国的力量都放在和平的建设事业上面，全体人民踏着整齐的步伐，万众一心地向共产主义大步前进。……这个景象叫人多么兴奋！我在苏联文学作品中所读到的一切全活在我的眼前，（苏联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中国读者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的一部分，它们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了中国人民，苏联作家在中国青年的心上占着多么高、又多么近的地位！）而且比任何小说中所描写的更生动、更具体、更抓住我的心。我真愿意交出我的一切，参加在这个巨大的行列中间，在这个伟大的建设工作中做一个小小的石子甚至一颗砂粒。这时候我才深切地了解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事业中产生的友谊的意义。我更深地爱着苏联和苏联人民像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样。我也更深地懂得中苏两大民族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有多大的关系。我也更深地明白苏联人民四十年来的光辉的成就对中国人民有多大的影响。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不仅是一个中国作家的感受。到过苏联的中国人岂止千千万万！我可以说他们全有这样的

感受，也许还有更深、更强的感情的流露，和更多、更浓的友爱的表现。但这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感受还是一样的。我们用不着找多少话来说明中苏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苏联"老大哥"挽住中国兄弟的手在光芒万丈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一同前进。六万万中国人欢欣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第八个国庆节以后，今天又以同样欢欣愉快的心情来迎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四十周年纪念日。这个大欢乐的日子不单是苏联人民的节日，它还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它还是全体进步人类的节日。

1957年10月。

友　　谊*

在访问中国的苏联诗人的热情的歌唱中，苏联艺术家的优秀的演出中，苏联朋友的亲切的问好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深厚的友情的声音。这正是我们所熟习的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祝贺、鼓舞、关切、友爱的声音。不仅每个访问过苏联的中国人从这样的声音里得到过支持和鼓舞，贡献出忘我的劳动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的六万万中国人民，也因为听到这友情的声音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这的确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中国人民把友爱的手伸给苏联的"老大哥"，我们的年轻人包围着从苏联来的客人，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用敬爱的眼光和注意的耳朵接受苏联专家们的意见，学习专家们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苏联的文学艺术教育了我们的青年，丰富了他们的心灵，扩大了他们的眼界，我们的学校里有柯察金学习小组和卓娅班。保尔·柯察金和卓娅、《青年近卫军》和《海鸥》的光辉的形象使我们的青年变得更勇敢、更善良、更忠诚。《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解除了我们大学毕业生的思想顾虑，使他们欢欣愉快地走向祖国的边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文艺月报》十一月号。

《普通一兵》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青年战士为祖国献身的精神，黄继光烈士就是看到马特洛索夫的榜样才想到用自己的身体堵枪眼的。这不过是无数动人的例子中的几个。在我们这里，人们喜欢用“大公无私”的字眼来形容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友谊。的确，我们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大公无私”的援助了。中国人民从事艰苦斗争的时候，曾经得到这样的援助；在中国革命胜利和经济恢复的时期，又得到更多的援助；现在，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们更是以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为建设的中心。苏联专家的优秀的品质不知道感动了、鼓舞了多少中国人。他们不仅把我们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他们甚至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护它们。他们忘记睡眠，忘记疲劳，整日地工作。在洪水中，在下水道中，在矿坑里，在锅炉旁，在深山荒野，在穷乡僻壤，都有他们的脚迹。什么地方需要他们，他们就把爽朗的笑声和严肃的工作带到那里去。什么地方发生困难，他们就用头等技术和负责态度把困难克服。我们多少的先进工作者在这些发光的心灵的启发与培养下看到了更光辉的前途。一听到苏联专家和友人的名字，多少人的心中立刻涌起一股暖流，多少人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感到幸福。今天我们在波涛滚滚的扬子江上架起了第一座雄伟的大桥，第一列火车安稳地在桥上驶过的时候，车厢里露出来男男女女的笑脸，每一张笑脸上闪耀着对苏联专家的感谢。

任何从苏联来的友人只要走到我们的面前，一声亲切的问好，一次紧紧的握手，甚至一个默默的笑容就使我们的心上

开放了花朵。大家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彼此非常了解，没有一点拘束，仿佛从来就在一起生活，没有人会感觉到语言的隔阂。我们的少年男女围着科斯莫杰米扬斯卡雅连声唤："妈妈，"依恋地说："我们永远是你的亲爱的儿女。"我们的儿童兴奋地读着马尔夏克的《飞向千百万中国的孩子》的诗。我们的孩子写信给苏联的母亲们倾诉心里的感情。我们的英雄模范紧握着苏联朋友的手互相祝贺、互相勉励。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苏联文学艺术的伟大成就中感到了忘我的喜悦，找到了光明的前进道路。

哪一个中国人没有得到苏联朋友的热心的帮助？哪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在苏联朋友面前倾吐他无穷无尽的友爱之情？

苏联朋友喜欢用感谢的调子讲他们在中国受到的亲切的招待和热烈的欢迎。我们访问苏联的时候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孩子们向我们欢呼，年轻人包围着我们，年长的人向我们问好，多少人对我们微笑，请我们签名，陪我们走一段路，给我们作向导，为我们解释苏联各方面的成就。在罗士托夫顿河岸上多少苏联青年骑着自行车追赶刚刚开行的载走中国代表团的轮船；在雅尔达阿尔杰克夏令营中，苏联的孩子们为中国的大朋友表演精彩的节目，并且争先邀请中国来的客人同桌进餐。像这样动人的事实是写不尽、说不完的。哪一个中国客人没有从苏联带回来他一生也忘不了的热烈的友情？

中国的客人在苏联看不到一样陌生的东西，连俄罗斯的黑土对我们也显得非常亲切。莫斯科的"红场"，列宁格勒的"斯摩尔尼宫"，雅尔达的风景如画的海滨，列宁大运河上工程

浩大的水闸，还有金碧辉煌的“大剧院”，富丽堂皇的地铁车站，以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列宁—斯大林墓前整日不断的参拜行列和克里姆林宫钟楼上彻夜发光的红星……没有一样不牵引我们的心。莫斯科的一个广场，斯大林格勒的一座纪念碑，苏联农村中的一个拖拉机站，一条小河，都仿佛近在我们的眼前。连遥远偏僻的萨根的春天和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爱情也使我们的心激动。难道会有一个中国读者不热爱苏联的文学？难道会有一个中国人不关心苏联人民的生活？对于世界进步人类，莫斯科是革命的圣地，莫斯科是和平的中心。对于我们中国人，莫斯科还是我们的梦里的故乡。我们熟习那里的一切，热爱那里的一切。我们了解苏联人民的思想感情就像了解自己的亲人一样，我们爱苏联人民就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我们看出来在我们两国人民身上有着那么多共同的东西，有着那么多我们所宝贵的东西。

我们同苏联的朋友们常常互相勉励：两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应当多多用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作题材，创造出光芒万丈的艺术品。这样的艺术品一定会激发人们身上最好的感情，一定有鼓舞人、教育人的力量，因为我们所歌颂的、所宝贵的这种友谊，并不是奇迹。它是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从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尊重，相互的爱中产生出来的。两国人民都在为着人类的美好的前途奋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把两国人民紧密地连在一起，人民幸福与世界和平的事业把两国人民紧密地连在一起。中国人民正踏着苏联人民的脚迹走向光芒万丈的前途，苏联

人民正挽住中国弟兄的手一同前进。今天使苏联人民激动的理想也同样地使我们激动；今天鼓舞着苏联人民前进的信念也同样地鼓舞着我们。相互的友爱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倾心的合作增加了我们前进的勇气。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感到疲乏的时候，在我们为祖国的建设、为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都听见了熟习的安慰的声音，看到了熟习的鼓舞的表情，得到了熟习的有力的手的扶持。在我们为着每一年的成就、每一次的胜利欢呼的时候，我们也听到熟习的祝贺的声音。我们熟习的响亮而有力的声音不断地鼓舞着我们："加一把劲，我们一同前进！"这些年来我们就这样不断地"加一把劲"前进再前进。六万万人民中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两倍的手，两倍的脑子，两倍的力量，因为我们有着像苏联人民这样的朋友，永远鼓舞、帮助我们前进的朋友。这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体现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最不自私的献身的感情。苏联人民四十年的斗争经验和辉煌成就，苏联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加强了这种感情，中国人民八年来的巨大成就同样地加强了这种感情。这种感情还要继续不断地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也要继续不断地发展。这种友谊发展的结果会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与普遍的繁荣，给人们带来美满的幸福，给母亲们带来更多的安慰，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快乐，给田地带来更大的丰收，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美丽；让每一张脸上都现出灿烂的笑容，每一家人家都发出欢乐的歌声……这一切就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的语言。那么还用得着我上面那些多余的话来说明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么？我们

两国人民彼此相爱，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这种友谊正如大家所愿望：永远光辉灿烂，万古长青。

1957年10月。

几件纪念品*

——回忆一九五四年的一次旅行

在我的书桌的抽屉里，有一朵枯黄了的红玫瑰和一片绿色尚未褪尽的橡树叶，这是三年前我从雅尔达带回来的。玫瑰花开在契诃夫的园子里。契诃夫纪念馆的叶令娜·非立波夫娜同志把它从枝上摘下来递给我："您带回去吧，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生前喜欢的花。"橡树叶长在雅尔达附近的植物园内的老树上，殷勤好客的园主人(他两年前到过中国)允许我摘下这一片带回家。我说，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教我懂得爱橡树，我要把这个充满生命力的橡树的记忆带回我的工作室。

每一次我打开抽屉，不论在阳光照耀下或者映着电灯光，枯黄的花瓣和褪了色的、有齿的绿叶都好像在低声歌唱。不用说，干枯了的红花、绿叶不会唱歌，也不能发声。可是望着它们，我明明听见了充满深厚友情的问好。我的心又飞到了苏联，而且从莫斯科一直飞到南方。我的耳边荡漾着一片友情的歌声。这些回忆使我又一次感到多么令人兴奋的温暖。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收获》第三期。

我从苏联带回来的自然不止是这两件纪念品。还有不少的东西留在我的身边。还有更多的无形的东西留在我的心上。每一样东西都会讲一段动人的故事，或者给我唤起一个愉快的回忆。我一定把我的一部分的心留在俄罗斯的黑土上面了。不然怎么在那边的种种使人激动的生活会时时出现在我眼前，使我觉得我好像同时还生活在苏联人民中间一样？

我仿佛又站在契诃夫生前同客人喝茶的装了玻璃的阳台上，玛利亚·巴甫洛夫娜用颤动的声音告诉我："我哥哥生前想去中国旅行，却没法去。现在您来了，以前还有中国儿童来为我跳舞唱歌。您回去，请替我向中国人民问好啊……"她带着红眼圈谈到她的哥哥，带着感激的微笑谈到中国。对新中国她流露出多么深的感情。她的瘦小的身子就是忠诚和友爱的化身。她把整个生命贡献给艺术（她是画家）与她哥哥的文学事业，终于获得了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今年一月她以九十三岁的高龄永远离开了她所爱的祖国和人民。前年她还写信来说："我知道伟大的中国人民热爱契诃夫，尊敬契诃夫，我万分高兴。"她还送给我一张她坐在铺上中国挑花桌布的小桌前面的照片。这说明她在最后的三四年中间常常想念中国。在那些时候，中国仿佛就近在她的眼前，因为她有机会不断地见到从中国来的客人和新中国的孩子。在雅尔达附近就是那个世界闻名的阿尔杰克夏令营，每年都有远道而来的中国"红领巾"到那里跟苏联儿童们一起欢度假日。中国的孩子们也知道尊敬俄罗斯的小说家，他们要用他们快乐的笑声与活泼的舞姿来安慰玛利亚·巴甫洛夫娜的老年。

我也曾在阿尔杰克夏令营里度过了整个愉快的上午。我比从中国来的孩子们先到这个风景如画的黑海海滨。在一个小礼堂里苏联的少年朋友们为我表演了不少的舞蹈节目。表演结束，一个光头的“红领巾”忽然走到我面前，严肃地向我敬礼，邀请我在这里吃饭，做他那一桌的客人。两个“红领巾”把我拥进餐厅。这两个殷勤的小主人像接待亲人那样地接待我。他们对我谈起他们的生活，并且问到快要到来的中国小朋友们的情形。每一句信口说出的话都带着真诚的友情。我在这个地方见到很多苏联的孩子，他们远远地望见我，就含笑招呼，仿佛我是大家欢迎的老朋友。那样的地方，那样的生活，那些树，那些人，那种健康的空气！就跟我在芭蕾舞剧《幸福之岸》中所见到的完全一样。新西伯利亚国立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同志们表演得多么真实！幕一拉开，我几乎要跳起来了。我忘记我是在上海的文化广场，我仿佛又回到了黑海边上。孩子们的友情这么牢牢地牵引着我的心。

从著名的“英雄的城市”斯大林格勒我没有带回来多的纪念品。只有两小块生了锈的炸弹破片，但是又在返国的途中遗失了。可是洛巴切夫同志给我寄来了他的小说《走父亲们的路》，这本在斯大林格勒出版的三百页的小说跟许多苏联小说一样，是激动人心的“英雄的书”。洛巴切夫同志在小说中描写了他亲身参加过的斯大林格勒的战争。读过《日日夜夜》的人都知道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曾捧着西蒙诺夫的小说跟沙布诺夫上尉一起经历了这残酷而英勇的战争。一条街、一幢房屋、一层楼的往返争夺，一百六十个昼夜

的不停的炮轰……在这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激烈斗争中，斯大林格勒的每一个苏联人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法西斯敌人把整个城市变成了瓦砾场，可是同时这里也埋葬了三十三万的德国军队。这场大会战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世界的命运。中国的母亲和孩子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因为有这个胜利才得到了保障。洛巴切夫同志就是参加过这个伟大的会战而残留下来的极少数战士中间的一个。他不单是作家，他还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普通市民，他又是一个平凡得非常可爱的苏联英雄。他兴奋地对我们谈起十几年前的战争，他尽谈别人，不谈自己。他领我们去参观有名的战场，像“巴甫洛夫楼”，像“马马耶夫岗”。

四周是异常的宁静。新来的客人不容易想象一九四二年秋天的那种决死的斗争。“巴甫洛夫楼”在我眼前不过是一座没有人居住的残破的楼房。洛巴切夫同志激动地指点着，告诉我：巴甫洛夫中士和他的三个战友怎样潜入这所房屋，四个人在这里坚守了五十九天，而且不断地向团指挥所报告他们发现的敌人的情况，一直到大军收复了这个地区的时候。洛巴切夫同志热情地描写了巴甫洛夫最后出来迎接自己军队的情形。那应当是多么动人的场面。

“马马耶夫岗”上有一座年轻女护士的塑像。这座白色塑像前的烈士墓园中盛开着美丽的秋天的花。一座残破的贮水塔耸立在不远处。三十公尺光景以外，在一个小小山坪上，有一个放着坦克的石台，这辆坦克的炮口正指向西方，对着水塔。我们在石台前面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山下面阳光照耀的

斯大林格勒显得非常美丽，新建的高楼耸立在绿树丛中。远远的、发亮的地方，那应当是列宁运河跟伏尔加河的汇合处。在洛巴切夫同志的眼里，战争好像还是一两天前的事情，他望望坦克，望望水塔，望望护士的塑像，那么生动地讲起“马马耶夫岗”的争夺战来。在十二年前为了争夺这个山岗，每一公尺的土地上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也都浸透了苏联战士们的鲜血。敌人每天在这里扔下两千个炸弹，给山岗铺上了几层铁。他们最后占领了高地，却始终不能把苏联军队赶下东面的山坡。坦克的炮口就是指向水塔方面的敌人的。护士是一个叫做别司卡斯洛娃的十九岁的姑娘。她因为抢救伤员陷在敌人的包围中。她就一边守护伤员，一边用机关枪战斗，她打死了三十多个敌人才交出自己的生命。

洛巴切夫同志还给我讲了电话员卜启洛夫的英雄事迹。卜启洛夫奉到命令去接通打断的电线，电线没有接好，他两只手受了重伤，他便用牙齿把两个线头咬在一起，让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接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任务。像这样的英雄气概我在朝鲜战场上也常常耳闻目睹。个人为集体利益牺牲一切，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一个特征。

我们下山的时候，阳光开始黯淡了。我在砂砾中捡了两块炸弹的破片。我家里已经有不少这样的破片，是在不同的地方捡来的。我在抗日战争中从内地带回来一些。我从朝鲜带回来一些。这些破片说明一件事实：千万吨的钢铁也敌不过革命战士和爱国人民的英勇和忠诚。人类的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感情是暴力所毁不了的。

回到城里，我在百货公司买了孩子们玩的活动汽车。百货公司的大楼也是在废墟上建筑起来的。这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而且挤满了顾客。人们带着亲切的微笑给我让路，售货员殷勤地为我取来我需要的东西。一个小女孩过来跟我拉手。几个人的声音同时向我送来："您好，您好。"我觉得我看见了自己脸上的幸福的笑容。

这天十一点钟以后，在温暖而宁静的夜里，我和苏联朋友们在宽阔而清洁的街上散步。我们谈着先前在建筑宫里听到的这个英雄城市的建设计划，四个人都感到万分兴奋。我们沉醉在斯大林格勒的无限美丽的远景里，沉醉在苏联的无限光明的前途里，沉醉在中苏两国人民的无限深厚的友情里。我和洛巴切夫同志应当在一个十字路口分手，可是我们都不想中止这段关于未来和友谊的谈话。我们真愿意走到天亮，迎接升在斯大林格勒天空中的金光灿烂的朝阳。

我动身回国的前两天，齐娜和沙夏两位年轻同志（仍然是他们两位做我的带路人）陪我去参观刚刚开幕的全苏农业展览会。进了大门，我好像上了宝山，满目琳琅，不知道应当在什么地方停留。我说不上看了几分之几，就已经感到疲乏了。我们跟着别人转来转去，忽然转到了种菜蔬、种瓜的地方。一位四十出头的苏联同志非常高兴地拉住我谈中国的事情，接连说了好几个"好"。他不仅拉住我走遍了瓜棚，他还拿出两个最好的甜瓜，削了皮递给我，说是一定要请中国的朋友尝尝最好的东西。我平时不喜欢吃甜瓜，可是我不能拒绝这么热情的苏联主人，我把两个瓜都吃了。它们是出乎我意外地

香甜爽口，一直甜到我的心头。过了三年，我仍然感到这种爽口的甜味。我相信这一件无形的纪念品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真想再跟那位我不知道姓名的苏联朋友紧紧地握一次手。

1957年10月6日在上海。

难忘的日子*

一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上午，我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中听见莫斯科红场上布琼尼元帅宣读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阅兵典礼开始的命令。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车厢的同志们都在兴奋地谈论检阅的盛况。游行队伍向着红场前进，我们的火车也向着红场前进。我们的心一致向往着莫斯科，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长出一双翅膀，马上飞到红场的上空，飞到游行的行列中间，跟莫斯科人民一起，向着检阅台前进。我们的心陶醉在红场上的一片欢呼声中。晚上我们同苏联朋友们在车上联欢，我们不断地举杯，为我们大家敬爱的人干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为彼此的幸福干杯，为我们共同的无限美好的前途干杯。我们干杯的理由太多了。一句话，在十月革命的节日里，我们找到了一切。我们的个人感情完全融化在那么普遍、那么深厚的"同志爱"里面了。

我们的列车两天后才到达莫斯科。我们来迟了。当天傍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收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难忘的回忆》。

晚我第一次走到红场，看到克里姆林宫钟楼上发光的五角红星，在雪后的马路上我感到无比的暖和。我觉得我好像在两天前就到过了这里，分享了苏联人民节日里无限兴奋、无限欢乐的感情。

这以后，在莫斯科最热的夏季里的一天，和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冷日子里，我又两次到过这个“圣地”，但是我始终忘不了检阅的行列和欢乐的呼声。

现在我的心又向往着莫斯科，我的心又向着红场前进。哪怕听见人谈起莫斯科的大雪，我也会感到春天的暖意。七年前的梦想终于成了现实，我想到就要第四次踏上俄罗斯的黑土，而且和铁流一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游行队伍一起欢度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伟大节日，我没法安静下来。我不久以前曾经对苏联朋友说过：“人到了莫斯科会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就像一滴水放进了海洋一样。”现在我特别感觉到这样的幸福。

二

这次我参加了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到莫斯科观礼，在苏联住了二十四天，到过四个城市，虽说是走马看花，对着汪洋大海，满目珠玉，不知道自己究竟懂得多少。但是我常常万分激动，真想把每分每秒的感情全留在纸上，又想记下我一切的见闻。可惜我少有拿笔的机会，有时在床上想来想去，竟然失眠。返国的那个深夜，我上了图一〇四喷气式客机以后，靠着

小窗望机场上的雪景，想起苏联朋友们的深厚友谊，我没法制止我的感情的波动。我不仅充满感激之情，我还感到无限的幸福，我觉得我有了更多的力量和信心。

第二天早晨飞机在新西伯利亚停留三十分钟。机场上吹着一阵一阵透骨的清晨的寒风，可是我们用热情的语言谈着我们就要离开的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心里充满着热爱。我们并没有惜别的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把苏联人民的友情带回了中国。不仅是友情，我们已经把整个苏联刻印在自己的心上带回家去。

的确，今天，在上海的静寂的寒夜里，我还听见红场上的欢呼声，我还看见无数的挥动的手，和亲切的笑脸。

三

有人说，今年十一月七日莫斯科的天气是“理想的”：没有太阳，没有雨，没有风，也没有雪，不会叫游行的人流汗，也不让观礼的人冻僵双脚。我们刚刚站到观礼台上的时候，我心里倒想：倘使有太阳，倘使阳光能照到这里来，那多好。快到十点钟的光景，赫鲁晓夫同志陪着毛主席走上了列宁—斯大林墓上的检阅台，广场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春雷似的掌声。我们在下面看见他们走到我们这一面来了。毛主席接连挥着他的呢帽，兄弟国家的代表们不住地欢呼，一直到毛主席走开了，好些人还发狂似地拍掌。接着阅兵典礼开始，礼炮声好像要把天空震破一样，接受检阅的队伍庄严而整齐地走过了检

阅台，各种保卫和平的新式武器跟在英雄们的后面缓缓地在红场上前进。我忽然觉得太阳已经冲出了云围，在整个广场上撒下了灿烂的金光。观礼台上一阵一阵地响起了爆竹似的拍掌声。游行的队伍潮水似地涌了过来。

游行的群众是以区为单位的，各行各业都包括在里面，男、女、老、幼都有。自然，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有人把孩子抱在怀里，有人让小孩骑在自己的肩头。大人向检阅台和观礼台摇手欢呼，孩子们也不停地点头挥手。人们手里拿着纸花，但是更多的人拿着纸做的小小树枝，枝上有几片绿色或者黄色的橡树叶。人们有时唱歌，有时喊口号。我们站在观礼台的最下一级，前面并无遮拦，因此跟游行的群众没有多大的距离。我们的面貌和服装又最容易引人注意。游行队伍中不论男女，他们走过我们面前，不是用中国话高叫“万岁”，就是高呼“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或者“莫斯科—北京”的俄文口号。声音是那么亲切，好像亲友们见面打招呼一样。我们起初只是拚命鼓掌，后来也齐声叫起“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或者“莫斯科—北京”来了。我们的左面是列宁—斯大林墓上的检阅台。在我们右面的观礼台上站着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的劳动人民代表团团员。兄弟国家的代表们比我们活泼。“莫斯科—布拉格！”“莫斯科—华沙！”“莫斯科—索非亚！”就一直没有停过。他们口号叫得响，唱歌声音亮。不用说，他们的热情也鼓舞了我们。我们的嗓子常常喊哑了，我们望着游行的群众有话讲不出来，就相视而笑，相对挥手。队伍中也有些中国留学生，他们看见我们，不论男的或女的，都高兴得跳起来，真

像看见了亲人一样。

人越来越多。在我的眼睛里好像尽是熟面孔。女的都穿颜色鲜艳的节日的衣服。每个人都是笑容满面地朝前走，好像出门去看亲戚、赴宴会。记者们来来往往，常常在观礼台前停留片刻，给我们照相。兄弟国家的代表们过来向我们问好，跟我们交换纪念章。时间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过得非常快。队伍的最后是一群高举旗帜的人。他们走过以后，留下一个空阔的广场，和无数随着微风飘舞的碎纸片。我们在这里整整站了四个多钟头。走下观礼台，我才感觉到右臂的酸痛。我正要去找汽车，忽然听见一阵掌声，一些人拚命朝列宁—斯大林墓后面跑去。我抬起头看检阅台，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我正在疑惑间，旁边一个同志笑着对我说："大家跑去看毛主席了。"他刚说完，我就看见一群人经过观礼台跑下了广场。他们一面跑一面带笑讲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现在连看毛主席的人也不见了。我遇到了锡兰的作家默黑丁，一个多月前我在上海接待过他。我看见他用雨衣代替大衣，问他冷不冷。他笑着说："红场上真暖和啊！"我才觉得自己衣服穿得太多了。他和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我们一块儿找到了汽车。

十几天以后，老舍、梅兰芳、高莽和我在波列伏依家里作客，受到他们夫妇殷勤的款待。波列伏依为我们开了酒瓶，裘丽亚不但作了菜，还为我们沏了两种中国茶：龙井和香片。在谈话中间，波列伏依忽然讲起七日那天他和苏尔科夫担任了向广播电台的听众们报告红场上检阅实况的工作。他说游行

的队伍已经过完了，他们忽然听见一阵掌声。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也想不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苏尔科夫就报告：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节日的游行胜利地结束了，等等。后来他们才知道有好些人从观礼台跑去等着看毛主席。毛主席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从检阅台下来，马上被这些人包围起来了，掌声就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他们两个在那个小房间里怎么想得到呢？

可惜我没有能够听到这两位作家的实况报告，不用说，它们是很精彩的。

这一顿饭吃了四个半钟点，陪客越来越多，苏联作协外委会的阿卜列钦来了，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九五四年我在莫斯科得到他不少的帮助；西蒙诺夫夫妇也来了。西蒙诺夫听说我们在这里作客，特地赶来同我们见面。他的酒量真大，讲话也很有风趣。可惜我没法把他和波列伏依的谈话记下来，否则我倒有了一篇很好的散文了。阿卜列钦那么热情地谈他三十年前见到的中国和今天的新中国（他过去在武汉和广州住过一个时期）……

我们告辞出来，在公寓的院子外面上车，两对夫妇把我们送到街口，我在车中回过头从背后的小窗望出去，裘丽亚穿着白色皮大衣的娇小身体偎在波列伏依的穿青色西服的高大身躯旁边，显得非常鲜明。他们还在那里挥手。

四

在这个伟大的节日里，莫斯科的确是一座不夜城。从我们到达的那个晚上算起，一连四夜，大街上人山人海，灯火辉煌。宝塔似的白色大楼给强烈的灯光照得透亮，高耸在墨色的天空，好像童话里的仙宫一样。在一座高楼前面用彩色电灯和霓虹灯表现了人造卫星环绕地球运行的奇观。最引人注目的是半空中的列宁头像和苏联国徽。它们是那么亮，那么高。我们看不见那两个吊着它们的气球，可是逼近了时我们看得见好几股探照灯光集中在这两个巨像上面。每晚我们从旅馆到剧院或者音乐厅去，在大汽车上我们总会看见它们，我说不出它们相隔多少远，但是总不在一处。列宁的侧面像我们第一眼就看清楚了，可是也有同志把苏联国徽看成了月亮。后来弄明白了，那位同志就带笑说："这有什么奇怪，过几年我们一定会看到从莫斯科射出来的人造月亮！而且是这么大、这么亮的月亮啊！"他说得全车的人都高兴地笑了。

大汽车经过的多半是行人较少的街道。我们看见莫斯科河畔接连不断的明灯，静静的水面也给灯光人影搅乱了！我们也看到广场上五颜六色的灯彩，看到街心花园的闪着银光的喷泉。乐曲、歌声和人们的欢笑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送到我们的车上。我们多么想看到彩色的节日礼花，多么想走到红场上跟莫斯科的年轻人共度一个欢乐的夜晚！可惜我们的日程排得太紧了。我们只能够在大汽车上畅谈红场的烟火，和

练马场前面的露天音乐会，在大剧院中和音乐厅里体会苏联人民欢乐的心情。的确，乌兰诺娃的舞姿，奥依斯特拉赫的小提琴，以及功勋艺术家们的歌声和表演把苏联人民庆祝节日的欢欣传给我们了。我们见到任何一位苏联同志，点头也好，握手也好，或者相对一笑，都有一种互相祝贺的感觉：这是我们共同的节日。

九日的傍晚，天刚黑，莫斯科的万盏明灯发出了万道金光，整个城市显得比白天更多光彩。我们终于离开了大汽车，在市中心的高尔基大街走了一个钟头。年轻的男女手挽手地唱着欢乐的歌，中年人把孩子抱在自己的手臂里，老年人由孙子搀扶着，向着美丽的红场前进。在一些大建筑物的最高的一层，现出用电灯泡扎成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类的标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抬起头用亲切的眼光去看它们，好像招呼熟人一样。这些标语说着人们心里的话。每个人都充满幸福的感觉，意识到自己正是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我越往前走，看见行人越多。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人，把多么宽的大街挤得像一条窄巷。不用说，耳边一片嘈杂的人声，我听见的不单是俄国话，还有许多国家的语言。在这里就像在我们住的乌克兰旅馆的大厅里一样，到处都是人，而且说着各国的语言。莫斯科的确是世界的中心，苏联的确是进步人类的大家庭。

眼前一阵亮，某一座大楼的正面吸引了我的眼光。在那里我看见了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国徽，也是用彩色电灯泡扎成的，真可以说是五色缤纷，光彩夺目。它们烘托着一幅巨大

的列宁画像。列宁活在整个苏联的土地上，他还活在全体进步人类的心里。

我们还没有走到红场，二十多个人就给挤散了。在这里找人实在不容易，找到这一个，又失掉那一个。你即使站在路旁不动，那股不可抵挡的人流也会把你冲走。而且你也会愿意让人流冲起你走，让你消失在衷心愉快的人群中间，你会觉得跟着这些人走，你是多么安适，多么放心。

我们还要到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去参加酒会，不得不离开了这一片欢乐的海洋。在酒会上我们诚心诚意地为这些欢度节日的莫斯科人干杯。

我到圆柱大厅这是第二次了。三年前我在这里听过叶尔米洛夫教授关于契诃夫的生平与创作的报告，看过人民演员塔拉索娃的出色的表演。叶林娜① 的动人的形象犹在我的眼前。美丽的白色圆柱依旧发出灿烂的光辉。代替三年前那几十排座位的是几十张长餐桌。洁白的桌布上满了清香沁鼻的鲜花，上等的美酒和丰富的菜肴。工会主席那么亲切、那么热情地欢迎客人，他站在中间那张餐桌的前面，用有力的声音建议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团结干杯。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七百多个客人欢聚一堂，用各种语言互相祝贺。在幸福的感觉中，在友爱的气氛中，酒杯不知道举起了多少次。多少人忘记了自己的酒量，多少人提高了讲话的声音。“友谊！”“和平！”人们用各种语言高呼这两个无限美好的名词，大口地喝着极其爽

① 叶林娜：契诃夫的四幕剧《万尼亚舅舅》中的女主角。

口的酒。就在每个人都感觉到友爱之情快要在自己身上漫出来的时候，在舞台上响起了动人的歌声和美妙的乐曲。人民演员列别新斯卡雅还为我们表演了一段《天鹅湖》……

中国代表团离开圆柱大厅的时候，我们中间至少有一半人的脸是红的。我们兴奋地走过一些房间，人们正在那里跟着乐声跳舞。明天是星期日，愿大家尽情欢笑地度过这个“狂欢之夜”!

五

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剧院的包厢里，听歌剧《铁甲列车》。三十年前伊凡诺夫为着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写了这个剧本，现在为着庆祝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它又被改编成歌剧演出。在大欢乐的节日里回忆四十年前的艰苦斗争，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舞台上那些战斗的场面，受难者的呻吟、哀诉，游击队员雄壮的胜利歌声，让人们头脑清醒地记起四十年来所走的漫长的道路。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中国人辛必武的英雄形象。他不仅跟苏联同志们一起战斗，他甚至用身体掩护游击队长维尔希宁，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中了敌人的枪弹以后，向他的朋友告别:“再见吧，维尔希宁。感谢你的伟大的友谊。你的忠实的兵辛必武安心地到沉默的山谷去了。”他死在游击队长的怀里。游击队长放下他的尸首，含着眼泪低唱:“辛必武，再见!你是个很好的人。你看，整个林子都在哀悼你，全体战士都在对你鞠躬行礼。”再没有

比这个简单的场面，和这几句简单的话更能打动人的了。这是用鲜血凝结起来的友谊。我们屏住气注视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倾听每一声歌唱，我们真想上台去抱住那几个出色的演员，感谢他们那么生动地表现了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中最感人的场面。

幕最后一次落下、观众散去以后，我们终于到后台去表示了我们的心意。我们和演员们互相握手，一次又一次，而且彼此说着同样的话，流露出相同的感情。这时候我才明白，在大欢乐的节日里演出这个戏，是有特殊意义的：苏联朋友热爱着我们。

一个星期以后，也是在星期天晚上，我们在轻歌剧院里又受到热情的招待。那天演的是匈牙利的三幕轻歌剧《西尔维雅》。舞台上载歌载舞，有说有笑。听惯中国戏曲的人更容易接受这种又说又唱、活泼轻快的"轻歌剧"。故事曲折，表演虽夸张而动人，最后有情人皆成眷属。观众不断地拍掌，不停地发出满意的笑声。观众和演员好像打成了一片，大家在一起欢度节日。

第二幕开始以前，卡巴尔达的功勋演员路班（他扮演女伶西尔维雅的情人艾德文）站在幕前代表全体演员发言，向在这里看戏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同志们致敬。他的话刚说完，全场的观众一齐站起来，朝我们所在的包厢鼓掌。那么热烈的掌声，那么自然的举动！

第二幕刚演完，我们就被请到经理室去。在那个小房间里桌子上摆满了水果和点心。几个主要的演员都来了。仍然

是路班同志致欢迎词，他简单而有感情地谈到新中国的成就和中苏两国人民伟大的友谊。他举起酒杯，建议为这次欢乐的会见干杯。喝完一杯葡萄酒，剧院的经理又拿起香槟酒瓶，笑着说："现在就要发射第三颗人造卫星了。"他不仅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他还发射了第四颗和第五颗。乐队指挥也来了。房间里挤得满满的。大家有说有笑地碰杯，连两位女主角也喝光了杯中的香槟，为中国的种种事情高兴。我们中间有一位同志一两个钟点以前坐汽车走遍莫斯科，想买几束鲜花来献给演员。然而在夜间花店全关了门，我们只能够用语言，用微笑，用干杯来表达我们的感情。梅兰芳同志也向主人表示了我们的谢意。在这里人们都知道他，也喜欢他的表演艺术。为了这短短的酒会，第三幕延迟十分钟开幕。男女主角带着酒意出场，他们的表演和歌声更显得感情饱满而且更动人。

六

我们在十二日早晨九点半钟到达列宁格勒。十五日下午一点钟从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我们在列宁格勒只住了两夜。

离开列宁格勒那一天的傍晚，我和三个朋友在涅瓦河畔散步。夜色刚刚降临，我站在基洛夫桥上，靠着栏杆眺望彼得保罗要塞。天空青灰色，天边一抹轻纱似的红霞，要塞大礼拜堂的白色尖塔静静地高耸在树丛中，更显得阴森可怕。右边

河畔灯火辉煌，隐约地传来人声。灯光映在水面，仿佛一天的星星。我默默地把这个沉默的建筑物看了许久。我想起我在特列杰雅科夫美术馆中看到的弗拉维次基在一百多年前画的《塔拉卡诺娃公主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名画：监房里涨了水，老鼠纷纷地爬上床，公主吓得站在床上，身子无力地靠着墙。叶卡特林娜二世在这里杀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尼古拉一世把十二月党人关在这里，让他们受尽了酷刑才送上绞刑架或者充军到西伯利亚去。多少俄罗斯的杰出人物，像诗人舍甫琴科、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曾在这里度过他们一部分的光阴。一九〇五年一月高尔基因为他写的那篇《告各界人士书》也在这里住了一个月。监房里的生活很快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住了两个星期就吐起血来。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中多少革命者被活埋在这里，有的发狂，有的病死。将近两百年中间，这个耸立在涅瓦河边、面对着冬宫的"石头城"一直是黑暗的暴政的象征。但是四十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声炮响使它沉默了。它现在孤独地躲在树荫里，掩藏了它一身的斑斑血痕。

朋友们催我往前走，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对这座古堡会感到兴趣。我跟在他们后面过了桥，沿着涅瓦河走了一大段路，又走过叶卡特林娜二世铜像的前面，转进了明亮的、热闹的涅瓦大街。我的眼前又是一片和平的幸福景象。想到我刚才离开的那个要塞，我更了解四十年来苏联人民走了多么远的路程。

我到列宁格勒，这是第二次了。七年前我在十二月党人

广场附近的旅馆里住过一夜，幻想过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场面。这一次我们参观了斯摩尔尼宫，在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厅里停留过一些时候。在四十年前召开的那个重要的会上通过了著名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大门两边的墙上还嵌了两块大理石板，一九一八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的全文就刻在石板上，而且全是引人注目的金字。

二楼上，还有一间列宁的办公室。房间就只有这么大：八公尺长，四点七公尺宽，而且还用木板隔出一间将近两公尺宽的寝室来。办公室里的陈设不多。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和一把普通的椅子。写字台上有一盏煤油灯，一架电话机，和几样文具；写字台后面还有大小沙发三张和一张小小的圆桌。布罗次基的名画《列宁在斯摩尔尼宫里》，是大家熟悉的。在那幅画上列宁就坐在这里一张小沙发上面写字。“你的确画得很像”，列宁对画家说过这样的话。在那间隔出来的寝室里只有两张从医院借来的小铁床。床上铺着灰色毛毯。列宁睡在靠墙的小床上，靠木板的小床是他妻子睡的。克鲁普斯卡雅有一面小圆镜，还是列宁的卫士送给她的。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的简单的生活。列宁就在这个房间里住了、而且紧张地工作了四个月。我们代表团里的李富清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列宁的卫士。他曾经站在这个小房间的门外保卫过列宁。这里的每一样东西对他都是非常亲切。他轻轻地摸一下墙，挨一下木板，抚一下沙发的靠手，好像就在跟亲人接触。望着列宁睡过的床，他忽然呆了一下。我觉得他的眼睛红了。他一定想起了四十年前的艰苦日子。在

他的耳边一定响着他所敬爱的领袖的声音。要是他能够详详细细地写出他的回忆来，那多好！

七

我们动身去列宁格勒的那天上午，听说全苏农业展览会就要在本月十五日闭幕（不用说，来年春季还要重开），主人为我们一部分同志安排了访问的"节目"。一辆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展览会的门口。

三年前这个大型的长期展览会开幕的时候，我到过这里。那是在八月初，车水马龙的盛况犹在我的眼前。现在天色灰暗，寒气袭人，空中还飞过一阵小雪，展览会门前显得非常空阔。

我们走进这个大公园。美丽的喷水池寂然无声，宝石花仍旧鲜艳夺目。每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陈列馆都关着大门，可能是我听错了话，展览会已经停止开放了。每一个陈列馆的建筑都保持着独特的民族风格，各有各的吸引人的特点，既富丽堂皇，又美观大方。我很想在各个陈列馆的门前徘徊一阵，单是看看那些出色的建筑物也使人心旷神怡。然而地方太大了。还有自治共和国的陈列馆，还有工、农业和牧畜业某些方面的专门陈列馆……据说一共有六十几个。一九五四年我在这里花去三四个钟点，也不过见到二十几个建筑物。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展览会中停留三小时。

我们一进门就受到热诚的欢迎，免不了有一番友谊的谈

话。然后主人把我们引进了科学馆。我们最先看到的就是人造卫星的模型。其实这不是模型，它就是人造卫星。第一次上天的人造卫星本来有同样的两颗。第一颗发射成功了，另一颗就变做了陈列品。它是一个亮晶晶的金属的圆球，还拖着四根长长的金属的天线。可惜它不会讲话。不然我们一定会听到许多动人的故事。讲解员的解说虽然简单，但是这个圆球却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而且抬起头我还看见人造卫星在深蓝色太空中运行的轨道图。

从科学馆出来，主人又把我们引进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陈列馆。在这里我又一次看到了棉花、粮食和水果的大丰收。三年前我在这个陈列馆里度过一些愉快的光阴。今天重来我又看到了变化。变化的确很大，不过我以为用下面四个字就说明了一切："丰富"与"幸福"。我还听到了同志们不绝口的赞美声。我们不仅看到和体会到这种丰富与幸福，我们还分享了它们。陈列馆的负责同志在这里安排了餐桌，用乌兹别克的葡萄、西瓜、甜瓜和无花果仁款待我们。这些鲜美的水果使我们忘记莫斯科的落雪天气，我们好像到了阳光明媚、玫瑰花香的塔什干。

八

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城给了我许多美丽的记忆。我从那个好客的城市带回来两个环形的酒瓶。乌克兰的陶器是有名的。据说在这里接待客人时，年轻的姑娘穿着民族服装，膀子

上挂一串环形的酒瓶。不同颜色的瓶子里盛着不同的酒。客人要喝哪一种酒，她们就取下哪一个酒瓶，把客人面前的杯子斟满。

这个故事是《前线》的作者考涅楚克告诉我的。二十日下午他邀了我们十个人到他的家里作客，他用非常丰富、十分可口的午餐款待我们。他的夫人万达·瓦西列夫斯卡（我们全读过她的《虹》）不仅是一个大作家，她还是一位烹调的能手。她一个人做八九样菜，全是自己动手。我们这一顿午饭吃了将近三个钟头。大家借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干杯。刻花玻璃的高脚杯在我们手里碰来碰去，不断地发出金属的声音。亲切的主人笑着说："杯子越碰得响，友情越深。"

他们的客厅里挂着从中国带回来的画，陈列着中国的小摆设。他们用热情的语言谈起一九五五年春天在中国的旅行和一些难忘的印象。考涅楚克曾经充满感情地说："在夜里空闲的时候，我和万达谈着闲话，我们常常回忆中国的旅行，我们谈起在中国见到的那些人，那些地方，那些事情。我说，将来我们一定要再去中国。我忘不了那些地方，那些人……"

我们告辞的时候，主人还为我们开了香槟，让大家把酒喝光，带着轻微的酒意和浓厚的友情互相拥抱。考涅楚克最后还紧紧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地说："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在基辅城也有家。我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们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不论谁到基辅来，都不要忘记来看你们的亲人啊！"

他用那么恳切的眼光望着我们。我们齐声说："一定来，一定来！"听见了这样肯定的回答，他满意地笑了。

我们下了楼，走到公寓的门口。考涅楚克和他的夫人也下楼来了。他没有穿大衣。我们劝他不要出门，他一定要送我们上汽车。我们坐上了两部小轿车，车子开动的时候，他们夫妇还站在公寓门前接连地挥手。

“这是我们的家，”我指着公寓的大门小声说。我多么愿意车子停下来，让我把楼上那个房间多看两眼。

九

从基辅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们去访问过苏联木偶戏大师奥布拉兹卓夫。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全苏戏剧家协会的招待会上见过他。他送了我们每个人一本他的新著，就是那本关于中国艺术的大书。他充满感情地谈起中国，他到现在还不能忘记他在中国过的那些日子。他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我们答应抽一个时间去看他。可惜我们的日程排得太紧了，他的工作也太忙。我们以为他星期天一定空闲，约好五点钟以前去看他，可是打通电话才知道晚上他还有演出的任务。这天上午落起了大雪，田汉和阳翰笙两位坐的那部小轿车半路上出了毛病。我们在奥布拉兹卓夫家会齐，已经是五点以后的事情了。女主人特地穿上中国织锦的旗袍来欢迎客人。屋子里显得十分暖和。我们在门廊上脱了大衣，跟着主人夫妇到客厅去。田汉同志带来一样礼物，那是湖南木偶剧团送给奥布拉兹卓夫的一堂大木偶：《辕门斩子》里的六个角色。老舍和田汉两位先后解释了《辕门斩子》的剧情。奥布拉兹卓

夫把六个人物的姓名、性格和生平简单地记了下来。然后我们又跟着女主人走进了就在隔壁的饭厅。餐桌上摆满了水果、点心、巧克力糖、酒瓶、酒杯和整套的茶具。不论酒、茶或者蛋糕都是那么可口。主人不断地跟我们碰杯，女主人接连地为我们切蛋糕、斟茶。我们害怕会耽误他的演出。他却一直在挽留我们。

奥布拉兹卓夫还让我们"参观"他的一些小玩具，小摆设。客厅里那张靠壁放的书橱顶上有一个玻璃匣子，七八个古装的西洋乐师在那里面或站或坐，拿着各种乐器。主人上满了发条，乐师们就奏起乐来。奥布拉兹卓夫告诉我这是两百年前意大利的精制品，可惜乐师们的衣服已经破旧了。饭厅里玻璃橱内装满了从各个国家来的小人。女主人取出一个南美洲的舞女放在旁边一个小圆桌上，她马上活泼地旋转身子，一直到女主人把她放进橱内为止。

这个家的每个房间都显得非常拥挤，但并不是地方特别窄小，却是放的东西太多。我相信孩子们一定很爱这个地方。这里有着太多的木偶、小人、玩具、面具……各种有趣的东西，精巧的手工艺品。墙壁上、角落里，到处都塞得满满的，连门廊里也是这样。奥布拉兹卓夫走遍了全世界，他从每一个角落带回来人们不大注意的小东西（从中国几个省份带来的东西也在里面）。这一切在他的家里聚齐，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小世界。他随时可以指挥他那些"小部下"为客人们举行小小的晚会。客厅里还有十几个玻璃鱼缸，排列在一起，缸里那么多的叫做"霓虹灯"的小小热带鱼，身上闪着一长条绿光，在美丽

的海草丛中游来窜去。

在考涅楚克家我特别喜欢那些乌克兰的大花酒瓶；在波列伏依家，我特别喜欢那些用树根雕刻的人像（好像也有康涅科夫的作品）；这里的一切都吸引住我的心。奥布拉兹卓夫在忙碌的工作以后，休息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面，一定非常舒适。我羡慕他有那么一颗“赤子之心”。

十

在莫斯科我参观了两次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美术展览会。那里的陈列品都是最近一年半中间征集来的新作。我在这么多的艺术品旁边来来去去，走过了又回转来，想把所有的精品都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但是我明白我没有很多的时间，我无法把数不清的珍宝全收进自己的口袋，我只能匆匆地走过它们跟前。

我至今还在怀念那个艺术的宝库。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它的陈列馆，每个民族都有它的杰作。展览品中不论是绘画或雕塑，也有少数手工艺的精品，形式和风格多种多样，艺术的魅力也有大有小，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劳动人民的感情和智慧，共产主义的气魄和精神。在这里陈列的艺术品中没有一样不是健康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本年度列宁奖金获得者、康涅科夫的杰作《粉碎旧世界的锁链》。这是一座大型的塑像。巨人参孙挣脱了锁链，伸出双手去迎接自由！这是多么鼓舞人的伟

大景象！这是多么感动人的艺术杰作。据说康涅科夫在一九〇二年就完成了这样的一座参孙的塑像，可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反动派毁坏了它。现在陈列在展览会上的这一座是他今年重新塑造的。康涅科夫用这座塑像来庆祝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也有充分的理由。只有站起来了的革命人民才能够“粉碎旧世界的锁链”。那么一个巨人伸出了两只有力的胳膊，整个旧世界在他面前怎么能不战抖哀泣？

1957 年 12 月 15 日写成，
1959 年 5 月 22 日修改。

给波列伏依的信*

拿起笔我仿佛还听见你那充满友情的笑声，保利斯·尼可拉耶维奇，在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我们跟你和裘丽亚匆匆地握手告别的情景。那是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夜间的事。四个多月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些时候我好像常常看见你含着笑对我眨眼睛。我忘不了我们在一起过的那些愉快日子。我指的是一九五六年我们在上海的短时间的相聚；我指的是一九五七年我在莫斯科冒着大雪到你的家去作客的那个夜晚；我指的是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阳光明媚、玫瑰花香的塔什干过的那些美丽的秋天的日子。倘使把它们一一地详细记下来，可能需要一本大书的篇幅。中国人同苏联人会见，这是今天极常见的事情，可是这里面包含着无穷无尽的故事！这个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因为你已经出版了厚厚的一本《新中国旅行三万里》，你还打算写更多的东西，你还准备再到中国来，走更多的路，认识更多的人。

可惜我没有你那种说故事的本领。在塔什干郊外的杜尔明别墅里，在宁静而凉爽的秋夜中，我们或者坐在空阔的饭厅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收获》第二期。

里，或者坐在灯光明亮的书报室内，总是你先开口，滔滔不绝地谈起你的见闻。你时而谈到你在美国受到华侨欢迎的故事，时而讲起你在俄罗斯大草原上的旅行，时而谈到塔什干的传说，时而讲起新中国的印象。你什么都讲，而且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听你谈话，我不仅得到更多的知识，而且得到更多的快乐。我至今还记得你讲到去年你亲眼看见的粮食的大丰收。麦子不仅堆满了仓，而且高高地堆在仓外把仓也遮没了，甚至堆起了一座一座的金字塔。我也记得你在美国某一个城市被特务监视着，华侨们知道你是从苏联来的朋友，便保护着你，请你去谈苏联的情况和新中国的事情。你用手比划，眼睛带笑，讲得多么愉快，多么生动。你把你自己感到的快乐也传染给听话的人。我的肚子里也装满了激动人心的故事。可是我没法讲得生动、逼真。我讲起我们工农业的大跃进，你的眼睛发了光，你带着多大的渴望说："我一定要再到中国去。"你已经不止一次地吐露过这样的愿望了。在我们国家里发生的每一样新鲜事情都牵引着你的心。你的平时的谈话里也流露出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对我国各方面成就的关心。

那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是十月十二日吧，那天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和一部分苏联作家在斯大林集体农庄作客），我们参观了棉花的丰收，从集体农庄回到城里，我和你在塔什干旅馆门前广场上等候一个朋友。前面是美丽的喷泉，后面是新建成的民族风格的旅馆。阶上阶下全是人。他们是朴实、善良、热情的塔什干市民。他们到这里来欢迎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代表，这些好客的主人常常在旅馆门前站半天只

为了得到来宾的签名或者得着机会跟远方的来客握一次手。整个广场上充满了友好的声音。人们在作自我介绍，或者互相问候。我有一种置身在友情的海洋中的感觉。你忽然指着包裹在白粉一样的丝丝喷泉中间的那朵石棉桃笑着说："棉花，白色的金子！"我当时还没有能充分体会到你这句话的意义。只有在大会闭幕以后我到费尔刚纳和其他城市参观访问的时候，我才看到了棉花的金字塔。棉花不仅遮盖了仓库，棉花还遮盖了公路。到处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白金。有时为了不要损害棉花，我们的小轿车不得不绕道。我们中国同志在集体农庄作客，不仅酒足饭饱，（多么可口的羊肉抓饭！）告辞的时候农庄主席还照当地规矩把一件一件的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次在农庄作客的是三个国家的代表，一共有二十几个人。主人抱来那么多的棉袍，那么多的锦绣花巾，那么多的小帽！人们喜欢谈乌兹别克人的好客，其实更重要的是丰富，是富足。在乌兹别克，跟在苏联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我所见到的就是富足。你那些讲不完的故事所告诉我的也就是苏联国家的富足与人民的幸福。

其实这富足和这幸福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苏联的广大土地上就没有一刻断过客人的脚迹。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心体会。苏联人总是做得多，说得少，做得大，讲得小。匆忙的旅行者收在眼底和心上的只是一鳞一爪，甚至可以说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从这一滴水也就看得出来一个伟大国家的惊人的成就。我们在乌兹别克参观过一个石油公司。跟你分别以后我又在西伯利亚参观

了刚刚建成的水电站。人在指挥室里按红绿色电钮就可以使若干里以外的机器转动或者停止。我们到了油井，一大片地上只见机器在升降，就像好些巨人在伸胳膊。每一架机器的附近装得有一台电话机。陪伴我们的总工程师打电话到不远处山脚下一间管理室，电话接通，机器就照总工程师的意思或停或动。在伊尔库次克那个相当大的水电站上，就只有寥寥几个工作的人。一九五四年我在苏联，可能是在斯大林格勒吧，匆匆地参观过一个电气化、自动化的工厂，我当时还不能充分了解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意义。但是面对着这些"无人管理"的机器，我不仅惊叹劳动人民的高度的智慧和巨大的创造力，我还深深地体会到苏联人的幸福：我看到了就要到来的共产主义的美丽景象。甚至在返国的飞机上，我也在想这样一件事情：倘使苏联的工厂逐渐地完全改建为高度电气化、自动化的工厂，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样的奇迹呢？我挖空脑子在想象那没有止境的丰富，在想象那没有限度的文化的繁荣！

那个时候宇宙火箭还没有升上天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五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也还不曾公布。但是每一个没有偏见的旅行者都感觉到在苏联随时会发生这一类的惊人事情。我在苏联常常受到兄弟般的接待。你就说过几次，要我把你的家当作我自己的家。乌克兰的剧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和乌兹别克的老诗人加富尔·古良姆也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我在苏联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感到陌生。即使我不跟翻译同志一起出去，在大街小巷也会有人给我引路。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朋友，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苏联人的心。我

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苏联丰富的不仅是物质生活，苏联人的精神生活也极其富裕。我的熟人中有老有少，也有各种不同的专业，但是他们知识的广博使我不能不吃惊。苏联人不仅是有高度文化的人民，他们的心甚至大得像海洋一样。我手边有一些苏联朋友的来信，他们的热情的语句使我的心暖和得好像受到阳光的照耀。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知道把他们的幸福分给成千成万的外国弟兄。他们懂得了解别人，同情别人，帮助别人。几个月前一位退伍的红军战士写信告诉我：要是中国领土受到侵犯，他愿意拿起武器重上战场。赫鲁晓夫同志写给美国总统的信里说的话就是每个苏联人心里所想的。苏联人把中国的安全当作自己的安全看待，这种兄弟般的共患难的友情的确值得每个中国人感激。

我好像又看见你在对我眨眼睛了，保利斯·尼可拉耶维奇。你会一边笑一边说："这算得什么呢？中国人处在苏联人的境地也会这样做的！"我没法反驳你，你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你说得多么好！一年半以前，就是我们到你家里作客的那一天，我和老舍曾出席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的座谈会，在会上听到了参加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苏联老同志和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中国老战士的讲话，在那个不十分大的厅堂里我仿佛见到了三十、四十年以前的壮烈场面。这种鲜血结成的友谊就是你那句话的最恰当的注解。我们亲身体会到每个苏联人都在发展这种友谊，我们中国的弟兄自然也不肯落在后面。倘使我说：这种友情会继续到子孙万代，这也决不是夸张的感情话。因为每个苏联人、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愿望，也有这

样的决心。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场面，一个使我兴奋了好久的场面。仍然是在一年半以前，就在那个金碧辉煌的“大剧院”里面，我们坐在正厅的后排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由一位出色的年轻演员担任女主角)。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中排看戏，他旁边留着一个空位。前一天我也在这个戏院里看见赫鲁晓夫同志。他陪着好几位外宾坐在离舞台最近的右面特别包厢里。今天他却坐在一般观众的中间。第三幕开幕不久，从外面进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赫鲁晓夫同志的身边坐下了。我知道来的是谁。我激动地望着那两个座位。我仿佛看见赫鲁晓夫同志侧过头对那位客人微笑。舞台上王宫里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动人的音乐，美丽的舞姿……陶醉在爱情里面的年轻王子多么快乐地在跳舞，最后才发觉他被黑天鹅欺骗了，黑天鹅发出可怕的笑声带着女儿走了，王子绝望地从富丽堂皇的厅堂里冲出去。幕落下来。人们疯狂地拍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正厅里电灯早已亮了。观众们全站起来一直在拍掌，他们意外地发见了毛泽东同志，高兴得不得了，大家向着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拚命拍掌，不断地拍掌。整个戏院的眼光完全集中在毛泽东同志的脸上。毛泽东同志站在赫鲁晓夫同志的旁边，含笑地微微挥着手。两位领袖在全体观众敬爱的眼光的护送下，像两个亲密的弟兄从容地走出了正厅。然后人们愉快地谈起话来。大家都是那么地激动。我在场外大厅里跟在成双成对的男女观众后面散步的时候，我还感觉到一股暖流在我的全身激荡。我比任何时

候都更深切地意识到我生活在我最亲爱的弟兄中间。我的四周是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的这种感情你一定能够了解，因为你也曾听见了红场上列宁—斯大林墓后面的掌声。就是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就是在红场上检阅典礼结束的时候，观礼台上的人们跑到后面去，包围着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向他们鼓掌欢呼。你告诉我，你正在向全苏人民广播游行盛况的时候，听到了这种春雷一样的掌声。这样的掌声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多么大的鼓舞！即使只听过一次这样的掌声，即使只见过一次这样的场面，人一生也不能忘记。两位领袖肩并着肩，两国人民肩并肩向前迈进，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迈进。庄严、美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特别是在苏联发射的宇宙火箭进入行星轨道、宏伟的七年计划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以后，大家好像看到了共产主义的面貌。倘使这些天我有机会同你在一起，你一定会讲出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故事。其实令人欢欣鼓舞的故事是永远讲不完的。对于我们两国人民，“莫斯科—北京”这两个地名连在一起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可以传到子孙万代的。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朋友们谈起，应当有人把这些故事详细地记下来，应当有人为“莫斯科—北京”，为这种可以传到子孙万代的友情写出伟大的诗篇，为人民的幸福写出不朽的作品。这是我们两国作家的共同的责任。提起这个责任我就常常想到你，你写出了那么多的苏维埃英雄的形象。你让

我们接触到“真正的人”的心灵。建设共产主义的平凡的人们在你的笔下显得多么生动、多么可爱、多么崇高！你又是那么热情地爱着我们两个国家和两国的人民。……你一定了解我这个意见。苏联作家跟苏联人民一样，一直走在我们这个大行列的前头。苏联作家对于我们共同的文学事业已经尽过了很大的努力，而且有过辉煌的成就。在现代世界文学中，苏联文学一直在发射最大的光芒。苏联文学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种悲观、绝望、痛苦、呻吟、欺骗别人、装饰自己的资产阶级文学的霉臭，发散出新的健康的气息，唤醒了无数年轻的灵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逃避现实、钻牛角尖、在无出路中找出路的厌世文学以及满足于色情陶醉和官能享受的变态文学风行欧美，使得人们或则意志销沉，坐待毁灭，或则尽情享乐，加速灭亡。苏联文学正如不断上升的一轮红日，照彻人们的心灵，用光明和希望鼓舞人们前进。为集体利益献出个人一切力量的无产阶级英雄永远站在前面给人们引路。苏联文学对于全世界人心的影响是太深远、太广泛了！我在这里讲的只是苏联文学的过去和现在。至于未来，那应该由你、由你们来讲。我只能谈我的看法，我的希望：不用说，前途是光芒万丈的。其实这并不止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一个人的希望，全世界亿万的人都把苏联文学当作他们最好的伴侣。全世界的读者都把希望寄托在就要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这里面自然有中国的读者，一定也有我在内。所有你们的读者和朋友都无限兴奋地祝贺大会开得特别圆满，特别成功，都期待着会后出现一个更大的文学发展的高潮，都等

待着读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仿佛看见你在讲台上热情地发言，保利斯·尼可拉耶维奇。那么多有才能的作家聚会一堂，讨论人民文学事业的发展，这的确是今年的一件大事。你们挑选了很好的时间召开代表大会，你们一定会配合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而且为人民文学事业更大的发展和繁荣开辟更宽广的、更光辉的道路。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就要大量地在苏联作家的笔下产生。不用说，我所期待的那些作品也将广泛地流传在读者中间。其中一定也有你的作品。那个时候你已经完成了你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访问中国的计划，看到了不断地跃进的人民中国的新面貌，结交了无数的中国朋友，记录了几十册的笔记，(我看见你记笔记记得多么快!)写出了你所想写的东西，中国的读者都习惯叫你作“老波”(你很喜欢这个称呼!)了，我想象得到你会发出多么愉快的笑声，会滔滔不绝地讲不完动人的故事……

写到这里，我应当提起前不久你寄给我的那张“兔子拜年”的画片了。兔子胸前那个大口袋里面装满的好像是贺年片，又好像是书，也可能不是书。但是你把它们全当成书，而且一一写上我的名字。我明白你的用意，我感谢你的鼓励。不过我倒愿意我也找到一张这样的贺年片，那么我就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在那许多“书”的封面上，把画片寄给你。因为你的书已经在全世界风行，而且这几年来你的确写了不少的东西。我最近还在本年度列宁文学奖金候选人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情。我知道你的近作《大后方》受到

苏联读者的欢迎。你得允许我在这里祝贺你创作上的丰收吧。……

我在春暖花开、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以冲天干劲向着锦绣前程飞奔的时候写信向你问好，也向苏联的作家们祝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特别暖和。莫斯科可能还在飞雪。但是向着共产主义迈进的苏联人民的雄伟步伐一定会在你们辽阔的国土上带来一个无限壮丽、无限温暖的春天。这不仅是苏联人民的春天，这也是全人类的春天。让我们两国的作家为这个春天写下更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更多光辉灿烂的诗篇！

1959年3月4日。

塔什干的节日

一

飞机离开塔什干的时候，我埋下眼睛，默默地望着这个一片翠绿的美丽的城市。

塔什干，这个充满阳光的大花园，我真喜欢它的美丽的喷泉，幽静的林荫道，富足的生活，热情好客的人民！我在这里见到、听到、接触到的一切全拴住了我的心。我来到这里好像来到自已熟悉的地方，好像到一个亲戚家里作客一样。我第一次踏上塔什干的土地，就有一种非常舒适、愉快的感觉。在那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我们的车子沿着扎满彩色电灯泡的林荫路向郊外别墅驶去的时候，我仿佛在欢度节日。

在塔什干我们的确过了一个美丽的节日。亚非两大洲五十个国家的作家们在这个天青日暖的中亚细亚城市里会见，恳切地交谈，并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人们走了长远的路程，从不同的方向来到这里，寻找一种共同的语言，寻找一条共同的道路，希望通过文学事业的发展、通过团结与合作来促使亚非两洲人民共同的愿望早日实现，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繁荣与幸福。

在塔什干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道路。在纳沃伊剧院里继续了六天的会议中，作家们彼此以心相见，互相倾吐了欢乐和痛苦，希望与决心。在会上每个人都献出了个人的智慧和他带来的本国人民的智慧，献出了自己的心和他带来的千万读者的心。在会场里我们听到了沉痛的控诉，我们也听到了战斗的呼声。我们得到了鼓舞的力量，也感到了友情的温暖。通过这次的大会，五十个国家的作家们庄严地向全世界宣言：

人民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这是多么响亮的语言！这是多么明确的道路！文学事业跟人民的命运是万万分不开的。只有在人民获得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文学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昌盛。我们听到非洲国家同行们的恳切而沉痛的发言，谁都深切地认识到要发展文学创作，就必须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使得非洲作家如此激动的感情也同样地激动着我们。我们的心跟着他们的热情的语言悸动，我们伸出手紧紧握住他们的手，不止一次地互相说着“友谊、和平、民族的独立、人类的美好的将来”这一类的字眼。

在短短的六天中间，纳沃伊剧院成了五十个国家的作家们的共同的“家”。人们坐在这个朴素而庄严的厅堂里，毫无顾忌地谈着自己心里的话，坦白地交换意见，认真地进行讨论，互相鼓励，共同研究；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得到充分发挥的

自由，即使有争论，也终于达到了互相的了解和一致的协议。最后通过《告世界作家书》的时候，会场里响起了那么热烈的掌声，真是所谓“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人们真愿意借自己一双手表达出又深又浓的感情。一位上了年纪的作家走出会场激动地说：“现在我的信心更大了，我的勇气更多了，我的头举得更高了，我觉得自己更庄严了。”他说得多么好。任何一个作家意识到自己跟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不用说，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关于塔什干的会议，别的许多作家一定有更生动的叙述和更出色的描写。但是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作家都从塔什干带走了同样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塔什干精神”。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人在谈论“塔什干精神”了。我相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人们会不断地谈论它。对一切善良的作家来说，它有一种鼓舞人的巨大力量。“塔什干精神”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在那个美丽的城市里，我每天、每时、每刻都见到它，都接触到它。在会场里，在广场上，在集体农庄，在热闹市场，在人们的笑脸上，在愉快动人的音乐声中，在欢乐轻快的舞姿上……我都感染到“塔什干精神”。不仅在塔什干，甚至在莫斯科，在北京，在上海，我也接触到它，感染到它。

我想说，我们的空气里充满着“塔什干精神”。我想说，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友谊，有和平，有幸福的生活，有为着民族独立的持久斗争，有为着建设新生活的忘我劳动，有为着人类

幸福的献身的努力，那么就一定有“塔什干精神”。

我离开塔什干已经半年多了。可是我又觉得我并没有离开那个城市。我的心仍然留在塔什干，或者塔什干仍然留在我的心上，随便怎么说都行。总之，我仍然看见庄严的会场，广场上的丝丝喷泉，站在旅馆门前等待签名的热情的市民；我仍然听见那些振奋人心的讲话；我仍然感觉到那种充满感情的热烈的握手。我的心仍然在欢度节日。

二

昨夜我回到了杜尔明别墅。还是那一片盛开的玫瑰和大理花，还是那一片灿烂的阳光；饭厅里餐桌上仍然有一盆一盆紫色的和绿色的葡萄，一大盘一大盘切开了的浅黄色的甜瓜和粉红色的西瓜；休息室内方桌上仍然有那么多的纪念邮票和风景片，从邮电局来的那位非常亲切的年轻姑娘俯着头在刚扎好的书包上写地址。我拿了一本书在园子里长椅上坐下，刚翻开书页……可惜就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我做了一个美丽的梦。但是梦太短了。要是梦能够继续做下去，那么我会走到饭厅里，在长餐桌前面坐下来。朋友们坐在我的旁边。凯尔巴巴耶夫斯文地走进餐厅，客气地对我们说了“早安”，默默地坐在餐桌的另一头。然后波列伏依匆匆地走进，眨着眼睛含着笑招呼了大家，坐在我的斜对面，吃完早点，喝着茶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就在这个饭厅里我度过了不少愉快的时间。我常常在饭

后喝着茶或者吃着可口的甜瓜，心情舒畅地听波列伏依讲塔什干的传说和会场内外的一些事情。有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我们三个中国同志和一位格鲁吉亚的作家在这里谈中国诗，谈格鲁吉亚的风俗、景物和葡萄酒，谈了一个半钟头。土克曼的老作家凯尔巴巴耶夫讲话不多，但是他那充满善意的微笑比秋天早晨的阳光还可爱。保加利亚的诗人安·托多罗夫总是那么匆忙。每天天刚亮，他就坐在休息室里，打长途电话到索非亚去，报告大会的消息。有时他把一篇长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很响亮地从头念到尾，到用早点的时候他的嗓子已经哑了。我的住房在饭厅的隔壁，休息室在饭厅的斜对面，中间有一条窄小的过道。波列伏依住在楼上，他的房间就在我这个住房的上面。他开玩笑地说，他总是托多罗夫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波列伏依也喜欢打长途电话。晚饭后我到外面去散步，回来走过休息室门前，常常看见波列伏依坐在电话机旁边，他满面笑容地在讲什么。我刚到别墅的那个晚上，他拿着听筒望着我笑了笑，就说："巴金来了，他现在站在门口……"我知道他正在跟裘丽亚讲话。有人告诉我，在苏联作家中间波列伏依和裘丽亚是一对感情最好的模范夫妻。后来我从塔什干到莫斯科，回国的前夕在大克里姆林宫的接待会上见到他们夫妇。我对裘丽亚讲到这个"舆论"，她谦虚地说，他们不过是一对普通的苏联的夫妻。一九五七年我和老舍、梅兰芳、高莽三位在他们家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喜欢这个和睦的家庭。我们都知道波列伏依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跟裘丽亚通电话。塔什干并不算远。裘丽亚在莫斯科，还可以听见她的保利斯从

北京、从上海、从重庆、从世界上其它大都市里发出来的声音。在杜尔明别墅里，我好几次碰见波列伏依拿着话筒跟家里的太太谈话。我常常因为这件事情跟波列伏依开玩笑。但是一个跟长途电话有关的故事至今还使我的心激动。一九五六年十月波列伏依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遇见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发生了。匈牙利作家得不到从祖国来的真实消息，为那里的情况担心。波列伏依问到了匈牙利作家家里的电话号码。他立刻打电话到莫斯科要裘丽亚跟布达佩斯通话探询匈牙利的情况。波列伏依在南中国走了一转回到北京，裘丽亚的电话来了。她费了大力跟匈牙利作家的夫人通了电话，知道一切安好。过了两天，匈牙利作家也回到了北京。波列伏依在一个会上见到他，带给他这个好消息。匈牙利作家含着眼泪紧紧地拥抱波列伏依。《真正的人》的作者不仅用笔写了无数动人的故事，他也用行动写下了感人的诗篇。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波列伏依的“热血侠肠”是最适当的了。我跟他相处愈久，我对他的敬爱愈深。可惜我在杜尔明别墅里就只住了十天，会议闭幕后，他马上回莫斯科，我也动身到撒马尔汗和费尔刚纳去参观访问了。

杜尔明别墅的客人不多，除了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部分同志外，还有二十多位印度的作家。印度的作家们住在后院的两所小洋房里。他们常常早出晚归，偶尔也在这里开会，有时争论得厉害，我走出房门就听见他们的声音。就在这个饭厅里我们同印度的全体代表联过欢，为我们两国人民的

友谊、为两国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干过杯。个别的印度朋友有时也过来找我们谈话，早晨或者晚上他们也会在休息室里坐一阵，聊聊天。休息室里有各国的报纸，有邮票，有画片，有信封信笺。有一位邮电服务员在这里接待我们。除了打长途电话得付通话费（我常常看见波列伏依付钱给那位年轻姑娘）外，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取用一切。报纸也好，邮票也好，信封信笺也好，你要多少就拿多少。你把桌子上的拿光了，邮电服务员又从抽屉里取出更多的来。那位姑娘看见我们，总是露出很亲热的笑容。从早到晚她一直待在这个光线充足的宽大房间里，她的服务态度永远是这么周到。

两位饭厅的服务员待我们就像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她们为我们特地沏了一壶一壶的绿茶。听见我们赞美甜瓜可口，她们就一大盘一大盘地端上来。除了香喷喷、热腾腾的羊肉抓饭外，每顿饭都有不少合我们口味的东西，油炸包子、饺子、馅饼……。她们要看见我们吃得满意才放心。我们在城里开会，在城外吃饭，有时参加晚会回来得很迟，每天三顿饭也够她们累的了！十月十四日下午我们搬进城，到塔什干旅馆，准备第二天清早搭飞机去撒马尔汗（印度作家在这天上午也搬进城去了）。她们跟我们同车进城，把我们送到旅馆门口。她们要回家去度假日。好些人为我们忙了十多天，现在也应当休息了。

我多么喜欢杜尔明别墅的早晨。阳光是那么明亮又那么温和，空气清爽得好像要把我的心也洗成透明似的。四周是

那么宁静。我在院子里散步，我在花丛中闲走，我顺着别墅门前的小路走出去，我走一步，就仿佛觉得有一只手在轻轻地拂拭我身上的尘土。这只是说明我有一种多么舒适的感觉，其实在别墅门前的土路上，我的脚步下得稍微重一点，就会扬起轻尘。有时我走得远一点，走出了小路，拐了弯，我会碰见一位穿长袍戴小帽的老人骑着小毛驴悠然自得地走过我的身旁。

别墅的四周是一片棉花田。我走过门前小路，就看见两旁田里刚刚绽开的棉桃。尽管枝子不高，但是棉桃不少。在别处棉桃已经采下来了。别人告诉我今年棉花大丰收。在这里人们叫棉花做“白金”，棉花产量最高的乌兹别克就是一个“白金国”。我离开了杜尔明别墅到集体农庄去作客，到别的城市去访问，到处我都看见一大堆一大堆、一大片一大片的棉花。旧日的仓库早已容纳不下了。

塔什干城里纳沃伊剧院门前的广场上，有一个石头的大棉桃，安放在喷水池的中央，日日夜夜从不停息的喷泉把棉桃包裹在它那细长的水柱里。在节日里彩色的电灯光把喷泉照得像彩虹那样地美丽。这里是塔什干居民经常徘徊的地方。这个大棉桃就是乌兹别克的象征。

三

在纳沃伊剧院的正对面，在广场的另一边，便是刚刚落成的塔什干旅馆。旅馆是为了亚非作家会议修建的。这个有民

族风格的七层楼的建筑物既美观大方，而又非常朴素。对住客来说它也是很舒适的。在开会期间，我常常到这里来找人，或者到楼下找大会招待组派小车送我回杜尔明别墅去。中国代表团的一部分同志住在旅馆的五楼，我有时也到五楼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后来大会闭幕，代表们分批到别的加盟共和国去参观访问的时候，我从郊外搬进城来，先后在这里住过三夜。十九日大清早我离开旅馆去飞机场，这里已经是冷冷清清的了。但是在开会期间塔什干旅馆就像一个闹市。

的确，我第一次来到塔什干旅馆，只看见门前万头攒动。我挤出了一身汗，才走进了旅馆的大门。那么多的男男女女拥挤在旅馆门口，只为了看一眼从五十个国家来的客人，或者得到他们的古怪文字的签名。不论在早晨，或者傍晚，这里总是人多。好客的塔什干市民为了欢迎这些罕见的宾客，站上几小时也很高兴。客人中间最受注意的是披大袈裟的锡兰和尚和每天换几次衣服的加纳部长夫人；印度男人的紧身衣和女人的沙利、缅甸人的长袍和白头巾、加纳人的金黄色底有条纹的宽大罩袍特别满足了塔什干年轻人的好奇心。不用说，其它国家的代表也受到同样的尊敬。参加会议的作家们异口同声地感谢塔什干市民接待客人的热情。他们那么亲切地对你微笑，那么热烈地跟你握手，那么热情地为你安排一切，那么愉快地待在你的身边，对你讲一两句问好的话，那么高兴地送给你乌兹别克的鲜花。你到任何一位塔什干人家里作客，主人会用那么丰富的饮食来款待你们。即使你在旅馆里，不论是塔什干旅馆或者杜尔明别墅，桌子上每天都有新鲜

可口的葡萄、甜瓜和西瓜。它们都是四郊的集体农庄庄员送来的。星期天休会，全体代表分成若干组，去访问不同远近的各个集体农庄，我们和一部分苏联作家到杨吉一尤尔区的斯大林集体农庄去，在那里受到了农庄主席和庄员们的盛情的款待。我们参观了晒棉场、托儿所、牲畜房等等地方之后，来到农庄的果园，葡萄架下垂着累累的果实，瓜田里躺着肥大的甜瓜；在不远的地方安放着长条的铁盒子，里面盛着灰，燃着炭火，盒子上摆着一排一排的羊肉串，散放着香气。农庄的主人给我们捧来刚刚摘下的甜瓜和葡萄，我从没有吃过这么鲜美的水果！在一个宽敞的饭厅里，我们不仅酒足饭饱，还欣赏了对我们非常亲切的优美的乌兹别克音乐。一位年轻的女庄员为我们跳了多么动人的民间舞蹈。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酒席上那么多的充满友情的语言。每张脸都发红，每个人的声音都在微微颤抖，中苏两国人民间深厚的友情激动着每个人的心。

我以后还有机会谈到乌兹别克人的好客。现在我已经穿过密密的人丛走进了旅馆。有人向我伸出手来了。在楼下的厅子里我遇见了好些朋友。被称为"泰国鲁迅"的小说家乃古拉·市巴立，我们坐同一个飞机从莫斯科来到塔什干，他永远那么谦虚、那么和蔼地招呼人。朝鲜著名作家韩雪野那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两年前他还到我家里作过客，我们在一起讨论过怎样使文学事业得到更大发展的问题。印度的作家班纳吉也显得年轻了，他带着亲切的笑容问起我的妻和孩子。……

到处都是人声。人们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架电梯容纳不了(还有两架正在安装)，有的人在厅子里等电梯就互相交谈起来。有的人结伴从宽大的楼梯走上去。每一层楼都有人拦住我们。我在这里见到了不少访问过北京和上海的各国作家。他们又拉住我，给我介绍新的朋友。我从小听惯了一句俗话："同行相忌"。我一直觉得它不对。现在我更有理由说：同行相见分外亲热了。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旅馆，我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固然塔什干主人的殷勤招待使我们感到"宾至如归"。更重要的还是这里成了一个大家庭，不必等到走入会场、进行讨论，我们中间已经有了共同的语言了。在这个大旅馆内，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屋子里都有人在交谈，而且谈得那么亲密，那么愉快。在这里所有的作家都成了知己朋友。

塔什干旅馆跟杜尔明别墅相比，一动一静仿佛两个世界。在这里，你休想安静片刻。你刚刚坐下，就有人来叩门。或者是熟人来拜访(人们多么急切地渴望见到分别了一个时期的朋友)，或者是朋友来赠送礼物(互赠书籍，这是极寻常的事，人们带着自己的著作走了千万里路，只为了让新旧朋友多了解自己)，或者是新到的各国作家来找人交换对大会的意见(既然大家相聚的时间有限，为什么不利用机会好好地畅谈一番)，或者是编辑来拉稿，记者来访问，摄影记者来照相，电台工作同志来录音(有的人从莫斯科来，有的人来自兄弟国家，更多的人在本城工作：他们待人客气，讲话也很周到，但是工作态度认真而且十分积极)；此外各国代表团的会外活动相当

多。会前和会外的商谈对大会讨论的顺利进行也有帮助。

人固然需要安静，可是他更需要朋友。人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这里来聚会一星期，商谈大家共同的事情。整个旅馆里充满了友情的声音。即使没有叩门的人，谁又甘愿把自己关在房里？

可惜我搬到塔什干旅馆来，已经是在大会闭幕以后了。那天早晨广场上还是人声嘈杂，旅馆门前车辆来来去去，把代表们载到车站和机场。好客的塔什干人一清早就赶来跟他们尊敬和热爱的客人告别。仍然是握手、签字、赠送小礼物。作家们走出旅馆就受到包围，谁都愿意在这些可爱的人中间多留片刻，谁都想把自己的感激之情借这个签名长留在塔什干主人的心上。

纳沃伊剧院里仍然十分热闹。会议仍然在这里进行。这是乌兹别克作家代表大会。据说会期一共两天，不过我只参加了上午的大会。在会场里我看到了一些熟面孔。不用说椅子上坐的大半是陌生人。休息的时候，我在人丛中找不到我的朋友维克多·彼得罗夫，才断定他动身回列宁格勒去了。一个星期以前就在这个剧院里，书籍展览会上，一个年轻的苏联人急匆匆地向我奔过来唤着我的名字，我没有想到列宁格勒大学的彼得罗夫已经到了塔什干。一九五七年我在列宁格勒的"莫斯科旅馆"里跟他见第一面，深夜一点钟他还到车站来送别。在我的脑子里他永远显得那么善良，那么诚恳。我在杜尔明别墅住下来，还往列宁格勒寄了信去，信刚寄出，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讲中国话比一年前流利多了。他从列宁格

勒来列席亚非作家会议，同来的还有他的大学里的同事。他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正在写一本题作《鲁迅的创作道路》的书。……书籍展览会比大会早一小时开幕。这以后我每天在会场里都有机会找他谈话；大会休会的时候，我们又参加同一个小组会。他还陪我出席过塔什干的读者座谈会，在台尔曼文化休息公园里跟本城的读者们见面。但是七天过得这么快！

在会场里我还见到一位波兰的朋友。魏德志教授也是一个汉学家，只是他不习惯讲中国话，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在上海的家里接待过他，可是在这个会场里，要不是他走到我的座位跟前来招呼我，我却难找到他的踪迹。他和彼得罗夫都是观察员。他住在塔什干旅馆，我访问了撒马尔汗回来的晚上，在楼下饭厅里遇见他，后来又到他的屋子里去坐了一会儿，才知道莫斯科天气不好，飞机停飞，让他在塔什干多住了一天。

那天晚上我临睡前还当窗站了好一阵。广场上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喷泉单调地响着。那么多的电灯静悄悄地照亮这一大片空地方。我有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

四

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我和八九个中国同志得到老诗人加富尔·古良姆的邀请，在他的家里过了一个难忘的快乐的夜晚。

古良姆住在一条僻静的街上。汽车在街口停下来，我们

听到一阵唢呐声(我年轻时候在成都的老家里听惯了这种音乐),没有想到前面就是诗人的家。我们下了车,走了两步,觉得眼前一亮,好些人在欢迎我们。乐人们吹着唢呐敲着手鼓,主人戴着乌兹别克的小花帽,穿一套深灰色西服,一只手按住胸口,默默地对我们深深鞠躬。人民演员塔玛拉·哈侬垂着两根大辫子,穿着有小背心的民族服装,热情地同我们握手。我们跟着主人走进了院子。乐人们留在院子里继续奏乐,古良姆和哈侬边走边跳,也拉着客人对舞。萧三同志首先跳起来,别的客人也先后跳了几步。乌兹别克的舞蹈是那么吸引人。可惜我不懂步法,只好在旁边鼓掌助兴。主人把我们引到正屋前面,又对我们鞠躬行礼,然后让我们走上台阶进到正屋,通过门廊走进饭厅。

饭厅里已经有了一些客人。我看见三位锡兰的作家和两位缅甸的作家;还有一位格鲁吉亚的老诗人,他是主人的老朋友。他们都坐在那张大餐桌的旁边。餐桌的确配得上一个"大"字。它几乎要把屋子填满了。靠里放着陈列小摆设的橱,我没有注意是一个还是几个,因为我一进饭厅,就被主人让到里面,坐在餐桌的一头,恰好背向着。主人把我安顿下来,又让格鲁吉亚老诗人坐在我的左面,他自己坐在餐桌的另一头,就在我的对面,也是在靠近门的地方。饭厅外面(就是在我的右面)还有一个房间,好像是阳台改装的(或者就是一个阳台,晚上我看不清楚),那里也安放了餐桌,也摆满了酒菜和水果,餐桌四周坐满了本地的客人。

大家都坐好了。老诗人站起来举起酒杯,倾吐了他对中

国和中国人的深厚的感情。他一开始就是那么激动，那么高兴，他要求我们尽量地喝酒。他看见我们的酒杯都空了，便向我们告罪，他暂时要到外面那个房间去张罗宾客，现在请他的学生和亲戚塔玛拉·哈依代他作主人。塔玛拉·哈依也拿起酒杯，说了许多热情的话，还讲到她过去在中国各地受到的款待。她不但向我们敬了酒，她还唱起歌，跳起舞，她一边跳一边移动，跳到谁的面前就把谁拉起来跟她对跳。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房间快要被餐桌填满了。（我现在还没法肯定地说究竟是一张大桌子，还是好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我当时对什么都不曾注意，并非我不想注意，只是我太激动了。那个晚上，我一走进古良姆家的院子，我就无法控制我的感情。那个晚上我听到了那么多的热情的语言，而且我好几次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了我心里的话。）空间是那么小，可是我看见同志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愉快地转动身子，两只手灵巧地上下舞动。

古良姆又从外面进来，找我们谈话，陪我们喝酒。有一次他还请来一位九十岁的老艺人给我们演奏了芦笛。这个简单的乐器在老艺人的嘴上会发出那么美妙的声音。大家兴奋地喝着酒，吃着乌兹别克的羊肉串和大饼。主人来来去去到两个席前敬酒，不停地干杯，谁也看得出他的热情在身体内满溢了，他在想办法倾吐它们。我觉得整个房间也容不下他的诗情和友情，我们受到了感染而沉醉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了红光，每一对眼睛都在发亮。老诗人两次向着我走过来，激动地望着我，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好，这

样善良？”我两次用颤动的声音轻轻回答："因为你们苏联人，你们乌兹别克人是这样好，是这样善良，你们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他不断地问："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呢？你们为什么不常常来呢？你们为什么不多住些时候呢？”他还问了一连串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只好用热情的拥抱来结束这样的谈话。我用力紧抱着他那结实的身体的时候，我并不感到一点勉强和拘束：我们彼此吻着脸颊，眼里含着泪，忘记了四周的一切，也忘记了屋子里的人们，我们只感觉到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又深又浓的友情。

老诗人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的家就是你们每个人的家。我的大门永远为你们大开着。我们每个乌兹别克人的家都是中国人的家……”塔玛拉·哈侬说："我真诚地爱中国人民。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见中国人，我的心就跳得厉害，好像你们的血液也流在我的血液里面……”他们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中国客人的心。中国的同志们接连地站起来讲话，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为主人们的健康干杯。诗人的夫人也出来了，一位多么贤惠、多么朴素的女主人！诗人的小女儿也出来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我们反复地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的家也就是大诗人古良姆的家和大演员哈侬的家。我们家的大门永远为古良姆一家人开着，我们家的灯永远为他们亮着。

羊肉抓饭端了上来。然而不论宾主都没法在身体内找到地方来容纳它们，我们不仅既醉且饱，而且装满了友情。一顿晚饭吃了将近四个小时。一位缅甸客人和一位锡兰客人因为

要参加团长会议早已告辞走了。格鲁吉亚的诗人和一位锡兰的教授还留在这里。我们喝着酒谈着话，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我们都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主人有点支持不下去了，不是由于疲劳，而是由于过分的激动。他站起来，又坐下，刚坐下又走出去，过几分钟又走回来，含着眼泪望着我们，张开口说了两句就接不下去。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感动地说："你们走了以后，我会长久地想起你们，你们的声音和笑容还留在我的家里……"我回答他："我们从这里出去，带走了您的声音和您的笑容，也带走了塔玛拉·哈侬的友情。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回中国，带给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永远记住你们，永远热爱你们。"

人们捧出来许多礼物。古良姆递给我一本古版的乌兹别克文翻译的印度诗集，要我带给郭沫若；他又交给我一双东方式的女鞋，要我带给宋庆龄；他亲手给我戴上一顶乌兹别克的小花帽，在我的腰间系上一条锦绣花巾。他还送给中国男同志每人一顶小花帽，女同志每人一幅花巾；送给锡兰客人一个瓷人。他又抱出一大堆自己的诗集，送给我们每人一部。他翻开第一本诗集，要在里封面上签字。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他的心跳得厉害，他拿着自来水笔放不下去，他接连地摇头。哈侬在旁边劝他："不要写了，您休息一会儿吧。"她亲切地说话，想把他扶到外面去。但是他刚站起来又坐下，笔落在纸上签了一个名，就发觉没有墨水了，他着急地小声说："墨水！"有人把墨水瓶拿出来了。他用笔蘸了墨水，又在一本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看看并不满意，忽然把左手的大拇指蘸了墨

水，在书页上捺了指印。哈依又劝他休息，他抬起头眼里含着泪，好像在责备我们：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要走呢？他摇摇头，又动手签名。等到把书送光了，他站起来，又跟我拥抱一次。“要再来啊，要再来啊！”他接连地说。

古良姆全家人把我们一直送到大门口。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院子里葡萄架下有一张大方床，上面铺了一幅有民族色彩图案的大床毯，四周放了几个坐垫，靠近树的地方还有一把乌兹别克的弦琴。老诗人坐在这张床上，弹着琴，唱着自己的诗，这应该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可惜我没有机会见到它。

大汽车慢慢地开动了。我侧过头，还看见老诗人站在那里，右手按住胸口对我们深深地鞠躬。他一声不响，但是他的面容是那么地严肃，那么地诚恳。

五

十月十五日我和一部分中国同志乘专机去访问撒马尔汗。十六日我们又从塔什干搭专机到费尔刚纳去，那天晚上就住在费尔刚纳。十七日早晨我们从费尔刚纳坐汽车到安集延，十八日正午再坐小客机回到塔什干。十九日早晨图一〇四喷气式客机载着我们飞向莫斯科。

这就是我们的乌兹别克旅行的一笔帐。像这样简单的文字念起来很枯燥，可是每一句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内容。我在老诗人古良姆家的宴会上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和苏联人见面，这是一件大喜事。”我有了好几年的经验，才充分了解这句

话的意义。

在撒马尔汗我们参观了帖木儿王朝的陵墓和兀鲁伯王天文馆的遗迹。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整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在茶厂里欣赏了芳香的名茶。在费尔刚纳，我们参观了丝绸厂和纺织厂，访问了工厂附设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同孩子们在一起无限欢快地度过了一个钟头；我们访问了师范学院，受到院长、教授和同学们热情的接待。在安集延我们访问了石油公司，总工程师陪我们到完全自动化的油井去，让我们看明白采油机的操作过程。在安集延我们两次去运河工程处，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夜晚和一个愉快的早晨。

在每一个城市，我们都找到了友谊。其实不能说是我们找到什么，是友谊包围了我们。我们一直生活在友谊的空气中。不论是在几百年前古建筑物的废墟上，或者在绿树丛中一座花园化的工厂里，不论是在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中间，或者在健康、热情的大学生们跟前，我都感觉到友情的温暖。我们跟乌兹别克人接触越多，越觉得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共同的东西紧紧地拴住了彼此的心。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在谈论著名的连接东西亚的“丝绸之路”，和历史悠久的友情：一千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历尽千辛万苦到过这些城市，五百年前乌兹别克大诗人纳沃伊的长诗《法尔哈德和希琳》里也塑造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形象。现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又把我们和乌兹别克人更加紧密地系在一起。

在这些日子里跟我们一起访问乌兹别克各城市的还有日本代表团的五位作家。日本朋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真空

地带》的作者野间宏。我读过他的作品，可是在塔什干我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朴素、诚恳、谦虚。我们同路旅行了三个城市，虽然没有畅谈的机会和时间，可是我们同样地领略了好客的乌兹别克主人的盛情。有一次在运河工程处，我们参观了水闸，主人把我们带到花园中一个平台上。餐桌已经摆好了，有瓜，有葡萄，有番茄，有大饼，还有许多可口的东西。主人开了香槟酒，跟我们每个人碰了杯。陪着日本代表团旅行的苏联翻译莫罗左夫也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讲了话。他激动地说，在莫斯科就听见人谈起乌兹别克人好客，这两天才亲身体会到乌兹别克人好客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担心自己会胀死在这些地方，不过他仍然十分愉快。他虽然是苏联人，又是工作人员，在这里不能算客人，但是他要不在这个席上倾吐他满腹感激之情，他就没法安静地度过这个晚上。他提到胀死，因为我们刚刚在集体农庄喝饱了葡萄酒、吃饱了羊肉抓饭来到这里，没有想到运河工程处的同志们又用丰盛的酒筵来款待我们。仍然是浓浓的红菜汤，香喷喷的羊肉串，大盘发亮的羊肉抓饭。主人不断殷勤地劝客。陪我们来的州党委书记望着我们微笑。我不能不接连地举起酒杯，拿起汤匙，动起刀叉。我的脸更红，我的心更热。我也站起来敬酒。我首先请莫罗左夫放心，我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不会胀死在乌兹别克。倒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胖子的可能。我担心的是飞机载不起我们，因为我们不仅体重增加，而且带走了那么多、那么深的友情。日本代表团的团长伊藤平日讲话颇有风趣，他接着说，乌兹别克人的好客使他吃惊，现在连中国人、日本人和捷克人都那么高

兴地变成乌兹别克人了。我们大家为他这句话鼓掌。他提到捷克人，因为还有一位捷克作家和我们一路访问了费尔刚纳和安集延。这位捷克作家正坐在我的对面，是一位中年人，脸上老是带着笑容，身材高大，西装上面套了一件乌兹别克的蓝绸棉袍，显得可笑。其实我和伊藤都是头戴小花帽，身穿蓝绸棉袍，即使我们自以为比捷克作家更像乌兹别克人，然而在别人的眼里，我们还是同样地滑稽。不用说，我穿上这件新棉袍觉得暖和无比，因为夜渐渐地凉了。

每个客人都有一顶小帽和一件棉袍；女同志也有女式小帽和花绸衫。这是我们从集体农庄带来的礼物。我们一连两个晚上都在集体农庄作客。一顿晚饭要花去两三个钟头，我们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宾主间有那么多知心话要互相倾吐。我们并非因为想喝酒，才借种种题目干杯。大家都有一种亲人见面、尽情欢聚的感觉：热情越积越多，谁也无法使它不奔放。不论宾主都站起来热烈地发言，也有人甚至发表长篇大论，都只是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心。这样欢乐的宴会多么使人陶醉：再没有比友情更美丽的了。我们没有弄清楚主人的姓名（似乎就没有人详细地介绍过），主人也不会记住客人的名字。但是两位农庄主席的面貌和谈吐，尤其是费尔刚纳豪爽的女副州长和安集延能干的党委书记，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安集延黑色达利亚集体农庄的主席三十二岁，当主席八年了。他又高又胖，两位伊藤加在一起占的面积还不及他多。宴会结束我们向他告辞，走出了饭厅，他按照本地规矩，赠送礼物，把小帽戴

在我们的头上，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还在我们的腰间系上锦绣花巾，然后同我们一个一个地拥抱，他一下子就把我们抱了起来。我们三个国家的客人再加上从莫斯科和塔什干两个城市来的工作人员和翻译同志一共二十几位，除了三位女同志外，只有《老残游记》的俄文译者谢曼诺夫不曾给他抱起，普通身材的谢曼诺夫反倒抱起了他。我看见他面带笑容安安静静地站在微光中，像一座小山似的，我约好三个中国同志，趁他不注意走到跟前把他抬了起来，引得宾主们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

运河工程处的晚宴继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我们分坐几辆小车回到旅馆已经过了十一点钟了。我们很兴奋，又很疲倦。第二天早晨，从塔什干派来接我们回去的小客机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又坐车去运河工程处，参观水闸以后，还在花园里散步，欣赏盛开的玫瑰。我在桥上闲走的时候，看见桥下有人坐在大石头上钓鱼。他穿长袍、戴小帽，拿一根钓竿，一动也不动，远远地望去，配上岸边的绿树，颇像一幅中国的古画。

这天飞机来得迟，我们在十二点以后才离开安集延机场。过了一个半钟头，我们就坐在塔什干旅馆的饭厅里面了。

六

大会闭幕后中国代表团分成三个小组到三个地方进行参观访问。三个组同一天回到塔什干。茅盾团长比我们先到。去阿拉木图的一组回来最迟。同志们分别了五天又在这里重

见，显得格外亲热。我们这一组十个人在旅馆里吃过午饭，我不想休息，就约了两位苏联同志（在莫斯科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谢曼诺夫和在塔什干大学里念书的年轻的尤拉）到旧城去。我们上车之前遇见了高莽（他和茅盾一块儿才从塔吉克回来），他愿意同去看看旧城，就跟我们一起出发。

塔什干城内树木多，建筑物漂亮。车子走的都是我没有经过的路。我们在市场门前下了车，慢慢地走进去。市场相当热闹，东西多，人多，但是并不显得拥挤。男人戴小帽穿袍子或者穿西装，女人也戴花帽，脑后垂两根大辫子。水果特别多。谢曼诺夫说是要买东西，一转眼间就不见了。尤拉和我们走进一个茶馆。茶馆门前摆着烤羊肉串的铁盒子，厅子里许多小圆桌大半空在那里。每张圆桌上都放得有盛盐、盛辣椒面的碟子。

我们拣了一张桌子，在旁边坐下。尤拉走进里面一个大房间去，过一会儿他端了一个木盘出来，盘子上有一壶茶、三个茶杯、一块大饼和十几块水果糖。有的人买了羊肉串和大饼，拿到圆桌跟前坐下来，蘸着盐和辣椒面，吃得津津有味。我和高莽喝着茶吃着糖，尤拉撕着大饼慢慢地吃，我们谈了一阵。尤拉讲中国话比谢曼诺夫更流利。谢曼诺夫在列宁格勒大学东语系毕业，他还是彼得罗夫的学生。尤拉是本地人，小时候跟着父亲在北京住过一个长时期，对旧中国他也有一些知识。

茶馆外人们来来往往，却始终见不到谢曼诺夫的影子。我站起来，走到里面房间的门口看了看。这个房间是专门喝茶的地方，里面放了好些张大匠床。喝茶的人舒舒服服地躺在

匟床上，颇像我们过去在澡堂里浴前或浴后休息一样。

我们不能够坐在这里老等谢曼诺夫，便走出茶馆。我们刚找到车子，谢曼诺夫也来了，他买了一个木箱的水果放在车上，说是要带给在莫斯科的太太。

我们回到旅馆，刚下车，就看见玛拉沁夫站在五层楼的阳台上，拉·赛音超克图也在上面招呼我，原来去阿拉木图的同志们已经回来了。

晚上十一点以后我又站在窗前。旅馆里寂无人声。灯彩也不亮了。只有喷泉老是那样不知道疲倦地升起来又落下去。那个大棉桃吸引了我的眼光。它仍然是富足的象征。在朦胧的灯光下，它好象渐渐地绽开，显得那样白，那样美。我多么喜欢这个地方！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五色缤纷的梦，梦见我在纳沃伊剧院看歌舞剧。那么灿烂、鲜艳的颜色，那么活泼、动人的舞蹈，那么优美的东方音乐，那么伟大的欢乐场面。我醒来后久久不能忘记。大会闭幕的那个晚上我们参加了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以后，就到纳沃伊剧院去看过一个乌兹别克的歌舞剧。在梦里我把在乌兹别克两个星期的见闻和感受全织在戏上，仿佛给舞台添装了一幅金色网幕。在梦里我又过了一个塔什干的节日！

十月十九日早晨图一〇四喷气式客机载着我们离开塔什干的时候，我仍然有一种节日的情绪：我是那么兴奋，又那么快乐！

1959年5月20日追记。

附　录

伟大的革命，伟大的文学*

在这个伟大节日的前夕谈到苏联文学，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个人的感受。我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提到苏联，提到四十年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辉煌的成就，便无法制止我的欢欣与感激之情。前两天夜里，有多少人在这个城市的月光照耀的天空找寻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谁不因为苏联的科学给人类打开了宇宙的秘密，谁不因为这个光荣的开端而感到万分骄傲！关于苏联，关于它的任何伟大的成就，每个人都可以讲不少的话，而且谁只要谈出一句，大家就能够完全了解，而且完全同意，因为我们的感受是共同的，我们的认识大体上也相差不远。然而我们大家仍然愿意多谈，不断地谈，甚至有这样的情形：不谈出来就不能平静自己的澎湃的热情，而且即使畅谈出来，不把这种感情化为行动，也不能使自己的心平静。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苏联跟我们每个人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爱苏联，就会爱苏联人，爱苏联人就会爱苏联文学。这是三位一体，完全分不开的。苏联人建设了苏联，苏联人创造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人民文学》十一月号。

苏联文学。新的人建设了新的国家，也创造了新的文学。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学又培养了新的人。这都是新的“东西”，而且是健康的“东西”。苏联文学写出了新的人与新的生活，对这些人与这些生活我们都很熟习。我们访问过苏联，在黑土上呼吸过那么健康的空气，也接触过各种各类的人，与各式各样的生活。我们也曾在自己住的城市里接待过从苏联来的客人，或者跟苏联专家们在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我们能够充分地了解这种新的人与新的生活。正是这种人与这种生活使苏联文学发生了夺目的光彩，正是这种人与这种生活通过苏联文学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有益的影响。

这不是一句空泛的赞辞。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全世界，因为有一个时期弥漫在欧美文学中的那种资产阶级的腐朽气味使多少读者感到窒息，教无数青年徬徨迷路，让善良的读者悲观、绝望。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人也没有想到作家有责任帮助读者，把读者引入正路，他们只顾卖弄自己的才能，夸耀本人的机智，玩弄文字的游戏，追求个人的名利。他们不惜用花言巧语腐蚀读者的心灵，让读者跟他们一起去追求官能的享受。我也曾读过不少这一类的作品，我好像给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撞来撞去，找不到出路。有时忽然闪起了一道亮光，眼前走过几个精心雕琢、刻画的忸忸怩怩的人物，那些自私自利的脱离人民的孤立的人。接着什么也没有了。除了“空虚”，叫人什么也抓不到。我还读过好些暴露性的作品，作者也都是有良心的作家。他们让我看见的尽是坏人得志，漆黑一团。作者空有满腔悲愤，但除了到处散布淡淡的哀愁、莫名的惆怅和终

身的遗憾而外，就毫无办法。这一切作品在我的心灵的发展上留下了有害的影响。在我向前走的时候它们偶尔也会绊住我的脚。给我打开这种黑屋子，移开这种绊脚石的正是苏联文学。

我不过是受益的无数读者中间的一个。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以及今天的各国青年从苏联文学得到了更多的东西。昨天一位埃及小说家对我谈起埃及文学的情况，他说埃及的读者最欢迎苏联的文学作品。我回答他，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的读者也是如此。我说我们两国的读者都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吸取养料，所以我们热爱苏联文学。他同意我的说法。我们不仅认为文学不能同生活分离，我们还看出我们的读者希望在作品中找到行动的榜样，个人前进的道路，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的读者不是用读书来消磨时间，排遣寂寞，我们这里已经没有闲得无聊、闷得要死的人；我们的读者是为了学习，为了得到知识、帮助和鼓舞才拿起书本的。他们把生活跟作品结合在一起，他们跟主人公一起在小说中生活。那些精力充沛的、健康而乐观的新的人，那些把个人跟集体结合得很好、让个人非常和谐地融化在群众中间的人，那些不知道个人打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的劳动者紧紧地抓住了我们读者的心。

前一阵子，我们这里居然有少数几个年轻作家提出“写真实”和“探求人生”的问题，我感到奇怪。难道还有比苏联文学更“真实”更充满生活气息的吗？难道在苏联文学的道路以外，还有所谓“真实”和“人生”吗？有人以为看见一堆垃圾马

上写进去就是写了真实。有人一定要在角落里找出一点芝麻大的类似感伤或温情的东西认为才是“人生”。这都是只看见一根小小荆刺却看不到梁木的人。随便举几个例子．志愿军的小通信员黄继光看了根据小说改编的《普通一兵》的影片，在紧要的关头就想到拿身体去堵枪眼。他在艺术中看到的不就是“真实”，不就是“人生”吗？不然那部影片怎么会在他身上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使得他拿主人公马特罗索夫作个人行动的榜样呢？许多应届的大学毕业生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以后，就不再闹情绪，甘心情愿地服从统一分配，甚至离开家乡到遥远的边疆去。他们在作品中看到的不也就是“真实”，不也就是“人生”吗？不然他们怎么能够把小说跟个人的生活那么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国的青年读者喜欢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他们那样信任和热爱小说的主人公柯察金，甚至因为柯察金爱读《牛虻》，就争先恐后地阅读这部几十年前的旧著，使得《牛虻》的译本在很短的时间就销出了好几十万册。在世界文学史上像这样的先例是谁也找不到的！

我用不着再举出更多的作者和作品了。名字太多，单是抄一遍也得费不少的功夫，何况那些名字读者们几乎全知道。在这里我只消随便拉住一位普通的读者，让他谈谈个人的感想。他一定会这样说：“苏联文学接受了并且发展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的传统。苏联文学又给我们描写了人类新生活的开端。”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了一般人的“口头禅”了。但是它完全真实。我记起来了，我那一代人多么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而且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

了热爱生活，热爱人，憎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相信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他们给了我们多少的快乐和痛苦，希望和勇气啊！后来我们在苏联文学作品中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与新人，给我们的心打开了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一个多么美丽的远景！

现在让那位读者继续讲下去："读者在苏联文学中找到很多新的、健康的、乐观的、鼓舞人的东西。苏联作家跟他们书中的人物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一起前进。他们的态度始终是忠实严肃，而且非常诚恳的。所以外国的读者即使读着不大好的译本，也并不感觉他跟书中人物有多少距离。读者不但完全了解作者的非常鲜明的爱憎，而且跟书中人物同甘共苦。苏联作家在作品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合情合理，生动具体，通过人物感动读者，使读者在生活中得到帮助。所以读者在苏联文学中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得到了鼓舞，得到了对生活与工作的勇气和信心。读者在苏联文学中看到了自己个人的光明的前途。一句话说完，苏联文学使读者们更加懂得应当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使自己变得更好，更有用，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我拉住的那位读者其实是无数读者的化身，其中也有我自己。所以我还要在下面加入这样的一句："这些话对中国的读者更适用，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根据苏联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人民正踏着苏联人民的脚迹在社会主义的路上大步前进。"

的确，苏联的文学作品好像也就是为着中国的读者写的一样，我们读起来显得特别亲切。苏联文学中描写的新生活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至于那种出色的新的人更是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的了。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可尊敬的埃及的友人曾经感慨地说："托马斯·曼是欧洲最后一位大小说家，他前年去世，现在再没有人了。"我不能同意他这种悲观的看法。我说，即使西欧没有，苏联还有，而且不止一位。倘使要我举出当代苏联大小说家的名字，我愿意写上萧洛霍夫、爱伦堡、费定、列昂诺夫……其实还有许多别的名字，但是我想这已经很够了。

10月14日夜4时。

后　记

编好这本集子，我还想写一篇序文，可是仔细一想，觉得要说的话都已经在文章里说过了。任何解释，在这里都是多余的。

我给这本小书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友谊》。的确，我在书中讲的全是友谊。中苏两国人民中间的友谊是写不尽的。读者们自己也有许多关于中苏友谊的故事，甚至可能有比我在这里所描写的更感动人的见闻和感受。我的小书也许会给一些读者唤起若干幸福的回忆，也许能给更多的读者证明那个已经存在而且永远存在的事实：中苏两国人民彼此相爱。

其实谁都知道：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这种证明也是多余的。所以我打消了写序的念头，仅仅在集子的最后写下这短短的"后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长短文章连"代序"和"附录"算在内，共有九篇。其中《塔什干的节日》是新近写的，还不曾在刊物上发表。《给苏合作同志》一篇是从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里抽出来的；《印象·感想·回忆》是从我的另一本小书《谈契诃夫》中抽出来的。我这次重读这两篇旧作，也作了些小小的改动。《难忘的日子》在《收获》双月刊上发表时只有六节，现在

又补写了四节。以上四篇文章恰好写了我四次访苏的见闻和感受。我到苏联一共五次，第三次仅仅停留了一天。那是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的下旬，我从柏林回国，为了践苏联朋友的约，在莫斯科苏维埃旅馆中住了一夜。前几天我在柏林参加德国作家代表大会，和苏联代表团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大会快要闭幕的时候，苏联朋友们约我和周立波在旅馆中聚餐联欢。费定和瓦金·科热夫尼科夫都是我的熟人。我们不间断地碰杯，无拘束地谈心，友好地交换礼物。大家喝得面红耳热，散席后科热夫尼科夫还到我的房间里来闲谈，约好下星期日在莫斯科重见。苏联代表团比我们早离开柏林。我们因为访问了别的城市，拿到飞机票迟了一天。星期一我在莫斯科打了整天的电话都找不到科热夫尼科夫。晚上他打电话到旅馆来，汽车已经在下面等候，我们得马上动身去飞机场，因此只能对着话筒互说再见了。这一天莫斯科下大雪，百货公司星期一全天休息，我和周立波坐出租小汽车在大街上逛了一阵，匆匆地看一看车窗外美丽、幸福的银白世界就回旅馆了。所以关于这一次的旅行，我什么也没有写。

不用说，这本小书并非可以传世的佳作。然而它是一本友谊的书。我愿意把它献给我所敬爱的苏联的朋友们。它不算什么大礼物，我只是借它来表示我的难忘的感激之情。

巴　金 1959年5月24日在上海。

新 声 集

《新声集》，一九五九年九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我国建国十年来文学创作的选集，要我参加这个工作。我把自己十年来的长短作品重读一遍，觉得这些东西既不深刻，又无力量，作为作家，我实在辜负了这个光辉灿烂、气象万千的时代。但是时代太伟大了，生活太壮丽了，我这管无力的笔，我这些简单的文字，也多多少少沾了这个时代、这个生活的光。所以我不忍舍弃它们。我考虑了将近一个月，终于照出版社的意思，编选了这本集子。

书名"新声"，并无深意。我只想说，在我的作品中，它们是新的声音。我过去的调子，不说今天的读者不会喜欢，连我自己也受不了。十年前我重新拿起笔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成绩不佳，作品不多，但是既然走上了新的道路，参加了新的队伍，就必须拿出全力跟着大队前进。而且正如我在《空前的春天》中所说："望着前面春光明媚、花红似锦，谁不全身轻快地奔赴前程？在这个步伐整齐的大行列向前迈进的时候，谁又甘心一个人寂寞地落在后面？"

至于这本集子，它也不过是爝火之类，日月一出，它就会欣然消灭。

唯有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壮丽的生活光芒万丈、万古长青！

巴　金 1959年4月12日。

廖静秋同志*

我最近从北京回上海，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朋友，他告诉我：廖静秋死了。我并不认识廖静秋同志，也没有见过她本人一面，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表演（她是一位川剧演员）。但是我听见好些朋友谈起她的事情。三年来我每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四川省的代表们住在一起，总听见人谈廖静秋同志的事。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就知道她得了不治的癌症，住过医院，施过手术，都不见效，她活着的时间很有限了。朋友们赞美她的演技，更称赞她的工作态度。她自己知道活着的时间不多了。她不肯躺下来等待死亡，也并不想过几天舒服的日子。她却尽量争取演出的机会。领导上照顾她，让她休息，她却更愿意尽可能多用她的艺术为观众服务。她不仅想演得多，而且要演得好。每次演出，有人到后台去看她，她总是诚恳地请别人多提意见，帮助她改正缺点。她说话做戏都像是一个健康的人，可是听话的人却不能不痛苦地想：这也许是她的最后一次的演出了。医生几次宣告了她的死刑。然而她并不屈服。她忍着痛坚持下去。她下了决心坚持到底，甚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至准备死在台上。朋友们不敢再到后台去看她卸妆后的病容。但是她的决心感动了更多的人。现代科学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减轻她的痛苦，但是它还可以保留她的艺术。电影局终于决定拍摄《杜十娘》的舞台纪录片。前年下半年她动身去北京的时候，她找过医生。医生后来告诉人：她的病快到最后的阶段了。到了北京以后她的两腿发肿，身上痛得厉害，脸上现出了死色，她服药，打吗啡针，忍着痛，在强烈的水银灯光下进行拍片的工作。那时她住在和平宾馆，每天工作完毕回到旅馆，她痛得关着房门哭。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愉快地继续工作。拍摄杜十娘投江那个镜头的时候，她从船头跳下，第一次跌伤了腿，她还忍着痛重来，一共跳了三次。《杜十娘》拍完，她已经支持不住了。当时传说她快要死了。但是她回到成都以后居然活了将近十个月。人们担心她自己看不到这部影片。但是她居然看过了两次试映。据说影片头一次在成都试映的时候她还对观众讲了话。今年元旦成都电台的工作同志去访问她，请她为广播录音，她躺在床上唱了一段，就因为嗓子不听指挥气得流泪。

这次我到北京开会又见到了成都的朋友们。《大波》的作者李劼人同志今年六十七岁了，他害流行性感冒在北京的医院里住了十天，刚出院回到前门饭店，躺在床上跟我谈话。我问起廖静秋同志的消息，他摇头说："没有希望了，每天要打八针才能够止痛。真可惜，才三十岁光景，正是艺术成熟的时期。"他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另一位朋友却告诉我，他来北京以前还见到廖静秋同志。她已经可以起床了，每天打针的

次数也减少到四次，所以她很乐观。过两天我遇见癌症专家吴桓兴大夫，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早已知道廖静秋同志的病史，他也奇怪她会支持这么长的时间。他说他有机会到成都一定要去找她。想不到她就死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天！

廖静秋同志死了。这两三年来许多认识她和不认识她的人，许多看过她的戏和没有看过她的戏的人都关心这一个生命，爱护这一个生命，党和人民也曾经花过不小的代价想保全这一个生命。但是她终于死了。廖静秋同志，她在旧社会中受过太多的不公道的残酷的待遇，她受过太多的不能用言语形容的侮辱和摧残。然而她终于从非人的地位走到了人的地位，从受践踏被蹂躏的女戏子变成了新社会的优秀艺术家，在短短的几年中间她看到那么多在旧社会中决不可能有的“奇迹”，她怎么能不让这些“奇迹”也在她的身上产生“奇迹”呢？她的短短的一生是充满着痛苦和不幸的。但是旧社会中黑暗的势力并没有摧毁她的精神，可怕的绝症也不能摧毁她的意志。甚至在她的垂死的身上还有着那么多发光的东西！她的出色的艺术和坚强的意志不会跟着她死去。她对于党和人民的感激与热爱也没有跟着她死去。现代科学不仅保留了她的艺术，而且保留了她那颗热爱艺术、热爱人民的心。去年七月我看过《杜十娘》的舞台纪录片（毛片）。杜十娘的欢乐和痛苦吸引着我的心，我看见那个载歌载舞的美丽的少妇（她唱得多么动听，演得多么逼真），我最初想到《拉郎配》里的小生罗玉中同志讲的故事（罗玉中同志跟她同台演《归舟投江》中的李甲，他看见她表演出色，只顾看她演戏，竟然忘记自己做戏

了），然后想起廖静秋同志拍完戏痛得关着房门哭的事情。一直看到杜十娘投江为止，我不相信她是一个垂死的人所扮演的。在这个肉体已经死了一半的女人身上充满的是生命，不是死亡。

影片《杜十娘》就要在全国放映了。这部影片一定会感动千千万万的人，这不仅因为演员的优秀的演技，而且因为廖静秋同志的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和热爱人民的心。她为什么要忍受那么大的痛苦让她的舞台艺术保留下来呢？她怎么能够忍受那么大的痛苦跟可怕的绝症斗争了这么久呢？她怎么能够在身上痛得厉害的时候还能够又歌又舞用艺术的力量感染人呢？回答是很简单的：她不愿意白活。她不愿意把她有的那一点发光的东西带到坟墓里去，即使花那么大的痛苦的代价，她也要尽可能多留一点东西给新中国的人民。

廖静秋同志的确没有白活。作为新中国的艺术家，她给我们留下一个多么美丽的榜样。

2月26日在上海。

“数字的诗”，幸福的保证*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时候，整个会场静得听不见一声咳嗽，代表们都把眼睛埋在各人面前摊开的报告书上。在一阵聚精会神的沉静之后，忽然响起一片风吹树叶般的翻书页的声音，或者一阵春雷似的响亮的鼓掌声。大家兴奋地吐一口气，抬起头看主席台，毛主席也在他的座位上鼓掌。强烈的灯光亮一阵，摄影记者忙一阵，然后全会场又静下来，大家的头又埋在报告书上。我们就这样地跟着李富春同志的严肃的声音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美丽的远景。他的报告引着我们的心走遍了全国。我们不仅更清楚地看见了我们国家现在的面貌，我们不仅更清楚地认识了我们国家的实在的力量，而且我们看见了我们国家的更光辉的前途，和我们人民的更美好的未来。在我们的眼前现出了一望无际的丰饶的原野和烟囱林立的工业城市，在我们的耳边响着歌声、笑声、铁锤声、镰刀声和种种充满生气的声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把我们引进了一个多么丰富、多么广大、多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么光辉灿烂的世界。它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喜悦和多强的信心。我简直没法制止我的心的猛跳了。我听到那些表示生产量显著增长的具体数字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说明建设规模巨大的图表的时候，我听到李富春同志庄严地宣布："我们正在做着为全国人民和后世子孙谋幸福的大事"的时候，我真想跑出会场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报告这个天大的喜讯。我相信每个代表都有这样热烈、深厚的感情，七十岁以上的代表不会比二十岁左右的代表更冷静。人们看见幸福的光芒在前面闪耀，知道多年来的希望就要逐渐成为事实的时候，他们那种不自私的快乐是相同的。因此一千一百多位代表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来欢迎李富春同志的报告，这是可以想象到的了。在热烈地鼓掌的时候，我们还带着笑容往四面看，我们愿意看见彼此的幸福的表情，我们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觉到我们的心的确连在一起，结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在为一个伟大的共同目标奋斗。

我便是这一千一百多代表中间的一个。在这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过去"，我只想着"现在"和"未来"，尤其是充满阳光和美景的"未来"。

但是在阅读五年计划草案的时候，在讨论李富春同志的报告的时候，"过去"的阴影就常常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从一些数目字上、从一些图表上我看到"过去"那些黑暗、痛苦的日子，那些在被奴役和被剥削中浪费了的岁月。简单的数目字告诉我们过去那些统治者究竟为人民作了些什么事情。简单的数目字也告诉我们新中国在六年中间有了多少辉煌的成

就。粮食的产量，棉花的产量，钢铁的产量，煤的产量，铁路的修筑，工业的建设……哪一样数字不说明短短几年中间的飞跃的进步和未来的光辉的远景，两年半以后我们就会有四千辆自己造的载重汽车；等到计划完成我们甚至有九万辆的年产量。过去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草案中的每一个数字都向我们证明这一个事实。这些数字都有极其丰富的内容。过去人们喜欢说："枯燥无味的数字。"但是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数字都是会说话的。它们可以讲许多动人的故事。它们可以绘出许多美丽的图画。在小组讨论会上一位代表指着五年计划草案说："这是数字的诗。"他说得真好。

我一直相信："诗应该给人以创造的喜悦，诗应该散布生命。"这些数字不仅散布生命和喜悦，它们不仅给我们描绘了幸福的远景，而且给这幸福作了确实的保证。这些数字不仅集中了六万万人民的感情，体现了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它们还是六万万人民的指路标，它们会正确地、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的路上去。它们像明灯一样地照亮了六万万颗心。

我们反复地阅读五年计划的草案，讨论李富春同志的报告，大家都觉得有满腹的话要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而且如何才说得完。但是谁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我们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了，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它似的。同时大家还有一个感觉：这几年来的成就并不是轻易得来的，这是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结果。社会主义即使近在眼前，可是今后没有全国人民长

期的艰苦的努力，美好的未来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无限美好的前途，为了后世子孙的幸福，谁又不愿意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呢？谁又不愿意忘我地劳动呢？

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单是这一部"数字的诗"就可以保证这个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是一定会完成的。这是具体的保证。它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多大的鼓舞。它给全国人民带来多大的喜悦和信心，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全国人民都在兴奋地谈论它，都准备用实际行动来迎接它，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的确，对于每一个站起来了的中国人，难道今天还有比为着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更光荣的事情？

但是在普遍的快乐中也没有人忘记艰苦的努力和尖锐的斗争。光荣伟大的事业必须通过这样的努力和斗争才能够完成。一位代表说得好："我们的胜利就是敌人的失败。我们的幸福就是敌人的灾难。"所以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会想尽千方百计来破坏我们的事业，这也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内外的敌人正在许多阴暗的角落里发出诬蔑的叫嚣和恶意的揣测。我们已经听见了他们的战栗的声音。他们因为我们国家的日益强大而感到恐怖了。今后各种反革命分子会用更疯狂的破坏活动来挽救他们的灭亡。固然他们的灭亡是无可挽救的。但是他们的破坏也会给我们带来损失。为了保护我们的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在坚决的斗争中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我相信，在打击敌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手是甘愿

落后的。

那么让我们为着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部“数字的诗”，这个幸福的保证尽情地欢呼、鼓掌吧。让我们的敌人听见我们的普遍的欢呼声和热烈的鼓掌声而战栗吧。

1955年7月15日在北京。

空前的春天*

我们每个人都记得不少春天的故事，都听过不少春天的歌。

我们从小孩时代起就喜欢春天，因为春天给我们带来温和的风、明媚的阳光同一片欣欣向荣的美丽景象，春天教我们懂得生长、繁荣的意义，春天把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灌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闻到春天的气息，就感觉到百倍的轻快，就觉得身上充满着精力。我们愿意活得更愉快，而且活得更有劲。

我们都曾经做过童话一样的春天的梦：仙人魔杖一挥或者青年王子一吻（或者用其他象征性的动作），于是整个大地回春，百花齐放，歌声遍野。在寒风摇撼纸窗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起桃红柳绿的春天。春天的回忆增加了我们的勇气。“春天一定要来，而且会不断地来。”“春天是属于我们的。”在我们以前不知道有多少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间也有人嘲笑过我们的荒唐的梦。他们不相信童话里的“魔杖”和“王子”，却宁愿关在屋里烤火永远不出来。

然而春天在敲门了。只有那些聋子才听不见春天的声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谁不愿意打开门跑出去迎接春天，谁不愿意让春天的风洗一洗自己的心肺？

难道你就没有听见跑步声？这是多么雄壮的声音！用“千军万马奔腾”的字眼来形容它，还嫌不够！这是六万万人民的脚步声。六万万中国人用跑步迎接一九五八年的春天。难道你就没有看见眼前的一片光明？原来六万万中国人高举着火炬迎接一九五八年春天的第一道阳光。

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春天，参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每个人都有一些痛苦的记忆或胜利的喜悦。每个人都在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受到教育。那个不寻常的春天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铺好一条更宽的大路。摆事实，讲道理，辩明了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在大鸣大放之后，当然就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干。这不是几千几万人的大干，这是六万万人民的大进军。八九千万农民冒着寒风和冰雪，用简单的工具挖沟修渠，改变大自然的面貌，这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场面。几百万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下放农村，向农民学习生产劳动，这又是一件前人梦想不到的大事。更不要说农业合作社社员们挖心思、想办法，大小工厂的工人们订计划、找窍门为国家生产更多的财富，为集体贡献更多的力量……这一类说不尽、讲不完的英雄故事了。

整个中国都在动。整个国家在向前跑，全体人民在向前跑。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没有一处不充满生命力，没有一个人不怀着“大跃进”的雄心。“大跃进”是口号，也是行动。这是从每个人心里发出来的响亮的声音。春天的气息鼓舞了每

个人。其实在人们的心里春天已经提前来了。一个人精力饱满，他就没法弯着背踱方步。一个国家充满力量，它就不得不"大跃进"。望着前面春光明媚、花红似锦，谁不全身轻快地奔赴前程？在这个步伐整齐的大行列向前迈进的时候，谁又甘心一个人寂寞地落在后面？除非是那一小撮仇视集体的人。但是连他们也不能永远关上门烤火挡住春天的阳光。即使他们耳聋，他们也一定听得见一九五八年春天的"大跃进"的欢呼。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的确是一个空前的春天。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也找不出这么美丽、这么光明、而且这么使人兴奋、这么令人快乐的春天来。我们今天看到新时代的"魔杖"和"王子"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出现了春回大地的景象，就响起了一片报喜的声音。许多惊人的数字都像是从"魔杖"下面变来的，许多动人的事实都像是由"王子"的嘴上带来的。其实都不是。它们全是从普通劳动人民的手上和心上变出来的。现实不仅代替了童话，而且超过了童话。我们今天的现实已经比任何时代的童话更美丽、更丰富了。中国劳动人民用一个接连一个的喜讯来迎接一九五八年的春天。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一定能把这个春天装饰得无比美丽和无限光明。

1958年2月初在北京。

变化万千的今天*

在这些日子，我翻读每天的报纸，或者听人们讲话，或者到各处去看看，我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活在童话的世界里面一样，好像在做梦一样。我跟一些熟人谈起，他们也说有同感。我们平日常说“变化万千”，从前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我才充分了解这四个字的意义。我们的周围的确天天在变，时时在变，人在变，事在变，物也在变。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变。这样的变化何止万千，你要数也数不清，而且也无法数，因为连你自己也在变。

从大的讲起，像万座高炉平地起，一亩收小麦几千斤，在好些方面不要十五年，只要短短的几年功夫就赶上英国；像把水引上山，把山削平，把海填满……这样的事，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编童话的人也不敢想得太多。在童话里一个聚宝盆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今天有的聚宝盆岂止千千万万！“我们吹口气，滚滚江河沸翻；我们一举手，巍峨大山胆寒！”劳动人民的这种气魄岂是编童话的人所能想象的！至于几年以后，我们的祖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在世界上出现，也不是编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

话的人想象得到的。童话里的世界没有这样美，也没有这样富。在童话里，一个奇迹甚至十个奇迹就到了止境了，在今天的中国，每天都有上千上万的奇迹出现。所谓“奇迹”就是从前认为人力所办不到的。今天再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了。今天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偏偏要办到从前人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他们的确办到了，而且一个超过一个，比来比去，没有止境。集体的人的力量才开始在发挥，就已经产生了这么多的惊人的奇迹。要是古人能够活起来看一看今天的世界，他们一定会吓得逃跑，他们会以为遇到了神仙了。在他们脑子里今天的许多事情只有神仙才做得出来。

很多外国的绅士读到关于新中国建设上辉煌成就的报道不肯相信，他们还把今天的中国人当作从前的“东亚病夫”。他们一方面上了他们的“古人”的当，另一面他们自己还在做着剥削的好梦，妄想年光倒流，过去的“好日子”重来。他们用他们的陈规来衡量新中国的飞跃的进步，闭上眼睛不肯承认摆在面前的事实，有时甚至痴心妄想，以为一阵叫嚣就可以抹煞六亿人民伟大国家的存在。其实并不要等多久的时间，他们就会发见自己远远地落在中国人的后面。他们做不到的事，中国人做到了。他们费了大力才做到的事，中国人民做得更多，更好。他们那些骗人的符咒不但吓不倒中国人民，也改变不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外国绅士们不认识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这是无足怪的；可怪的倒是有少数中国人到现在还迷信外国的陈规，不愿意承认自己同胞用两只手做出来的一切。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封号：“专家”。这些“专家”最大的本

领就是不相信奇迹，也不愿意看见别人创造奇迹。他们始终认为过去不曾有过的事情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有。他们用过去的陈规造成了四面墙，把自己关在里面。他们看不见破除了迷信打破了陈规的劳动人民天天在创造奇迹。

最近上海广慈医院治疗了一个烫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三的病人。按照外国的陈规，这个病人最多只能活三天。在会诊的时候，第一流的外科专家根据外国的医学文献，断定他很快地就要死亡。但是经过医院的细心治疗，病人已经活了一个月，而且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这种医学上的奇迹在上海几个医院里就有好几件。这就说明只要破除了迷信打破了常规，外国人没有做到的事今天的中国人都能做到。

再从小的方面说，你踏上电车就会有人招呼你，替你抱小孩，拿书报给你看；你丢了东西，人民警察会挑着担子送上门来招领；你到医院看病，医生会把你当作朋友或者亲人看待；你已经忘记了自己什么时候修理过钟表，店里却来信殷勤地询问钟表是否走得很好。……任何大大小小的事都使你感觉到新社会中人们彼此的关心，感觉到和睦家庭中的温暖，感觉到人与人的关系一天一天地密切。

人们天天见到这些大的、小的变化，而且越来越深地感觉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这些大小的变化，这种新的关系不用说鼓舞了人们前进的勇气。一个人四周的一切都改变了，当然会促成他的改变。有些人变得慢，变得少，他们还习惯用旧脑筋看新事物，他们会觉得这一切都不可以理解。他们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去衡量一切，当然会处处碰壁。

新社会里有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不为自己为大家。离开了众人的利益，哪里还有个人的利益呢？在一个一日千变万化的大时代中，一个人究竟能够做出什么事情？个人随时都会消灭，但是六亿人民这个伟大的集体却要永远存在，而且兴盛繁荣。也有人迷信自己的那一点点"知识"，认为在今天还是了不起的东西。我在前面讲过广慈医院的事情，在那次会诊的时候就有一位大专家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来了比用什么药都好。我断定病人要死，谁也就没有责任了。但是出乎专家意外的是病人偏偏不死。这就说明个人的知识跟群众的智慧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

今天已经不是少数人独占知识的时代了。也不是知识分子摆资格拿架子的时代了。那一点点所谓"知识"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包袱。资格越老、架子越大的人背的包袱也越重。包袱背得越重，走起路来也就越慢。今天六亿人民都在跟时间赛跑。要参加这个长距离赛跑，就不能够背着重的包袱。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在学习总路线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时代变化太大，自己跟不上；时代跑得太快，自己追不上。变又变不大，跑又跑不快，只好远远地落在后面。落了后还想用"甘居中游"的招牌来安慰自己。其实在这个时代里，并没有可以让你"安居"的"中游"。因为时代不能因为你而停止前进，而且群众的力量还要推动时代跑得更快。今天的"中游"可能就是明天的"下游"，一旦落到"下游"就难免要被时代抛弃。不能怨时代无情，只能怪自己不求上进。知识分子跑不快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背的包袱太重。只有把背

上的包袱打开，将一件一件的肮脏东西完全丢光，才有可能跟着时代跑，永不掉队！

1958年6月底在上海。

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

这两天有不少的所谓“自由世界”的绅士在替中国人民算帐。不用说，他们已经替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过帐了。不管话说得怎样巧妙，怎样尖刻，可是他们发抖的声音就说明了他们内心的空虚。即使是愚蠢到像杜勒斯那样的人，也懂得那许多光辉的数目字的意义：粮食的产量，棉花的产量，钢的产量，煤的产量，……倘使他们一样一样地数下去，他们会全身发冷，会看到自己前途一片黑暗。他们一定明白：坟已经挖好了，就等着他们睡下去。

在一九五九年的元旦吉日提到这个不吉利的“坟”字似乎不大好吧。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的确是不好的。他们替我们算一九五八年的总帐，算来算去，只算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毛主席所说的：他们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而且他们的“烂”法，和我们的“好”法都是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在进行的。他们挖好了坟准备睡下去，这对我们来说，正是大吉大利的事。

一九五八年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事情不说是惊天动地，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发表时题为《新年试笔》。

少也震惊了全世界。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成绩欢呼，我们的敌人为它们战抖。同样，苏联人民这一年来的辉煌成就和最近提出来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也都是史无前例的。所谓"自由世界"的绅士们最喜欢用"宣传"两个字来抹煞他们不高兴或者害怕的一些事情。其实爱吹牛、爱造谣的正是他们。我们说得出就做得到，而且总是说得少做得多，说得小做得大。在我们这里一年比一年的生产上升，力量加大，幸福增多，美好的事情说不完；在他们那里正相反，生产下降，困难加大，纠纷增多，苦恼的事情说不尽。我们越来越团结，他们越来越不和。我们这里参加劳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那里失业的队伍愈来愈大。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吃得饱穿得暖，高高兴兴；他们那里少数人穷奢极欲，多数人啼饥号寒。

单单拿我们中国来说吧，人们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好像去吃喜酒一样；公社里吃饭不要钱；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基本上扫除了全国的文盲；几千万首诗、几千万幅画在各地方出现；技术革新的花在每个角落都开得鲜艳异常。每个脑筋都在开动，每双手都不休息，每一样东西都发挥作用，每个人的精力都取得成绩，每一颗心都充满力量，每个人的前途都充满光明。全国人民大家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好像参加一场友谊大竞赛一样，你追我，我赶你，你推我，我拉你，最后同心协力、心情欢畅、手挽手肩并肩地向前飞奔，向着一个相同的目标，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落在后面，也没有人愿意别人留在后面。每个人想的都是整体，谁都认为想到自己是可耻的事。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人与社

会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真实面目现在才完全露出来了。连过去那些冒牌的“中国通”也不能充分了解我们人民公社的重大意义，也不能充分认识我们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何况那些殖民主义的高等绅士们！但是有一点他们倒是深切地认识到的，那就是：我们不断地在前进，他们不断地在后退。我们越跑越快，不但要赶上他们，而且要把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的光明、美丽的远景，那是谁都可以想象到的。然而光明和美丽到多大的程度，连我们自己目前也想象不到。总之那是没有止境的。不过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到那个时候帝国主义一定完蛋了。

让我们的敌人来看看我们以多么蓬勃的朝气和多么坚强的信心来迎接一九五九年的元旦，让他们来听听我们唱着多么响亮、多么快乐的歌来迎接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跃进！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向前迈进的雄伟步伐是任何反动力量所阻挡不住的。中国人民跨进一九五九年了！这是一件大事。一九五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周年，是我们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是我们苦战三年改变祖国面貌的最重要的一年。无疑的，中国人民一定为伟大的一九五九年绘上最美丽的图画，写下最美丽的诗篇。中国人民决不会辜负一九五九年！社会主义阵营也决不会辜负一九五九年！

1958年12月31日。

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

一 “主角是群众”

在上海广慈医院里，最近进行了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战斗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是它已经轰动了整个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把它拍成影片。剧作家到医院去搜集材料，偶然跟一位年轻医生谈起，写电影剧本应当拿什么人做主角。那位医生是医疗系党支部的副书记，在这个战斗中也起过一些作用，他想了一阵就回答道：“我实在想不出来，要写就写大家，就写群众吧！”他说得对：“每一次的介绍总会漏掉很多人，很多事。的确是这样，最值得写的还是群众。党把这些人的心连起来，像一根红线把我们连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挽救了丘财康同志的生命。”

不过剧作家也找到了电影剧本的主角。剧作家在医院里跑来跑去，每天都听见许多人不绝口地讲一个名字：丘财康，或者更亲密地叫他“老丘”。这个病人把无数的人引到自己的身边，那么多的人围绕在他周围，为他献出一切的力量。那么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人民文学》八月号，同年十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单行本。

多的人关心他，爱他！倘使通过这个人来说明在广慈医院发生的奇迹，一定能够打动观众的心。

我相信电影剧本一定写得好，因为我发现剧作家爱上了他的主角。有一天晚上我在医院里碰见了剧作家。我们两个站在隔离病房窗外走廊上，病室里电灯明亮，老丘两只腿暴露在外面。医生们正在把一种新药滴在老丘的正在腐烂的右腿上。老丘伏在"转床"上痛得浑身发抖。我心里很难过，我看剧作家，他快要流眼泪了。后来医生给病人注射了止痛针，老丘才慢慢地睡去。我和剧作家离开医院的时候，又到病室窗外站了片刻。房里相当暗，病人仍然伏在"转床"上，静静地没有一点声息。

在隔离病房外面的露台上正在举行内外科专家的大会诊，会诊到十二点钟才结束。这是老丘入院后第三十六天。这一天老丘的情况不大好：精神差，食欲大减；右下肢感染厉害，过去用的多粘菌素已经不能控制绿脓杆菌了（绿脓杆菌产生了抗疫性）。今天下午刚刚开始试用一种新药：噬菌体（一种能破坏细菌的微生物）。这种噬菌体是第二医学院的六十个同学花了一天的功夫从郊外污水里找来，再由助教和技师们花三四个通宵做出来给老丘用的，放在试管里实验，它很有效，它专门吃老丘身上的绿脓杆菌。但是医生还不能断定它用在病人右下肢上是不是马上见效。这二十四小时又是老丘的难关。倘使噬菌体不能吃尽老丘右腿的绿脓杆菌，那么就得准备右下肢的截肢了。参加会诊的医生们离开的时候，脸上都没有笑容，大家把希望放在"明天"。

过了两天我到医院去，知道噬菌体发生了作用，病人情况好转。绿脓杆菌受到控制了。老丘的右腿放在噬菌体溶液里浸浴了一昼夜，小腿上的脓全消除了。年轻医生对我说，不单是噬菌体起了作用，其实暴露就是最有效的治疗办法。现在不再用药，就让他的两只腿一直暴露着。老丘又渡过了一个难关。医生和护士们谈起老丘，脸上又出现了笑容。在挽救老丘生命的战斗中，现在又得到了一个胜利。大家的高兴不是没有理由的。

后来我再去医院，看见老丘仰卧在转床上，一位护士用汤匙把食物送到他的嘴里。他的胃口似乎很好，发红的脸上带着笑容。我认识的那位青年医生告诉我，已经给他进行了一次自体植皮，把他左脚脚背上的一块皮分成几小块植在右下肢上面了，过两天还要给他进行第二次的自体大植皮。这说明老丘的健康逐渐在恢复，新皮慢慢地在生长了。

第二次自体大植皮连换药一共进行了五个钟头，到午后一点半结束。手术是在病房里进行的。老丘一直处在全身麻醉后的昏睡状态中，我们只看见他的嘴微微在动。一位年轻医生在老丘的左下肢和肚皮上切除了四块皮，主任医师把它们剪成像邮票那样一块一块地贴在病人的右下肢上。病房里工作相当紧张，主任医师似乎感到吃力了。剧作家和我仍然站在窗外走廊上，我们感到一种严肃的心情。但是我们不像在半个多月前那样痛苦地在这里徘徊了。我们看到了灿烂的阳光。

昨天下午我又在这个地方站了几分钟。老丘的一位亲戚

也站在这里。病房中相当亮，灯光照着老丘的右腿。老丘安静地仰卧在床上。两只腿仍然暴露着。右下肢已经在长皮了。那位年轻医生告诉我们最近又为他植过两次皮，情况很好。体温和脉搏也都很正常。危险期早已完全过去。年轻医生的脸上现出了胜利的喜悦。

二　严重烧伤的钢铁工人

这个艰苦的战斗是从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深夜开始的。那一夜还不到一点钟的时候，一辆救护车开进了上海瑞金二路广慈医院（第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三副担架从车上抬下来，进了急诊室。这三个病人是由上钢三厂保健站的医生和值班护士陪送来的。他们都是钢铁工人，在一个多钟点以前刚刚给钢水烧伤：一个伤势比较轻，两个受伤很重。重伤病人脸都肿得很大，身上红一块，黑一块，有的地方还是血淋淋的，大部分都是深度烧伤，右下肢皮肤都已经烧成焦灰，两只手烧伤也很重，始终高高地举在头上，放不下来。其中身材较高的一个把牙齿磨得格格地响。他不但自己不叫痛，反倒鼓励他的两个同伴忍住痛不要喊。他就是二十九岁的丘财康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优秀的炼钢炉长。

急诊值班医生看见病人伤情严重，连忙打电话到外科医生的宿舍去，把住院的外科医生全叫起来了。病人抬进了手术室。大家马上动手做急救工作，一直忙到早晨四点半钟，才把三个病人包扎好。病人抬走以后，手术室里还有强烈的

焦味。

天亮以后，上钢三厂党委组织部长就赶到医院里来了。广慈医院的党组织跟上钢三厂的党委意见一致，要用尽力量挽救烧伤的钢铁工人的生命。所以当天上午就举行了专家的会诊。上海著名的外科医生都请来了。病人的伤情的确严重：丘财康同志的灼伤面积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九点三；另一个年轻同志的灼伤面积甚至超过百分之九十一。根据国际医学文献，灼伤面积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就难免死亡。这两个病人烧伤面积不但广，而且深，好些地方连肌肉都烧伤了。所以有经验的外科专家们都皱皱眉，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有人说："不过三四天。"有人说："至多三天。"有人说："用不用药，都是一样，反正病人一定会死。"大家都同意"死亡"的结论。会诊就是在这种悲观、绝望的气氛中结束的。它根据国际医学文献上的死亡统计数字，宣布了重伤病人的死刑。

但是医院的党组织不能够同意这种悲观的看法。党总支委员会马上找负责治疗的医生们谈话，接着又召开负责医生的会议，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向医生们反复解说：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用一切力量救护烧伤的工人，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抢救钢铁工人的生命，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统计数字对我们并不完全适用。总支书记特别要求医生们：第一，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不要再受洋人的束缚；第二，走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的力量。他最后表示，"党要用一切力量来挽救为祖国创造财富的钢铁工人。"

接着上钢三厂的全体工人也送来了感谢的大字报，要求广慈医院的全体医务、护理工作者创造奇迹。这张大字报喊出了五千个钢铁工人的声音："用尽一切力量挽救我们的重伤同志！"

这些响亮的声音解放了医生们的思想，扫除了他们心上的暗影，鼓舞了他们的热情。于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整个医院以无比的热情进行挽救生命、创造奇迹的战斗。

三 "炼钢炉子缺我不得"

病人入院以后，医院里马上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治疗小组，由四位外科医生负责，这四个人里面有外科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其他两位年轻的医生。他们接受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尤其是外科副主任医师，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医学上的奇迹。他相信自己过去的经验，他相信国际医学文献上的统计数字，他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医院里的设备和治疗条件。所以他最初听见医院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的谈话，还有一点抵触的情绪。他心里想：这是强人所难啊！但是既然接受了任务，就"聊尽人事"吧。反正病人是要死的，第一道"休克"的难关就难渡过。他怀着这种灰溜溜的心情到重病室去看病人。

副主任医师走进重病室，丘财康同志已经在麻醉以后醒过来了。他背上的烧伤特别厉害，现在他伏在普通病床上，两只手仍然高高地举在头上，包扎得紧紧地不能动一下。他呼

吸急促，咬紧牙关忍住痛。他听见医生问他“觉得怎么样”，他用力发出不十分清楚的声音：“医生同志，告诉我，我的眼睛是不是坏了！”

“你的眼睛很好。”

“怎么我看东西有点——模糊？”

医生在病人的眼前伸起两根指头问道：“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两根手指头。”

医生又伸出四根指头，再问：“看得见吗？”

“看得见。四根手指头。”

医生笑了笑，就说：“你看得很清楚。眼睛很好，一点也没有烧坏。”

病人松了一口气，说：“那么我还可以回去炼钢。脸上多几块疤，难看点，并不要紧。”他想起苏联专家对他们说过的话：“你们中国工人真行。单凭一双眼睛就知道什么时候出钢，而且质量准不会错。”他想笑，但是全身微微地颤抖起来，他连忙咬紧牙齿。牙齿又格格地响了一阵。

医生怜悯地望着病人，他心里想：“你活不过三天了，怎么还想那么远的事情？”他皱起眉头正要走开。病人忽然睁大了眼睛向他要求道：“医生同志，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活我。不是我夸口，我很重要，炼钢炉子缺我不得。我的家，我的爱人孩子我都放心得下。但是炼钢炉子怎么办呢？”

医生望着眼前这张肿得很大的脸，温和地安慰病人道：“同志，你放心，你会好的。”其实他心里想的是另外的一句：“你会死的。我也无能为力了。”他心里有些难过。他害怕再

听见病人这一类的话，便匆匆地离开了重病房。

副主任医师后来对人说，他做了十年的外科医生，看见过不少的人死，已经变得很冷酷了。他一向只对病感到兴趣，对病人没有感情。但是他听见丘财康同志的这几句话，感触很多。他离开病房以后，还想了很久。他想，一个等死的病人在咬紧牙关忍受全身刀割一般剧痛的时候，完全不想到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却念念不忘祖国的钢铁生产，一心一意想回到炼钢炉子旁边去。像这样的大公无私的人，他过去只有在小说上见过。他还以为他们不过是作家笔下的理想人物。现在他亲眼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了。这个人应该活下去，祖国的钢铁事业也需要这个人活下去。他是不是能够尽力让这个人活下去呢？他越想越觉得找不到出路。他一个人暗暗地摇头。但是他忽然想起了总支书记"两种制度、两种态度和两种结果"的分析，他好像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他在心里说："他能够忍受这么大的痛苦，他不怕烧伤，还只想回去炼钢。他要活，他为什么就不能够活呢？"病人跟医生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了。这以后医生不仅常常想到病人，而且拿病人跟自己相比，越比越感到惭愧，也越想多为病人做一些事情。从第一天、第一面起，副主任医师就从病人那里受到了教育。

副主任医师后来把老丘的话告诉了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是留美学生，不过他的洋气比别的留学生少。他是一个不大会讲话的老实人，经验多，治病比较有把握。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参加这次的治疗工作的。他曾经对人说过，他第一次看见老

丘，老丘刚从“休克”里挣扎出来，话也不能说。除了伤势严重外，他并没有别的印象。他也不过把老丘当一般的重伤病人看待。他听说老丘讲起自己很重要，当时还以为病人自高自大。副主任医师又用感动的声音说下去：“他的想法跟我的完全不同。我要是炼钢受了伤，医好了，我就再也不回到炼钢炉子那里去了。可是他却不然，他刚刚受伤就想回去再干。这就是工人跟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我们总是念念不忘自己。”副主任医师在讲自己的心情。这几句话出之于副主任医师的口，还是第一次。主任医师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三十几岁的人动了感情。这几句解释的话搅动了他的心，使他想了好几天。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过去的看法不对，越觉得老丘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他跟副主任医师，跟另外两位年轻医生一样，同老丘接触愈多，受的影响愈大；对病人愈有感情，治疗病人的决心也愈大。他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感觉到自己的思想感情一天一天地在变化。他们一方面在治疗病人，另一方面也好像在治疗自己。就是这个主任医师，有一次老丘问他“是不是党员”。他知道老丘这样问他，是关心他，是对他有好感。他不能不对老丘说真话，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现在还不是党员。”他特别加一个“还”字，就是向病人说明他要争取入党，来安慰病人，取得病人的信任。也就是这个主任医师，在准备为老丘植皮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求把自己的皮移植在病人的身上。

四 “这样多的人在关怀他，帮助他”

挽救生命的战斗开始了。二十八日外科医生的晨会决定发动群众的力量，由四十位外科医生每人阅读两篇近十年来各国有关烧伤的文章，然后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治疗方面的建议，当天下午就开会讨论治疗的方针。在会上大家毫无保留地讲出各人的看法，提出具体的意见，最后根据许多好的建议制定了十五条治疗病人的新方案。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医院的一切陈规都打破了。过去被外国文献拴住了的脑子现在活动起来了。人们开始敢说、敢想、敢做了。在他们的眼前出现了新的天地。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做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医生们所不敢想的事情。他们是在进行挽救生命、创造奇迹的战斗。而且战斗的范围越来越扩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在治疗工作上遇到困难，就广泛地征求院内院外医生们的意见，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渡过一个一个的难关。

病人从重病房移到了严密消毒的手术室，包扎取下来了，开始采用暴露疗法。手术室里开放了冷气，严格地控制了室内温度。一方面要让病人身体内的高温发散，另一方面又要顾到病人的没有皮肤掩护的肌肉受不住寒冷。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和护士们想尽了种种的方法。

头几天病人每天需要大量的血浆。医生向院内的血库提出要求，血库的同志们连眉毛也不皱一下立刻爽快地回答：

“行，你们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的确一分钟也没有耽误过。有些血浆还是临时由别的兄弟医院（例如中山医院）送来的。病人身体需要营养，但是他胃口不好，而且吃东西很困难。护士们就向锦江饭店要来一份菜单，在病人面前反复地念下去，不断地劝病人吃这样吃那样，慢慢地引起了病人的食欲，然后把一样一样的菜买来，喂到病人的口里。

三天终于安然度过，第一道难关突破了。这是第一个胜仗。不用说，大家的信心增加了。病人的情况开始在好转，医生们的脑子也天天在发生变化。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的感受最深。他们从聊尽人事变化到用尽全力，从只对病发生兴趣变化到对病人产生敬爱的感情。他们在进行治疗工作的时候，越来越深地感觉到总支书记所一再强调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副主任医师后来在一个公开的会上说：“我想到有这样多的人在关怀他、帮助他，心里就有了力量，新的力量。”这个不相信医学上有奇迹的人居然热情地参加了创造奇迹的战斗，连他自己也想不到！

的确群众发动起来了。整个医院，整个医务界，整个上海社会都在支援这个挽救生命的战斗。全院的医务人员、护理人员以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不断地献计献策，要用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来保护病人渡过第二个大关——绿脓杆菌的感染。

为了有效地控制绿脓杆菌，广慈医院开始做各种浓度高低不同的联合抗生素敏感试验。这是第一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建议的。这位教授对抗生素有研究，他不但参加了每次的会诊，并且每隔一天要到广慈医院来一趟，就像对待自己的病人

一样，出主意，想办法，他还让自己在那里服务的医院也帮忙做一份这样的试验。后来一共做了五十八种试验，得出来控制绿脓杆菌败血症的有效药物。于是多粘菌素使用了。

为了预防感染，医生们开始为老丘进行人工植皮。六月五日第一次给老丘植皮。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别的医生、护士们紧张地工作了一个夜晚，从十点半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把病人的三度灼伤的组织切除了，又在两手和两腿上移植了健康的皮肤。在决定异体植皮的时候，主任医师首先报名献皮。同时要求批准献皮的人很多。那天中午，一位害神经病跳楼跌伤的老太太死在医院里，她的丈夫愿意献出她的皮"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服务"。植皮的情况很好。过了十一天，在十六日又进行第二次的植皮。到那一天，报名献皮的人已经到了八百几十个。植皮的时间是在下午。但是十二点钟起人们就排队等候献皮。一个看护老丘的护士在日记里写着："中午我报了名！我要把自己的皮植在老丘的身上。我的皮很好，没有皮肤病，一定适合需要。只要能为老丘做一件有益事情也是光荣的。"医生们最后决定用四个人的皮，每人切除四寸到八寸。这四个人中间有三个是护士，皮上的汗毛已经剃掉，还涂上了药，只等施手术。临时有人送来了刚死亡的小孩，剥下皮来植在老丘的背上刚好，就用不着活人的皮肤了。

六月二十一日，医生们决定征求两个健康的输血者，要在他们身上注射三种细菌（绿脓杆菌、链球菌、葡萄球菌）的混合菌苗，输血者发过高烧以后，血液里就会产生一种抗体。把带

有抗体的血输给老丘，便可以杀死老丘血液中的细菌，增加他身体的抵抗力。消息一传出去，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和护士们争先恐后地跑来报名应征。两个女学生被选中了。她们高兴得不得了。这两个年轻人身上注射了混合菌苗以后，躺在床上等待反应。她们不能忍耐地彼此问询："你难过吗？""你发烧吗？"都希望自己越烧得厉害越好。三天以后她们完成了任务，回到学校。有一天下午，她们也到隔离病房窗外走廊上来看老丘。老丘仍然伏在转床上，连头也没法动一下。他听见护士说这两个姑娘刚刚输过血给他。他睁大眼睛看她们，想用微笑表示他的感谢。

五　千千万万颗心

关于"转床"也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老丘的烧伤面积很广泛，除了头部、两个肩膀、腰间一圈束皮带的地方和两个脚底以外，全身都烧坏了。背部和臀部全是深度烧伤，右下肢更厉害。翻一次身，换一次药，都要动员十位医生和五位护士，花好几个钟头的功夫，而且病人很痛苦，好半天喘不上气来。他仰天睡着，背就溃烂，感染很厉害；翻过身来伏着睡，对胸部又不好。要减轻病人的痛苦，要减少治疗的困难，必须制造一种可以旋转的病床。医生们在一本外国书上找到了一张"转床"的照片，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医院的技工间，说是第二天就要。

技工组的同志们听说这张床是给老丘睡的，一句话也不说，就根据那张并不清楚的照片，照病人的身材尺寸，在技工

间的地上画了一个草图，马上工作起来。他们从下午两点做起，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床就做好了。床上的气垫是由上海塑料二厂设计制造的。当天下午一位医生赶到塑料二厂去交涉制造气垫。不巧那天正是那里的厂礼拜。但是厂长听说要给烧伤的钢铁工人做气垫，马上就把住在附近的工人找了来。工人们了解了医院的要求，立刻设计制造，到深夜一点钟，就把一个上海人从未见过的非常柔软的气垫制造出来了。那位医生带着这个新产品回到医院，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可是技工间门前广场上电灯明亮，工作非常紧张，谁也想不到睡觉。床做好，气垫放好，大家还睡上去试一下，的确很舒服，而且翻一个身只要两分钟。后来床放进手术室以后，技工同志们还不放心。他们轻手轻脚地走到手术室门口，等着有人出来，便问床合用不合用。塑料厂也打来电话，问气垫行不行，要是不行，厂里还要做一个更好的送来。

一直到现在老丘睡的都是这张“转床”。他后来从手术室搬进隔离病房，这张床也跟着他搬了过去。

这不过是无数动人故事中的一个。在设计制造“转床”之前，医生们还到过上海医疗器械厂，想在那里找到一张合用的床。厂里有一张骨折床正放在出口商品展览会上，听说医院需要，马上就用卡车把床搬回来，并且进行了改装，让病人在床上睡得安稳舒服。好些工人同志为这个工作动了脑筋。床送到医院以后，一个参加设计的老工人深夜还从杨树浦跑到医院来，他说：“我下班回到家里，想想不好，病人这样睡着，还可能感到不舒服。我想想还是加几块可以轮换的木板好些。”

他就为了这几块木板，穿过了大半个上海。他把图样画了出来，他说，如果不来一趟，他一夜就睡不安宁。

有一次病人需要一种特效药，上海没有存货，上海医药公司马上打电报给广州公司。广州公司立刻设法买来，交飞机运到上海，不到三天，药就到了医生的手中。

还有一个晚上，医院营养室的一位同志到一家饮食店里为老丘买鱼圆汤。店里刚刚熄了火，职工听说老丘要吃鱼圆汤，马上动手赶做。炉子灭了，立刻发起火来；没有鲜鱼，就到别家店里去借。全店五十七个人就做了五十七只鱼圆，说是："一只鱼圆一颗心，送给老丘表心情。"鱼圆汤做好，职工们推了两位代表亲自送到医院去。

动人的故事太多了。送到老丘身边的不止是五十七颗心，是千千万万颗心。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守护着老丘，都在等待机会为他做任何一桩事情。从全国各地寄来了慰问和鼓舞的信函，所有的人都要老丘活下去，带红领巾的小学生们不断地来信要求医生叔叔们创造奇迹。医务界好些单位的全体同志都来信表示："愿意为他献出一切，要皮有皮，要血有血，要力有力。只要能够在抢救丘财康同志的艰巨任务中尽一分力量，就是我们最伟大的光荣。"

南京一位画家送给老丘一幅毛主席的画像。他请护士把画像挂在床对面的墙上，他仰卧在床上，稍微抬起眼光，就看得见毛主席。他想到毛主席，就有了忍受痛苦的力量。

上海国画院送他一幅花卉的中堂，上面题着这样的字："铁打的身体，钢铸的心，在你钢铁战士的面前，我们看到工人

阶级优良品质的活的化身。钢水可以损伤你的皮肤，丝毫损伤不了你的党性。在你的心目中只有钢铁，只有党，只有人民；给你永生的力量——是党的领导，是你的眼睛。送上一丛永不凋谢的鲜花，祝你早日恢复健康，重新跨上钢铁战线。”

人们关心正在大发展的钢铁工业，人们热爱钢铁战士的高贵品质和英雄形象。

六 “党是我的第一条生命”

在这些时候，老丘始终伏在病床上忍受极大的痛苦。医生和护士们用尽了方法减轻他的痛苦，但是并不能消灭它。连主任医师也说过：“我们给他治疗的时候，我想换个别人一定受不下去，但是他都忍受了。我看见他咬紧牙齿，不喊痛，我也难过得流了眼泪。”老丘的痛苦是长期的，止痛针也不能打得太多。换药的时候，连笑气麻醉也不能使他安静。有时他痛得实在没有办法，全身抖得支持不住，发出了叫痛声，他马上就用力唤着：“毛主席来啊！”“毛主席来啊！”其实他再用力叫，声音也不会大。但是一提到毛主席，他觉得再大的痛苦也能够忍受。

他最初伏着睡的时候，呼吸急促，疼痛难熬。一位年轻医生劝他忍受，他说：“医生，请你搬过床来睏一下试试看。”他又说：“这比受刑还苦啊！”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来找他谈话，对他说：“工作时候要相信党；生病时候也应当相信党。”他就表示，再大的肉体的痛苦他也要忍受下去。

有一次病情恶化，副主任医师也起了动摇，认为他活不下去了。老丘自己也感觉情形严重，他就对他的爱人说："看样子，我很危险，两个孩子要交给你了。"当天晚上党总支副书记来看他，他讲了自己的思想情况。副书记鼓励他要有信心，还说："你的病一定能治好。有党在，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他听党的话，就像一个孩子听母亲的话。他又恢复了乐观的情绪。党要他信任医生，好好地跟医生合作。他在治疗过程中一直跟医生配合得非常好。换药是最痛苦的，可是他仍然对医生说："换吧，不换药毛病怎么会好呢？"他吞下任何食物，颈部每一牵动都会增加他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吃东西。但是要治好病，就需要大量的营养，党委书记向他解释几句，他就当作任务认真地接受了。单靠吃东西还不能保持他身体需要的营养。医生又要从他的鼻子里插一根胃管进去，每天滴入多少养料。他整天伏在床上不能够动，已经感到呼吸困难，鼻子里再插进胃管，那是更加难熬的痛苦，但是他终于听党的话，不声不响地忍下去了。

他的爱人初到医院里来看他的时候，他小心地叮嘱她："五号就要到了。你记住，要替我缴党费。千万不要别人垫，要从家里拿钱去缴。"他接着又说："不要忘记了。党是我的第一条生命。"

他把党当作他的第一条生命，所以他非常听党的话。他要活下去是为了党，也是为了党交给他的工作。

老丘有一次对年轻医生谈到他的身世。他说："我过去是一个可怜的人。在旧社会里吃过很多苦。"他原是崇明岛上的

一个贫苦农民，被国民党当壮丁拉去过。后来逃了回来，在上海摆过小摊，又做过轮船上的杂工，到处流浪，没有固定的职业。解放以后，他一九五一年进了上钢一厂当助理工，很快地就学会了炼钢技术，从第三助手、第二助手一直到担任司炉长的职务。他五二年入团，五四年入党。五五年做副炉长。

他是五六年调到上钢三厂来的。这次上钢三厂发生事故的时候，他在火焰里从一面小窗爬出去，带着一身火滚下平台。工人们抱住他，扑灭了他身上的火，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在医院里清醒过来，马上就想到他的炼钢炉子，想到今年的生产任务。他希望能够早日回到厂里去。厂里的同志来看他，他反倒鼓励他们："你们不要怕，像这样事故是少有的。不要这样一来就害怕了，鼓不起干劲来了。还是应该加油干！"三厂的党委书记来看他，他惋惜地说："这个月的任务恐怕完不成了，不能达到要求了。"他常常说要早些回厂去，要赶英国。

晚上他常常在梦中叫起来："铁水！铁水！包子放下一点，行车靠过来！"他好像就在转炉旁边指挥工作一样。他醒过来，有一次他的爱人在旁边问他讲什么话，说是"你好像在车间里一样"。他回答："我一直都是在车间里。"

甚至在他忍受穿心的痛苦的时候，他的头脑也是很清醒的。他伏在病床上，连动也不能动一下，浑身痛得发颤，他还不忘记关心人，帮助人。他任何时候都在做思想工作，正像一位护士所说，"他总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知道，他就要提意见，有时虽然尖锐，却很正确。"他在厂里工作时是这样，在医院生病时也是这样。有一次他告诉一位医生：

“做工作应当有三分热诚，七分措施，二十分干劲。我们在生产上就是这样。”他批评主任医师“不够大胆”；批评副主任医师“太主观”；他对副主任医师提的意见最多，也最尖锐。副主任医师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同时也在受教育。

还有一次他已经搬到“转床”上了。青年医师和护士给他翻身，不小心让他连床垫一起滑了下去。他后来对青年医师说：“我做个梦，梦见床翻倒了。不过压在下面的不是我，是你们。”

一个青年护士读报给他听，她读的是轻松的新闻。他就说：“读报应当先读社论，然后读国内大事和国际新闻。”他知道她是团员。他对团员有团员的要求；对党员有党员的要求；对群众有群众的要求。

老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躺在广慈医院的隔离病房内，不像一个病人，倒像一位认真负责的政治教员。他一直抓紧思想的工作。他不断地用他的活生生的例子，用他的尖锐的批评和具体的意见帮助、教育、团结了所有跟他直接间接接触过的人。他们都爱他，尊敬他，对他发生了那么深的息息相关的感情。

七　他顽强地活着

挽救生命的战斗仍然在进行。到今天老丘已经活到一百零三天了。他顽强地活着，忍受一切痛苦地活着。他已经成

了一面旗帜，一面鲜红的旗帜。许多人把他看作鼓舞的力量或者学习的榜样。许多人把他当作说明工人阶级高贵品质、说明共产主义伟大风格的活生生的例子。

挽救生命的战斗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老丘活到现在就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他已经渡过了一个一个的大难关。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以后即使还会碰到一些困难，也不过是恢复健康迟早的问题。老丘一定会活下去。迷信破除了，陈规打破了，在上海广慈医院里产生了双重的奇迹：严重烧伤的人会活下去；医生在治疗病人的肉体，病人在治疗医生的心灵。医生的病不见得比烧伤的病人轻，知识分子的病是在心上，而且病了相当长的时间。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设身处地跟老丘比一下，他一定会看出自己的毛病来。看出了毛病，就愿意服用医生的药。

挽救生命的战斗在推动整个广慈医院前进，推动整个上海医务界前进，推动全上海的医务、护理工作者前进。这个战斗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产生这样大的影响，这不是任何一个医生的力量。在这么艰巨的战斗中，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想起了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的话："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为了一个目的，才会产生伟大的力量。"

所以剧作家虽然把老丘当作剧本的主角，他着重写的仍然是群众，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群众。

1958年7月9日作，

8月7日改。



创造奇迹的时代

《创造奇迹的时代》，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七月《收获》第四期，同年十月由作家出版社印行单行本。

创造奇迹的时代*

——党挽救了丘财康同志的生命

一

五月二十六日午夜一点钟光景，上海瑞金二路广慈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室里到了三个被钢水烫伤（也可以说是烧伤或者灼伤）的病人。他们是由上钢三厂保健站的李医生和值班徐护士陪送来的。一个伤势较轻，两个受了重伤，全身皮肤都烧坏了，两只手高高地举在头上。他们躺在三副担架上。两个人不停地叫喊；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脸肿得分不清眉目，右下肢皮肤已完全烧成了焦炭，却把牙齿磨得格格地响，不让自己吐出一声痛苦的呻吟。这个能够忍耐痛苦的人一进医院，就给医生和护士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以后都叫他做老丘，他便是共产党员丘财康同志，是一个二十九岁的优秀的炼钢炉长。

急诊值班医师一面叫人把病人送进手术室，一面打电话

---

* 本篇原署作者名为巴金、任幹、胡万春、靳以、魏金枝。其中部分为巴金同志所作，部分曾由巴金同志改作并对通篇作了整理。经征得巴金同志同意后收入本卷。

到外科医师宿舍，把住院的外科医师全叫起来了。大家紧张地做急救的工作，一直忙到早晨四点半钟，才把三个病人包扎好，送进了病房。有些医师离开手术室的时候，鼻子里还有烧焦的气味。

天亮后不久，上钢三厂党委组织部长就赶到医院来了。他代表三厂党组织来向广慈医院表示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三个钢铁工人的决心。值班医师听见这位同志的恳切的谈话，很感动，同时也很难过。他知道这三个钢铁工人是应当救活的，但是他想那两个重伤的人怎么能救活呢？医书上没有写过，老师没有讲过。外国书上写得很明白：烫伤、烧伤面积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的病人在通常的情况下，难免死亡。他没法回答这个难题。按照广慈医院外科的规矩，每天早晨八点钟有一个晨会，他便把难题交到晨会上去。

全体外科医师都按时来了。值班医师报告了三个病人的情况，他越讲越激动，仿佛血肉模糊的形象还在他的眼前。医师中有些刚刚参加过急救、包扎的工作，也了解伤情的严重。轻伤病人马富根同志的烫伤面也达到百分之三十，丘财康同志的烫伤面到了百分之八十九点三，还有一位年轻同志刘四小，他的烫伤面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一：除了头皮和脚底外，全身就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值班医师讲完话坐下来。大家都皱起了眉头，不作声，脸上的表情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想法却差不多：死亡。后来也有人发言了："伊文思是治疗烫伤的权威，他报告过十一个病例都是百分之七十的烧伤，没有一个救活的。况且现在这两个病人的三度烧伤面都超过了百分之

二十几。"有人说："这两个病人活不了五天。"另一个人说："至多也不过三天。"有些医师口里不说，心里也是这样想：过去没有人治好过这样严重的烫伤，外国人设备那样好，也救不活这样的病人，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有一位医师刚刚编完关于烫伤、烧伤的讲义，对这个问题了解多一点，可是他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他比别人知道多些，也就比别人更缺少信心。

二十七日的晨会虽然是在悲观绝望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它也决定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当场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治疗小组，由董方中（外科主任）、史济湘（副主任）、陈德昌、朱德安四位医师负责。这四位医师当时的热情也并不比别的医师高，信心也并不比别的医师大。他们也只是抱着"聊尽人事"的态度来对待病人，用一点药减少病人的痛苦，延长病人的生命。但是他们跟病人接触以后，他们的思想感情一天一天地起了变化。他们的眼界渐渐地开阔了，他们的心灵渐渐地开展了。史济湘医师曾经公开说过："医学上是不可能有奇迹的。"然而"奇迹"就在他们的眼前产生了。医生治疗了病人的身体，病人治疗了医生的心灵。今天医生谈起病人就像谈起自己的亲人一样，连主任医师也要求过把自己的皮献给病人。这是他们最初接受任务时所万想不到的。他们要是回想到三十天前那种灰溜溜的心情，一定有不少的感触，一定会发生疑问：那些外国的统计数字当初怎么会把自己的脑子拴得那么紧？

医院的党组织和上钢三厂的党委当然不会同意这种悲观的看法。外国权威们的报告吓不倒他们。他们决定用一切力

量来救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受了伤的钢铁工人。于是在外科的晨会以后又举行了院外专家们的会诊。凡是能请到的上海著名的外科专家都请来了。医师们听到请专家会诊的消息以后，有人说："这是白费力气，专家又不是神仙！"又有人说："这是做给人看看的，跟人死了开追悼会差不多！"还有一位医师心里想："会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大家都说'预后严重'治不好，那么人死了，就不会有纠纷。"会诊的情况果然不出这些医师的预料。外科的权威们聚在一起，提不出一个有创造性的意见。每个人都把外国文献上的死亡统计学宣传一通，还摇摇头，皱皱眉，叹叹气，表示对病人的同情。最后大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必然死亡。其中有一位最大的权威听见别人问他要不要用某一种药，他就说："用不用都没有道理，反正我来了，比你们用那种药好些。"他的意思就是：用不用那种药病人都会死。反正我专家来看过了，病人死亡你们就没有责任了。

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居然还有人摆解放以前的那种专家架子！然而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反驳他。可见医师们仍然充满消极、悲观的情绪，"无能为力"的思想仍然牢不可破地盘踞在他们的脑子里。

所谓"聊尽人事"的会诊终于结束了。参加会诊的专家们留下了"预后极端严重"的共同结论，就心安理得地告辞走了。在专家们看来，凡是应当对病人做的事全做到了，至于病人能够活多久，那是病人自己的事情。

会诊并没有解决问题，它反而增加了困难。

重病室里笼罩着大片的乌云。医师们仍然没有治好病人的信心。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党组织出来说话了。

二

下午在外科办公室里，陈德昌医师正在跟史济湘医师谈上午的会诊。这个青年医生是一个共青团员，当然不满意专家们那种无能为力的说法。可是他自己想不出好的治疗方案，也找不到理由驳倒外国的文献。他心里也有些疑问，却又不敢公开地讲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骨科医师杨之骏推开门走进来了。杨之骏医师是广慈医院党总支医疗系支部的副书记，总支刚刚开过会讨论了治疗上钢工人的问题，杨之骏医师代表总支来找负责治疗的史济湘医师谈话。

“史医生，对那两个烫伤比较严重的工人同志，你看医院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杨医师坐下以后，就直截了当地跟史医师谈起来。

史医师看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答了一句：“我看能够做到的全做了。”这是会诊的时候一位专家说过的话。

这句话是杨医师料得到的，他并不失望，却接下去说：“刚才总支开过会。组织上决定用一切力量来挽救我们的钢铁工人。上钢三厂的党委也这样要求我们。他们是为祖国创造财富的人，是优秀的钢铁战士，是祖国最需要的人。例如那个炉

长丘财康同志受了重伤，不哼一声，始终念念不忘他的工作。他自己也要活，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说他应该死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治好他呢？”

史医师抬起头来看了杨医师一眼，说：“杨医生，你也是医生，跟我一样。我们应当相信科学。人体组织的广泛破坏，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组织破坏所引起的病理生理的变化是科学的规律，死亡就是规律演变的必然后果。国际文献上的死亡统计学就是这些必然后果的证据。文献上说烫伤面积百分之七十的人难免死亡，丘财康烫伤面积已经到百分之八十九点三，我们怎么能救活他呢？杨医生，在医学上是不可能有奇迹的。”

杨医师淡淡地笑了笑，不同意地反驳道：“现在各方面都在创造奇迹，为什么我们在医学上就不能创造奇迹呢？难道外国文献上的死亡统计数字就不能够突破吗？史医生，我看，你是给那些统计数字缚住了手脚了。我不懂为什么外国医生救不活的，我们就不能救活呢？难道我们不能发动群众的力量，运用群众的智慧来打破迷信，创造奇迹吗？”

“嗯？”史医师说了一个字，他心里想：你这是强人所难啊！

杨医师望着史医师，提高声音说下去：“二医党委会明确地提出来，应当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问题。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统计数字看来，这两个病人是没法救活的了。但是请问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被钢水烫伤的人是些什么人？只有工人才会受到这种严重的烫伤或烧伤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会

用尽一切力量来抢救劳动人民的生命。难道资本家会不惜一切来抢救工人？难道那些一味追求利润的医院会用尽力量来抢救工人？再拿医护人员来说，他们会具有像我们这样深厚的工人阶级的感情吗？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统计数字对我们并不完全适用。我们就拿丘财康同志来说吧，在我们国家里他是主人，他是祖国最需要的人，我们的国家能够动员一切的力量来挽救他的生命，我们的党愿意用一切力量来治疗他，使他活下去。那么他为什么就不能活下去呢？”

史医师埋着头不做声。杨医师的话的确打动了他的心，但是并没有打通他的思想。他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单靠政治热情就能解决问题？他做了十一年的医生却始终没有见到一个奇迹！他回答不出自己的问题，也不愿意对杨医师再说那些他已经说过几次的话。他站起来，说了一句：“我去看看病人，以后再谈吧，”就走出了办公室。

年轻的陈医师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谈话，他没有插嘴。他激动得厉害。他本来就不完全同意史医师的看法，现在渐渐地完全站到杨医师这一边来了。他看见史医师默默地走出去，有些不满意。他想，不管你怎样固执，我总要听党的话。

杨医师望着史医师的背影，心里想，这个人的思想已经在动了。我们连大山也搬得开，还怕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人的脑子？他兴奋地离开外科办公室，到总支书记兼院长程贤家同志那里去。

党总支委员会经过研究后召开会议，向负责治疗的医师们特别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不要

再受洋人的束缚；第二，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程贤家同志最后还强调："我们党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号召全体人民节约一针一线。但是要挽救为祖国创造财富的人，党决不吝惜一切。党要用一切力量来挽救钢铁工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两种不同的态度，必然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

这次会议更明白地表示了党的决心，也开始解放了医师们的思想。党组织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支持医师们的工作，号召大家创造奇迹。党组织的书记亲自抓紧治疗的工作，随时听取汇报，处理建议，帮助解决困难。

从此笼罩着重病室的乌云一扫而光，整个医院以无比的热情进行创造奇迹的战斗，奇迹果然在广慈医院产生了。

三

史医师离开了办公室，边想边走，不觉走到了病房门口。

他换上了消毒的隔离衣，慢慢地走进丘财康同志的病房，到了病人的床前。护士提醒病人道："同志，史医生来看你了。"

丘财康同志背上伤势特别严重，只能够伏在床上，两只手包扎得紧紧的不能动，他的呼吸急促，痛苦地睁开了眼睛。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这句普通的问话脱口而出，在史医师的眼里这个人也不过是普通的病人罢了。他拿起病历卡看了一下，病人现在的体温是三十九度……

病人声音打颤地说："医生同志，告诉我，我的眼睛坏了没有？"

“你的眼睛很好，”史医师答道。

“我怎么觉得看东西有些——模糊？”

“模糊？”史医师吃惊地说。他便朝着病人伸起两根指头问道：“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两根指头。”

史医师又伸起四根指头再问：“看得见吗？”

“看得见，四根指头。”

“你看得很清楚，眼睛很好，一点也没有烧坏。”史医师安慰病人道。他并没有忘记这时候病人正在忍受极大的痛苦。

“那就好了。脸上多一些疤，难看点，不要紧。”病人好像松了一口气地说。

史医师怜悯地看了病人一眼，他当时还不大明白，后来才听说炼钢工人最需要一双好眼睛，苏联专家曾经对上钢三厂的工人说：“你们真行，只靠一双眼睛就知道什么时候出钢，而且质量准不会错。”原来病人在极度痛苦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工作。所以过一天厂里同志来看他，他就说：“医生说我的眼睛没有坏，医好了回来，仍旧可以炼钢。”

病人刚说完话，忽然全身微微地颤抖起来，牙齿磨得格格地响，他睁大眼睛望着史医师，诚恳地要求道：“医生同志，我跟你讲，我求你，你一定要救活我。不是我夸口，我很重要。炼钢炉子缺我不得。……我的家，我的爱人、孩子，我都放心得下。但是炼钢的炉子怎么办呢？”

史医师常说做外科医生的人不应当动感情，头脑要冷静，心肠要硬。他自己做了十一年的医生就很少动过感情。但是

他这次听见病人的这几句话，忽然激动得很厉害，平日讲惯了的那些话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他结结巴巴了好一阵，才吐出几个字来：

"同志，你放心，你会好的。"

他转过身，轻轻地离开了病房，带上了房门。他埋下头靠在门框上站了片刻，从他的眼角落下了几滴泪珠。这是他做医生以来第一次为病人流泪。他不但流了眼泪，而且这一天他都在想病人的事情。

"为什么他在快要死的时候，还只是想到他的炉子，他的工作呢？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想到他自己呢？……为什么他能够，我就不能够呢？"

史医师反复地想来想去，他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他越想越觉得不舒服，在没有人的时候，脸会突然红起来，他感到惭愧了。

"我总不能看着他死，我至少总要为他做点什么事情。"一直到夜深，他还在想这个问题。

在第二天的晨会上史医师提出了建议，发动了群众的力量，由四十位外科医师每人阅读两篇近十年来各国有关烫伤的文献，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治疗方面的建议。下午开会讨论治疗方针的时候，四十个医师果然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许多好的建议最后概括成为十五条治疗病人的新方案。

散会以后，董方中和陈德昌两位医师先到手术室去了。杨之骏医师同史济湘医师走在后面，他兴奋地对史医师说：

“史医生，你看，一发动群众的力量，马上就有了办法了。大家的信心也增加了。刚才上钢三厂的五千个工人同志给我们送来了大字报，感谢我们能够尽一切力量挽救他们的重伤同志……”

“大字报贴出来了吗？”史医师连忙站住着急地问了一句。

“还没有。迟早总要贴出来的。”

“现在还没有把握啊。只能说是想出了一些办法。如果治不好怎么交代？”史医师沉吟地说。

“那就看我们有没有决心了。办法是一定有的。不是就要给病人取下包扎，把病人安置在严密消毒的手术室进行绝对的隔离治疗吗？这不就是很好的办法？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只要相信群众的大胆创造，我们一定能救活病人。”

史医师点了点头。他找不到理由来反驳了。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好像走上了一条路，前面的景物全是新的，他还不知道这条路会把他引到哪里去。但是他觉得他不再像前一天那样地悲观了。

上钢三厂全体工人表示感谢的大字报搁了几天才贴出来，它轰动了整个医院。大字报像一份战书，它向死亡挑战，向一切保守、失望、迷信、自私、落后的思想挑战。它喊出了五千个钢铁工人的声音：“尽一切力量挽救我们的重伤同志！”

同时也贴出了广慈医疗系党支部《给全体外科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仿佛是进军的誓师辞。它根据两位重伤工人同志活了六天的事实，要求全体外科同志在思想上和

技术上再来一次跃进……真正创造出奇迹来。“公开信”一方面表扬了医护人员的干劲，另一方面也批评了个别护士的丑恶的个人主义，那个有经验的外科护士害怕病人身上的绿脓杆菌传染给她的儿子，竟然要求调离工作岗位。她这种自私的行为后来受到了全体护士的谴责。“公开信”还介绍了丘财康同志的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要求大家学习他那种至死不忘工作的精神。

“公开信”在整个医院里掀起了拔白旗、插红旗的高潮。

共产党员丘财康同志的形象鼓舞了所有的人。一个宏亮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医院：在党的领导下，尽一切力量挽救丘财康。

四

在广慈医院里，在各个兄弟医院里，人们不断地谈起丘财康同志的事情。医师和护士们都习惯叫他做“老丘”。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老丘，但是他们谈起他，就像他是大家的亲人一样。

丘财康同志有一次对医师和护士们谈起他自己的事情。他说自己过去是个可怜的人，在旧社会吃过很多苦，被拉去当过壮丁，逃了回来，又摆过小摊，做过轮船上的杂工，没有固定的职业，到处流浪。解放后他才进了上钢一厂当学徒。五二年入团，五四年入党，后来他在上钢三厂当炉长。

陈德昌医师在他的日记里写着：“他讲的就是这些，大家

围坐在他的床头，舍不得离开。”

董方中医师也常常向人讲起他一生永远忘不了一件事情：有一次老丘忽然问董医师：“你是不是党员？”董医师了解病人的关心，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道：“我现在还不是。”老丘就进一步启发他，说他应当有一个打算，并且告诉他怎样打报告，怎样提高自己，好好争取做一个党员。老丘还问起他的出身和社会关系。老丘在忍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也并没有忘记关心人，帮助人。

护士小裘同志一直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进行病房消毒的时候，老丘忽然醒了，小裘想分散他的注意力，便读报给他听，她选了一则动物园里黑猩猩的消息。老丘听了就说：读报应当先读社论，读国内大事和国际新闻。护士长谈起来也说：“老丘无论看什么总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很尖锐，也很正确。”

另一个护士在她的日记里写下一件事情：第三天三厂党委书记来看他，他很担心地说：“恐怕这个月的任务完成不了，不能达到要求了。”

有一次老丘对一位医师提意见：“做工作应当有三分热诚，七分措施，二十分干劲。我们在生产上就是这样。”

史济湘医师有一次听见老丘跟他爱人华秀芳在谈话。华秀芳劝他：“……要好好调养。丁厂长和党委书记要我对你说，你一定要好好地调养。”

史医师马上接下去：“你应当多吃点东西，多吃东西，人就有力气。你现在吃得太少了。”

老丘打趣地说：“你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等我好了，我

们比比看。我一个月要吃五十五斤大米。”

史医师楞住了。他望着老丘的还没有完全消肿的脸，心里想：多么旺盛的生命力啊！他又听见老丘对妻子说：

“秀芳，五号就要到了。记住，五号，你要替我缴党费。千万不要别人垫，要从家里拿钱去缴。”

“我知道。”

“不要忘记了。党是我的第一条生命。”

又有一次厂里同志来找老丘，老丘反倒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害怕，像这种事故是不常有的。你们要安心生产，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害怕了，鼓不起干劲来了。”

史医师还听见华秀芳讲起一件事情。华秀芳每天晚上都在病房里陪伴丈夫。

老丘常常在睡梦中突然叫起来：“铁水！铁水！包子放下一点，行车靠过来！”他好像就在车间里指挥工作，站在喷吐火焰的转炉旁边，他说得那么认真。

华秀芳吃了一惊，轻声问：“财康呀！你在说啥呀？”

老丘醒了过来，说：“我没有说啥呀！”

华秀芳又说：“你好像是在车间里似的！”

“是啊，”老丘说，“我一直都是在车间里。”

史医师想起这些话就很感动。史医师跟老丘接触越多，感触也越深。他常常受到老丘的批评。有一次他没有戴消毒手套就去挨老丘的身体，一面还说：“老丘，你好多啦！”老丘马上回答他：“史医生，你这是在卖弄老资格吗？”又有一次老丘批评史医师：“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还没有放下！”史医师当时有

些受不了，但是他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心里又平静了。有两次史医师在病人面前拿出旧作风来，碰了钉子，差一点当场发脾气。他为这种事情感到惭愧和后悔。有时他甚至觉得不是他在给老丘治病，倒好像老丘在治疗他。他的病在心上，那是旧社会留给他的，现在这个病开始有转机了。史医师自己后来说："工人跟知识分子的想法的确差得很远。照我的想法，既然发生了事故，这种事情我第二趟再也不要做了。工人却认为应当做，治好了回去还要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念念不忘个人的人，这种人在新时代要被淘汰的。老丘是一个真正忘我的人。"所以史医师对老丘的感情反倒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他从对病发生兴趣，到对病人发生兴趣，他公开地承认自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还说："现在才知道医生对病人应当有感情。"而且他已经对老丘发生了感情。

不仅是史医师，每个给老丘治病的医师都对老丘发生了感情。一个医师说："我们爱他。"一个护士说："病人每一次痛都痛在我的心上。"另一个护士说："老丘病情好转，我们情绪也随之而好转，感到非常高兴。我从来没有对病人产生过这种友谊。"另一个护士在日记里写着："时间真快，夜班又下班了，真想在病人旁边多留一会。"还有一个护士写道："同他接触的时间越长，越发觉他有许多高贵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有一个报名献皮的护士说："只要能为老丘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都是光荣的。"

医师和护士跟病人这样密切地息息相关，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病人使医师和护士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也是从来

不曾有过的。工人阶级的高贵的品质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医师们创造了奇迹，病人也创造了奇迹。这都是外国的文献上所没有的。

现在负责治疗老丘的四位医师和担任护理工作的十位护士中有不少的人都在写日记，这些日记将来都会成为很可宝贵的文献。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件事情。人们赞美丘财康同志的钢铁一样坚强的性格，忍受痛苦的忍耐力，和高贵的道德品质，同时也没有忘记这些力量来自什么地方。

丘财康同志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也有忍受不了痛苦的时候，但是只要第二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关子展同志或者广慈总支副书记金伯刚同志来跟他谈几句话，他就改变了态度。有时他缺乏食欲或者饮食难咽下，只要党委书记来解释几句，他就当作任务来接受。他在任何时候都相信党，听党的话。

五

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党组织在指挥部里发出必胜的号令。医院的全体工作同志兴奋地朗诵着“公开信”里激动人心的话：“这几天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不平凡的思想革命。这三位同志居然活到今天的事实，在我们面前展出了一幅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灿烂的远景。”参加战斗的不仅是那些专门负责治疗和护理的医师和护士，医院的全体工作同志都团结一致地高举着红旗走上了前线。黑板报上每天登出捷报。人们欢欣鼓舞地传布胜利的消息：外国文献上的死亡统计被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

自然人们心上偶尔也会蒙上一层阴影，例如在刘四小同志逝世消息传出来的时候。烫伤面积在百分之九十一以上的刘四小同志终于因败血症死去。但是他活了十一天的事实也已经打破了束缚人们脑子的陈规了。刘四小同志的死亡引起了不少同志的眼泪，然而也加强了大家尽力挽救丘财康同志的决心。刘四小同志的父亲甚至愿意让医院解剖他儿子的尸体，“为了对丘财康同志和以后的严重烫伤病人的治疗有所帮助。”

丘财康同志伏在手术室里病床上，不能够移动一下，从早到晚全身就像被刀子割着，痛得他常常咬紧牙关，直淌冷汗。他吞下任何食物的时候，颈部每一牵动都会增加他的痛苦。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他常常对他的妻子说：“我一定会活，因为党委书记告诉我，我一定能活下去。”他还向医生们提意见：“我什么时候出院呢？……能不能再跃进呢？”

丘财康同志在手术室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当天就会传遍整个医院，甚至飞过医院的围墙，传到上海的一些角落。他的响亮的声音震彻了人们的心灵。他要活，他要用坚强的求生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战胜死亡。为什么科学就不能让他活下去呢？他要创造奇迹，为什么科学就不能创造奇迹呢？

从兄弟医院，从学校，从工厂送来了大字报，寄来了信函。每一个字都含有无限的同志爱，每一句话都表示了支持和关心。连小学学生也写信来要求医生叔叔们创造奇迹。第二医学院的一部分学生和某些医院的全体工作同志先后送来了热

情的信，表示："为了抢救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愿意为他献出我们的一切，要皮有皮，要血有血，要力有力。只要能够在抢救丘财康同志的艰巨任务中献出一分力量，就是我们最大的光荣。"

群众的支持和鼓励增加了医师们的勇气和信心，也增加了他们工作的热情。连过去迷信外国文献的史济湘医师也知道战斗正在进行，要不投降，就只有勇猛前进。他后来在公开的会上说："我想到有这样许多人在关怀他，帮助他，我心里就有了力量，新的力量。"董方中主任医师的信心更大，他甚至准备把自己的皮献给病人。陈德昌医师为了照应病人，接连几夜不闭眼睛，他晚上就睡在病房的附近。

六月五日第一次为丘财康同志进行异体植皮，这是预防感染的一种措施。董、史两位医师紧张地工作，在病人的两腿、两手上移植健康的皮肤，从夜间十点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五点。皮是从一位老太太身上取来的。老太太在这天中午去世，她的丈夫愿意献出她的皮。他说："她生前害精神病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她死了，她的皮对社会主义有好处，为什么不献呢？"

植皮的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就有人开始报名献皮，到十六日第二次植皮的时候，报名献皮的人已经有八百几十个了。植皮的时间是在下午，十二点钟起人们就排队等候献皮。医师们决定用四个人的皮，每人切除四寸到八寸，皮上的毛已经剃掉，而且涂上了药。临时有人送来新死亡的小孩，剥下皮来刚够植在病人的背上，就用不着那四个人的皮了。四个人里

面有三个是护士。这些同志失去了献皮的机会，他们感到多么大的失望。一位报名献皮的同志谈过他的感想：要是他光荣地献了自己的皮，几年以后，孩子看到他身上的伤疤，问起来，他就可以自豪地说："我的皮已经长在中国最优秀的炼钢工人身上了。"这是多么不寻常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是很普遍的了。

激烈的战斗继续在进行，参战的人愈来愈多，斗争虽然艰苦，但是形势愈来愈有利。负责治疗工作的医师们越来越了解党组织过去所说的"用尽一切力量抢救"的意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群众发动起来了，社会也动起来了。医院的每个部门都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医院里进行的一切工作都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为了抢救病人，需要什么，就有什么。要药有药，要血浆有血浆，随时得到各个兄弟医院的支援。医生说一句话，许多人就会热情地劳动一整天。过去没有的东西，只要对病人有利，就会在一两天内创造出来；国内存货不足的药，只要病人需要，也可以马上从别处买到。譬如为了控制绿脓杆菌败血症，搭配五十八种抗生素试验，试验成功了一种多粘菌素来治疗。其中有一种药，上海医药公司没有，公司的党委马上打电报给广州公司，广州公司接到电报，立刻派人四出采购，很快地解决了这个困难，将药交飞机运到上海，不到三天药就送到了广慈医院。医师们接到这种药的时候，他们会有多大的感触，这是可以想象到的。他们会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整天守护着病人的并不止是他们几个，整个广慈医院，各个兄弟医院，整个上海社会都在注视着病人，

等着机会为他尽力。上海医疗器械厂送来了特制的骨折床；一个老工人深夜从杨树浦跑到广慈医院来提出关于床的新意见，并且画了图样。他说如果不来一趟，他一夜睡不安稳。

医师们无时无刻不在想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董医师有一次看见丘财康同志咬紧牙齿不叫痛，他难过得流了眼泪。病人躺在床上不论伏着或者仰卧，都非常痛苦。他翻一个身、换一次药要花四五小时，还要动员十位医师、五位护士。移动的时候病人痛得更厉害。因为他烫伤面积非常广，除了头皮，两个肩膀、腰部一圈束皮带的地方和两个脚底以外，全身都烧坏了。病人仰天睡着，背就溃烂，感染很厉害；翻过来伏着睡，胸部又会发生问题。要减轻病人痛苦，要治好病，必须设法制造一种可以旋转的病床。医师们在一本书上找到一张转床的照片，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医院的技工间。

技工组的同志们听说丘财康同志需要这样的床，而且要在一天里面做好，他们高兴地一口答应下来，马上根据那张并不清楚的照片，照病人的身材尺寸，在技工间的地上画了一个草图，就开始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们从下午两点做起，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床就做好了。床上还需要气垫。那天下午技工们正在辛勤劳动的时候，叶椿秀医师赶到上海塑料二厂去交涉制造气垫的事。不巧那天正是厂礼拜。但是厂长很热情地把住在附近的工人找了来，马上设计，动手就干，工作到深夜一点钟，居然把一个非常柔软的床垫制造出来了。叶医师带着床垫回到医院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技工间门口广场上灯火通亮，技工同志们正在起劲地工作。那个给床垫做帆布

套子的工人听说需要很急，也就把机器扛到医院的技工间来，跟技工同志们一起劳动。大家一夜不睡，不吃东西，一直到床做好才松了一口气。

床做好，大家睡上去试一试，的确非常舒服，而且一两分钟就可以翻一次身。大家都很高兴。床搬进手术室以后，技工同志们还轻手轻脚地走到手术室门口，等着有人出来便问床行不行。塑料厂也打来了电话，问床垫是不是合用，要是不合用就马上另做一个送来。

这张床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减轻了丘财康同志的痛苦，也解决了治疗工作上的一些困难。这张床随时都在提醒每一个医师、每一个护士，要相信群众的智慧，相信群众的力量。

这只是无数的动人故事中的一两件。像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没法把它们全写下来，而且也用不着全写下来了。在我们国家里，在我们社会里，这的确是很平凡、很普通的事情。

在这里还可以讲一件事。丘财康同志当初进上钢一厂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同他一起进去，那个人叫做王福林。后来他调到三厂工作，王福林同志同时也调去了。王福林同志最近在杭州工作。他在上钢三厂的时候，跟丘财康同志还有一点小意见。他这次得到丘财康同志受伤的消息，立刻写信要他的爱人赶到丘家去看望华秀芳同志，王福林的爱人到了丘家，看见华秀芳同志一方面要照顾两个孩子，一方面又要到医院去陪伴病人，实在为难。她就决定把她的小孩交给家里的母亲照顾，自己到丘家来带丘家的两个孩子，让华秀芳可以专心

看护病人。这种大公无私的阶级友爱就是我们新社会、新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和一种巨大的力量。

正是靠了这个巨大的力量，丘财康同志终于战胜了死亡，广慈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六

丘财康同志已经在医院里住到了一个月了。他最近又搬进了消毒极严密的隔离病房。他的脸早已完全消肿，脸皮也已长好，前胸的皮逐渐长成，左腿也可以稍微移动。背上植皮以后，经过情形非常良好。血液里的绿脓杆菌已经能够完全控制。他的体温下降到三十八度左右。他的肉体的痛苦开始在减轻，他的食欲逐渐增加，他的乐观的情绪不断地增长。党给了他无比的力量。他自己要活，整个医院要他活，整个上钢三厂的同志要他活，整个上海的人民都要他活。他一定能够活下去。

丘财康同志以他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以他在钢铁事业上对祖国的贡献，成了英勇豪迈的工人阶级的象征。他在严密消毒的隔离病房里，伏在工人弟兄为他创造的转床和气垫上，他忍受痛苦的力量，他顽强的求生的意志，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以及他的一言一语都传遍了整个广慈医院，传遍了上海各个兄弟医院，感动了所有的医生和护士。不论见过他或者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受到他的教育。院内院外上千的人愿意为他献皮输血，以给他做一件事情为荣。学校老师在

课堂里介绍他的英雄气概，工人同志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各个阶层的人接连地到医院来探听他的病情和事迹，带来慰问信和鲜花。人们从全国各地给他寄来安慰和感谢的信。这么多的人关心他，这么多的人贡献力量使他早日恢复健康。

根据外国医学文献上的统计，丘财康同志活不到三天。但是他已经活到三十天了。他活着，这是不能抹煞的事实；他不但活着，而且渐渐地在恢复健康，这也是不能抹煞的事实；他可能还要经过一些难关，但是他会活下去，而且会回到他的同志们中间去，这也是不能抹煞的事实。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专家看来，医学上不可能有奇迹。然而丘财康同志活着就是一个奇迹。其实今天不仅在广慈医院里，在其他的医院里，人们也同样地在创造奇迹。因为今天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人人创造奇迹，处处创造奇迹。

广慈医院里的奇迹已经引起了全上海的注意。人们关心正在大发展中的上海钢铁工业，人们热爱丘财康同志的英雄形象和高贵品质。他把那么多人吸引到他的身边。那么多的人围绕着他，为着他献出全部力量和全部智慧。像这样的事只有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可能办到。如果没有这许多人，丘财康同志决不会活到现在，如果没有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革命，丘财康同志也决不会活到现在。广慈医院里的奇迹的确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正像一位医师所说的那样：“党把这许多人的心连起来，像一根红线把我们连成了一个整体，就是这个整体挽救了丘财康同志的生命。”

1958年6月26日。

后　　记

作家出版社要把我们五个人的集体创作印成小册，我们当然愿意让丘财康同志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格和上海人民（尤其是上海的医务界）所进行的挽救生命的严肃斗争感动更多的人。我们五个人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自己就受到了一次共产主义的教育；同时我们还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帮助，使我们深深感觉到新社会的无限温暖。

我们的“特写”是在一个半月以前脱稿的。这四十几天里面在丘财康同志的治疗工作上虽然还继续遇到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困难，有一个晚上甚至举行过内外科专家大会诊，讨论右下肢截肢的问题。但是这一切困难都已经先后克服，病人的危险期也早已完全过去。丘财康同志的健康逐渐在恢复，身上大部分伤口都已经长好。董方中医师和别的医师们一连为他进行过几次自体植皮，都是拿他自己左脚背、左下肢和肚皮上的皮来植在右下肢上面。现在全身情况非常良好。体温和脉搏也很正常。

前些日子我去广慈医院，在隔离病房窗外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见丘财康同志仰卧在转床上，一位护士用汤匙把食物送到他的嘴里。他的发红的脸上带着笑容。他的胃口很好，据

年轻的陈德昌医师说，他的食量几乎超过了两个常人。三天前我又去医院找陈德昌医师，又在病房的窗外站了几分钟。丘财康同志仍然安静地躺在床上，烧伤最严重的右下肢已经在长新皮了。陈德昌医师含笑地对我说明病人的情况。我知道史济湘医师到东北会诊去了，因为辽宁省某处的医院里有一个严重烧伤的病人；我知道这一层楼上有了好几张新的转床，因为从宁波、从南通、从太仓都送来了烫伤、烧伤的病人，为了护理这几位病人，还从别的医院里调来一些护士；我知道还有一个烧伤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四的病人在这里治疗，已经安全地度过了十几天，情况也很好，而且这位邓明琪同志也具有同样崇高的共产主义的品格；我知道跟丘财康同志同时入院的钢铁工人马富根同志早已痊愈出院……

这些消息都是我们的"特写"的读者们所最关心的，现在我借用这一页篇幅简单地报告一下。

巴　金 1958年8月8日。



赞 歌 集

《赞歌集》，一九六〇年四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

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些日子我好像在做梦：我走进了宝山和仙境，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我的耳边有那么多欢乐的歌声，我的心怀着无限的喜悦飞向四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高山到海洋，从森林到沙漠。我的心跟我们伟大的祖国贴得多么近。我感觉到活着是多么大的幸福！

这并不是梦：人不能做这么长的梦，梦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幸福。我明明生活在伟大的现实里面。前几天在一个会上，人们用热情的句子谈我们今天的生活，一位白发的老人站起来，语不成声地告诉大家，十年来他找到了一样宝贝："这就是我那个失去的祖国。"他的话打动了多少人的心，给多少人唤起了梦魇一般的记忆。在过去漫长的惨痛的日子里，谁不曾饱尝辛酸？谁不受雨淋日晒、风吹霜冻？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好像无家的孤儿。在那些被压迫、受践踏的日子里，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安身的屋顶，听几句好言温语？我们跟一切黑暗势力战斗到鲜血淋淋，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裹伤、洗去血迹。我们看见同胞们在铁蹄下面呻吟、哀号，却无法减轻他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萌芽》第十九期。发表时题为《我们的祖国》。

们的痛苦。在忍受痛苦的时候，在悲伤绝望的时候，在饥饿寒冷的不眠的长夜里，谁不曾含着眼泪、忍住叹息轻轻地唤一声“祖国，我们的母亲！”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在悲愤填胸的时候，多少人忍不住吐出了一两句怨言：“祖国，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儿女遭苦难、受欺凌！”的确，十年以前那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里，祖国像一位贫病不堪的母亲，她不能庇护自己的儿女，只好流着泪用失神的眼光望着他们横遭摧残。但是她从来不曾责备过自己的儿女：那么多的子子孙孙就不能保护年老的母亲过一天幸福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的“过去”！在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的时日里，我们失掉了多少宝贵的东西！不用说，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祖国。没有了这一位老母亲，整个大家庭就成了一盘沙，让无情的狂风暴雨逐渐冲散、吹垮。

我不知道应当用多少文字来表达我们欢乐的心情！孤儿们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母亲，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一盘散沙上面出现了。东方的天空中升起了一轮鲜红的太阳。祖国带着笑容站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两只胳膊，把我们大家全抱在怀里，而且抱得那么紧，一刻也不放松！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带着哭泣又带着笑声接连地唤“亲爱的妈妈”？哪一个不充满幸福地感觉到自己和祖国中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过去的苦难是一去永不复返的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有决心、有力量、有气魄克服任何的困难。祖国再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过我们。十年来我一天一天地注视着一个伟大国家的长成。十年来我看见祖国的面貌一天比一天地年轻、美丽。过去我们有多少美丽的理想被旧社会消磨干净，我们逐渐失掉

对于美好事物的憧憬和信心。今天六亿五千万人民不断地创造出惊人的奇迹，而且开始在人间建立天堂。旧社会给我们的印象只是黑漆一团。今天，有眼睛的人都看得清楚花红似锦的光明前程。在旧社会里几个人有过幸福的童年？谁不曾白白地浪费了青春？多少有为的年轻人在人间地狱里悲惨地死去！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在流氓恶霸的控制下，在反动官僚的统治下，整个上海哪里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哪里有一个说得上真正幸福的人！今天整个国家都换上了美丽的新装来迎接伟大的国庆节日。清洁、美丽的新上海也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过去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花园都市。连十年前的寄生虫，也在这个新时代的大洪炉中经受锻炼，努力使自己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儿童们受到整个社会的爱护和培养；青年们看见自己的青春开出美丽的花朵；壮年人有机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来装饰祖国。每个人都愿意出一分力把祖国打扮得更加美丽，因为大家同样地热爱这位母亲，这位失而复得的母亲牢牢地拴住了我们的心。

一直生活在幸福中间的人也许不会充分地了解幸福的滋味。唯有失去过幸福的人才能够像爱护自己眼珠那样地爱护今天的幸福生活。对于某一些人祖国可能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说得大些，这个字眼可以包含一切。但是“找回了祖国”，这句话里有多么深的感情。对于那许许多多的人，祖国的确就是自己最亲热的母亲。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我在朝鲜住过一段时期，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找到了自己的家。三百几十天里面我

到过不少的地方，见过不少的人，我同任何人在一起，都要谈到一个字眼：祖国。我背着人的时候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个祖国。在朝鲜我们把祖国看成了具体的东西，甚至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时候我们一提到祖国好像就看见一位母亲的面容；有时候我们把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集中在这个字眼上面。我知道好多战士走上阵地的时候，都抱着为祖国献出生命的决心。我常常和一些初次见面的人谈话，一谈到祖国，大家眼里发光，脸上露出笑容，马上觉得自己跟谈话的对方中间的距离立刻消灭，好像真有一位慈祥的母亲伸出手把大家拉在一起。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在参加战斗的时候，甚至在交出生命的时候，志愿军战士一想到祖国，就充满了力量，眼前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美丽的图画，各人用自己最心爱的事物来代表祖国，用自己最深的感情来爱祖国。祖国无时无刻不在志愿军战士的心中。每个人都从祖国带来了幸福的回忆。没有一个人不感觉到祖国就在自己的身边。在一个连队“墙报”的国庆特刊上志愿军战士写下了这样的誓辞：“……用我们钢铁的意志，保卫祖国像铜墙铁壁一样……”他们的确用行动实现了这样的决心。

我在朝鲜的山沟里，在贯通了大山的阴湿的坑道中，在黑夜里不开灯在乱山中间奔跑的吉普车上，我的心苦苦地想念着祖国。离开了祖国，我反倒更清楚地看见祖国的面貌，我反倒更深切地体会到祖国给我的幸福。我不止一次地有过战士们那样的感情：在需要的时候把一切交给祖国，而且我会把这个看作莫大的幸福。我不能说自己勇敢，但是我的确有着那

么深的爱。我爱祖国正像每一个人爱自己的母亲一样。

国家变了。社会变了。人也变了。这十年来我们走了多么远的路程。这十年来我们有了多么大的变化。这十年来我们创造了多少移山倒海的奇迹。这十年来我们写出了多少振奋人心的诗篇。做儿女的并没有辜负这位返老还童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祖国也为了儿女们的幸福一直不停地向前飞奔。

可惜我没有一枝神笔，为三千六百五十天中每分每秒的变化留下不朽的彩绘。其实这些变化积在一起，已经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开始建造起我们前人所不敢梦想的人间乐园来。

我绝不是在做梦。我的确走进了宝山和仙境。谁能够说我们的祖国不是宝山，也不是仙境？难道对于我们还有更美丽的乐园和更大的幸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应当让自己的心紧紧地贴在祖国身上，永远地跟着她，扶着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她，同她一起驾起大跃进的祥云，奔赴无比庄严的人间极乐世界！

1959年9月在上海。

"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敌人的飞机炸弹到处追赶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紧张生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怀着多么深的感情想念上海，常常用多么亲切的语调谈着上海的一切。我们中间谁在战争中被迫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谁不曾望着我们熟习的美丽的土地掉过眼泪？谁念着这个充满感情的句子不感到兴奋？不觉得增加了力量和勇气？

"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个响亮的声音何尝有一个时候离开我的心灵！

但是在我过去的作品中，我写到上海的时候不曾用过一次美丽的形容词；细心的读者在我的文章里看见的倒是强烈的憎恨。这个城市给了我那么多痛苦的记忆。这一部惨痛的历史我不知道应当从哪一页写起？一九二三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上了岸我最先到的地方并不是旅馆，却是四马路的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文艺月报》五月号。

捕房，因为我雇的马车犯了交通规则，罚了钱。住在上海的旅馆里，我处处遇到敌视的眼光，在马路上向人问路，也会遭到白眼，或者受到欺骗：人们互相猜疑，彼此提防，好像仇人见面一样。那个时候公园门口已经不再挂上“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招牌了，但是我因为没有西装就进不了顾家宅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在马路上走路，我会突然被人拦住，叫我高高举起双手，让“包打听”来“抄靶子”，外国巡捕拿着手枪站在旁边用轻蔑的眼光监视我们。一九二五年“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的时候，我不在上海，没有见到南京路上的血迹。然而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暴行我是见到了的。日本军队炮轰闸北民房，杀害和平居民，最后占领了那一带地方，我几次埋着头，闭紧嘴，回到我的故居，看够了敌人和汉奸的嘴脸，才搬出了劫余的破书。有一回我领了通行证走进日军的占领区，刚走过一个站岗的年轻日本兵的旁边，就听见一声叱骂，我回过头，正看见那个日本兵狠狠地打了一个穿长袍的中年人一记耳光。挨打的人默默地埋下头往前走了。我在他旁边走了一阵，才听见他痛苦地叹一口气。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攻占上海，把闸北和南市烧成一片焦土的时候，我站在苏州河边望对岸的火光，听四周人们的呻吟；我又站在“法租界”的铁门内，望着法国巡捕用警棍打击拥在铁门外哀求开门的南市居民，我站在那里旁观，不能做任何事情。这年冬天，敌人横行，汉奸猖獗，“租界”当局加紧剥削市民，爱国志士的头颅接连挂在电灯杆上，我们的刊物被封，活动受到限制。对着这群魔乱舞、一片灰暗的局面，我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响亮

的声音:“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这里,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血汗灌溉了它。这个肥沃的土地的确是我们的。

我并没有美化过上海。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上海,有人称它为罪恶的都市,有人叫它作冒险家的乐园。一只一只的远洋轮船载来一批一批的冒险家。他们利用这里的廉价劳动力,开办工厂,制造商品,取得广大的市场,并且组织发行网,推销他们从海外运来的剩余物资。他们在这里利用中国人的血汗建造了高楼大厦,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而上海的劳动人民却蜷缩在寒冷的小屋中和摇动的阁楼里,睡在高楼前的人行道上,挤在苏州河边的乌篷船中。在这里成千的工人为了微少的工资把生命消耗在不合卫生的工作条件下面,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和平的人民被人枪杀,人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我也许写得太简单,我并没有充分写出我的感情,甚至在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上海土地的时候,甚至在英国“三道头”命令我举起双手等候检查的时候,甚至在法国守兵厉声叱骂不许我走过兵营正门前的时候,甚至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士封锁虹口马路禁止通行的时候,甚至在英美水手喝醉酒在大街上掷酒瓶打人、侮辱妇女的时候,甚至在日本侵略军包围“租界”进行大搜捕的时候,甚至在美国吉普车在马路中横冲直撞辗死行人、美国兵坐车不给钱打死三轮车夫的时候,我仍然充满信心地反复念着:“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在上海我见过接收大员,流氓恶棍,横行霸道,欺压良民;

多少人投机取巧，白手成家，损人利己，剥削致富；多少妇女过着非人生活，每天晚上在大世界、四马路、先施公司一带成群结队等候顾客，拉不到客人常常在寒风里忍饥挨饿站到夜深；我见过多少人辛苦劳动得不到饱暖，多少人不劳而获，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我见过物价一天涨十几次，路旁街头响着一片银元声，许多人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够一天的饭钱；我见过多少人为了追求真理坐牢受刑甚至交出生命。……

惨痛的回忆是写不尽的。抗战以前或者解放以前在上海住过一段时期的人谁没有一肚皮的怨气和一肚皮的苦水？谁不曾感觉到有多少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肩头，有多少人骑在自己的头上？谁没有眼睁睁地望着亲人死去自己却束手无策？每条马路，每座大楼，每个公园，每家戏院，哪一个地方没有上海人的血迹？哪一个亭子间，哪一个灶披间，哪一层阁楼，哪一家棚户没有浸透上海人的眼泪？人们在工厂里生产了财富，可是作为报酬他们却得到了叱骂和侮辱，疾病和死亡。工厂成了监狱，工人过着奴隶的生活。年轻人没有青春，壮年人好比牛马，老年人冻饿在街头。遍街都是乞丐，到处都有小偷。一九四八年一月里两天中间就有一百几十个人冻死在路旁。……甚至在这样的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中，人们也始终没有放弃过他们的信仰："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个信仰鼓舞人们勇敢地活下去，挣扎下去。固然上海从来不曾美丽过。但是人们相信，它的将来一定是很美丽的。每个人都这样相信：有一天上海真正会成为"我们的"，那个时候它的美丽的面目就要开始露出来了。好多年来人们就见到

了从远远的灯塔里射出来的一线亮光。

于是十年前五月下旬的一天，上海解放了！我记得很清楚，我迷迷糊糊地听了一夜的枪炮声，天刚刚亮，就接到一个在报馆工作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上海解放了！"就只有这五个字。我也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大家都为解放欢呼，谁都感觉到一个新的光辉的时代开始了。

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讲他自己对解放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他亲身的感受。对于许多人解放就等于解救，对于另一些人解放就是新生。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一轮红日上升在这个新生的城市的高空。灿烂的阳光照着清洁的马路，高耸的建筑物上红旗飘扬。上海第一次显得这么美丽。几百万上海人用愉快的歌声和雄壮的步伐迎接今天的幸福。谁还能够制止满眶感激的热泪？谁还能够不放声高歌：

"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上海现在的确是"我们的"了。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谁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一种真正的主人翁的感觉。谁都会感觉到自己跟这个美丽的土地有多么密切的联系。痛苦没有了，悲愤消失了，过去骑在人们头上的怪物不是已经死亡，就是鼠窜而去。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在前面等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一种第一次昂起头真正做人的感觉，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美丽的土地多么需要自己为它工作，也都愿意献出全部力量来把它建设得更加美丽。从解放的第一天起，上海就在改变。变化一直没有停止，变化越来越大，而且没有止境。每个人不但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同时也尽力

促成了它们。一天接着一天，一月接着一月，一年接着一年，上海变得越来越干净，越美丽了。

两年前有一天一位外国客人来到上海。他说自己打算写一篇表现旧上海的小说，早已想好了故事，一只外国轮船靠在外滩的码头，几个国籍的水手们愉快地走到岸上，他们哼着小曲到酒吧间去找寻年轻的上海姑娘。……他要求看看外滩，也想在酒吧间里坐一会。可是他不但找不到酒吧间，他觉得外滩也完全变了样。过去又肮脏、又吵闹、流氓打架、干不正当营生的地方，现在成了风景如画的公园。他只好放弃了旧的题材改写今天的上海。

他所提到的酒吧间的确是有过的。我曾经为它写过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来表达我的愤怒的感情。在那一天我走过一条小街，石阶上有几家小店挂了酒吧间的洋招牌，但是都上了铺板，只有一家半开着门，我看见一个穿粉红色西装的小姑娘坐在高大水手的怀里。据说这是酒吧间中最下等的。但是不论下等或上等，它们早已在上海绝迹。今天外国轮船停泊上海，水手们在清洁、漂亮的海员俱乐部里受到殷勤的招待，人们把他们当作朋友，并且为他们安排使他们身心愉快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

其实外国客人看见的不过是市容的变化。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例如，马路弯的拉直了，窄的拓宽了；没有马路的地方开辟了平坦的马路；苏州河上增加了新的桥梁；公园不断地增加，工厂厂房不断地改善、扩建；棚户区建起了高楼；泥地上出现了工人新村；臭水沟变成了美丽的林荫路；过去藏垢纳污

的旅馆改做了雄伟的工人文化宫；人行道上一片桃红柳绿，映着明媚的春光；玻璃橱窗内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全是中国的产品。一到放学的时候，满街都是健康、幸福的年轻面孔，少年儿女衷心愉快的笑声给新上海的春天增加了光彩。……我没法在这里为十年来的建设开一个清单，因为光辉灿烂、壮丽无比的新上海的景象不是一枝笔绘得出来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过去我听惯了外国人的嘲笑："你们是一盘散沙。"可是现在党把"散沙"组织起来了。在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是一个整体；在上海，八百万人只有一条心。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提防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友爱和互助。今天任何一个人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他会感觉到他好像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大公园里面，这里生命无处不在，这里万物欣欣向荣；他又像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面，这里人们休戚相关，心心相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尤其是我为人人，因为人们都把为集体的利益出力看做最光荣、最幸福的事情。所以许多一辈子死守住上海的人也高兴让子女远赴祖国的边疆支援社会主义的建设。今天再没有甘愿离群索居的人了，今天再没有"自扫门前雪"的人了。年老的受到尊敬，年幼的得到照料，壮年人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每个人都有一滴水归到大海的感觉。每个人都以自己是大集体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自豪。

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着发光的思想和性格的新人天天出现，处处都有，他们不止是三个五个，他们是成群结队、成千上万地出现的。人们天天在创造奇迹，时时做出从前连

想也不敢想到的事情。跟自然斗争，同时间赛跑，向大地夺取更多更大的丰收，在工业战线上争取全面的大跃进——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的气魄，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的气魄。

十年来辉煌的成就不过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以后光明灿烂的前程决不是我们今天的头脑所想得尽的。当我们高歌"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向前飞奔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目中美丽的岂止是上海，还有一个更美丽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你所锺爱的儿女。我们的力量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要献出我们的一切，为了增加你的美丽，为了使你永远美丽，而且无限地美丽，让我们紧紧地贴在你的心上，永远跟着你前进！

1959年4月在上海。

我又到了这个地方*

我又到了这个地方。黄土路上几幢干干净净的楼房，灰屋顶，白粉壁，深灰色窗格的玻璃窗全开着。砖墙上有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一个农村大姑娘手里抱着大棵青菜，带着笑脸，告诉人们丰收的喜悦。从播音室里送出来悦耳的戏曲唱词。这一切对我是多么熟习。刚才我还走过那几间矮矮的玻璃暖房。五个月以前它们好像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在暖房里看过番茄的幼苗；现在，暖房显得更漂亮了，数目也增加了。人们告诉我，在不久的将来，右边一块地上还要盖上两间这样的暖房。可是我的思想走得更远，在我的眼前仿佛有一大片数不清的暖房在阳光下面闪闪地发亮。蔬菜地里有好几个农村少妇和少女躬着身子或者蹲在地上收菜。她们有说有笑地在工作。这些笑声和笑脸也是我熟习的。可是颜色却比几个月以前多了些，鲜明些，她们都穿上了花花绿绿的衣裳。

我再往前走，连灰瓦白墙的楼房也变了。那么多的脚手架！有两处还耸立起灰色的砖墙。几个月前我只看见寥寥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收获》第五期。

几个人，现在人们和小车不断地来来往往。那一条大路也被脚手架截断了，人们在路当中修建了高大的房屋，木头的门框和窗框已经装上了，建筑工人忙着在砌砖。两个多星期以后，这个食堂就要开幕了。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食堂又会变成高敞的礼堂，农村的青年男女要在这里表演自己准备的文娱节目，多少人要到这里来欢度节日。食堂并不是唯一的新建筑物，同时修建的还有学校、幼儿园、托儿所；还有农民的住房……倘使国庆节我再到这里来，我一定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党委书记站在有大幅壁画的砖墙下面迎接我们。他不是五个月以前我看见的那位书记了。那个时候这个乡、这个生产队还是属于另一个公社的，调整以后这里却是这个种蔬菜、种花的新公社的中心点了。书记亲切地握过我们的手，把我们引到播音室隔壁楼上房间里去。这个房间也是我熟习的。那一次我们十几个访问者在这里吃过一顿饭，还在楼下听了另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介绍情况。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跟着年轻书记的叙述激动起来。农村的新面貌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注意到坐在我对面那位年老的人民代表脸上惊喜的表情。现在这位新的书记显得更活泼，他给我们描绘出更美丽的远景。并不是这位书记比另一位书记有更多的才能和更大的抱负。唯一的原因是这五个月来我们的公社向前飞奔了那么一大段路程。不用说，并不单是这个公社或者那个公社，并不单是整个北郊区或者上海的各个郊区，整个国家都在跟时间赛跑，连每秒钟、每分钟都取得了胜利，而且不

论是在农业战线上或者工业战线上，在任何一个方面，在任何一个部门，都发出了响彻云霄的欢呼。像我这样一个在过去所谓“无声的中国”生活了四十几年的人，连被抛在后面的“时间”的喘息也容易听出来。

党委书记把我和一位同来的朋友安顿在新村第二排楼房一个楼上小房间里，给了我们种种的方便，让我们各处跑来跑去。要是我们需要访问什么人或者参观什么地方，也有人给我们带路。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临时住房的斜对面，我一有空就到那里去。我没有看见他闲过：不是有人找他谈话，就是他出去找人。电话铃一响，我就听见他在讲话，或者别人唤他的声音。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后不久，我们动身到某个生产小队去访问的时候，他正在准备材料，要到县里去汇报夏季卫生工作。晚上我们在另一个生产队的食堂里旁听农民的座谈会，他打电话要那个为我们带路的女同志回去参加讨论规划的会议。我知道这一晚他睡得很迟。早晨我到他那里去，听说他三点钟才睡觉，但是八点钟就起来了。这个三十几岁的人似乎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他一天高高兴兴，不论工作怎样忙，怎样紧张，总是面带笑容。前一天清早我看见他蹲在地上洗衣服，一面洗，一面跟我们谈增产的情况。他的手很熟练地拿着衣服在洗衣板上擦洗，洗干净了，然后把湿衣拿到楼上一件一件地挂起来。

第一天下午党委书记请一个生产队长陪我们到附近走了一转，时间不过两个多钟头，可是我们看到了不少的东西：鸭棚、鸡场、猪圈、暖房……这一切在我的记忆中还很鲜明。也

有我上次不曾见到的，那就是快要建成的宽大的新猪房，旁边有一间给猪烧饲料的厨房，另一面还有一口刚挖好的井。鸡场中，各样毛色美丽的种鸡，隔着铁丝网悠闲地在并不太小的小天地里散步，不断地发出满意的叫声；来克亨、芦花洛克、澳洲黑、婆罗门……这些名字五个月前就留在我的笔记本上，但是每只鸡现在肥大多了，芦花鸡已经长到十斤左右。在这里我们好像在动物园中一样，不同的只是我们的身边不见一个游客。我们顺着竹篱转进里面，眼前忽然出现了天井和房屋。一间屋子里有电气孵化器。我一进屋就听见马达的声音。前一次我来这里，看见工作同志正在挑选鸡蛋准备放进器内去。现在工作同志为我们打开孵化器的铁门，电灯一亮，我就听见了小鸡的吱吱叫声。工作同志又打开下面那个抽屉似的盒子，里面平放的上百个鸡蛋中有四分之一已经破碎，浅黄色和灰黑两色的小鸡伸着头在残破的蛋壳里唤它们的母亲。这些可爱的小生物，它们到哪里去找母亲呢？在隔壁一间屋子里，有好几个长方形的鸡笼，三四个堆在一处，一共有十几个。第一层的鸡笼上面，放了些洋铁做的塔形的饮水器。一个少女走到笼前，打开每个笼子朝上开的门，把饮水器一个一个地放在笼里，每个鸡笼里放进两个。门一开小鸡们就朝上扑，少女连忙用手把它们接下。有几只小鸡逃出来了，她弯着身子把它们一一地放回笼去。每只鸡有它自己的"家"。她仿佛就是它们的母亲。她头上盖着白色头帕，身上穿着粉红色的短衫，下面一双赤脚。她含笑地回答我们的问话。在旧社会的农村里哪里有这样的姑娘？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农

民连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电气孵化器！公社里三套电气孵化设备中，最大的一套一次可以孵化小鸡或小鸭两万七千八百只。党委书记告诉我们，公社成立以来单是鸡的数目就增加了两万多。

我们没有走进鸭棚。可是我们好几次经过那里。绿荫下一池秋水，数不清的雪白的鸭子在水上游来游去，使我想起了两句旧诗："白毛分绿水，红掌荡清波。"我们站在栏外跟饲养员闲谈，他频频地掉头去望水上、岸边的鸭子，它们有的在水上亲切地呼唤伴侣，有的挤在一处啄食地上的硬壳食物。从他的眼光和他的声调我明白他多么喜欢他目前这个工作。上一次我并没有见过这么一幅美丽的图画。几个月以前哪里有这么多可爱的小生物！

我们也曾在产妇院的院子里耽搁了好几分钟。不用说，这是公社创办的一个新事业。今年三月底我曾经从篱外走过。现在我有时间看清楚那一排四间敞亮的平房。一个穿花布短衫的二十几岁的助产士站在阶上欢迎我们。浅黑色框子的玻璃窗开在白色粉墙上，人站在院子里也看得见房内整洁的陈设。笑容满面的姑娘告诉我们，这里一共有两个助产士，目前住院的只有两位产妇，照规矩普通的产妇可以在院里住五天，医药饮食完全免费，而且受到特殊的照顾。产妇的伙食每天五餐，五天中还有三斤鸡蛋。我们通过竹篱门走出医院，看见后院篱笆上扁豆藤开出了红白两色的小花。

"我妈从前哪里有这种好福气啊！"我们在院后的小路上称赞这所产妇医院的时候，年轻的生产队长望着扁豆藤这样

地说了一句，可是他的脸上并没有悲伤的表情。

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里，我们耽搁了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并不止一个，我们在一天半的时间里面参观了几个生产小队的托儿所或幼儿园。党委书记说：整个公社一共有七十三个托儿所，收一千五百多个小孩；幼儿园二十七所，有儿童七百九十多个。一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告诉我们，他那个村子里只有一百个劳动力，可是在托儿所的小孩就有二十八个；幼儿园里有三十二个儿童，此外还有小学生四十名，和十七个中学生。这说明公社化以后农村中已经没有失学的儿童了。在每个托儿所或者幼儿园里，孩子们受到亲切的照顾。阿姨们都是胖胖的年轻姑娘，身体结实，性情好，一天总是那么高兴。在托儿所里一到天黑，父母就来把孩子接回家去。幼儿园里那许多穿花衣裳的儿童自动地为我们唱歌，用他们可爱的声音连唤“叔叔”。在苏联乌兹别克的几个城市里，我也曾见过这样的幼儿园。虽然那些幼儿园的设备比这里的好，但是儿童的活泼可爱却没有什么分别。在今天的中国农村里已经看不到拖鼻涕、满脸污泥的“流浪儿童”了，儿童们在整个社会的爱护和培养下发育成长，这是在旧中国万万办不到的事。岂但在旧中国，就是在今天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孩子们哪里有这样的幸福？

第二天陪我们参观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女同志今年才二十六岁。她做过拉链工，当过工会干部，后来下放到农村，不久以前才正式调到这个公社来工作。一张丰满的脸，厚厚的嘴唇，中等身材，对人又亲切、又热情。我们跟她在一起走了不

少的路，到处都有人向她打招呼，好像所有的人都认识她，好像她对一切都很熟习。她用轻快的脚步走路，用带感情的句子谈这里的事情，连羊棚、牛棚在我们的眼前也成了美丽的图画。牛棚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一天我们去过两个牛棚，我更喜欢下午看到的那一个。在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集体农庄里我也参观过牛棚。我觉得我们公社宽敞清洁的牛棚也很不错。虽然别人使用了挤奶器，这个公社还靠人工挤奶，但是我明白这种差别不久便会消失。挤奶的人有男有女，他们坐在矮凳上，两只手动得那么灵巧，高大的毛色光滑的荷兰奶牛那么服贴地听他们指挥。据说公社里有五处牛棚，养牛二百九十七头，平均每天产奶二千一百六十斤，一天分三次送到食品工厂去加工。但是到了冬季就留下一部分牛奶，自己消毒后，送给社里的儿童食用。公社化以前的长时间里，谁听说过农民的儿童喝牛奶？谁又见过农村经营牧畜业？先前我们在大路上还遇见年轻农民骑着自行车送奶进城去。车子跑得像箭一样地快，车前两个洋铁的奶桶连摇也不曾摇一下。

我们来去都经过一个缝纫组，去的时候，带路的女同志停下来，在门前跟店内一位“成衣匠”谈几句话，谈的是他的小孩的事情。我匆匆地朝店里望了两眼。两架缝纫机响个不停，三张缝衣案上堆了好些裁好的花布。几件刚做好的花布短衫挂在一根绳子上。机旁案前人们专心地工作。“还是女同志喜欢穿新衣服，”同来的朋友指着店里各种颜色的花布短衫对我说。我想：过去的农村哪里有这么多的颜色？过去农村的妇女哪里有这么多的新衣裳？听女同志说，在缝纫组工作的同

志按月领取薪水，他们的报酬不是以劳动日计算的。农村的顾客做新衣服都是按件付款。我见过两个缝纫组，十几个男女“成衣匠”手不停针，还是做不完那么多的工作。

我们走过这个村生产小队长的家门前，带路的女同志说："进去坐坐吧。"我们跟着她走进了那所相当干净的瓦房。小队长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姑娘，她殷勤地招待我们在矮凳上坐下，又从热水瓶里倒出开水，盛在几个饭碗里，放在我们面前那张小桌子上，然后从容地对我们谈起这个生产小队的“家常”来。一九五二年这里有七户人家十六个劳动力搞一个小小的初级合作社，因为人穷社穷，别人常常挖苦他们“浇粪像洒香水”，“牛毛都没有一根。”可是现在我亲眼看见在这里什么都有了。小队长并不属于那七户人家。她一家父母、兄嫂、侄儿、侄女都很健康，还有一个姐姐在上海某纱厂作工。这一天是厂礼拜，姐姐回家来休息。听她说，解放以后她家里几次添修了新屋。我们坐在里面谈话的这一间便是两三年前添建的。她听见我问起那七户人家的情况，便说有一户姓顾的就在这邻近，建议我们过去看看。

吃中饭的时候近了。我们经过这家的厨房走到外面，小队长的姐姐正站在灶头烧菜，碟子里放着生鱼和新鲜鸡蛋。年纪大一点的小孩端着锅子到食堂打饭去了。我们到了顾家，刚刚坐下，就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捧着一锅饭和一大盆菜走进来，放在那个相当漂亮的靠壁的大灶上。女主人还在地里，男主人才回来。他身体结实，心情舒畅，讲话不多，可是笑声不断。解放前他欠了七石米的债，冬天吃粥常常不饱。

合作社成立以后，他开始还债，到去年才把旧帐还清；公社成立以后他一共添了五件绒线衫，又买了热水瓶和别的东西。他有一男三女，一个在小学，两个在幼儿园；最小的一个在托儿所，要到晚上才接回家来。现在他的小女儿捧着饭碗站在桌子前，用盆子里的豆芽菜下饭。别的孩子在等待妈妈回家。我们不愿意多占用那位父亲的休息时间，但是告辞出门的时候，我还请求主人允许我打开他的鸡房的门，看看里面的小鸡。其实我想看的并不是小鸡，每户农家今天都少不了这样的小小家禽，哪一家都有鸡鸭声。我想看的倒是这个鸡房的本身，因为解放前他一家人就住在这个又破又漏的小屋里面。他现在的住房是他的哥哥后来让给他的。他的哥哥搬到别处去了，他不仅接受了哥哥的房间，三年前他还培修了它，把一间屋隔成了两间，又将旧灶翻新，后来还买来了架子床。近几年来，尤其是这一年来，他的生活的确大大地改变了。……

下午我们走了将近八里路，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傍晚我们就在那里一个小队的食堂里吃晚饭。一位朋友请客，我们三个从上海来的人，一共只花了几分钱的菜金。这个食堂从八月份起改行了粮食供给制，我们付了粮票，用不着付饭钱。整个小队七十三户人家一共三百九十二人。他们全在食堂里吃饭，从开办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肯退出食堂。食堂设在一所旧式洋房内，花砖铺地，上面还有小楼。墙壁上一边张贴食堂的帐目，另一边贴的是七天的菜单，一张接着一张，几个月的菜单都贴在这里。即使没有负责人的说明，我们看菜单也知道：这里一个星期内不吃重复的菜；每月还有三大荤、六小荤，而

且每个人都能吃到鸡蛋。工作紧张的时候食堂还要为社员添做点心。天气暖和的时候，社员们高兴把饭菜打回家去，到冬天多数人都愿意到食堂里来吃热饭。付一分钱就可以在食堂里装满两个大热水瓶的开水。楼梯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服务部，出售肥皂、毛巾、香烟、糖果；每天一百个新鲜甜点心一送到就卖光。人们半开玩笑地称服务部那个唯一的兼管售货的年轻人做"部长"，他的服务态度得到了普遍的欢迎。食堂的台阶下有一大片空地。厨房在食堂的左面。食堂的右侧有一口井。我们再往右走，就走到猪圈、羊栏、鸡鸭棚和兔子窝。这十三头猪、十一只绵羊、五十只鸭、一百二十只鸡、二十六只兔子都是食堂养的。整个生产队一共有十个食堂，这应当是最受群众拥护的一个。

晚饭以后，刚从县里来的妇联的干部在小楼上主持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了十多个男女农民来座谈公共食堂的问题。人们像谈家常一样地谈出心里的话，有说有笑，有几句就讲几句，嘴一停别人就会接下去。大家讲的都是食堂的好处。有人说：过去天亮下地，三点钟就起来升火烧饭，一顿饭几顿吃，吃不完馊了，要丢掉舍不得，吃下去又容易生病；有人说：升炉子多麻烦。有时下雨打湿了柴，升火升不燃，就用铺床的草来引火，草烧光了，冬天更难过；有人说：有时大人下地，不在家，叫小孩做饭，常常发生危险，有一回一个小孩烫坏了两只手。有人说：小孩烧饭常常是生的，而且还容易引起火灾。大家都说：有了食堂不用自己升火烧菜做饭，妇女可以放心下地劳动，这是"最愉快的事情"……

我们下楼的时候，才九点多钟，座谈会尚未结束，楼下食堂里坐满了人，生产队的负责同志正在作报告，讲到怎样把食堂办得更好。给我们带路的女同志接到了公社党委书记的电话，要马上回去。外面开始在下小雨。四个开会的女同志为我们借来了四把雨伞。我们打着伞走了。我们想躲过这场大雨，可是到了中途，大风大雨一齐袭来。我们在黑暗中差一点迷了路。我用力抓紧伞柄，才不曾让风把伞吹走。

我终于到了我这个临时的家。脚手架旁静静地没有灯，没有人声。整天忙碌的小车和推车的人也不见了。只有土地吞下雨水的快乐的声音。只有几个办公室里的明亮的灯光。人们在紧张地工作。渴了的土地在拚命喝水。我记起来，明天我们本来有机会看到人工降雨的奇观，但是这个机会已经飞走了。这里有三百二十亩地，下面埋了水管，只要在某一块地上装好降雨管，然后开动河边那个站房里的马达，就可以随人意降下甘霖。在没有埋水管的地上，我看见放在船上的抽水机把大股大股的水引到地里去。但是在炎热的日子里，一场大雨比晒烫了的河水更能为大地解渴。我并不为这个失去的机会惋惜。我高兴蔬菜的丰产有了更大的保障。

新村的最末两排楼房是农民的住宅。楼上楼下大小四间屋子里住一户人家。前一个晚上还有些年轻男女陆续地从这些屋子里出来，扛着铁鎝，谈着闲话，又时时发出笑声，鱼贯地走到地里去。现在所有这些人家都灭了灯放心地睡了。只有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和别的几个办公室里面的灯光一直亮着，而且亮了大半夜。人们在讨论发展的规划，人们在为未来绘

图……在这些人的眼前出现的不止是美丽的、幸福的今天，而且还有更美丽、更幸福的明天。并不是这些人想得更多、想得更远，倒是时间走得更快。时间在飞奔。我下一次再到这个地方，我看见的将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我想到这个，就觉得自己这颗心暖和得好像要溶化了一样，好像要溶化在六亿五千万人的伟大集体中间一样。

1959年9月在上海。

最大的幸福*

拿起笔，我不能不想到十年以前的事情。节日的欢乐引着我的思想走了更多的路。我不像十几岁的年轻人，我在旧社会里生活过四十多年，所以，在幸福的生活中我常常想起过去痛苦的日子，就是在万分高兴的时候，我也会流眼泪。并不是我在普天同庆的大节日里感到悲伤，这只是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感激之情搅动我的心，使我落下喜悦的泪。我越是细心地体会今天的幸福，我越是觉得这种幸福来得不易。

我在上海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个城市里我写了我的大部分的作品。我用了憎恨、厌恶的颜色来描绘上海，可是我并没有充分地写出我的感受。我说过，在自己的国土上，我像一个无家的孤儿。在解放以前的漫长的岁月里，我哪一天哪一刻有过安全的感觉？我常常站在人行道上，旁观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看见善良的人受苦，凶恶的人得志，外国冒险家到处横行，一个好人可以无缘无故地遭受欺凌。我抱怨自己贪生苟安，我诅咒这个罪恶的城市早日陆沉。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里面，写着北火车站广场的电线杆上挂起了革命者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头颅。我并非闭门造车，我羡慕今天的青年永远见不到那种叫人一生忘记不了的恐怖景象。

三十二年前我写过《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二十七年前我在一本书的序文里说过："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像一根鞭子似地永远在鞭打我。"我的一本中篇小说的主人公有过这样的看法："人活着多么受苦啊！"十一年前我在一本长篇小说的"后记"里还写过这样的话："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在那么长的岁月中，我的四周无处不是苦恼，到处我都听见痛苦的呻吟。我跟人们接触，要不听见没完没了的沉痛的诉苦，那么就是人们对我关上他们的心。整个国家的命运上罩满了乌云，我的生活里、我的作品里怎么能有欢乐？我常常因为主人公的悲惨死亡流泪。我很想给正直的普通人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单靠自己的一双手和一个脑子生活的正直人，要摆脱悲惨的"命运"是多么困难！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寄来诉苦的信，充满信任地写出他们心里的话，可是我始终爱莫能助。我的作品反倒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苦恼。看见别人受苦而无能为力——再没有比这个更使人难堪的事情了。我最近重读一九二八到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的那些作品，那么多的灾祸与痛苦使我吃惊。人们不断地受苦，接连地死亡，眼泪好像就没有尽头。想到过去那许多、许多阴暗的日子，我真是不寒而栗！

但是我毕竟比一些同辈的作家幸运，我活过来了。我的

几位敬爱的友人却贫病交加，到中年就惨痛地死去。我见到了光明，而且可以毫不迟疑地写下人们的幸福，因为我看到了人们的幸福，因为我自己感到了幸福。我记得很清楚：十年前的今天，我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听见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望着一片红旗的海洋，那个时候我真觉得这颗心就像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一样，我知道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我的这种感觉只有长期受苦的人才能够了解。过去那根一直在鞭打我的鞭子消灭了，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条光明大道。游行的群众在晚上九点以后才散尽。我回到住处，耳朵里还留着六个多小时的欢呼声，我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从此我便用我这管写惯苦难的笔来写人们的欢乐。这也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了。我自己也参加了我所描写、所反映的生活；我自己也分享了我所歌唱的人们的幸福。今天的中国作家不再跟人民隔离了，却直接投身在各种各样的生活里面。人们把我们当作亲人看待。我们无论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到工地，到山区，到海岛，总之到任何地方我们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种种的帮助。我们在生活里见到种种鼓舞人的景象，也听到种种感动人的故事。我们有机会和我们下一部作品的主人公一同生活，一起工作，一道欢笑。我们在各处都接触沸腾的生活，经历激动人心的场面，看见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这一切都给新中国的文学作品增加了夺目的光彩……在这短短的十年中间，我们不仅亲

眼看见一个伟大的国家的成长，我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们还有机会看见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间开放美丽的花朵，看见自己的作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对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幸福？每当我写倦了放下笔休息的时候，我望着窗外布满星星的天空，我会有一种高度的自豪感：我的心跟我的祖国贴得多么近，我时时刻刻都感觉到她的呼吸。外国的高等绅士过去喜欢称我们为"东亚病夫"，诬蔑我们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削平了山，填平了海，在波涛滚滚的长江上架起行驶火车的大桥，把杳无人迹的深山改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这不过是十年中间中国人做过的或者正在做的几件事情。像这样的事每个读者都可以举出来几百几千，它是在旧时代中人们所不敢梦想的。过去有一个时期，中国的劳动人民没有找到机会显示自己的力量，知识分子也失去对前途的信心，自卑心在旧社会中极为普遍。"明哲保身"成为一般人的座右铭，谁也不关心在个人之外的大集体。那个时候祖国好像是一个被子孙们抛弃的老乞婆。现在谁都把祖国当作自己最亲爱的母亲。时代变了。人也变了。这的确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新中国的劳动人民喜欢发出豪迈的壮语。去年上海柴油机厂的工人唱出了一首民歌："叫大海让路，叫高山低头，叫钢铁听话，……"这并不是信口开河，随便举一个例子：长江上第一座大桥在武汉建成以后，第二座大桥又快要在重庆完工了。十年来，天天都在变化，处处都在建设。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乐

园——共产主义的天堂。谁也认识到个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大家，同时也为着自己。工人在工厂中机器旁边紧张地工作，农民在田地上辛勤地劳动，不论大大小小的工作，人们都是全力以赴。作家们自然也不是例外。作家也是新中国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崇高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

今天我仍然接到从祖国每个角落里寄来的信。读者们不断地给我送来鼓舞和信任，希望我和他们一同前进。和读者一同前进，的确是作家最大的愿望。我也愿意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

十年中间改变得最厉害的不仅是我们祖国的面貌，而且还有人们的心。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个人的心怎样溶化在集体的心中间，个人如何紧密地同集体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不但不曾消灭个性，反而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勇气和更大的信心。这十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常常在人行道上留心看来往行人的面貌，我在每一张脸上都看到那样的勇气和信心，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伟大的集体站在自己的背后，仿佛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主人。昨天我还走过十年前我常常经过的那几条马路的人行道。每一家商店都换上了节日的新装。在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的两旁，我看到一片红花绿叶，过去一些摇摇欲坠的危楼，现在变成了路边的花园。人们亲切地互唤“同志”。三五成群的系红领巾的孩子们一边高声谈话，一边发出清脆的笑声。……

我无缘无故地笑起来。我觉得满身轻快、心情舒畅。我很喜欢这些红领巾，我也喜欢我在好几个地方、好几个人民公

社的幼儿园里看见的天真可爱的孩子，这无数的孩子使我看到了我们祖国的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未来。我看见他们的笑脸，觉得过去的一切痛苦都得到了报偿。我真愿意献出我的一切，只为了使笑容长留在孩子们的脸上。我真愿意为他们写下更多的新中国的美好事情。这时候我更了解个人的心溶化在集体的心中间那种最大的幸福。

1959年9月在上海。

无上的光荣*

这一个月，我借着种种的机会，发抒了十年来积在我心上的感情。人在快乐的时候总喜欢唠唠叨叨，反复地对人讲心里话，讲个没完没了，并不管这些话是不是大家早已熟悉。其实在这个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的伟大节日里，谁又能有一种特殊的个人的感情？十年来我们祖国各方面惊天动地的辉煌成就，我们锦绣河山日新月异的惊人变化，我们工农业战线上接连不断的巨大胜利，全国人民移山填海的英雄气概……哪一样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用说有些人接触到的新鲜事物可能多一些，有些人经历过的变化可能大一些，有些人可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出了更多的力，有些人可能在新社会里得到更大的幸福。拿"同"的方面来说，在新中国、新社会里，大家第一次过起人的生活来；从"异"的方面看来，每个城市、每条街、每幢房屋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对有些人来说，"解放"不过提高了他们做人的地位，改善了他们精神和物质的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解放"本身就是救星，共产党把他们从死神的魔爪里抢救了出来，把他们从地狱里搬进了天堂。在六亿五千万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中国人中间真正有翻身之感的人占绝大的多数。今天为社会主义事业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也正是这多数的人。对新社会的恩情，他们的体会比一般知识分子深得多。其实单是知识分子这十年中间所走过的道路，倘使真实地写下来，也就是一本激动人心的小说。一般的知识分子不管过去怎样顾惜面子，怎样舍不得放下架子，他们在旧社会中的生活实际上跟慢性的自杀差不多。我见过不少有才能的人，他们不是贫病交加、壮年枯死，就是白白地耗费光阴，扮演了一辈子没有人欣赏的小丑戏。我曾经对人讲过我打算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我想写几个我熟悉的人，也有可能写到我自己，这里面有教授，有医生，有工程师，也有作家。我当然不会替这些人吹嘘，但是我也不打算大出他们的洋相。我只想通过他们十年来的变化歌颂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面貌。

这部小说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可是有些人物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活动了好久了。我也注意到他们不断地在变化。新社会将废铁磨成绣花针，把鬼变成人。这种点石成金的“仙术”，在知识分子的身上也开出了花朵。我亲眼看见一些成天想到自己的人、一些永远拿自己的利益去衡量一切的人，居然会丢开自己去想“子孙万代的幸福”。从口头上跟着党走到实际上跟着党走，从接受改造到争取改造，这中间也有一段并不太短的路程，可是有些人已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时代太伟大了！谁都知道要是跟不上时代落在后面，就会被淘汰，六亿几千万人的脚决不会停下来等待少数人的。好好地改造自己，只是为了更容易找到机会为祖国、为人民做

一些有利的事情，找到机会证明自己并非白吃米饭的废物，自己的身上也能发一分热、放一道光。这跟过去那种发牢骚、吹牛皮、闹闲气、争名利、糊里糊涂、一事无成的生活比起来不知道要强过多少倍。对这些人说来，这伟大的十年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这部小说首先就应当表现这样的力量！

然而我目前在写作的却是另一部小说。这是几个志愿军青年战士的故事。一九五二年我在朝鲜住过七个月，第二年下半年我又到朝鲜去住了五个月。我并没有白白地在英雄们中间生活了一年，我也曾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英雄们"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和他们准备牺牲一切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就像是一根铁锤和一块铁砧，我的心成天放在砧上给铁锤敲打。我承认有时候我很感痛苦，因为我害怕拿自己跟英雄们相比。但是我也有过万分兴奋的时候，因为我看见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战士，千千万万从祖国来到朝鲜的年轻的翻身农民都变成了气吞日月的英雄。七年前我在朝鲜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爱中国人民志愿军，……我成天接触到这样崇高、伟大的心灵，听到响亮的英雄的声音，永远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动我前进。"我还在平壤写过："对这个伟大的国家，这个英雄的城市，和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语言说明的热爱。"到今天这些话还使我的心激动。我的爱并没有褪色。我还记得那许多健康的、亲切的、年轻的脸；我还记得那些豪迈的、坦白的、恳切的话。我还记得我跟战士们一块儿在坑道里过的那些日子。工人出身的副团长陪我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到前沿阵地去；军政委把我带到山头

去看部队怎样攻取敌人阵地；我住在掩蔽部里，半夜来查铺的副指导员脱下他的棉大衣盖在我的被子上；我睡在朝鲜老百姓的家中深夜给通讯员叫醒，抬起头就看见敌人投下的照明弹。……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也曾抽空翻看我在那些时候写下的简单的日记。哪怕是一字一句也会把我引到另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我多么珍惜我这一段的生活！我多么怀念那千千万万最可爱的人。我每一次想到我在朝鲜过的那些日子，我就记起了一位文工团的年轻女同志对我说过的话："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无上的光荣。"一次小战斗胜利结束，战士们深夜回到连队里。第二天早晨，她在小溪旁边给负伤的战士洗血衣，想起战士们回来以后的兴奋的谈话和他们脸上的光彩，她觉得自己非常喜欢他们，她认为能够为他们做一件小事情就是难得的幸福。她望着阳光下面满山的迎春花，她说出了那一句话。我也有过这样的感情。我也渴望着这样的幸福。一直到现在我还因为自己没有充分地表达出这样的感情而感到苦恼。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我的笔显得单调、无力，我又没有能够好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在一年前全部撤离朝鲜了，可是我的小说至今还没有写成。我一直有一种负债似的感觉。所以每当我背着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翻腾得厉害，有许多感情在那里翻腾。我必须把它们完全倾吐，我的心才能够得到安宁。我昨天又在翻看我七年前的那本小小的活页日记，我无意间看到这样一段话：

八月二十五日……雨住了两小时，六点前一刻又下起来了。八点一刻熄灯。我一直留心着洞子里的水，每隔二十多分钟，就用小面盆舀起积水往外倒出去。洞口的土不断地往下塌，洞内的土也开始小块小块地落下。副指导员和副连长都来看过。一排长来把灯拿去盛了油燃着送回来。过一阵通讯员又送来一罐油，吩咐我不要让灯灭掉。副连长又叫岗哨站在洞子的甬道口，并且在甬道上支起雨布，好在那里过夜，随时注意洞口，免得土大量地塌下封住洞子而没有人知道。我醒在床上想阵地的生活，听见土落下的声音，听见滴水、溅水的声音，更想到住在旁边几个洞子里的战士们，我对战士的心情似乎有了更深的体会。到十二点以后我才睡熟。二十六日早晨三点前，我醒过一次，用电筒照见洞子里已经灌满了水，无法下地，便又沉沉睡去。五点半副连长进来，水已经给人舀出去了，他要我马上搬到村子里老百姓家中去。他讲起他昨夜一夜未睡，在几个洞子的洞口往返了好几次……

这段话给我唤起了多么亲切的回忆。我至今还常常想念这位二十六岁的副连长。我记得在这以后的几个黄昏里，我同他一起去看望生病的同志，他那么殷勤地照料病人的饮食，关心病人的生活。他的亲切的笑容就像冬天的太阳那样给每个人带来温暖。有一个傍晚，我听见他花了半点钟的时间耐心地说服一个刚刚发过脾气的病员，他的入情入理的话使得

那位同志感动地埋下头承认错误。我同他从老百姓家中走出来，雨点打在我们的脸上，我想起他昨天夜深带病视察工事掉在水塘里、今天吃不下饭的事情，我们分手的时候，我就劝他："副连长，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他的疲乏的带笑的应声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我回到我的住处，许久都在想这个人的事情。我深深地感觉到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是无上的光荣。这种感觉经过了七年的长时间不但不曾消失，反而愈来愈强烈，愈显著。今天我们有更多的事实来说明这种光荣。而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更深刻的感受。任何重复的解释都成了多余的了。

不用说，我那部小说要是写成了，我想告诉读者的也就是这种无上的光荣。

1959年9月在上海。

“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

前不久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上刊载了一条引人注意的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电影制片厂正在合作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新闻的标题也就是这影片的名字：《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德国大诗人亨·海涅的这句诗不仅说出了今天中德两国人民伟大的抱负，而且也说明了我们两国人民正在从事的极其光荣的事业。这条新闻得到了普遍的热烈的欢迎。我已经听见好些人用热情的语言在谈论这部影片的内容，也有人甚至预言这部影片将来上演时的盛况。

我觉得新闻发表得正是时候。在最近这些日子里人们常常在谈论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因为我们两个共和国诞生在十年前的同一个月份，我们两国人民正在以万分欢乐的心情庆祝两个国家的十岁生日。

我们两国的人民有过不同的经历，也遭遇过不同的灾祸，但终于由不同的路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在我们两个共和国里，太阳一天一天不断地往上升，工农业的生产一天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

天地往上涨，文化教育一天比一天地普及、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地改善，团结乐观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地加浓。十年并不是很长的时期，而且我们也不想过分地渲染我们的成就。但是经过了十年的斗争和建设以后，我们两国人民可以豪迈地说出我们心里的话：在地上建立天堂。

不用说，在影片里人们可以看见我们两国人民怎样在建立天堂。影片会把观众带到建设工地，带到工厂，带到农村，带到学校和其他地方，让观众们看到许多动人的场面，让观众们体验到各种沸腾的生活，让观众们体会到两国人民的燃烧的心。而尤其感动人的就是两国人民互相支援、真诚合作的亲密友谊，这种友谊一定会贯串着整个影片。

在沸腾的生活里，我们到处看见这种友谊开放出来的美丽的花朵。用不着我一一列举十年来新中国建设上辉煌的成就中有多少德国朋友的心血。我也常常听见德国朋友讲起我们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对德国人民的支持和鼓舞。最近我有机会去参观浙江省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工地，在那里住了四个晚上。这个地方三年前还是荒山，甚至是虎豹出没之地。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在水上筑起了高达一百零五米的拦河大坝，在荒山上修起了现代化的大楼。这个水电站还没有建成发电，一部分的工人又动身到另一个更大的水电站的建设工地去了。新安江水电站不久就会开始发电。在这个工地上我遇见了好些工人。他们中间有的来自东北的丰满、河北的官厅，有的来自浙江省的黄坛口，有的还到过四川的狮子滩。他们告诉我有少数人已经到瓯江水电站的建设工地去了，不久还

有更多的人要去，因为这里的工作已经做好大半，那里的工作正在开展。他们也可能到别的省份去，因为别的省份也在建设这样的水电站，或者正在准备建设。有一个从东北来的装管子的工人告诉我，他当初来到这里，除了青山绿水就只有一片荒凉。他亲眼看见平地上建起了高楼，荒山的黑夜里亮起了一片灯海。可是他等不到厂房建成开始发电，又要到别处去做开辟的工作了。他谈起这些事情倒十分高兴。他有两个理由：一则，看见祖国的工业建设事业非常兴旺；二则，知道自己能够在这些建设事业上尽一份力量。像这样的把整个国家当作自己的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处奔走的人，我在新安江见过不少，在别的地方也见过很多。在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把个人的命运连系在集体的命运上，他们更关心的并不是个人的利益，却是集体的幸福。所以在每一个工地上，不论是修建水电站或者修建工厂，或者修建宿舍，或者修建办公大楼，在每一个工厂里，不论它生产的是什么物品，在每一个农村和矿山，不论地点是在祖国的东西南北，人们总是忘我地辛勤劳动，想出种种办法，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我去新安江的时候，我走过几个地方，访问了几个人民公社。那些欢乐的笑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在那些地方我看到了满足和丰富，也看到了社员们那种冲天的干劲与乐观的信心。我在金华双龙公社的花圃中，看过了用来熏茶的茉莉和珠兰，带着一身花香爬上一个小山坡，又看见火红的铁水从土高炉流出来。健壮的农村青年带着愉快的、自信的表情

在炉前工作。在杭州西湖公社一个生产队的幼儿园里，一群穿花衣服的肥胖小孩拉住我不断地唤“叔叔”。十年前那些无声无色的农村景象我还不曾忘记，现在来到一片欢笑的、色彩鲜明的农村，我怎能不为祖国十年来的巨大成就欢呼！

在新安江我听见过工人们的豪言壮语。他们曾经在那一条比河床还低的四百六十多米长的“廊道”里工作。当时江水暴涨，洪水有可能封住“廊道”的出口洞门。工地的现场指挥部发出了几次命令，才使得他们放下工作。后来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肯早出来，在“廊道”里是否曾想到自己的安全。他们的回答是：只想趁着洪水还不曾进来的时候把灌浆的工作做好。他们说：“大坝的安全才是我们自己的安全，这件事关系着子孙万代的幸福。”这些新安江工人的豪迈的声音也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者的声音。今天不论在穷乡僻壤天涯海角，都可以听见这种响亮的声音。“为子孙万代的幸福，”这不是一句抽象的空话。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眼睛永远望着前面。他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也正是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

我在新安江也看到这幅美丽的图画。在朱家埠工人生活区中有一所设备完善的托儿所。我站在清洁、风凉、明亮的饭厅的窗外，看孩子们愉快地用餐。孩子们吃完饭，抬起圆圆的胖脸，含笑地招呼我。我离开托儿所的时候，活泼的孩子们摇着手，亲切地唤道：“叔叔，再见！”看见他们，我就想起我的没有笑声的童年；看到他们，我又想起他们的在工地上忘我劳动的父母。我多么羡慕他们！

我们的德国朋友可以给我的这些话作证，因为在新安江生活和工作的还有德国的专家。我见到了四位从莱比锡来的德国朋友，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了。我们同住在紫金滩那个现代化的招待所里，而且每天在同一个饭厅里吃三顿饭。晚饭后在门前纳凉时，我们也交谈过。虽然我们没有问起彼此的姓名，但是我们谈起话来觉得非常亲切。一位年纪较大的专家是跟缆索起重机一块儿来的。缆索起重机一共有两台，已经装好了一台，另一台正在准备安装。据说按照当时当地的条件安装这样的起重机非常困难，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后来经过德国专家和新安江的工人们仔细研究，采用了老工人的建议，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把一台起重机装好了。我看见两个钢架像两只巨人脚似地横跨两岸，起重机从容地在空中往来，进行工作。德国专家和中国工人结了亲密的友谊。中国工人赞美德国专家工作认真负责，生活艰苦朴素。德国专家越来越热爱中国工人那种我为人人的无私态度、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集体智慧。德国专家初到新安江工地的时候，还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感到寂寞，现在他觉得跟中国同志一起工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虽然他的任务只是装好两台缆索起重机，可是他表示愿意在中国长住下去，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我们的工业建设。另外三个德国人是一位年轻的专家和他的妻子、女儿。女儿的名字是加林，今年才六岁，但已经会讲流利的中国话，可以为她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当翻译了。所有到新安江工地参观的人都知道这个小加林，而且都喜欢这个小加林。她在这里

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一样。她把她遇到的一切中国人都看作自己的亲人，不用说我也是其中之一。她的幸福的笑容和鸟叫似的饶舌给新安江的人增加了不少的快乐。她会在新安江同样衷心愉快地欢度我们的伟大的节日，也欢度她自己的伟大的节日。在新安江，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德两国人民携手前进的深厚友谊。

新安江的生活也就是整个新中国生活的缩影。用不着我像绘地图者那样在一张纸上画出中国的全图，从一个小小的工地就看得出整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家的面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今天的中国，而且是未来的中国。六亿五千万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力援助和支持下，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天堂。

有一天无限美好的天堂一定会在人间出现。那个时候今天的小加林会用她的滔滔不绝的口才向她的孩子们和孩子的孩子们讲她在中国新安江过的那些日子。

为柏林《新德意志报》作，1959 年 8 月在上海。

星光灿烂的新安江*

昨天晚上我又到了新安江。一座星光灿烂的山，一座灯彩牌楼似的大坝；那么多的人，那么响亮的歌声！人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声齐唱欢乐的歌曲。……昨天我在《新民晚报》上读到新安江水电站截流工程提前完成的消息，接着就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梦。可见我的心还留在新安江。

三个月前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我接触到工地上沸腾的生活，也接触到建设水电站的英雄们的燃烧的心。我看到了耸立在江面上的拦河大坝的雄姿，也看到了工人居住区中家属们的幸福生活。我看见了不少为公忘私的先进人物，也听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英雄事迹。早晨，我到招待所附近的悬索桥上去看拦河大坝；夜晚，我在招待所三楼露台上，望见对岸繁星似的灯光。我到江边看过运输砂石料过江的悬索桥，我现在还仿佛听见好几里长的电动传送带日夜不停的响声。那个时候坝脚下还开着两个导流底孔，白中带黄的江水从底孔里飞奔出来，在坝前翻腾。九个底孔已经封闭了七个。人们戴着安全帽在坝前坝后竹子搭的跑道和脚手架上来来往往、忙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新闻日报》。

碌地劳动。

有一次我也走过这样的跑道去看厂房封顶的工作。年轻的小伙子们推着小车争先恐后地跑到平台似的顶上，把混凝土从一个一个面盆大小的洞孔里倾倒下去。下面厂房顶上有好些工人在结束封顶的工作，把从上面倾倒下来的混凝土铺匀。不用说，我看见的只是尾声。前一个夜晚人们那么兴奋地在这里苦战了通宵。在工程局工作的干部们大多数都到坝上来，或者参加劳动，或者做宣传、鼓动的工作，一直到天明封顶的工作基本完成，他们才回到宿舍休息。我得感谢那位年轻的干部，他牺牲了睡眠，从大坝直接来到招待所，激动而愉快地对我们讲他的感受。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一种自豪的喜悦，他好像参加了一场战斗得胜归来一样。

我多么懊悔自己失去了那一个好机会，我不曾看见人们像作战那样地在一起劳动。工人们的干劲冲破了黑夜使它变成了白天。有人说，在新安江就没有黑夜，工人分三班日夜不息地跟时间赛跑，不让白天从他们的手里逃去。有人说，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者和其他工地上的建设者一样，分秒必争，要从跑开的每秒钟那里尽可能夺回更多的东西。这些话都不违反事实。我在这里有机会跟一些工人同志谈话，他们中间有的是先进工作者，有的只是普通的农村青年。但是他们全有这样的看法：为祖国多做事情是极大的光荣。他们不仅拿出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劳动，而且多动脑筋，献出更大的智慧，只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只为了让祖国的财富增加得更快，只为了让社会主义早日在祖国建成。好些人在改进工具、

改进工作方法上都有过不小的成绩；不少的人至今还在找窍门，想办法，刻苦钻研，克服困难，用他们的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来换取更大的创造发明。

我遇见一位不到四十岁的管子工人，他从东北来，已经在新安江安了家。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久又会调到另一个工地去。像他这样的管子工人总是比一般人先到工地，但是离开也比别人早，因为厂房建好安装机器的时候就不需要他们了。不用说，他们又赶到别的地方去做同样的开辟的工作。拿这个管子工人来说，他去过河北的官厅，到过四川的狮子滩，以后他可能去的地方更多。我们祖国到处都在动工建设水电站，到处都少不了管子工人。他带笑说：我跑的地方越多，我越高兴，这说明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越来越兴旺了。奇怪的是这个管子工人创造了一架小型电焊器。本来管子工人不用做电焊的工作，但是他看见大坝升高，电焊器运上山相当困难，耽误了任务完成的时间，便不顾自己没有文化，宁愿多吃苦头，成天不让自己一双手休息，也不让自己的脑子休息，不断地找同组的同志们一起商量，想尽办法，终于造成了一架比旧式的轻二十多倍的小型电焊器。从此电焊器可以随意搬上高山，管子工人也不妨兼做电焊工作。这个过去没有文化的工人，不但搞发明得到了成功，而且现在也开始学会了读报写字。他那一组最近还有更多的创造发明的计划，而且有的已经接近成功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先进小组的组长，人很朴素，不大会讲话，干起工作来却很有办法。他不仅自己苦干，而且能

够团结别人一起积极干活。工作紧张的时候，家里小孩生病他也不回去看看，下了班仍然留在工地上想办法出主意。我见到他，正是在领导上想方设法要他回家休息的时候，一则因为他的儿子生病；二则前一天晚上由于厂房封顶争取时间，他也参加战斗，一夜未睡。这时封顶工作刚刚完成，他因为集体事业的这个辉煌胜利，兴奋得不想马上离开战场，只愿意多多献出自己的力量。这个浙江省的东阳人也不过是无数新安江工人中的一位。他将来也要到另一个工地上去创造更多的奇迹。

我没有提这两位我很尊敬的同志的姓名，因为我在新安江遇见了很多这样的工人。其实岂但一个新安江，在上海，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地方，哪一处没有这种征服了时间的英雄。我没法把他们的姓名全写出来，我只想用“中国人”三个字来代表他们。“中国人”现在的确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呼。这十年来“中国人”究竟完成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奇迹，要把它们一一详细地记下来，千百册大书也不够。新安江水电站提前一年截流蓄水，不过是大跃进中一件小事。但是由于这个跃进，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和南京、杭州的工业都可以使用新安江电站供给的充足而价廉的水电了。那个时候我再去新安江，将会看到一个风景优美的休养地，也会看见五百吨以上的轮船靠着起重机的帮助从坝上来来去去。谁想得到四年前这里还是杳无人迹的荒山呢！

现在大坝脚下九个导流底孔全封闭了。我仿佛听到最后一扇闸门放下去的时候工地上一片响彻云霄的欢呼。新安江

的工人献出多么宝贵的礼物来迎接祖国的伟大节日。斩江断流的壮举完成了。发电的设备也将陆续运到工地，安装在坝后厂房里面。这是我们自己勘测、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第一座巨型水电站，而且所有的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在新安江工作的人谈起它都感到骄傲，都像爱护自己眼珠那样地爱护它。十年前我们哪里敢梦想这样的建设！可是今天的中国人想得到就办得到！而且是在这么短的时间，而且进行得这么顺利！工作紧张的时期中有两万多人在工地上劳动，现在将近一半的人到了别处。最近可能还有不少人被派到新的工地去做开辟的工作，在虎豹出没的荒山上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和现代化的工业。

我说过新安江的生活就是新中国的生活的缩影。我指的是沸腾的生活；我指的是燃烧的心；我指的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我指的是斩江断流的英雄气概；我指的是万马奔腾的大跃进的形势；我指的是无限壮丽、无限光明的前途；我指的是今天我们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感受的一切美好的事物！让我们好好地体会在新中国作人的幸福，而且像保护自己眼珠那样地保护这种幸福！

1959年9月在上海。

“元旦试笔”*

我们有过这样的习惯，喜欢在元旦早晨拿起笔写几句吉庆话，算是“元旦试笔”。所谓吉庆话，也无非祝望这一年如何如何，不用说全是朝好的方面想。虽然那些祝望不见得就会实现，我们却总是不断地用这样的祝望安慰自己。

这是过去的事情，而且是相当远的事情。在过去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时候：那就是像赫尔岑在一百多年前的回忆录中所写的：“我们不好意思再说出对这个新年还有什么愿望。向前看比朝后望更可怕。”这种话，这种心情是今天的中国青年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曾经做过这样噩梦的人却更深切地感到今天的幸福。今天我们拿起笔迎着新年的阳光，我们可以写下许多、许多的祝望。这些祝望都会一一地在我们的眼前实现。过去我们把“移山填海”当作神话，但是在新中国这种人造的奇迹已经成为寻常的事情。向前看，前面是一片灿烂的金光，美丽的前途向每个人招手。

我们已经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是我们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年头。我们当然很兴奋。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文汇报》。

是我们已经不像五年前那样地紧张了。我们有了更多的经验，有了更大的信心，而且有了更好的条件。固然要得到任何的成就仍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勤劳不懈的努力，但是我们已经有更大的把握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今年元旦试笔的时候，也用不着我们多写吉庆话了，因为许多、许多可喜的事情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祝望一九五八年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美好的东西，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美好的东西。不用说，我们最大的祝望仍然是：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幸福。

提起和平与幸福，有人就会想到今天在阿尔及利亚、阿曼、伊夫尼等地方仍然有人在流血，战争的挑拨者还在忙碌奔走，到处制造纠纷，在大片的土地上依旧充满着苦难。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的天空中还有两颗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各国人民中间正流传着两篇伟大的宣言。这两个历史性的文件体现了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合作和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它们显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阵营落后了，拥护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壮大了。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冷战、热战，仍然没有给他们自己带来好处。相反的，他们一直在各处碰壁。过去一年来他们不断地替自己吹嘘，可是牛吹得太大，已经把肚皮空空的气球吹破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气得发病进了医院，也没法叫美国的火箭升到天空，更谈不到放射那环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了。于是在一阵你怪我、我怨你的内部争吵之后，美国也只得放下面子，承认自己科学落后两年。最近连美国的空军部长也认为在一九五八年苏联很可能发射一枚火

箭到月球上去。这即使不是甘心认输的话，至少也说明已经气馁了。哪怕是战争挑拨者，他们自己心里也有数：纵然挑起战争，也不见得有胜利的把握。现在原子弹、氢弹等等也吓不了人了，——“别人可能会有更厉害、更高明的东西”。他们也许不能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实力对比的变化他们却懂得。在他们认为自己的科学比别人进步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冒险，害怕事情闹大了，没法收拾，自己吃亏。现在知道自己的科学不如别人，连一个土豆子也发射不起来，怎么敢跟别人认真较量实力呢？那么偷偷摸摸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小小地干一下吧。譬如说在中近东、在东南亚吧。在这些地方，他们的阴谋也遭到失败。西伊里安眼看就要回到它祖国的怀抱，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最后立脚点也快要连根拔掉了。

所以在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等等地方，那些穿燕尾服的绅士们举起酒杯迎接一九五八年的时候，他们的笑容一定不是愉快的。他们也许会说出许多新年的愿望(自然，他们的愿望是很多的)，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在说梦话。天空中人造卫星对着我们射出强烈的光芒，而在他们的眼里却成了一天的乌云。的确，一九五八年的天空中不会有帝国主义的“命星”了。对于他们那只是一个浓云密布的阴天，他们再也见不到太阳了。对于他们，倒的确是“向前看比朝后望更可怕”。

在埃及的首都开罗，亚非团结大会正在热烈地进行。解放了的亚非人民挑选了这么好的时机来显示他们的团结的力

量，让他们的洪亮的声音响彻全世界。他们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他们有力量跟其他国家的人民一起保卫世界的和平，掌握自己的命运，安排自己的前途。亚非人民饱尝了受压迫、被剥削、被侵略的痛苦，现在他们终于站起来了。不曾有过奴隶生活经验的人很难透彻了解“站起来了”的意义。我想起了我最近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美术展览会中看到的一座参孙塑像，那是著名雕刻家康涅科夫的杰作。“站起来了”的人民就像挣断了锁链的巨人参孙。“粉碎旧世界的锁链！”这是多么感动人的艺术品！这是多么鼓舞人的伟大景象！穿燕尾服的绅士们当然不会喜欢这样的塑像。他们只觉得它可怕。对于这些先生们一九五八年会带给他们什么呢？不用说，不会有一样使他们感到舒服的东西。

用不着我来替帝国主义者算命。他们的前途是谁也看得清楚的。（即使是“右派分子”，也不能不默认资本主义国家的月亮不那么亮、帝国主义者的前途不那么光明了。）我倒希望自己手里捏的笔能够替爱好和平的人民记一笔帐。记下在我们这些把主要力量放在和平建设上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增长。这并不是吹牛式的宣传，这是人民生活的忠实记录。苏联四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和新中国八年来的光辉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原子破冰船的下水，人造卫星的上天，在冰天雪地上建设工业城市，用人力完成“五海通航”，这几件征服大自然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苏联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同样我们在亚洲第一大河的扬子江上架起了行驶火车和汽车的大桥，在厦门海峡修筑长堤建造铁路，开始制服为害

千年的黄河，在沙漠和荒地上建起无数繁荣的新城市，这几件事实也就说明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他们的光芒万丈的前途。我们是中国人，八年来在我们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大小变化都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这中间我们尝过多少辛苦，克服多少困难，尤其是这一年来我们进行了多么巨大的斗争，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绩，不仅是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我们都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的团结更巩固了；劳动锻炼的方针执行以后，我们的力量更增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以后，我们的信心更充足了。跟着一九五八年的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六万万的中国人民将以勇敢而愉快的心情，满怀信心地大步向前，迎接一九五八年的灿烂的朝阳，这是多么伟大的壮观！

作为一个生活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国人，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1957年12月在上海。

迎接新的光明*

两年前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那个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全苏美术展览会上看见了康涅科夫的著名的雕像：巨人参孙挣断了锁链，伸出双手迎接自由。矮矮的像座上有一句简单的说明："粉碎旧世界的锁链。"接连两个下午我来到这座大雕像跟前，我仰起头出神地望着那个巨人。他那两只大大张开的胳膊向上高举，手腕上还戴着刚刚挣断了锁链的手铐，粗壮结实的右腿仿佛要朝前跨出去。整个巨大的身体里充满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望着，又望着。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厅子太小了。巨人参孙马上就要奔出去迎接新的光明。我听到了他那响雷似的欢呼。

苏联现代大艺术家的杰作给古代的神话增加了新的意义。康涅科夫的参孙不会推倒房屋，与敌人同归于尽，他却挣断锁链，打烂旧世界，要去完成塑造新世界的伟业。这个雕像表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在新的参孙的身上，我看到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那种移山倒海的雄伟气魄和巨大力量。

七百天很快地过去了。在这不平凡的七百个灿烂发光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上海文学》十月号。

日子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景象，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个挣断锁链的巨人。我明明看见他动着两只大手在塑造新的世界。我明明看见我的周围一天比一天显得美丽。人间出现了真正的巨人，神话也远远地落在现实后面了。在这七百天里面，中国人民究竟做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们整个国家面貌的改变究竟大到什么样的程度？不用说，我们的敌人故意闭上眼睛不愿意知道；其实连我们自己人也不可能全都清楚。一个普通人的眼睛怎么能够跟得上巨人参孙的脚步？站起来了的人民的冲天干劲又何尝有一个止境？七百天还只是一个小数目。我应该把最初的八年加上去。让一切有心人仔细地算一算，十年中间新中国巨人腾云驾雾究竟走了多远的路程！

十年前中国人民挣断了锁链，以巨人的雄姿踏上世界舞台，西方世界的高等绅士和流氓政客们还故作镇定，伸起手掩住自己的眼睛，不要看见一个大国的存在；一小撮逃出大陆的战争罪犯还在梦想勾结国外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第二次骑在人民的头上。其实他们何至于聋到听不见新中国巨人脚下破碎的声音，旧世界一天一天地在烂下去，它那些建筑物一天一天地在腐朽、动摇。谁也听得到旧世界的痛苦的呻吟。他们明知自己毫无力量摇动新中国巨人的一根头发，却鬼鬼祟祟地朝着他的背影掷一个石子或者吐一口唾沫。他们躲在角落里不断地发出吱吱喳喳的咒骂。有时候捧一本“反攻大陆经”，有时候念一遍“自己垮台咒”。于是睁着眼睛白天做梦，厚起脸皮胡乱吹牛，今天一个预言，明天一段谈话，说来讲去，无非

"新中国过不了一年，帝国主义的前途光明灿烂"这一套鬼话。他们已经耍尽了骗人骗己的本事，到了今天，有的因紧张而发狂，有的因绝望而病死，有的因灰心而麻木，剩下的那些仍然反复地唱着没有人听的老调子，但也只是为了壮自己的胆子罢了。连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前途十分黯淡。发射光芒的倒是他们朝夕咒骂的新中国巨人。现在他们即使遮住双眼，新中国的光芒也可以穿透他们的手背，使他们目眩心惊。新中国不但活过了一年，十年，而且还要活到千年，万年。而且一年比一年富足，一年比一年强大！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敌人搞了多少危害我们的阴谋诡计，他们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放了多少绊脚石。可是我们战胜了一切的困难，一直向前飞奔。十年来新中国巨人的脚步并没有停过一天。那两只巨大的脚可以踏碎任何大大小小的绊脚石，那一双巨大的手可以粉碎旧世界的一切腐朽的建筑物。它们可以在平地上建造无数工业城市；它们可以随意搬走几座大山，几条小河；它们可以在荒山上挂起千万颗明星；它们可以在大江上架起万丈长虹。它们可以把落后的国家改变成变化万千的"聚宝瓶"；它们可以使大自然为人民生产巨大的财富；它们可以使六亿五千万颗心溶合成一个伟大的集体。它们可以把废铁磨成绣花针；把沙漠改变为良田；把鬼变成人。……它们可以在十年中间塑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一等强国。让那些以咒骂我们为生的人来数数看，究竟有什么事情是新中国巨人所办不到的！让他们想想看，这十年中间新中国巨人究竟有哪一回因为失败

而放手走过回头路？

十年的辉煌成就把我们祖国广大的河山装饰得无限美丽，每一项成绩都像一件发光的珠宝。生活在这个国土上的人因为朝夕看见千万道金光而感到自豪。万马奔腾似的新中国巨人的脚步声，吓得我们的敌人彻夜不眠。可是到了我们朋友的耳里它却成了异常美妙的乐曲。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我们的弟兄形成了无比强大的社会主义的阵营。我们的成就也是我们弟兄的成就，我们的成就也是我们朋友的成就。十年来，我们哪一天没有得到友谊的帮助和鼓励？我们哪一个时候不曾因为听见弟兄们向前迈进的雄伟步伐，而兴奋起舞？

十年也只是一个光辉的开端，就像一轮初升的太阳。谁都想得到红日当空究竟能发出多大的热，和多强的光！用不着我来描绘新中国的锦绣前程。将来有一天连太阳也要全心全意地为人类服务，这倒是可以断言的。到达月球的苏联宇宙火箭就是迎接新的光明的伟大号召。社会主义大家庭全体弟兄们的团结的力量可以比得上无数个挣断锁链的参孙！他们要完成打烂旧世界塑造新世界的光荣事业，而且一定能够完成。

让我们欢度节日的歌声、笑声响彻云霄吧！看，在残破的旧世界中成天咒骂我们的流氓、绅士、政客们已经缩着头在瑟瑟地打颤了。

1959年9月在上海。

无比光辉的榜样

——祝全苏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

全苏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将于五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我拿起笔想写几行祝词，我觉得心里非常温暖，仿佛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暖流，包围了我的心。我体会到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感情。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里没有一本苏联的文学作品？哪一个热爱生活、追求光明的读者不熟悉几个苏联作家的名字？苏联文学不仅是属于苏联人民的，它已经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了。用不着我在这里列举苏联文学的辉煌的成就。每一个忠实的读者都可以用不同的动人的故事来说明自己从苏联文学得到的帮助。近四十年来苏联文学一直在世界文学中放射夺目的光芒，发散健康的气息，养育年轻的心灵，用光明和希望鼓舞人们，用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物形象引导人们前进。全世界的读者第一次在苏联的作品中，看到了新的人和新的生活，健康的人和合理的生活，感染到了对合理生活、对真正身心健康的人的热爱。甚至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甚至在压迫与剥削、流血与饥寒使人们大批死亡的地区，苏联的作品也给人带来了勇气和信心，力量和希望（苏联文学给人们带来了光明一定战胜黑暗的信仰）。在阳光普照的解放了的国

土上，苏维埃人的英雄形象和优秀品质又是人们学习摹仿的榜样。

苏联文学帮助了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苏联文学不仅反映了时代，而且推动了时代。……作为中国的读者，我有这样的体会；作为中国的作家，我更有这样的体会。倘使我把全世界语言中最好的形容词用来形容苏联文学，也不算夸大过分。翻遍世界文学史，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伟大的作家和出色的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些作家的名字至今还鲜明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但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发挥过像苏联文学那样的作用，产生过那样的影响！苏联作家把读者当作知己朋友，当作有理智、有感情的人，而认真负责地跟读者们一块儿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共同前进。苏联作家把写作看成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严肃工作和艰苦劳动。苏联作家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而且发展了它。苏联文学又鼓舞了兄弟国家新的文学的成长，对全世界进步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今天苏联文学已经是十分壮大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要部分。它的前途光芒万丈，这是不用说的。就是在今天它也是一股不可抵挡的铁流，它会冲破一切的阻碍，顺着它的道路不断地往前发展扩大。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有一些迷恋骸骨的人不习惯呼吸新鲜的空气，靠剥削为生的人仇视合理的生活，奴役人民的人怕看见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钻牛角尖逃避

现实的人想用色情陶醉和官能享受来减轻死亡的痛苦，不愿找寻出路、自甘灭亡的人用荒谬绝伦的恐怖来刺激他们死了一半的脑筋，他们宁肯欣赏好莱坞的《苍蝇》影片，赞美背离人类良知的小说《洛丽塔》，把惯于做噩梦的卡夫卡的作品当作圣经，却向苏联文学抛掷污泥，企图用肮脏的手来掩盖苏联文学的光芒。其实他们的花言巧语和愚蠢行为倒好像蜉蝣撼大树，树干一点也不会摇动，连一片树叶也不会因而下落，可是蜉蝣本身就只有几小时的生命。修正主义者也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或则偷偷摸摸贩卖私货，或则歪曲事实，造谣中伤，无非想损害苏联文学的威信。可是他们也只是白花力气，自讨没趣，终于成为被人唾弃的败类而已。四十一年来苏联文学发展的道路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爱苏联就会爱苏联人，爱苏联人就会爱苏联文学。这是三位一体，分不开的。……新的人建设了新的国家，也创造了新的文学。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学又培养了新的人。"我还可以在这里补充一句：全世界的读者由于新的文学认识了新的人和新的国家，也由于新的文学爱上了新的人和新的国家。苏联文学的力量就在这里，苏联文学的作用也在这里。苏联和苏联文学虽然已经存在了四十一年，可是它们仍然是崭新的东西，因为它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它们还是朝气蓬勃，洋溢着生命力，有无限广阔、无限光明的前途。它们仍然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文学。苏联人也是这样。不论是国家、人或者文学都还有更重大的使命，都还应当完成更重大的任务，而且一定会做出惊天动地、造福子孙万代

的伟业。全体进步人类今天对苏联抱着更殷切的、更大的期望。全世界的读者对苏联文学也寄予更殷切的、更大的期望。苏联发射的人造行星还在宇宙间运行，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举世无比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共产主义的美丽远景愈来愈近，愈来愈具体化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正以冲天干劲，向前飞奔，争取一九五九年工农业更大更好的全面跃进，兄弟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先后在生产战线上创造出惊人的奇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在高涨，世界和平阵营的力量不断壮大。苏联作家的代表们挑选了这个大好的时机召开大会，那么多举世闻名的有才华的作家们聚会一堂讨论今后的工作。面对着无比雄伟、无限壮丽的新形势和新局面，苏联的作家们一定会配合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而且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更大发展和繁荣准备更有利的条件，开辟更光辉的道路，然后全力以赴卓越地完成这个任务。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光辉的榜样！

苏联作家依靠个人艰苦的劳动、集体的智慧和共同的努力一定会给全世界进步作家立下一个无比光辉的榜样。一九五四年苏共中央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所提到的作家的“使命”——“为劳动者的事业服务而且要达到世界艺术创作的最高峰”，至今还是全世界进步作家共同努力的目标。“贡献全部精力忘我地为人民服务，创造出无愧于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时代的作品”。这不仅是苏联党和人民要求于苏联作家的，这也是全世界的读者对苏联作家的要求。这不仅是苏联作家的任务，全世界进步的作家也都有责任为读者写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中国的作家当然不是例外。

我相信大会一定开得热烈，圆满，成功！大会以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光辉灿烂、气象万千的苏联文学更大繁荣的新局面！

1959年4月在上海。

一生也忘不了的教育

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的同志们被全国人民称为“最坚强的人”。跟最坚强的人会见，听他们谈话，看他们表演，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许多人感动得流了眼泪，许多人激动得想大声欢呼，许多人想上台去拉住他们的手，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向他们倾吐，许多人想把他们中间任何一个接到自己家里去、为了自己和孩子们向他们表示感谢。看见他们，我们更觉得自己的心跟祖国、跟全国人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看见他们，我们更强烈地感觉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找到了最好的教师和最亲密的朋友。我一连两个晚上都在想他们的事情，我知道一定有许多上海人想着他们的事情激动得不能睡眠。他们在上海演出的时间不会久，我们也没有多的机会跟他们接触，而且大多数的上海人只能从收音机里听到他们的声音，或者在电视机上看到他们的面貌。但是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忘记他们。我们在快乐的时候，会想到他们；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更会想起他们。我们要是在前进的路上碰到了阻碍，我们要是在较大的困难前面感到了软弱，我们要是被个人的打算蒙蔽了自己的眼睛，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会像

老师，像朋友那样地在我们的耳边进忠告：

没有眼睛照样读书看报，
没有双手照样写字弹琴，
两腿瘫痪能用双手劳动，
没有双脚也能疾走飞奔。
困难只能在软弱者面前存在，
挡不住久经锻炼的士兵！

谁听见张家琛同志朗诵的诗能够无动于衷？诗是一位下肢瘫痪的革命残废军人刘渝生同志写的。两手截肢的张家琛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没有两只手却能够弹风琴，能够跳手举折扇的民间舞蹈，而且能够写出很端正的小字。他在舞台上用坚定而快乐的声音朗诵《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射出强烈的光芒，笑容里也带着很大的信心，谁都会相信他将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奇迹来。没有双手的人都能够创造奇迹，那么我们这些两手完好的人就不能克服一点点的困难吗？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我们就不能呢？这是每个人不能不想、不能不多想的问题。

跟张家琛同志一块儿跳舞的同志们中间涂伯毅同志显得最活泼。他在东北民间歌舞《闹元宵》中的表演博得了更多的掌声。谁看到他那活泼、轻捷、愉快的舞姿决不会想到他是面部和双手烧伤很厉害的一等革命残废军人。昨天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大厅里拍照的时候，我紧紧地握住他的不能伸直的手。照相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对光，我们兴奋地

在等待，涂伯毅同志非常激动，他还没有对我讲完心里的话。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的，那还是七年前的事情。我们一起走去拍照的时候，他热情地告诉我："解放的时候我才十几岁。……党教育了我。……现在又使我在受伤以后还能够为人民做一点事情。……我和队里同志们一样，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我们要献出全部力量，永远为共产主义服务。"他的一个战友在旁边劝他冷静些，他接连说："我要说出我心里的话。"

的确，演出队的同志们不论在舞台上或者在日常生活里对任何人都说自己"心里的话"。这就是张家琛同志朗诵的诗里面写着的：

> 祖国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 我们永远和祖国心连心。
> …………
> 只要我们心脏还在跳动，
> 就要坚决为共产主义斗争！

所以双目失明的樊宁然同志在他自编自唱的金钱板里会那么高兴地唱起《人民公社好风光》来，断了双腕的苟中玉同志会带着那么愉快的笑容唱着《心里真舒坦》，右手右脚截肢的杜双全同志会带着极大的轻蔑唱起《反对美帝侵略》的快板，下肢瘫痪的何长俊同志会充满信心地唱出《不见英雄花不开》。《大合唱》和《十月联唱》简直是一片英雄的凯歌声，给听众们带来那么坚强的胜利的信心。还有五个没有手的同志的

《口琴合奏》，三个双目失明的同志的《手风琴齐奏》，左手截肢一目失明的易如元同志的《竹笛独奏》，双手截肢的黄天然同志精彩的乒乓球表演……这些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其实整个演出队就是一个大的奇迹。这可能是全世界中的第一个特殊的演出队。他们在舞台上不仅对观众作精彩的表演，他们还把鲜红的心掏出来交给人们。他们叫你不能不想，不能不拿自己跟他们比一比，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生活的安排。他们的燃烧的心会照亮你的灵魂，烧掉你身上一切肮脏的个人的东西，推动你跟着他们一同前进。我们生活在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不可能不产生无数的奇迹。一个接连一个的奇迹带动大家跟着时代向前飞奔。任何人都能够创造奇迹，只要他像演出队同志那样"和祖国心连心……坚决为共产主义斗争"——这是演出队让我们相信的一件重要事情。

我用不着写下去了。我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写不完演出队同志们的共产主义的风格，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艺术和工作的热爱以及他们勤学苦练的毅力。他们的确是最坚强的人，他们同时也是最虚心的人。他们待人又是那么亲切，那么热情。无论谁只要跟他们见一面，一定会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一生也忘不了的教育！

1958年11月在上海。

跟志愿军一起欢度国庆节*

在朝鲜，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过了两个国庆节。一九五二年在开城附近一座大楼的废墟上，我和一百多位政治工作干部一起为祖国建设上的成就干杯，为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干杯，为祖国人民领袖的健康干杯。一九五三年在西线的前沿阵地上，我跟五百多个战士在一起听营教导员关于祖国建设的报告，战士的代表们纷纷在庆祝会上发表感想。每个人都带着笑容谈起祖国，都感觉到自己的心仍然留在祖国的土地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行列中间，每个人都觉得祖国的欢乐的景象中有他自己。这些人都是随时准备着用自己的血肉来保卫祖国的。我体会到他们那种深厚的爱，而且生活在他们中间我也感染到了他们的那种爱。

在朝鲜我们最常用的字眼是“祖国”。“祖国”不是空话，不是幻象。“祖国”是具体的东西。每个人照他的方法来解释“祖国”，来爱“祖国”。有的人用他妹妹的照片来解释，有的人用家里的来信，有的人用画报上的图片，有的人用祖国送来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人民文学》十月号。

慰劳品，有的人用从合作社里买到的东西，有的人用归国代表团的报告，……我没法列举下去，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祖国不断地在进步，祖国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在改善，祖国的面貌一天一天地变得更美丽。过去的痛苦的日子在谁的记忆里都还很鲜明，今天谁都亲身受到翻身的好处。拿“过去”跟“现在”比较，谁也会承认这一个伟大的翻身的事实：六万万的中国人站起来了，在自己生长的丰饶、广大的土地上做了主人，用他们的从未表现过的全部力量来建设幸福的生活。志愿军同志们的深厚的爱就寄托在这个事实上面。倘使仔细观察，我就看出来，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流露着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普遍的幸福的感觉，他们感觉到幸福，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六万万人的幸福有了保障，他们知道六万万人团结成一颗心，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努力。他们感到幸福，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地上造出了天堂，却只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美好生活的远景，有了共同的前进的目标，而且六万万人正以同一的步伐向着那个目标前进。

“祖国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地好”，这是志愿军战士们最爱讲的一句话，也是他们最爱听的话，因为这是事实。所以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就答应过随时向他们报告祖国建设的消息。

我从朝鲜回来已经有八个月了。我没法实践我的诺言，因为叫人兴奋的消息实在太多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工业建设上的成就，人民生活的改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的清除……这一类的事实哪一天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共同的事业？哪一个中国人

不因为祖国的光明的前途而感到兴奋？哪一个中国人不因为我们国家在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有了重大贡献而感到骄傲？哪一个中国人不怀着感激的心情热烈欢迎我们的第一个宪法？……要把这一切使人欢欣鼓舞的事实忠实地记下来，我得写一本大书。其实这已经不是他们需要的了。他们不但早知道了这一切，而且这一切已经包含在他们常用的“祖国”两个字里面了。这样的祖国的确是值得人用全心来爱的，这样的祖国的确是值得人为它牺牲一切的。

今年我虽然不在朝鲜，但是我的心不会离开志愿军同志，我的心仍然留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在一起欢度这个一九五四年的国庆节。

1954年9月在北京。

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介绍《志愿军一日》

听见窗下的蛙声，我又想起了朝鲜。四年前我在开城附近一个村子里住过几天，晚上我们很少点蜡烛，免得成为美国飞机投弹的目标。我打开窗倾听月夜里的蛙声，我感觉到朝鲜土地的温暖。大炮在不远的地方轰鸣，朝鲜的小女孩在大树下空地上唱歌。接着响起了一个中年女人的笑声。在战地上我看到的不是恐怖和死亡，却是无穷的生命力，是不可制服的勇气，是像迎春花那样开满山野的友爱。

有一天我从这里走到山上去，在坑道里住了好几晚。每天跑过交通沟，通过封锁线，去访问前沿阵地的志愿军连队。深夜，敌人炮弹片落到坑道口，我出去看岗哨是否安全，年轻人的笑脸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像这样的笑脸我每天都看见。在战争中的朝鲜，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的朝鲜，我不知道见过多少这样可爱的年轻人。在仲秋的一个凉夜里，年轻的指导员脱下自己身上的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解放军文艺》九月号。

衣盖在我的被子上，因为我是从祖国来的客人。在志愿军同志们的一举一动上，我都看到了对祖国的热爱。

的确，在朝鲜，我每天都过着兴奋的生活。在坑道里，在掩蔽部里，在农家的茅屋里，我不断地听到志愿军指战员讲的英雄故事。我也亲眼看见在我的周围发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生活在朝鲜的土地上，生活在志愿军部队中间，不论是在战争中或者在停战后，我都觉得：生活多么丰富！人们的感情多么深厚，多么强烈！这种的感情都是用每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用行动来表现他们的爱和恨，到必要的时候甚至牺牲生命。譬如，敌机投弹的时候护士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伤员。在困难的时候，战士们节省自己的粮食送给朝鲜老人和小孩。战斗激烈、任务紧急的时候，每个人都无畏地勇往直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志愿军指战员的行动不仅引起朝鲜友人的眼泪，而且常常成为朝鲜妇女歌唱的题材。这些歌子会流传万世，因为它记录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在朝鲜我听惯了这样的歌子，我也听惯了志愿军同志们写的更多的歌子。文工团同志们唱不完战士爱祖国、爱人民的深情，战士们也唱不完他们那种“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会写的就用笔写出来，会唱的就用嘴唱出来，不会写、不会唱、不会讲的就用行为表达出来。这里面都含得有一样东西：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在志愿军中间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从我们农村里来的朴实、平凡的好青年。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里何止千千万万！可是他们一旦到了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恨表现得最突出

的地方，他们就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事情。他们做得很自然，没有一点勉强，好像他们不能不这样做一样。有一个朝鲜老大娘跟我谈起来，她说志愿军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感情，只有爱和恨是共同的。谁不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和人民？谁不爱勇敢、勤劳、活泼、热情的朝鲜人民？谁不爱和平建设与劳动的生活？谁不恨将美丽的城市沦为废墟、使和平人民血流遍地的敌人呢？在这个尖锐的斗争中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得到培养而开花了。

像这样的花朵在朝鲜每一寸土地上都找得到，它们点缀了朝鲜的美丽的河山。敌人的飞机、大炮炸毁不了它们。一切现代化的武器在它们跟前都失去了效力。它们向全世界发射光芒：暴力终归要失败，和平终归要恢复，正义终归要伸张。生活在朝鲜的人哪一个不曾为它们歌唱？访问朝鲜的人哪一个不曾有过感激的心情？什么人能够不用它们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多少人从它们那里得到了教育，受到了鼓舞！

在朝鲜的时候我常常同朋友们谈到这个，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应该写，应该多写，让每个中国人都看到这样美丽的花朵，可是要靠我们写是不够的，而且我们的笔又是多么软弱无力！倘使参加实际斗争的志愿军指战员能够动笔写出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多么好！倘使发动志愿军同志们写出他们的英雄事迹，哪怕是一鳞一爪也一定含得有发光的珠玉般的东西；要是把它们凑在一起，一定会是一幅很出色的大画面。

现在《志愿军一日》终于在大家的盼望中出版了。这是一

部空前的书。这是英雄们的创作。它不仅是充满热情的文章的总集，更重要的，它还是实际斗争的记录，而且还是充满献身精神的行动的总结。执笔的人都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指战员，他们写那些给他们印象最深的事情，从副司令员杨得志到战士朱友恒，每个人都写得那么朴素，那么诚恳，那么真实，没有丝毫的夸张，而且不带一点文艺腔，却又那么动人。每个人的叙述都证明一个事实：他曾经为他写的每一句话付过很高的代价。就拿指挥部队“突破临津江”的杨得志同志来说吧，他为着组织这个战斗花费了多少心血，他当时是以全力从事的。他知道自己要是稍微有一点疏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伤亡，甚或不能完成任务。打仗不比写文章，错了就没法改正。再拿万福来连长来说，他的关于黄继光烈士的报告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他的文章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叙述。但是先有了通讯员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的英雄事迹，然后才有万福来连长的激动人心的文章，而且万福来同志本人在战斗中也多多少少贡献了自己的鲜血。“连中三元”的战士朱友恒同志不管自己胸前一大片的血迹，咬紧牙齿冲出工事，用火箭筒打坏了敌人的装甲车。可以说，他的文章是用自己的热血写成的。他不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他是抱着必死必胜的决心在参加战斗，所以他的笔下的每个字都有很大的重量。……

我用不着再举更多的例子了。那些不朽的文章比我的话更有力量。我说“不朽的文章”，并非盲目颂扬。我相信，它们里面流露出来的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可以万古长青，连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也会在它们里面找到鼓舞和力量。每一

个诚恳的读者都会从《志愿军一日》中得到益处：你读它，认真地读它，它会使你变得更好！

1956年6月在上海。

欢迎最可爱的人*

在上海迎春花刚刚开放。看见这一片鹅黄，我想起了朝鲜满山满野的迎春花，我想起了朝鲜的美丽的江山和热情的人民，我想起了我在朝鲜过的那些令人兴奋、感动的日子，我想起了许多人和许多事情。我恨不得马上飞到鸭绿江边，站在成千成万手捧鲜花的人们中间，高声嚷着，笑着，呼唤着，歌唱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从一个温暖、友爱的环境回到另一个温暖、友爱的环境，从一个正在用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回到另一个同样地用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你们身上带着朝鲜的黄土，心里藏着朝鲜人民的友情，跨过了久别的鸭绿江。祖国的春风温柔地亲着你们的脸颊，你们望着数不清的挥动的手，听着唱不完的嘹亮的歌声，祖国的兄弟姊妹把你们紧紧地拥抱着，热情地抬在肩上，孩子们在你们的脖子上套上了红领巾，连祖国的小鸟也为你们唱着欢迎的短歌。在这个时候，在这些日子里，我可以想象你们的心情。远行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祖国这个老母亲穿上最好的服装来欢迎她朝夕想念的儿女，她把家收拾得像一个大花园来接待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解放军文艺》四月号。发表时题为《欢迎，最可爱的人！》。

你们。儿女们不曾辜负母亲的期望，母亲也知道怎样使儿女们安心。除了美丽的鲜花、响亮的歌声和热情的拥抱外，还有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万马奔腾般前进的脚步声。在这个跃进再跃进的变化万千、空前美丽的春天里，你们一定看到了祖国的各种各样新面貌。七年半以前你们离家远行的时候，母亲哪里有现在这样的健康？哪里像今天这样精神饱满、充满力量？

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都爱自己的母亲。只有离家的人能够体会到跟久别的母亲重见时的心情。祖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祖国。但是，到过朝鲜，在坑道里、在掩蔽部里、在地下室里、在山沟中农家茅屋里跟你们同住过的人，更能够了解在你们的心中祖国占着怎样高的地位。正如离开了母亲的子女特别想念母亲，热爱母亲。你们在朝鲜作战，保卫受难的国家和自己祖国的时候，你们在朝鲜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你们更深切地感到自己跟祖国的密切关系。祖国就是你们一切力量的泉源，也是你们一切行动的目标。你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你们对祖国的热爱。对于你们，祖国是具体的东西。一封信，一本书，一张照片，一件纪念品……只要是从祖国来的，都可以代表祖国，都会牵系你们的心。你们吃一口炒面、喝一口雪的时候，你们想的是祖国；你们睡在阴湿寒冷的坑道里的时候，你们想的是祖国；你们蹲在前沿阵地上临时挖的不大通气的洞子里等待出击的时候，你们想的是祖国；你们拿着爆破筒奔去炸敌人地堡的时候，你们想的也是祖国。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是描写不尽的，“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英雄气概是歌颂不完的，祖国就是你们一切教育、一切锻炼的源泉。勇敢、热情、活泼、勤劳的朝鲜人民又是你们学习的榜样。在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在美丽城市变为废墟、废墟上又建成更美丽的家园的地方，在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人间最美好的感情更容易受到培养而含苞、开花。你们过去大半是朴实的农村青年，今天成了英勇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在朝鲜的七年半中间你们经历了多少艰苦的日子，走了多么长的路程。在你们身上增加了多少优良的品质，这些品质也教育了国内的兄弟姊妹。以吃苦负责为光荣，以享乐偷懒为耻辱，在你们中间，这原是极寻常的事。现在你们会看到这已经成为国内的新风气了。祖国也在迈着空前的大步前进。在分别了七年半以后，你们回到祖国母亲的膝下，祖国母亲用那么结实有力的两只胳膊拥抱你们，你们看到她的极其健康的笑容，你们一定会感到多大的幸福。让我们用欢乐的笑声来互相倾吐无限幸福的感情！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终于回来了。我还记得四年半以前我在你们中间听到这样的几句“誓辞”：

祖国人民啊，
“不作英雄归来，
便作英雄死去。”
用我们的鲜血，
把到处是瓦砾焦土的朝鲜，

灌溉出一个美丽的花园……
用我们钢铁的意志，
保卫祖国像铜墙铁壁一样……

你们履行了你们的诺言，你们的确成为英雄归来了。朝鲜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国家建成了美丽的花园。我们的祖国也已经巩固得像铜墙铁壁一样。祖国需要英雄，需要更多、更多的英雄。你们完成了祖国交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你们的确是祖国的“最可爱的人”。那么你们一定会继续拿出英雄气概，跟祖国人民一起把祖国建设成无限美丽的花园。让更多的英雄事迹和美好感情像迎春花一样地在祖国的遍山、遍野开放。

1958年3月在上海。

向小朋友贺年*

我拿起笔想写一封向小朋友们贺年的信，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祝你们新年快乐。

我知道你们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快乐。我知道你们会注意自己的身体，也会爱惜你们的时间。我看见你们的满心高兴的笑容，就想到自己的童年。我真羡慕你们。我的童年是说不上幸福的。我不想告诉你们这个。现在我要对你们讲的是另一件事情。

我最近参加过一次授军衔、授勋章的典礼。这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给予那些对国家有功劳的人员的崇高的荣誉。典礼十分隆重。会场里除了少数来宾外，全是受衔和受领勋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和校官。典礼一共继续了四个钟头。刘伯承元帅代表周总理把将官军衔授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代表毛主席把勋章授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功人员。宣读授衔、授勋命令的时间相当长，这些时候，从穿着海蓝色元帅大礼服的刘伯承元帅起，不论台上台下全场一致肃立，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严肃的表情。我听到许多熟悉的名字，我看到许多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儿童时代》一月号。

熟悉的面孔。授军衔的时候一共有三百几十位将军先后上台接受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每一次上台的人数是八个、九个或者十个，这是按照台下横排座位每一排编组的。上将就只有一组，其余的都是中将和少将。每一组接受了命令状就从边门走进后台更衣室，换上有肩章的新军服以后，又在台下出现了。全场用掌声欢迎他们。起先在他们接受军衔命令状跟刘伯承元帅握手的时候，整个会场也用掌声来祝贺他们。这里面有战友们互相祝贺的掌声，也有来宾们的感谢与祝贺的掌声。

受领勋章的军官一共有一百八十位。除了将军外也有少数的校官。这一次授给的都是一级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三种都受领了的将军只有几位，大多数的人只得到其中的两种或一种。勋章都放在精致的盒子里面，刘伯承元帅把它们一一递给走到台上来的有功的军官。将军们都穿着崭新的将军服，满脸光彩地跟刘伯承元帅握手。等到他们从后台转入会场的时候，左边胸前已经挂着金光灿烂的勋章了。刘伯承元帅开始授军衔的时候，我旁边一位女同志低声对我说："我要哭啦。"她说了两次，就用手帕去揩眼睛。我当时只有一种严肃的心情。可是后来我看见几位我认识的将军受领勋章的时候，我激动得厉害，我的眼睛里也有了泪水。我知道那些人的历史，也跟他们生活过一个短时间，我在他们身上见到不少好的、美的、善良的东西。他们每个人都走过长远的路，冒过无数的危险，受尽千辛万苦，为革命事业立下很多的功劳。他们都在艰苦的战斗中受过了锻炼。他们都

亲眼见过许多英勇的战友在他们旁边倒下，流出最后一滴血。他们踏过多少敌人的尸首朝胜利前进。有多少人们所想象不到的艰苦日子在这一天得到了报偿，有多少烈士的心在他们身上跳动。我觉得站在台上受勋的不止是一百八十几位军官，却是整个人民的军队，却是所有的祖国的英雄儿女。

我看见那位身材瘦小的河北泥水匠出身的中将，军服上挂着一颗解放勋章。他的额上脱掉一片头发。他告诉我，有一回一粒子弹打到那里，差一点拿走他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爱兵士的指挥员。他关心每一个战士的生活，他用全部精力组织每一个战斗。他生活得非常朴素，态度也十分谦虚，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国家立过功劳，却只想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多做一点工作。在任何时候他都发出爽朗的笑声，那一次我同他一起在朝鲜一个小山头看部队怎样打垮敌人的时候，也曾听到他的这种笑声。今天他应当更畅快地笑了。

我看见那位江西放牛孩子出身的少将。在抗日战争中他负伤躺在棒子田里几乎死去，全靠他带着血整夜爬行，才逃出敌人的虎口。他经历过那种人们难以想象的危险和艰苦。他为革命事业带病工作，累到通夜失眠，也不要求休息。

我看见那位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少将，在战斗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组织一切，用全力避免任何不必要的伤亡。我记得他在临津江前线同战士谈话的时候，那么亲切地为他们安排生活。他有时也皱起眉头来，那就是前线战士的艰苦生活使他感到不安了。

上面我不过随便举出几个例子。

这些人心里有许多东西，单单没有自己。他们整天想许多事情，就只没有想到自己。他们为革命事业曾经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且准备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使出全部力量。他们从来不想到酬报，他们都爱说：没有为祖国尽到力量。现在，我们祖国和人民给他们以应得的报酬了。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里射出来的还是谦虚的眼光。

亲爱的小朋友，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心，这样的品质，怎能不使人感动！看见这许多祖国的英雄，使人想起跟他们一起战斗过的更多的烈士。长眠在地下的烈士不能到台上接受国家给的荣誉了。想到这个，谁能不流出感激的眼泪！

然而这并不是可以悲伤的事情。活着的人更抓住我们的心。我们祖国有这么多没有私心的英雄，我们青年有这么多光辉的榜样。我们的国防非常巩固，我们的建设事业有无限的前途，我们人民有无限的前途，我们的小朋友更有无限的前途。所以我应当再一次地祝贺你们。

1955年12月在上海。

索桥的故事*

四川灌县二王庙山脚有一座索桥，叫做“安澜桥”。桥身有一里光景长，是用粗的竹索挽成的，竹索上面铺着一块一块的木板，木板铺得不整齐，中间还露缝。木板不宽，也不长，三个人并排走在上面，就不大方便。有的板上有洞，有的木板断折。人走在桥上，看得见木板下面岷江的绿水，也看得见桥下的砂石。冬天水少，桥显得更高，要是人在桥上走，眼睛只顾穿过缝隙望下面，就会看得头晕眼花。幸好桥两旁有竹索编的栏杆，即使人失了脚，也不会落到水里去。索桥并没有桥墩，高高的竹架代替了它们。架子比栏杆高，还有一个顶盖，在竖立架子的地方，桥身就像小山坡似地高起来，过了顶盖下面，桥身又往下斜，然后再向第二个顶盖升上去。

凡是到都江堰参观的人都要来看看索桥。那天我从山上二王庙下来，在索桥上来回走了两次。桥身微微地摆动，我往前走，桥也好像在往前走。一个乡下人挑着担子迎面走来，桥一下子动得厉害了。我走过他身边，加快脚步往高处去。忽然起了一阵笑声，两个小孩从高处跑下来，桥接着大大动了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儿童时代》第一期。

会儿。我连忙走上高处，又继续往下走。我刚走了一半路程，就停下来，站在栏杆前埋头看下面。我的眼光正落在"分水鱼嘴"上，我起初看不出来这个光滑的、鱼嘴般的"石头"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它是把岷江分为内外两条江的工程。这个"鱼嘴"在都江堰的前端，都江堰便是两千两百多年以前李冰父子在岷江中修筑的一条大堤。二王庙就是为了纪念李冰的儿子二郎修建的。

我看看"鱼嘴"，看看"鱼嘴"两旁数不清的砂石，我又往前走了。回来的时候，我把"鱼嘴"再看了一阵。"鱼嘴"依旧摆在那里，看一百遍也看不出什么变化。可是在它上面我好像看到了两千两百多年前人们的手和心。这个"石头"是会说话的。那许多用手建造了这个"鱼嘴"的人，虽然没有留下名字，可是留下了他们的心。就在离这里九公里的紫坪铺，在将近一公里长的河谷的两岸，上千的忙碌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心不是跟两千两百多年前那些人的心一样的么？大的水电站就要在那里动工修建了。

我走下了索桥，同来的友人刚看过山脚的一块石碑。他告诉我，这索桥又叫做"何公何母桥"，是清朝初年一个姓何的教书先生设计修建的。那个时候人们没法在这么宽的两岸上修一座桥。何先生想出了造索桥的办法。桥造成了，人们来来往往，感到便利。可是桥上没有栏杆，在摇摆的木板上走起来，并不是十分安全的事，不多久就有人失脚从桥上摔下去，死了。不满意何先生的官府把责任完全推到何先生的身上，将他逮捕处死。何先生的妻子决心要替丈夫雪冤，要实现丈

夫的真正的愿望，她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办法，用竹索在桥两旁编上了栏杆，从此危险的桥变成了安全的桥，使得三百年后的小孩也能够在桥上跑来跑去，发出一阵阵的笑声。

我不能说这个故事是千真万确，然而碑上的文字让我们看见了那一对夫妇的心。我走下索桥，满头大汗，不用说，我走得疲乏了，我的脚也开始发热。可是三百年前人们的心也给我带来温暖。那样的心，那种想帮助多数人、想跟多数人的心贴近、为了多数人甚至牺牲自己的伟大的心是不会死的，不管经过百年千载，它都会发光，就像高尔基在一篇故事里所描写的"燃烧的心"那样。勇士丹柯挖出自己的心拿在手上，心在燃烧、发光，给人们带路。"何公何母"的心给每一个走过索桥的人添一些温暖，甚至在三百年以后的寒冷的冬天，我站在桥头，还会揭下帽子当团扇来搧。

索桥的故事自然不止这么一点，都江堰也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然而故事是讲不完的，谁要是到都江堰走一趟，谁要是在索桥上站片刻，他一定会得到比故事更美、更好的东西。

1956年12月在成都。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二十年前一个秋天的夜里，我站在上海万国殡仪馆礼堂中鲁迅先生的灵前。半截玻璃棺盖下面现出他那清瘦的、慈祥的面颜，包着铜皮的棺木的四周都是芳香沁鼻的鲜花，他仿佛酣睡在万花中间。我默默地望着他紧闭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想着他对青年的热爱，对人民的关怀，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的心非常激动，我不相信他会死，我甚至疑心我是在做梦，我对自己说：他会活起来。

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情景。我仍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他没有死。他会活起来。的确，他怎么会死呢？二十年来，我每次想到他，我就感觉到他那强烈的爱，我就看到他那亲切的笑容，他给了我多少的勇气，给了我多少的温暖！他那抽着烟含笑谈话的姿态永远不会在我的眼前消去。

我不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我只是他的读者和学生。我很早就爱读他的小说，还带着他的作品走过好些地方。可是只有在他的最后三四年中间我才有机会跟他见面，而且我只有在他逝世的那天到过他的家。说来奇怪，我们见面的地方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中国青年报》。

都是上海的饭馆或旅馆。那个时候临时到租界上的大旅馆开一个房间，吩咐餐厅把酒菜送到楼上房间来，吃饭谈话都比较方便，杂志社有事情商谈，也喜欢到南京饭店或者新亚酒店开房间。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先生外，还有茅盾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不曾见过。我记得那天我正在跟茅盾先生谈话，忽然饭馆小房间的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噜嗦，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他从《文学》杂志的内容一直谈到帮闲文人的丑态，和国民党的愚蠢而丑恶的宣传方法。自然席上并不是他一个人讲话，关于每个题目，别的人也发表意见，不过大家都高兴听他的议论。后来谈到了林语堂，他说他曾经写信给林，劝林翻译点英国古典文学作品，林很不高兴，回信说等到自己老了，再做这种事情。鲁迅先生觉得林语堂写那种《论语》① 式的文章实在无聊，他诚恳地劝他搞一点比较有用的工作。……

这个晚上我不知道看见多少次他的笑容。我离开他的时候才注意到时间过得太快了。他给我的印象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竟然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平易、多么容易接近的瘦小的老人。我觉得我更贴近地挨到他

① 《论语》是林语堂当时在上海编辑的幽默小品的刊物。

那颗善良的心了。以后我还在同样性质的宴会上看见他一两次：话说得少一点，但笑容还是有的，人还是那么朴素，那么亲切，好像他装了满肚皮的好心好意，准备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分给接近他的人一样。只有那对明亮的眼睛有时候会射出仿佛要看透人心的光芒。

一九三四年我去日本之前，十月初文学社的几个朋友给我饯行，在南京饭店定了一个房间，菜是由餐厅送上来的。鲁迅先生那天也来了。他好像很高兴。他对我谈了些日本的风俗人情，也讲了一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由于语言不通闹的笑话。我听人说过他要去日本休养，问他为什么不去。他笑笑，说，“将来再说吧。”他后来对我说，到了那边，文章也得多写。我很感谢他的鼓励。饭后大家在房里闲谈，他谈起他的几个熟人被捕后的情形，好像也谈到适夷同志在南京的消息，他现出很关心的样子。谈到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时候，他的眼里射出来愤怒的光。

第二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有一天《译文丛书》的编委会在南京饭店请客，鲁迅先生和景宋先生都来了。他瘦了些，可是精神很好。他因为《译文丛书》和他翻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就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感到高兴。那时他正在计划翻印A.阿庚的《死魂灵百图》，我们谈起果戈理的这部小说，我就说，听说他要写一部关于中国旧社会和旧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希望他早点动笔。他仰着头，抽了一口烟，想了想，微微笑着说：“想做的事很多，总是做不完。”他还想写中国文学史，还想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那个时候我正在计划编辑《文学

丛刊》第一集，我对他说："周先生，编一个集子给我吧。"他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过两天他托一个熟人来通知我集子的名字和内容，说是还有三四篇文章没有动笔写，等写好就给我送来。这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短篇集《故事新编》。那时《出关》刚写成，他的身体又不大好，我预计他短期内不可能编好这个集子。哪晓得不久书店刊登广告说是《文学丛刊》第一集十六册在旧历年前出齐，鲁迅先生看见广告就着急起来，他对人说，他不愿意耽误书店的出版计划，他得赶写，所以在一个月内就把几个短篇全写好，编好集子送来了。几个月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又向鲁迅先生要稿，我说我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他要人带了口信来，告诉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陆续写了些文章。听景宋先生说，他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边，已经在作编《夜记》的准备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在十月十七日下午还去访问过日本朋友鹿地亘，十九日早晨就在大陆新村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夜记》还是景宋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代编的一个集子。每次我翻看这两本小书，我就感觉到鲁迅先生对待人的诚恳和热情，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我仿佛又看到他那颗无所不包而爱憎分明的善良的心。我的心充满了温暖，同时也受到了鞭挞。我常常拿他做人的态度来衡量我自己的行为，我不能不因良心的责备而感到痛苦。

我跟鲁迅先生见面并不止这几次，谈话也不止这一些。

可是我当时并不曾一一地记下来，现在也没法在这里重述了。其实关于他的言行，我听见的也不少，朋友们对我讲了许多。对于敌人他从来不妥协不宽恕，即使是跟熟人谈话，倘使话不投机，他也会拂袖而去。然而对于朋友和青年他却善良、亲切、关心到了天真的程度，他纵然上当一次，也并不减少他对新的青年的信任。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那个“义子”的故事，可是他仍然常常花费时间替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做种种事情，看稿、改稿、介绍稿子，甚至出钱替他们刊印作品。例如《奴隶丛书》中《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便是他出钱印的，他还为它们写了介绍性的序文。他做起工作来，事无大小，一样地严肃对待，不论写文章或译书，他选择一个字都不肯马虎。他编印一本书，批格式，看校样，设计封面，也都非常仔细。书印好分送朋友连包扎都要自己动手，而且一点也不苟且。他帮助过不少的人和不少的事业，好些小出版社都曾得过他的无私的帮助。譬如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是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以后的发展。他把几部稿子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后来出版社每次给他送版税去，他总要推辞几次才肯收下。文化生活出版社答应替他代印代发《死魂灵百图》的时候，他还先拿出七百元的印费让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来周转。书销完，书店把垫款还给他，他要在知道书店并无困难之后才肯收下款子。难道他跟文化生活出版社有特殊关系？完全没有。他不过是在帮助他认为是好的事业的发展罢了。倘使以后他发觉他的看法错了，他会跟它断绝关系，但是他不在事先提防。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即使上过了许多人的当，

他还是充满热情地信任别人。……像这一类的事情在这里是说不完的，而且也没有多说的必要了。

“鲁迅先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每次看见他，我就忍不住要在心里说这样的话。站在他面前，你觉得你接触到一个光辉的人格，他的光芒照透了你的心，你的一切个人的打算都消失了。你不能不爱他，你不能不爱他的思想，你会因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志而感到幸福，你会极力把自己变好来使他高兴……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他的笑容对我永远是鼓励，也永远是鞭挞。

1956年7月在上海。

悼 振 铎*

十月二十日我在莫斯科第一次听到振铎遇难的消息，当时还不大相信。最初苏联同志对我说十七日由北京起飞的图一〇四班机在中途失事焚毁，接着萧三同志偷偷地告诉我振铎就在这架飞机里面。我们都不愿意让代表团内更多的同志知道这件不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代表团正在办理飞机票登记的手续，就要搭图一〇四班机回国。但是团里的同志们在两天里面就从各种不同的来源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来消息完全证实了，几个朋友在一起偷偷地谈起振铎，我们谈得不多，但是想得很久。我们一路上都在想念他。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仿佛就在我们的面前，像他这样充满生命力的人，这样始终乐观的人是不可能死亡的。甚至在他的骨灰送回来以后，我和曹禺站在他的故居那两扇小红门前按电铃，我还期待着他走出书房来迎接我们，我还等待着他的一声爽朗的笑和一次紧紧的握手。

振铎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能忘记的人。我认识他将近三十年，我们常常见面，我们中间也有过争论，但是我一直敬爱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悼郑振铎同志》。

他。在他身边我觉得非常安全，因为他关心朋友，也能毫无顾忌地批评朋友，而且更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他为人正直、热情，喜欢帮助年轻人，鼓励人走新的前进的道路。三十几年来有不少的人得过他的帮助，受过他的鼓舞，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对人坦白，有话肯直说，我也常常受到他的批评，例如有一次他就责备过我近几年写作太少。然而我听得更多的倒是他推荐好的作品，讲别人的长处；对别人的优点他总是尽力表扬。他待人厚道（有时也不免流于姑息），朋友们谈起他，总说他是一个大好人。然而他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好好先生"。他一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于汉奸、特务、民族败类、帝国主义走狗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之类他决不宽容，决不妥协。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沪战失利的时候，他和几个朋友打算成立一个上海文艺界的抗敌组织，有一天在新雅酒楼召开座谈会，被国民党党棍和特务们夺取了会场，他不愿被坏蛋利用、愤然离开的情景我还分明记得。

振铎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我每次跟他见面，他的谈话中都流露出这种深切的爱。他曾参加过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做过救亡的工作。在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日子里，他写过许多抗议和控诉的文章，做过许多事情。在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他也曾坚守在文化岗位上跟日伪作过长期的斗争。

朋友们称赞振铎是一个"多面手"。的确他的兴趣很广，他的工作范围也很广。在文学艺术，甚至在文化方面他做过不少研究、介绍、传播的工作。他还写过不少的散文、小说和

诗。在解放以前，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常常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情。他唯恐他的工作受到阻挠，所以一有机会，他总是尽力多做。我常常听见他说："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应当做的事情太多，不努力做，不赶快做是不行的。"我也注意到他有时在工作中表现了粗枝大叶的作风。但是我不能不承认他气魄大，精力充沛，是一个永远不知道疲倦的工作者。

全国解放以后，他在党的领导下可以把自己的精力完全贡献给国家了。他担任了行政的工作，也接受了种种新的任务。他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渐渐地在改变，在进步。他常常心情愉快地谈到他现在的工作和将来的计划，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谈到祖国建设的巨大成就。他更乐观了，更显得年轻了。我最近一次看见他，他告诉我他要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到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去访问，我们约定在莫斯科见面。他谈到人民公社时，兴奋地说："人民公社成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快要实现了，我能够亲眼看见共产主义社会，我个人再没有什么要求了。以后得好好地改造自己，多多地做事情。"他当时非常高兴，他还谈到年底回国以后的计划，谈到明年即将在我们首都建成的几个大博物馆，谈到我们祖国建设的远景，他接连地发出了响亮的笑声。我带笑地对他说，他不仅可以见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他还可以活到一百岁，为国家做出许多、许多的事情。的确像他这样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始终乐观的人，在新社会中是可以活到一百岁的。我当时绝对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在莫斯科接到的会是他遇难的消息！

敬爱的朋友，你失去了四十年的光阴（再过一个多月你就满六十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你要是真能活到一百岁，那多好！我没法想象你最后一刹那间的心情。但是我想你是不会有遗憾的。你为祖国献出了你的宝贵的生命。你的许多未完的工作会有更多的人来接替，你的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你所关心的一切都会得到适当的安排。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都会继续飞跃前进，空前的文化大繁荣的时期马上就要到来。你静静地安息在八宝山的墓地上，你的爽朗的笑声永远留在幸福的中国人民的中间！

1958年10月在北京。

哭靳以*

上午我到了万国殡仪馆。院子里寥寥两三个人，台阶下一块黑漆木牌，上面写着两个白色大字："章府"。灵堂里只有一张方桌和几十把椅子。我知道你的遗体一时不会离开"化妆间"。我只是先来看看你的新居。我慢慢地走上台阶，又慢慢地走下来。我在阴暗的厅子里站了好一会，又望望院子，望望草地。几个钟点以前看见的你那张没有血色的脸在我的眼前现了一下，又隐去了。我好像在做梦。怎么我在这里见到了二十三年前我们两个人的脚迹！就是这个台阶、这个院子和这块草地，它们应该记得十几个青年作家抬着鲁迅先生的灵柩走下台阶到柩车前的情景，那么它们也不会忘记你和我吧，它们也会了解两个普通人的将近三十年的友情吧。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友情就不能再继续三十年？为什么偏偏该年纪较大的我来埋葬你呢？

台阶和院子一点也没有改变，连草地也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下这几级台阶。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和在艰苦斗争中逐渐发展的文学事业曾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文学》十二月号。

经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三年前鲁迅先生遗体迁葬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又在一起扶着鲁迅先生的柩车到新的墓地。二十年漫长的岁月使我的头发褪了颜色，在你的浓发中间也出现了好些银丝。可是我们站在鲁迅先生的塑像前，看见先生头上和身上一片灿烂的金色阳光，我们的心情多么舒畅。我们“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鲁迅先生安息在美丽的花园中，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日子”① 里。我们周围的一切不论是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都把我们的心系得更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要用最响亮的声音、最饱满的感情歌颂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歌颂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歌颂这些年中间数不尽的移山倒海的壮举和惊天动地的奇迹。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互相鞭策、互相激励，要贡献全部力量，做建筑社会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跟着时代前进，永不掉队。现在回想起我们这许多次的谈话，我还感觉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这些年总是你走在我的前面，你的声音比我的响亮，你的热情煽旺我的心灵之火，你的爽朗的笑声增加我前进的勇气。你的心里充满着那么强烈的爱，你的身上有那么充沛的精力，你的笔下绽出那么多的火花，你怎么能够默默地走向死亡？而且去得那么匆匆，那么突然，不留下一句话，也不让我们有时间跟你告别？

我不相信你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不相信你就永远放下了你那管热情奔放的笔！所有认识你的人都没法把“死”字跟

① 《幸福的日子》是靳以十年来散文选集的名字。《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是这个集子里的一篇散文。

你连在一起。每个看见你的人都感觉到你的身上好像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你的身体并不强壮，可是你的感情健康。人们看见你那么热情地为总路线欢呼，为大跃进欢呼，为人民公社欢呼，看见你那么兴奋地去工厂、下农村，写出一篇又一篇激动人心的散文和特写，听见你滔滔不绝地描绘新中国的光辉面貌和欢乐气氛，怎么会想得到三十三年前的老病仍然在蚕食你的肉体，怎么能够说服你躺下来休息！你并不像安东·契诃夫那样，知道病的可怕，便想尽方法掩饰疾病，不让亲近的人为自己担心；你轻视病，而且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意气风发的时候连自己也忘记了这个凶恶的敌人并不曾离开过你。你忽略医生们几次的警告，你用微笑回答朋友们多次的劝告。你相信自己的坚强的意志，你有决心要活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你那表示衷心欢快的满面红光和爽朗笑声，不但迷惑了你的朋友，也欺骗了你自己。我们和你都白白地错过了两次有力的警告（心力衰竭）。你第三次入院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也只是说："以后记住决不再晚睡早起。"（你指的是清晨五点钟起身，你两次发病都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你最后一次发病（就只有十六分钟！）以前几个钟头，你还对人说，你一两天便要回家。后来在你逝世前三个钟点，你还兴奋地跟住在隔壁房间的病友畅谈创作上的问题。谁想得到你就只有这么短促的时间！

你今年刚满五十。你毕竟比契诃夫活得久，还比他幸福，你终于见到了自己追求的新社会的光明，而且为这光明工作了整整十年。你为文学事业贡献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甚至

在生活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你也不曾放下笔；你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道路，才找到了党。你曾经因为写小说受到轻视，因为编辑文学刊物受到迫害。三十年来，你在生活的道路和创作的道路上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和打击，也有过丰收和胜利的喜悦，你始终严肃、诚恳地挺起胸膛向前迈步。有时你的步子跨得大些，有时脚步显得迟缓；有时头抬得高些，有时背略略弯下。但是我永远看见你在前进。解放十年来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你的心情越来越舒畅，你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你的感情越来越年轻，你的笔越来越有力。特别是在国庆节以前五六十天中间，你写得那么勤奋，那么畅快，你用了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调子，歌颂十年来千千万万无限美好的事物；你用了诗一样的激情的语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唱人民的幸福生活。你一口气写了十几篇好文章。差不多每隔一天你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一篇文章又写成了，另一篇的腹稿也有了。我称赞你写得多，写得快。你总是谦虚地带笑回答："不易啊！"有时候我们见面谈起来，你还会讲出你打算写的另一些小说和散文的内容，你讲得那么生动，那么愉快，那么自然，好像你的心里安装了喷泉，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流不尽，喷不完。我读你的文章，总感觉到作者从纸上伸出手来，紧紧地拉住读者，向前飞奔。你把你对新社会的热爱尽量地放在文章里面，你把读者全当作你的朋友，向他们倾吐你最深的感情。读你的文章，我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跟你在一起谈话，我也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在你的文章里充满的是生命，在你的身上充满的

也是生命。

你多么想活下去，你多么想好好地活下去。你常常说，过去你走了不少的弯路，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光阴，好不容易找到了东方鲜红的太阳，就应当全心全意为它严肃工作。你曾经大声歌唱："为了社会主义，不浪费一分一秒。"你多么爱惜在新社会里过的日子。你多么珍视这种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你又多么勇敢、多么坚决地保卫着它们。你一生爱憎分明，爱得深也恨得切，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从来不知道宽容，然而你又那么热烈地爱着一切为祖国生产财富、走在时间前面的英雄。谈起英雄事迹来，你眉飞色舞，眼睛发光，你讲得活龙活现，更显得你生气勃勃。你的热情常常给我很大的鼓舞，有时我兴奋起来，说："我们真该活一百岁，就可以做不少的事情。"你就带笑说："活一百岁也还不够，工作是做不完的。"有的人真愿意无穷无尽地工作下去。你应当属于这种人吧。没有人能够相信你的生命会在五十岁结束！没有人能够相信你那雄壮的歌声会突然停止！

但是你毕竟离开了你所爱的亲人，你毕竟离开了朝夕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你毕竟离开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你毕竟离开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的河山与英雄的人民。你离开了你所热爱的一切，静静地永闭了眼睛。你的妻女呼唤你的哀哀哭声都不能把你惊醒。我永远忘不了医院里的两三个钟头：天明以前的寒冷的夜，阴暗的大厅，轻微的人声，难堪的等待。为了不要叫出声来，我不能不几次咬紧嘴唇。我到过太平间，我又回到大厅。你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绞

痛了我的心。难道这就是诀别？难道这就是三十年文学生活的结束？难道一颗火热的心就这样无声地死灭？难道一个光辉的生命就这样淡淡地消失？为什么不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完成计划中的工作？为什么不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唱出更美丽的“热情的赞歌”？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得像钢一样向着锦绣前程飞奔的时候，全国文艺界欢欣鼓舞信心百倍地继续跃进的时候，偏偏少了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你！读者在等待你的新作，《收获》需要你主持、安排，各地文艺刊物编辑部纷纷来信向你约稿，作协的同志们念念不忘你的热情的语言和不知道疲倦的干劲，你的家属……你不能够躺在那里闭紧眼睛！

你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或忧伤的表情，你好像睡得十分深沉，十分安静。这不是死，这应当是长期的休息。你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因为你没有任何的遗憾，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你的愿望也已经逐渐地实现：你看见了阳光普照中国，“美丽的花朵铺满祖国辽阔的土地山河”；你终于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你留下了三十多册优秀的作品，它们将继续在读者心上开放灿烂的花朵。你并不曾白白地浪费了你的生命。我有什么理由在这里哭你！我有什么理由来打扰你安静的休息！

一年前，铎兄因坐机失事遇难的时候，你写过一篇悼文《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了解你的心情。倘使你现在还有知觉，你一定不愿意我在你的面前垂泪。我只好站在墙边默默地把眼泪吞进肚里。我没法制止它们，我在哭我自己的损失。以后到作协开会我再也看不到你亲切的笑容，电话铃响拿起耳机，再也听不见你那一声带笑的“怎么样”，翻开杂志再

也读不到你那些朴素而充满感情的文章，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再也得不到你的帮助和鼓舞……我不应当自私地想到我个人的损失。就在太平间里我还听见一个年轻的声音唤着“爸爸”。这个短短的哭声至今还在我的耳里激荡。我想起来了：你不是完全没有遗憾的。你的最后的思念一定在这个十五岁的女儿身上。你特别锺爱这个聪明的孩子，她也用了整个心灵爱着父亲。她是你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她也是你的病中最大的安慰。我看见她扶着保姆的肩头、困难地走进你的病房，也看见她靠在保姆身上缓缓地走出医院。我看见你们在书房里相对读书，也见过你亲切地对她讲你的一些见闻。这个活泼的孩子三年前突然得了“多发性神经炎”，在病床上躺了很长一个时期，到现在还必须扶着别人的肩头才可以走动。三年来，她的病耗费了你们夫妇多少的心血。你在病房里还常常为她安排生活。我每次在病房里看见你们父女亲密地谈话，我特别感到温暖。但是看见你们两个病人彼此关心，互相安慰，我有时也会痛苦地暗想：万一你有一天撒手而去……现在这个孩子终于失掉了父亲。在医院的大厅上和太平间里她显得相当安静，在家里她却哭得那么伤心。你的纪念在她的心上已经成为神圣的了。谁也想象得到你的逝世对她是多大的打击！……

但是你的悬念已经是多余的了，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时代中，在这个无限美好的新社会里，到处在开放爱的花朵，到处播送友谊的歌声。人们甚至可以为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献出自己宝贵的东西；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四面八方都

有人伸出手来援助。我们的社会里有的是健康的同情，有的是同志的友谊，有的是相互的关怀，有的是心连心携手前进。你心爱的女儿不会在悲痛中过孤寂的日子。她失去了一个她视作神圣的父亲，但是会有更多的父亲般的爱从祖国各个地方送到她的身边，帮助她，支持她勇敢地跟疾病战斗到底，保护她早日恢复健康，让她能够完全像同样年纪的女孩那样，过正常的生活，进行正常的活动；在集体的关怀下充分发挥她的精力，发展她的才智。那么她一定会成长为出色的青年，你这一生想做而来不及的许多工作都会在她的手里完成。你不仅活在人们的心里，你还会活在她的身上。你的南南，这个好心的孩子，为了纪念她所深爱的父亲，她一定能够坚强。你静静地安息吧，敬爱的朋友。

1959年11月在上海。

他明明还活着*

我拿起笔写哀悼靳以的文章，总觉得我是在做梦。电话机就放在我的写字台左面的小桌上，我随时等着电话铃响，总以为拿起耳机就会听见他的声音。我写的是第三篇悼文，①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亡。我的手边还摊开先前接到的沙汀的来信："刚才看报，知道靳以在七日逝世，我始终无法安静下来。靳以有心脏病，这我早知道，但从感情上说，这个不幸的消息，毕竟来得太突然了！"其实岂止远在成都的沙汀，就是我们几个和靳以朝夕见面的朋友，到现在还不大容易把"死"字跟他连起来。

靳以的确死得太快，死得太突然。十一月六日晚上九点钟他还高高兴兴地和隔壁病房的朋友谈话，睡下来到十二点，他打铃叫护士来，说是气闷，比上次厉害。护士马上给他接氧气，医生也赶来了，他只说一句："难过。"不久他就永闭了眼睛。一共只有十六分钟。没有一个熟人在他的身边。他没有一句遗言，也没有任何关于死的暗示，在逝世前几小时，他还对人说一两天就要出院。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他，是在他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收获》第六期。

① 另一篇是公祭仪式上的悼词。

世前三天的黄昏。他看见我就说："你以后不要再来，我过两天就要回家了。"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还在关心他主编的《收获》，还在考虑他的创作计划。在临死前三小时他和病友谈的也还是文学的问题。作协分会的同志正在打算以后送他到别处去疗养，他却一直在为文学事业打主意。没有人看见他因为病皱过眉头。

靳以是一个又直爽、又热情的生龙活虎般的人。在他的身上好像有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充实的生命。朋友们常常说："有了靳以，就热闹了。"或者说："靳以一来，空气就活泼了，大家的情绪就高了。"每次政治运动一开始，他总是精神饱满地站在前头，他不仅自己向前跑，他也拉着大家一起向前奔。他讲起话来，总是那么兴奋，而且那么愉快。自然他也有精神委顿的时候。不过这种时候很短。更常见的倒是他心情舒畅或者斗志昂扬的时候。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一个老青年，因为他有年轻人的激情和干劲。他坐不住，闲不了，他的口要讲话，手要写字；他喜欢做工作，也喜欢交朋友，帮助人。他越忙越高兴，精神越好。他一口气写了十五、六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他自己说：越写笔越畅快；越是多做工作，越是觉得自己年轻。

今年五月他的入党的要求批准了。他十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以后五个多月中间他特别高兴，工作得更积极，任何跟他接触的人都感觉到他的心在燃烧，他的确得到了党给他的力量。他精神焕发，声音响亮，不论是工作或活动，他都不知道疲倦；他自己忘记了他的病，也使得别人忘记了他的病。

他写的那许多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热情的赞歌，没有一行不渗透作者对新社会的热爱。每一段、每一句都闪烁着生命的火花。这些文章今天还在读者的面前放光发热。不认识靳以的人可能以为作者是一位年轻的歌手，或者冲锋陷阵的勇士。没有人能够相信"死"会轻易地把他抓去！

我看见他的遗容被棺盖遮没，我扶他的灵柩上了柩车，我看见墓穴被石灰填满，我也在石灰上面盖上了一铲土，我又向堆满花圈的坟头行礼告别。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亡。

这几天我一静下来，就想到靳以。不由我自己作主，前前后后将近三十年的事情，我都想到了。我还不是靳以最老的朋友，曹禺才是。但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也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在振铎编辑的《小说月报》某一期上，我和他写的两个短篇正好排印在一起，一个熟人介绍他来找我，我们就成了朋友。两年以后我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从文家作客，又见到他。不久振铎和他在北平创办《文学季刊》，我和别的几位友人在旁边呐喊助威。我后来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这是季刊编辑部，也是靳以的住家）做一个"食客"，帮忙靳以看校样，自己也写点文章。我在三座门住了几个月。每天晚上，对着一盏台灯，我们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工作到夜深。有时我们也放下工作闲谈，谈各人走过的道路和生活里的悲欢。他的正直、纯洁、善良、诚恳、直爽抓住了我的心。那个时候我们的文章里都带了点忧郁的调子，他的忧郁气更浓。在个人的感情生活里受到了伤害，他还没有完全摆脱那些痛苦的回

忆。我听他那些带着叹息讲出来的故事，我读他的小说《青的花》和《虫蚀》，我为他感到痛苦，同时也对他进过一些劝告。但是我看见他那么热心、那么负责地进行季刊的编辑工作，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的友情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发展的。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我们的友谊也越深。

《文学季刊》出到八期停刊，我从上海到北平帮忙他结束这个工作。那时他的母亲患癌症，在天津老家中痛苦地等待死亡。他整天待在家里陪伴母亲。他把全部感情寄托在母亲的身上，用尽力量想减轻她的痛苦。但是他的爱并不能征服死。他埋葬了母亲，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然而他的感情的负担去掉了，他的忧郁消失了，他的心情畅快了。一九三六年他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就显得精力充沛，心胸开阔，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在他的身上再看不到一点哀伤的痕迹。在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公司楼上一个小房间里，一张靠壁的条桌前面，他埋着头聚精会神地工作（写信，读来稿，看校样）。我坐在旁边一张破沙发上，有时抬起头看他，总觉得他正在昂头向着阳光明媚的地方前进。

《文季月刊》只出了七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毫无理由地明令查禁了，同时被查禁的还有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十二种刊物。可是靳以并不灰心，他马上就开始另一份月刊的筹备工作。四个月以后他编辑的《文丛》月刊就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了。这份小小的刊物给他引来了敌人的明枪暗箭，也使他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终于在朋友们的鼓舞和帮助下坚持到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的时候。《文丛》第六期已经打好

了纸型，却无法印出。半年后我们到了广州，才有机会让它跟读者见面。这一期上发表了他那首攻击华北宋哲元不抵抗的长诗《我的家乡》。这首诗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几天中写成的，可是一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有人读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诗句。

《文丛》在广州复刊后，从第二卷起改为每半个月出版一次。那些在上海常常像鬼影一般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文化特务和大小汉奸暂时离开了我们。不用说，在广州我们经常受到敌人炸弹的威胁。但是我看见靳以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兴奋，而且工作得更愉快，更努力。他自己写过这样的回忆："我们走到南方的大城，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敌人的轰炸也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我们是在敌人轰炸的空隙中间工作的，有时就是敌机在头顶上盘旋，我们也还在工作。那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工作的愉快，捧出了一本书或是一本杂志，衷心地感到做了一点事的喜悦。"我还记得在广州盐运西一巷的楼上，我们每晚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对坐在两张拼拢的写字台的两面，一边挥手赶走越来越多的飞蚁和蚊子，一边写文章、写信或者看校样、看来稿。靳以在为《文丛》工作，我是《烽火》旬刊的编辑。这两份刊物并没有被敌人的炸弹毁灭。但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军队在连日捷报声中送掉了广州，我靠了朋友的帮助在敌人进城的前一晚坐船去广西。靳以在前些时候也到了重庆，他说："到重庆时是初冬，我穿的是一身夏天的衣裳。"我的情形也是一样。至于刊物，《烽火》的原稿已经跟着

印刷局化为灰烬,《文丛》刚出完第二卷也就停刊了。

在重庆他开始走进了教育界。他的母校复旦大学聘请他教授中国文学。他当时还认为这是“自己所不情愿的工作”。他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收获。他后来才承认:“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从此他便有很多的机会跟青年们接近,受到他们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得到勇气,”和他们共同前进。他热爱这个工作,热爱和他朝夕相处的学生,热爱年轻人热烈追求的光明,和年轻人站在一起勇敢地跟反动势力斗争。他的文章的调子也更明朗了。一九四〇年冬天我在重庆看见他,我觉得他反而年轻了,话讲得多,而且有力量。

那个时候他还在继续写他三年前在上海开始的长篇小说《前夕》。同时他又在编辑《国民公报》的文学附刊《文群》。他每天仍然要分出一些时间来做写信约稿、看稿和写回信这一类的事情。他很高兴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他很高兴让更多的年轻人的文章在他编的附刊上出现,让年轻人的声音通过他更响亮地叫起来。

不用说,他越朝前走,越跟青年接近,也越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到一九四一年夏天他刚写完《前夕》,就被伪教育部解聘了。他不得不离开乌烟瘴气的重庆,到福建南平师范专科学校去教书。他在福建除了教书、写文章、打摆子以外,仍然积极进行编辑的工作。他主编过在永安出版的《现代文艺》月刊;他编辑过《奴隶的花果》和《最初的蜜》两册文学集刊;他

还和一个朋友计划在南平出版一种大型文艺刊物，创刊预告已经在报上发表，可是因为拿不到登记证，刊物终于无法出版。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他又从福建回到了重庆。

日本投降以后，他在一九四六年夏天跟复旦大学全体师生一起迁回上海。他准备在上海出版《文群》月刊。他已经做好了计划，也开始向朋友们约了稿。可是伪社会局一再留难，不发登记证，他也明白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心甘情愿让他编辑刊物。但是他并不灰心退缩，他始终紧紧握着文艺武器跟反动派斗争到底。他后来参加了《中国作家》(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编辑工作，又为上海《大公报》的读者编辑了《文艺》附刊。

解放以后，他的心情更舒畅了，精神更旺盛了。他用了这样的话歌颂上海解放的第一天："我的精神昂扬，大口地吸着清新的空气；我的心胸开敞，大声歌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我向着太阳走去，我想向每一个早起的人祝福，想和每一个相识的人热烈拥抱。"他并不是在说空话，他的确热情充沛、勇气百倍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从事各种工作，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担任过学校行政工作，也担任过文学组织工作，访问过山东老根据地，到过朝鲜前线，去过佛子岭水库，在长春汽车厂进行过采访，在国棉一厂找到了深入生活的基地……茅盾同志说他"直到最后一息还是跟着党在继续跃进"，这句话说得多么恰当。

不用说，他不会放弃他心爱的工作。的确，他在一九五〇年和五一年还编辑过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刊(那是周而复

同志在香港创办的），以后又为平明出版社编过一套《新中国文艺丛书》。一九五七年他接受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委托，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创办了《收获》双月刊。他为这个刊物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因为读者们的称赞感到喜悦。在编辑工作上他也曾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他始终依靠党的帮助，鼓足干劲，把它们一一克服。他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常常使我感动，同时我惭愧自己只是在旁边做一点摇旗呐喊的事情。我了解他一心一意要办好刊物，只是为着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添一点光彩，在万紫千红的百花园里做一名勤恳的园丁。他为每一期《收获》要看一百多万字的来稿。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批改《收获》的稿件。我最后一次在医院里见到他，他还跟我谈起这一期《收获》的内容。我告诉他，一位苏联朋友在最近一期《旗》杂志上发表了专门介绍《收获》的文章（《中国文学的丰收》）。他很高兴，接着说："我们应当把《收获》办得更好。"他没有留下别的遗言。那么这就是他的遗言吧。这就是他最后的愿望吧……

我没法在这里记下二十八年中写不尽的大小事情。我的笔只好停留在靳以的编辑工作上面。在他的将近三十年的文学活动中，这个工作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这个工作上，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文学编辑工作者。从一九三三年起，他接连编辑了十种以上进步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通过这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团结了很多优秀的作者，为新文学事业培养了不少的新人。今天好些作家的第一篇作品都是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家们谈起他，好像

在想念一位又亲切又热心的朋友。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我们文学事业花去的心血和付出的劳动，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心，他留下的优秀的作品和热情的赞歌……这一切都不会死亡。它们永远鼓舞人们勇敢地、热情地向着新的光明迈进，向着新的胜利迈进，向着共产主义迈进。

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死亡。他明明还活着！

1959 年 11 月在上海。

后　　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二十二篇长短文章不过是最近三年中我的一点小小收获。这些年我写的东西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止这么一点点。我这里指的是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以后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已经编在《新声集》(我的十年作品选集)里面了，另一部分虽然也曾在报刊上发表，但似乎没有重印的必要，我也不想花功夫去搜集它们。其实保留在这个集子里的二十二篇文章也不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佳作。然而我写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却常常放射光芒，连我的拙劣的文字也沾了光彩。的确像我在《新声集》序文中所说的那样，“时代太伟大了，生活太壮丽了”。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赞歌”，它也要蘸饱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我绝非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我有满腹的感情要倾吐，我有不少的见闻要告诉人，我有说不尽的对新社会的热爱要分给别人，我才拿起我这枝写秃了的笔。

这里的二十二篇文章就可以给我以上的话作证。我自己重读它们，我还觉得它们强烈地搅动我的心。甚至在这寒冷的静夜里我也有一种在暖和的阳光下面的感觉。并不是文章给我带来的温暖。是我们伟大的时代和我们英雄的人民在放

光发热。

干劲冲天的上海人民提早十六天完成了一百六十五万吨钢的指标，若干万青年工人提前进入一九六〇年……像这样的大喜事哪一天没有！我为这一切辉煌的胜利兴奋，欢呼。同时我为自己这一点不足道的收获感到惭愧：我居然大胆地称这个集子为《赞歌》，用这样无力的《赞歌》来迎接就要到来的光辉的一九六〇年。

时代在向前飞奔，中国人民继续在全面大跃进。我也得奋勇向前，哪怕是跑得气咻咻的，也要鼓足干劲赶上去。否则到一九六〇年底，我连这样的一本《赞歌》也编不出来了。但是我绝不愿意落在后面。

巴　金 1959年12月20日夜在上海。

倾吐不尽的感情

《倾吐不尽的感情》，一九六三年六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

致芹泽光治良先生*（代序）

在这个闷热的夜晚，我又打开了您寄来的美丽的小书。您的著作的名称《爱、知、悲》和您那像交出了心一样的恳切的文笔对我都显得非常亲近。我好像又听见您的声音了。我好像又坐在东京小泷町您那间小小的客厅里，吃完了拌着奶油的可口的草莓，喝着清香的绿茶，望着您满头的银发，倾听您动了感情地讲着的故事。前一天夜里在欢迎酒会上，我和您见第一面，刚刚谈起北京的春天，我就像见到了一位久别重逢的知己朋友。第二天下午在您的府上，您的生活的故事又对我敞开了一个正直人的火热的心，没有隐瞒，没有顾忌，您也早把我当成了亲人。巴黎的留学生活，在南京受苦的中国孤女，在济南被日军押赴刑场的中国青年，东京的轰炸……在这些激动人心的细节里我认识了一个正直而善良的心灵。从此您的仁善的面颜牵系着我的心，我高兴结交了您这样一位爱憎分明的朋友。今天我在您的二百四十几页的小说中，重读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香港《文汇报》。发表时题为《谈友情——致芹泽光治良先生》。

到那些将灾难、痛苦、挣扎和希望揉在一起的真实故事，看到（我应当用“听”字来代替“看”，因为您的声音犹在我的耳边，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友谊之声啊！）叙述中不断地出现的亲密称呼（可是您长我七岁，应当由我称您为“兄”），我的心好像又同您的心贴近了。您的心灵之火传到了我的心上。我浑身发热，我觉得我有那么多的感情，我需要把感情倾吐，将热发散。我真愿意和您携着手共同前进，您一年前的一句话“人民的喜怒哀乐，就是我们作家的喜怒哀乐”，对我有多大的鼓舞力量。我想起了去年初冬的等待，我们家已经准备好接待您这一位客人，却没有料到堀田善卫先生会给我们带来您患病的消息。而且您在作品的开头也提到您带病完成小说的决心。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离开了病榻；您是否可以实践您访问中国的诺言。我更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坐在您对面畅谈一切的机会。但是我相信未来，希望也绝非空虚。纵然您的愿望一时不能实现，两颗互相了解的心却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分开的。您“为酬答友情”而写的小说将化为催花的雨露，愿我们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变成肥沃的泥土，我们一定会看见千万朵美丽的友情的花。

友情，这个美好的字眼仿佛一枝神奇的画笔，多少动人的画面由它产生。两颗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两国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为着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事业努力——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有多少歌颂友谊的不朽诗文，在人们心中唤起了崇高的理想，可是像这样传之万代子孙都不会褪色的崇高理想还需要我们为它献出自己的精力和心

血。望着一片新绿的秧苗，谁不愿意呕心沥血在田野上多降些雨露，多照一点阳光。敬爱的朋友，像您、我这样的作家，即使不能做农人，也愿意做勤勤恳恳的园丁，我们的工作便是帮助生命的成长，摧残生命的一切灾害都是我们的仇敌。一年前我飞过东海来到您的面前，第一次紧紧地握着您的手，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使我们互相接近，有一种共同语言使我们互相了解，当时在我们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壮丽的景象：生命繁荣，灾害绝迹。我怀着求友的渴望来到你们的国家。崇高的理想并不曾欺骗我，我见到了那么多真诚的朋友，我又一次体会到以心换心的快乐。我衷心地感谢你们，你们像弟兄一样地接待我，为我安排了一个月的友谊的旅行。我把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访问称作"友谊的旅行"，因为在那一个月中间，我不仅生活得安适而愉快，我常常兴奋得好像心也燃烧起来。人民中间的友谊究竟有多么深，我以前不曾想过这样的问题。在你们那里，只要大家手挽手唱起《东京—北京》的友谊歌，越唱声音越响亮，眼睛越发红，手挽得越紧，围成一个大圈子的人越不想分开，哪怕是初见的人也感到互相吸引，没有一点做作，没有一点隔阂，仿佛一次见面就订了生死之交，一曲高歌便打开了彼此的心。我到过陌生的城市，却见不到一个陌生的人，我不说日本人面貌同中国人相似，我想说的是，常常有不认识的人向我伸出手，说着我心里的话。仿佛他们都有一把启心的钥匙，只消用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在那些兴奋、感动然而十分愉快的夜晚，我回忆我的一些见闻和经历，我才了解两千年的人民友谊有如汪洋大海，

它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人到了海的跟前才认识到海的庄严和海的力量；多跟海接近才明白海能够做多少事情。我在友谊的海洋里生活越久，我的幸福的感觉越深。浪涛的冲击不会使我沉到海底，它却不断地给我力量，让我鼓起勇气向远方的灯火前进。像这么深长的人民友谊一定能创造出许多、许多美好的东西。远方的灯火五光十色，多么吸引人！敬爱的朋友，您明白我所谓"远方灯火"并不是空虚的幻想。难道还有比人民的胜利更崇高的目标、更明亮的灯塔？我不会忘记，在您那间令人感到舒适的朴素的客厅里我们交谈过彼此的创作经历，尽管我们两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可是我们追求的都是那一星"远方灯火"，当初我只看见一星星，现在应当说是一片了，因为我已经走过了三十几年的路程，您的道路也不会比我的短。那时的远方灯火在我的眼前已经现出光辉灿烂的美景了。您和我都不曾把三十几年的岁月虚度，可是我们今天感觉到眼睛更亮、勇气更大，人民的胜利成了多么具体的东西，我们仿佛向前一举手就可以挨到它。我们的心和许多、许多朋友的心融合在一起，心在生长，心在扩大。它燃着友谊的火，要为万代子孙铸造幸福。

敬爱的朋友，我把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跟子孙万代的幸福联在一起，并不是我有意夸张。您曾经对我谈过您的一些经历和感受。您因为东京被炸，替自己的女儿耽心，便联想起南京孤女的命运。您亲眼看见无辜的中国青年在济南给侵略军押赴刑场，却不能救出他们，而深感痛苦。您绝不愿意看见这种惨剧在您的面前重演。我们也有决心不让这种惨剧重演。

这种惨剧是谁造成的？又是谁破坏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您一定看得十分清楚。这友谊的中断曾经给你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多少家庭残破，多少生命死亡，多少年轻人的幸福遭到毁灭，多少父母失去了他们年轻的儿女，多少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石川达三先生早期的小说中那些令人战栗的场面是每个有正义感的真诚的人（不仅是作家）所不能忍受的。我感谢这位正直的作家，他给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留下了确凿的证据。他那血淋淋的描写到今天还在提醒我们："要警惕啊！"那些努力想使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的人，那些千方百计破坏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人，正在进行新的阴谋，妄想用青年的热血来换取、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正在准备规模更大的血宴，布置比石川先生描写过的更残酷的场面。他们还想毁坏我们后代的幸福，仅仅为着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利益。

敬爱的朋友，共同的敌人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能够袖手旁观，让他们为所欲为吗？我的回答是："不能！"您的答复也不会是两样。您和我都比二十多年前更坚强了。友情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也给了我们无比的信心，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多么伟大的力量！我们紧紧地站在一起，就可以做出我们前人所办不到的任何事情。敬爱的作家，不要看轻自己的笔，有时候笔甚至比刀更锋利。现在真需要您这枝笔！我多么盼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敬爱的朋友，我的信不曾结束，我也没有得到您恢复健康的确实消息，我就离开了上海。在北京见到新从莫斯科返国

的杨朔同志，他高兴地对我讲起在莫斯科意外地见到了您，您的健康恢复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喜讯。不久我便和杨朔同志一路去东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大会。我以为在东京可以见到您，同您详谈别后的一切。我还梦见坐在您的客厅里对您畅谈自己的心情。但是我回国前在机场向人问起，听说您仍在国外。在东京我过了两个星期令人兴奋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然而我又一次失去了同您再见的机会。我不能说我没有失望，不过我并不灰心。果然我回到上海，您的信已经在等候我了。见到您的信就好像见到您本人一样。在您的笔迹上我看到了您在巴黎寓所中伏案握笔的姿态。我常常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后，夜深人静，怀念故人，拿出您的信来读一两遍，我会在您的亲切的字句上看到过去有一个时期我见惯了的"苦栗树和菩提树"，听到"清晨的鸟声"。波洛尼树林原是三十五年前我旧游之地。想不到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它还保持着从前的面目。你们父女在一起，这个"清静的"暑假，一定过得很幸福。幸好我没有早告诉您我重访日本的消息，省得您"缩短日程，早回东京"。否则我就难免破坏您和您小姐幸福的团聚了。

夜渐渐地凉起来，四周静得像在乡下一样。您的信和小说都在我的手边，就在这张铺着大玻璃板的写字台上。这是我回国后第三个月的开始，从我写头一句的时候算起，已经过了一百天了。我读到东京转来的您从巴黎寄出的信函，也有一个半月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您是在巴黎还是已经回到了东京；您是在"安静地思索文明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还是在

奋笔续写您那部“关于人类命运”的“大河小说”。我仿佛看见了您书斋窗内的灯光。中国的友人隔着东海在对您谈话。我的怀友的声音不可能达不到您的耳边。您先后寄来的书和信便是友情的信物。在这个秋天的夜晚，两家书斋的灯光又遇在一起，那个共同的事业，那个坚定的信念——“人民的胜利”像灯塔一样又把我们的笔、我们的思想引到一处了。我们的友情将在这里放射更大的光芒。敬爱的朋友，人民的胜利，这不正是您朝夕思索的“人类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么？这不正是您、我都在为之献身的美好的事业么？

夜更深，也更多凉意，我要暂时放下我这枝哓哓不休的笔了。从前常常被我手上的汗珠打湿的玻璃板在我的手腕下面显得冰凉，可是我的心仍然十分暖和。友情在我的心里燃烧。“远方的灯火”仿佛向着我靠近。敬爱的朋友，我忘记告诉您，我这次从日本带回来更多的朋友的心。我能用什么来量日本人民无限深厚的友情呢？我这个清静的书斋也变成了友情的海洋。我拿起笔就有一种力量推着我的手动。我停笔思索，眼前就出现了许多朋友的笑颜，那些热烈的、鼓舞的眼光好像在说：“前进罢，为着我们共同的美好的事业，为着万代子孙的幸福，我们手拉手、肩靠肩继续前进罢。”

我在这样的鼓舞下陆续写了十篇访问日本的文章。它们也是为着“酬答友情”而写的，所以我将它们编成一本小书献给您，同时也献给我在日本的一切朋友。我诚恳地请求您和朋友们接受我这个小小的礼物。我称它为《倾吐不尽的感情》，因为纸短情长，我写下来的不过是我的感情的百分之一、千

分之一而已。但是我的未尽之意您一定了解，我的整个心已经化作书页上一行一行的字献给您、献给所有我敬爱的朋友们了。

1962年10月20日。

我们永远站在一起*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羽田机场上飞机的时候，我站在舱口扶梯的最上一级，望着对面平台上栏杆前数不清的带笑的脸和狂挥的手，我提高声音接连地说："再见！"我几次挥动我的手。我真想跑下扶梯，跑到平台上，同朋友们再聚一会儿。可是人们在催我进机舱，接着扶梯也给推走了，最后飞机转了弯离开了地面。我坐在机舱内舒适的座位上，和我旁边坐的沙汀同志畅谈这一个月的愉快的旅行，我想排解压在我心上的惜别之情，却没有料到那无数只手一直把我的心拉向日本朋友的身边，甚至在三个多星期以后的这样静的深夜里，我还仿佛听见那些友情的声音，看见那些把我的心紧紧拉住的手。我什么也不曾忘记，连一首古老民歌的词句也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你明天要走了，
希望明天下起大雨来，
一天是不够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

最好一下就是十天八天，
十天八天的大雨也不够，
不如索性下起刀尖或者利箭罢……

这是在我回国的前夕，年轻的导演关口润先生在汽车里念给我听的。在我们访问日本的期间，那位年轻导演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都曾为我们出过不少力，我们跟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首先红了眼睛，掉了泪。对这样的朋友，我常常说，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在分别的时候，也会想到将来一定在美好的日子里常常见面的事情。然而正是这样的友情把我们和朋友们的心连在一起，人们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表达深的感情的时候，眼泪常常涌出来代替了它们。机场上并没有悲愁的气氛，送别的场面甚至比欢迎的场面热烈，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跟朋友中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会一直继续下去，而且是永远切不断的。我跟日本朋友分别的时候，不仅相信我以后有很多的机会再见到他们，而且我还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和他们始终站在一起为着共同的正义的事业努力，互相支持，彼此关心，永远不会分开。我知道日本朋友一定也有同感。那一个月中间在亲切的会见和融洽的谈话中，在欢乐的聚会和愉快的旅行中，我们和朋友们都不曾忘记未来的光明、美丽的远景，大家常常谈起它，梦到它。我的确感到了心连心的快乐。

我很难在机场上忍住眼泪。不但如此，在前一天我们的告别酒会上中岛健藏先生讲完话从台上下来，我走到他面前同他握手致谢，我看见他眼角的泪珠，我的眼睛也红了。在中

岛先生的泪珠里和机场上别的朋友的眼泪中一样，闪耀着未来的远景，那么光明、美丽的远景。我相信我们和日本朋友的友情一定会在那个远景中开花结果。所以我非常珍视这样的眼泪，而且我总是带着衷心愉快的笑容想起它们。

我坐在书桌前写以上的话，我觉得好像中岛先生就站在前面给我拍照一样，他胸前挂着他那两个照相机，眯起眼睛，露出和善的笑容站在我的对面。在那一个月中间我们常常称中岛先生为我们的长兄。他正直、诚恳、善良，又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热爱他的祖国，他也热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取得辉煌成就的人民中国。他的爱憎非常鲜明。他还有一股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的正气。我还记得那天早晨在箱根温泉旅馆小涌园的厅子里，我们对坐抽烟，谈到古巴，他严肃地说，美国人正在那里干坏事，但是不会久的，古巴人知道怎样对付那一帮人。过两天在东京他又笑容满面地为古巴人民的胜利跟我碰杯了。他是个忙人，他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做过很多的事情，他和那位不知道疲倦的历史学者三岛先生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我至今还不能忘记三岛先生指挥我们合唱歌颂“美丽的友情”的日本歌《东京——北京》的情景。有人说三岛先生从前寡言笑，可是他现在谈起中国，谈起我们两国人民的友情，却滔滔不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以后，日本主人招待各国代表访问京都，我们在东京上车，经过横滨车站，十多个人打着日中友好协会的两色大旗匆匆地跑到月台来欢迎我们，最前面便是满头白发的三岛先生。当时连谈话的机会也没有，火车停留的时间是那样短。三岛

先生一直热情地挥着手。后来他告诉我，他这天刚刚在东京机场迎接了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便赶到横滨来欢迎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有三个中国的代表团在日本进行访问，三岛先生作为好客而又热情的主人，他兴奋地到处奔跑接待来自远方的朋友。我们到镰仓的第三个夜晚，我和林林、君健两位参加了大内兵卫先生的便宴，回到旅馆已将近九点。我在“玄关”脱了皮鞋，走过客厅，三岛先生正在那里等候我们。前天晚上我们从金泽回来，他还在东京上野车站迎接我们，把我们送到开往镰仓的观光汽车上，现在他结束了两天的工作，又从东京赶到镰仓来，他熟悉这个城市的历史，准备陪伴我们游览这里的名胜古迹。他这一天还在大学里讲过课，前几天还参加过要求恢复中日两国邦交的游行示威。我关心他的健康，问他累不累，他笑着回答：“不累，孔子不是讲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的朋友来得越多，我们越高兴。”日本友人熟悉我们的古典著作，在甲府市一个午餐会上，有人站起来为我们朗诵了一首王维的七绝：“……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是用日本话朗诵的，他还说现在应当读作“多故人”了。“多故人”，他解释得多么好！在日本我们的确有那么多的知己朋友。他们的亲切的面颜已经刻印在我的心上，而且越来越鲜明。我任何时候都仿佛看见龟井胜一郎先生的恳切而友爱的笑容。他陪我们绕着壮丽的富士山访问了好几个城市，为我们安排日程常常工作到夜深。我们离开金泽的前夕，他因为周到地照料我们的缘故，左手的几根手指被一个华侨青年（小周）误关汽车门碰伤了，他让手指流着血安静地参

加我们和当地业余作家的座谈会。他的伤在医院包扎好了以后他回到旅馆，我们到他的房间去慰问，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谈得多么畅快，多么亲热，真像一家人似的。他后来甚至对我们说，他庆幸自己受了这点小伤，才有那样的欢聚。他还说那天下午和我们一路访问曾经进行过反对美军基地的英勇斗争的内滩渔民，看到美军基地的废墟，晚上又参加五百人的热烈的欢迎会，他的心情非常愉快，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我还没有机会拜读龟井先生的七卷选集和他的《知识分子的肖像》等著作，但是接触到他那优美、正直的心灵，我对日本的知识界不能不充满敬意。日本的知识分子今天正在严肃地考虑问题。日本人民去年连续二十三次规模巨大的正义斗争，在知识界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书斋，站在人民斗争的前列，要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更多的人走到十字街头，正在选择道路，要迈步前进。我昨天刚刚买到一本题作《日本人民站起来了》的画册，在显示斗争场面的许多振奋人心的图片上，我找到不少熟识的面颜。我又看见了文艺评论界的老前辈青野季吉先生，他年过七十，体弱多病，可是他那么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在亚非作家东京会议的前夕，他抱病出席日本协议会的酒会，走上讲台热情地举杯欢迎来自亚非两大洲的代表，第二天下午刚从医院出来他又赶到会场。他把参加这次会议当作庄严的任务，他因为会议的圆满成功而感到高兴。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他那间到处堆书、只能容三四个客人的小客厅里谈了一个多钟头。老人对我们解释他的信仰：知识分子离开人民就会走上毁灭的

道路。我们回旅馆的途中，那位给我们引路的日本朋友用尊敬的语调对我们说："青野先生是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长，可是他住的地方非常简陋。他自己并不在乎，他始终严肃地对待工作。"青野先生不止一次用充满感情的调子对我谈起他两次访问中国的印象，他接待我们好像在接待自己的亲人。那天我们上飞机之前在羽田机场休息室里，青野先生赶来送行，他坐在长沙发上，满面含笑地对到机场来的日本朋友说："我要同中国代表团一路到北京去。"要是他真的能够和我们同路去北京，那多好！今天我在上海的静夜里还仿佛看见他的布满皱纹的瘦脸，跟我在机舱内通过圆圆的玻璃窗最后一次望见的一模一样。我多么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到中国来度一个愉快的假期，接受我们的友谊和敬意。

在画册上我还见到一个对我十分亲切的镜头，那就是石川达三先生拿着传声器对群众讲话。许多四十上下的中国读者熟悉他的名字，并且通过《活着的兵》这本小说知道他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作家。石川先生给我的印象也正是这样。他在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上的闭幕辞和在共立讲堂群众大会上责斥小坂外相的讲话都得到十分热烈的掌声。有一个下午我和白羽同志到他家里谈文学，在他那间敞亮的西式客厅里，听他恳切地谈他的创作和作家的责任。《活着的兵》里面几个非常残酷的场面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它们像无数根针刺痛我的心。石川先生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右手按住沙发靠背，左手拿着纸烟轻轻地举起来，他用低沉的声调谈他一边流泪一边写那本小说的情形。他明知道他的小说会给他招来不少的麻烦，也

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可是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把真实的见闻隐藏在心里，经过一个时期的考虑，他终于发表了他的小说，而且吃了官司。石川先生对我们反复地严肃声明：他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写的，他任何时候都不曾忘记他对读者负有责任。他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光明、美丽的远景，给我驱散了二十几年前小说中阴暗的场面。我们回国的时候，他把我们一直送到机舱口扶梯前，最后一次紧紧的握手不仅表示了深厚的友情，还订了重见之约，第三次、第四次……见面的约。这样的友情是任何外来的力量所不能破坏的。

芹泽光治良先生也是我这次在东京结识的一位敬爱的朋友。他跟身材高大、身体强健的石川先生比起来，显得有点苍老了。然而他在精神上还是和石川先生一样的年轻。我在他的家里作客，他好像接待老友一样。他坦白地说他同龟井先生过去都是所谓没有倾向的中间作家。若干年前他在法国害肺病，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觉得有许多话要告诉别人，才开始写小说。可是他一再向我们强调人民的喜、怒、哀、乐，也毫不隐瞒他对北京的向往。他每一次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情。这种友情可以说是日本作家对我们的共同语言，友情可能有深有浅，但严肃和诚恳却是一样。

热情而讲话不多的白石凡先生在飞机的扶梯前和我们握手告别的时候，差一点儿掉了眼泪，这位长者似的善良的朋友，他为亚非作家的会议，为我们的访问，忙了许多天，也应该休息了。木下顺二先生从旅馆一直送我们到羽田机场。在机场上我没有见到阿部知二先生，可是我至今还想念他。刚才

我又找出来他和我在箱根小涌园美丽的院子里合摄的照片，他的脸上仍然露出他常有的笑容。我想起和他在箱根过的两天十分愉快的生活。到箱根来同我们欢聚的还有几位日本朋友，中岛、龟井、白石三位早一天回东京去了。阿部、木下两位和我们同时离开箱根。有一次我们谈到日本的现状，阿部先生非常激动，也很痛苦。可是我们谈到日本人民的斗争，谈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他又点着头愉快地笑了。我们离开箱根的前夜，晚饭后，他和木下先生还拉着我到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喝啤酒。我们谈到十点钟还不忍分开。大家重复着已经讲过多少遍的话，还觉得言不尽意。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情强烈地激动着我的心，我多么渴望这种友情开花结果的日子早日到来。

我相信那个美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而且不会在若干年以后。这是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我们两国知识界和两国作家共同的愿望。我和每一个日本朋友的谈话都增加了我的信心。藤森成吉先生的朴素客厅外的雨景，川端康成先生收藏的字画，大内兵卫先生家的美酒佳肴，土岐善磨先生阳光明媚的小园，井上靖先生美丽的积雪庭院……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十分鲜明。不论是阴雨连绵的日子，或者春雪飘飘的静夜，我们都和日本朋友在一起畅谈文学和友谊。我们已经把每一个友人的声音和相貌带回了中国。我没法在原稿纸上写下那许多、许多对我们十分亲近的名字。(我有多少感谢的话要向他们倾吐！)但是每一个朋友都在我的思念中。我永不会忘记他们。

我并不是一口气写成这篇短文。我只是在思念最深的时刻写下一点怀友的感情。我在文章里常常提到"静夜"，因为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伏案执笔。而且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也看到那个共同的事业的光辉，我也体会到那种像长流的水一样切不断的深厚友谊。现在日本人民斗争的烽火又熊熊地燃起来了。对我们两国的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胜利和幸福更美好的事业么？烽火越燃越明亮、越美丽，我们和日本朋友的手也越拉越紧。大家都在为那个共同的事业努力，我们和日本朋友始终站在一起，而且永远站在一起。我很喜欢那首民歌。但是今天用不着"下大雨"或者"下刀箭"来挽留像我们这样的客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永远、永远切不断的。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紧紧地拥抱你们。

1961年5月26日。

从镰仓带回的照片*

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傍晚，天空中出现了淡淡的红霞，连柔毛一样的雨丝也终于绝迹了。我满心希望见到明天早晨的太阳，还和朋友约好明天上午到虎跑去喝茶。晚上我打开关了几天的玻璃窗门，坐在写字桌前看书。忽然有什么小东西凉凉地贴在我的左手背上。我吃惊地抬头一看，原来手背上和垫在桌面的玻璃板上密密麻麻聚了不少的小雨点。

雨越下越大，不到一个钟点，窗前廊上居然有了荷荷的流水声。这么一来，我连书也看不进去了。窗门关上后，屋子里又很闷热。我便拉开写字桌的抽屉取折扇。扇子取出来了，可是我并没有用它。我在翻看同时拿出来的一叠照片。

照片全是今年四月在日本镰仓拍的，每一张上面都有我，不用说也有别人。我翻看它们，只是为了消除我心里的烦躁：我受不了好像永远下不完的雨。这些照片使我想起了两个月前在镰仓过的那些日子，它们还给我保留着春天的明媚的阳光；只有一张是在雨天里拍的，陌生人在这有花有树的照片上看不到柔毛一样的雨丝，可是我明明记得当时的情景。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上海文学》七月号。

和光旅馆客厅外面的廊子在我的眼里显得格外亲切。廊下绿草如茵的庭院里有过我不少的脚迹。我多么喜欢我们在镰仓度过的四个清晨。我趿着木屐，踏着草叶上的露珠，走下弯曲的石级路，一直走到那所小小的茶屋，有时在一棵发香的矮树前停留一阵，或者坐在干净、清凉的大石上享受暖和的阳光。我们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庭院中接待过许多朋友；敞亮的饭厅里常常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和融洽的谈话；我们坐在客厅里一张当中可以生火的小方桌的四周，和朋友们进行过多少次恳切的交谈（在那些时候我们作了整个旅馆的临时主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窗一柱、一桌一椅都是那种比酒更浓、比花更美的友情的见证。

我们在镰仓也曾遇到雨天。雨时大时小，从早下到晚。可是雨并不妨碍友情。有多少人打着雨伞来访问我们，我们也冒着雨走过不通汽车的泥泞小路，到朋友家作客。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就是在这个雨天来访问我们的。她在我们的小客厅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我只参加了最后两个小时的谈话。照片大概是在午饭后回到客厅之前在廊上摄的。有吉佐和子姑娘靠着一根廊柱，前刘海下面丰满的椭圆脸上还带着她常见的微笑。在东京我们不止一次、两次见到她的笑容。可是坐在镰仓和光旅馆客厅里小方桌旁边沙发上，她却微微埋着头、严肃地谈她自己的事情。美国人邀请她去“留学”，她住了一个时期，深深地懂得了种族歧视的意义，回到日本，马上学习中文，下决心要到中国访问，认识新中国。我见到报纸上的预告，她的一个长篇就要在日报上连载了（有人说不止一

个)。据说她还在计划写一部关于原子弹受害者的长篇小说。我知道她写过短篇，替广岛的受害者叫屈诉冤，在谈话中便提到广岛的惨剧。我一句话唤起了她许多痛苦的回忆。她的头一句答语就是："去年在广岛还有一百几十个原子病人死亡。"

去年！这是原子弹爆炸以后十五年了。在客厅里宾主五人中，除了正在讲话的客人外，只有冰心大姐到过广岛。她在广岛看见一所极其漂亮的大建筑物，说是美国人办的原子病研究所，可是从未听说哪一个病人在那里得过一点点帮助。

"是啊，美国人在广岛修了许多漂亮房子，想掩盖那个罪恶，可是广岛人不会忘记它。他们设立这种原子病研究所，不是来治病救人，只是为了研究病人的痛苦，拿病人来作实验，看原子弹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有吉佐和子姑娘依旧声音平平地、细细地讲下去，有时微微抬起头，左手始终放在右手上面，就像我现在在照片上看见的那样。微笑早已消失了，但是她好像把痛苦和愤怒全埋在心里，不让自己露一点激动的表情。不管这些，她的话通过翻译的口却成为愤怒的控诉了。翻译同志早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小方桌的一个角上，他坐在那里，常常提高声音，挥动拿铅笔的右手来表示他的感情。

"在广岛流传着种种的故事。据说，饮茶可以治疗原子病，又说喝酒能使原子病断根，所以有些人家连大带小拚命地饮茶喝酒。可是会有什么结果呢？我的一个短篇就是这样开头的：有人到广岛去探亲访友，看见主人发狂似地拚命叫孩子喝酒饮茶，觉得奇怪，主人便讲起原子病的情况来。"

声音仍然是平平的、细细的。然而脸色有了改变了，两道

弯弯的细眉微微聚起，看得出一种极力忍住的忧郁的表情。她默默地望着自己胸前叠在一起的两只手，等翻译同志闭上嘴摊开笔记本的时候，便把身子略略俯向前面，又说下去：

"我认识一位广岛姑娘，她生得非常漂亮。原子弹投下来的时候，她才七岁，今年二十三岁了。可是她不能不成天躺在床上。她站起来，走几步路，就会摔倒。稍微用一用思想，也会马上昏过去。她对我说，尽管她活得多么痛苦，可是她要活下去……"

虽然还是平平的、细细的声音，但已经带了一点控诉的调子了。廊子外面庭院中雨下大了，穿过那几扇玻璃门，我望见连绵不断的雨丝、雨线。单调的雨声跟她用细细的声音讲出来的故事连在一起，折磨着我的心。我不由自主地咬紧了下嘴唇。然而她又往下讲了：

"我还认识一对年轻夫妻。妻子也是个原子病人，结婚以后夫妇感情很好，却非常害怕生孩子，因为据说原子病人专门生畸形的怪物。后来妻子终于怀了孕。这个事实使她痛苦。她的丈夫拉着她的手，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又压不住自己的激动，他含着眼泪说：'你不要怕。你生罢，不管你生下来的是三只手或者一只脚，甚至没有鼻子没有嘴，我都一样地心疼它。我一定要让它活下去。我要抱着它走遍全世界，让所有的人知道谁在我们这里丢了原子弹，犯下这样的罪行。'……"

雨一直下个不停，洗净了的绿叶带着水微微打颤。有吉佐和子姑娘的声音也开始战抖了。这样的故事使她不能不动感情。在她的叙述里我仿佛听到那个未来的不幸的父亲战抖

的声音。多么强烈的爱憎！对于原子弹使用者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不是极有力的控诉么？翻译同志激动得厉害，他替那个勇敢的丈夫和未来的父亲讲话的时候，他站起来，动着两只手用力比划，好像要把那些话一字不漏地印在我们几个人的心上。

我感谢有吉佐和子姑娘，也感谢和我一路从中国来的翻译同志。这两个小时里面讲过的许多话使我知道了一些我应当知道的事。但是那些语音好像并不曾落到我们脚下的地毯上而消失，也没有让微风带到庭院中给雨打散。它们全挤在小小的客厅里，挤得满满的。连翻译同志年轻有力的声音也不能冲散它们。我越来越感到压迫，似乎它们一下子全压到我的心上来了。我闷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我不住把下嘴唇咬得更紧，我还把右手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我真想站起来，跑出客厅，冲到雨里，奔到街上，高高举起拳头，高声大叫："让人们好好地活下去！"

不用说，我仍然坐在沙发上，一面望着廊外下不完的雨，一面静静地倾听有吉佐和子姑娘的谈话，一直到雨由大变小，空中又出现了柔毛似的雨丝，一直到客人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我们告辞，我才离开了沙发。送走了客人，我也出去访友。可是一路上我仿佛听见这样的叫声："让人们好好地活下去！"不仅有我自己的声音，还有许多、许多人的声音。的确，许多、许多人已经高高地举起拳头大声叫过了。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人站出来"制止使用原子弹的罪行"。这样的罪行一定会给人制止！我们跟有吉佐和子姑娘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在她年

轻、美丽的脸上也看出来这样的信心。

以后我就不曾见到这位年轻的小说家了。再过一个多星期，我们离开了日本，每个人带回来不少的照片，而且还有比什么都珍贵的友情。……

一张雨天的照片使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其实这些事我一直不曾忘记。前两天我还对人讲过我在镰仓客厅里听来的故事。今后我得向更多的人讲到它们。

我差一点忘记了我在别处听到的一件事：有人在广岛市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看见一块纪念碑，说是广岛市市民建立的，碑文只有这么一句："我们绝不再犯这种错误。"他认为应当在碑上刻出一个人的名字："哈利·杜鲁门"。我这是道听途说，不知广岛市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块纪念碑。倘使真有的话，的确应当把碑文改写了。受了损害的人民究竟有什么值得刻在碑上的"错误"呢？要是真的让广岛人民来改写碑文，他们一定会大书特书："不准再犯这样的罪"或者"制止这种罪行"！

有吉佐和子姑娘会赞成我这个意见罢。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她就会告诉我关于碑文的事情。我相信我一定能再见到她，不仅是在她所很想了解的新中国一次、两次地见到她，而且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罪行的正义斗争中不断地见到她。不用说，她那部长篇小说早已完成，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了。……

我的烦躁完全消除了。尽管廊上的雨还是那样吵个不停，不让我打开窗放进一丝凉意，可是我满心愉快地想到了久雨初晴后美丽的蓝空。难道真有永远下不完的雨么？就让你

再猖狂地下一个整夜、两个整夜罢。我一定会迎接到我所期待的晴空万里的早晨。

我郑重地将照片放回在抽屉里，然后打开了折扇，拿着它从容地扇起来。

1961年6月15日在杭州。

忆青野季吉先生*

炉火在什么时候灭了。屋子里有了一点冷意。我从一本书上抬起头来，才注意到夜已经深了。我正在奇怪四周怎么会这样静，忽然听见了火车头的叫声，过了几分钟，车轮在铁轨上前进的声音也听得见了，而且十分清楚。但也只有一会儿的功夫，于是任何的大小声音都没有了。我燃起一支烟，望着自己吐出的烟圈，一面休息，一面在想一些事情。我想着，想着……我听见了一个多么熟习的声音。一个熟人在对我讲话，好像他就在眼前，好像他就坐在我书桌另一面靠壁放的沙发上。我指的是故青野季吉先生。这位杰出的日本文艺评论家离开我们已经半年了。我在两小时前开抽屉找东西，无意间翻到了他的照片，我注意地看了一会儿，依旧把照片锁在抽屉里。可是他的面貌一直留在我的心上，现在他的声音又在我的脑子里响起来了。仍然是八个多月以前我在东京听见的他那苍老的声音，他那恳切的谈话。他带着深厚的友情一次又一次地唤我的名字……

我的手拿着冷冰冰的钥匙，我又打开抽屉，取出青野先生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六月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倾吐不尽的感情》。

的照片来。照片一共三张，都是今年春天里摄的。第一张的背景是青野先生的书斋，青野先生正在谈话，我坐在他的对面，在我的右边还有沙汀同志；在第二张照片上，我们立在青野先生的门前，青野先生穿着木屐站在中间，左手插在西服袋里，右手拿着一根手杖，我和沙汀同志一边一个搀着他；第三张是我回国前在羽田机场休息室里摄的，我和青野先生坐在一张靠壁放的长沙发上，我的右肘略微靠着一张带柜的矮桌，桌上有一个美丽的人形给罩在玻璃匣子里面；藏原惟人先生坐在我右面那张单人沙发上。青野先生身边沙发上还现出三根指头，它们是另一位文艺评论家中岛健藏先生的，我记得中岛先生在这里坐了好一阵子，还常常拿着照相机到外面去。这些天他不知道消耗了多少胶卷，他好像想用他的相机把中国作家代表团留在东京。最后一张照片还是我回到了上海、白土吾夫先生来访问的时候当面交给我的，那时青野先生逝世不过两个星期，我看见照片，又想起那个动人的情景，我不能相信青野先生已经死去。现在就让我从这张照片谈起罢。

我怀着惜别的心情等候上飞机的通知。朋友们到机场来送别。休息室里容纳不了那么多的送行人。人们匆匆地走进来，紧紧地握一次手，短短地讲一两句话，用充满友情的眼光看了看我们，然后就退出去，站在大厅里。我听见他们在外面谈话的声音。这一个早晨我不知道和朋友们握了多少次手。二十六年前我离开东京到横滨搭船回国，对这个大都市我没有什么感情。可是这个春天的清晨我发觉我爱上了东京，因为我不愿意离开眼前这许多朋友。中岛健藏先生来了，三岛一

先生来了，龟井胜一郎先生来了，石川达三先生来了，白石凡先生来了，堀田善卫先生来了，木下顺二先生陪着我们从福田家旅馆坐车到机场。同这些朋友分别并不是容易的事，他们的友情牵引着我的心。藏原惟人先生来得较早，他后来才进休息室坐一会儿。我在东京常常见到他，他的语言、举止都非常朴素、谦虚；他对我们很周到又很关心，仿佛对待亲人一样。若干年前我读过他的文章，见了面我更感觉到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忠实朋友。当着他的面我没有讲过感谢的话，只有回国以后我同熟人谈起来，才表达了我这种敬爱的感情。白土先生摄影的时候，我并不曾注意，我多么感谢他送给我这个珍贵的纪念品。

我没有想到青野先生会来机场。我们一到东京，就听说他患胃癌。在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举行的欢迎晚会上我见到他，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见过他一面，不过五年的功夫他瘦多了，老多了。那天晚上他非常兴奋，拿着玻璃杯走上讲台，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祝酒。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大会会场，听说他昨夜回家忽然昏倒，给送进医院治疗。我们代表团送了一封慰问信去。我决定下半天到医院去探病。下午我先到会场，准备动身去医院，青野先生忽然拄着手杖来了。他走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来，我同他紧紧地握手，我们交谈了好几句话，还不愿意把手放开。这是我第三次跟他见面，可是我们好像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交谊。我敬爱他作为一个英勇、坚强的文艺战士，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把我看作从中国来的亲人。我为他的健康耽心，不敢找

他多谈，他却坐在中国代表的席位上热情地谈起话来。他对我谈起他若干年前到上海的情景。便衣侦探从日本一路跟来，到了上海，他居然设法摆脱了他们的跟踪。可是一个月后他搭船回到日本，刚上岸就给便衣侦探逮捕了。他谈起他当时看见的上海和他在一九五六年见到的上海。他要讲的话很多，从他的精神看来，他并不像一个病人。我多么愿意听他谈下去，然而我没有理由多消耗他的精力，过多的兴奋对他的身体并不适宜。我这时也看出他的病已深，不过绝没有想到他就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我当时的确有十分矛盾的心情，我一方面渴望多跟他见面谈话，另一方面又耽心我们的拜访会妨碍他的休息。后来大会胜利闭幕，我们在关西旅行后回到东京，听说青野先生愿意接待我们，我和沙汀同志便在四月五日下午到了他的家。我的登门拜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日中友协的越寿雄先生给我们带路。出租汽车的司机不熟习新的交通规则，我们的两部车子在东京郊外的小街小巷转来转去，我听见他说了许多次："真糟！"最后才在一条巷口停下车来。那天和我们同去的还有一位在东京华侨总会工作的朋友，两张照片都是这位华侨友人照的。我刚才还谈着在休息室里摄的那张照片，一下子却扯到前两张照片上来了。这原是我们的旧习惯：我们都喜欢按照顺序，从头讲起，那么我也只好照这样讲下去。

那个下午我们在青野先生的客厅里坐了一个钟点的光景。他曾经请人告诉我们，他的客厅窄小，容不了较多的客人。可是我们在那里感到异常舒适。这个朴素的客厅的确窄

小，然而光线多，书更多。靠壁的矮矮书架里立的是书，架顶上横着放的是书，地上堆的也是书。我坐在主人的对面，也就是坐在四壁图书的中间，喝着淡茶，望着青野先生满是皱纹的含笑的脸，听着他的略带颤动的苍老声音，我感到一种生死不渝的友谊，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热情。他一坐下，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来。青野先生并不像一个发表意见的健谈家，他很像是在对着亲人谈家常。他谈得很诚恳，也很坦率。他讲他自己，也讲了别人。他从架上书堆里拿出一本书来，这是他一位亡友的著作。这个人过去跟他很熟，年轻时候曾经同他一起追求过真理，可是后来走进了反动的阵营。他便拿这个人三弟兄做例子来说明知识分子的道路，一个兄弟出了家，另一个兄弟悲观消极，对什么也不相信，后来下落不明。他有感慨又有信心地说："知识分子离开了人民去找道路，除了毁灭外再也找不到什么。"他也讲起他自己的心境，讲得十分恳切。我后来读到他的遗作《文学的半殖民地》中这样的一段："从根本上动摇了我的旁观主义的是到中国和苏联的旅行。……一年前的反安保斗争是半殖民地化的日本民族空前的抵抗；对我来说，也是对盘据在我思想中的旁观主义、文学与政治分离主义、文学至上主义的一种半殖民地思想状态的反抗。正因为如此，我才不顾健康情况，不断走上街头"。我觉得我对青野先生当时的心境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更贴近地接触到了他的崇高的心灵。那天他还讲了许多话，我很后悔没有把那些深刻、精辟的议论记录下来。同来的朋友都说近来难得听见青野先生谈得这么多。我当时就有这样一种感觉：青野先生知

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要把心里的话尽量地讲给中国的朋友听。短短的一个钟点内哪里讲得尽？他不愿意跟我们分别，我和沙汀同志也不愿意离开他。可是为了照顾他休息，我们不得不告辞了。在我们离开之前，他还叫他在大学念书的小儿子出来跟我们见面。他用慈爱的眼光望着那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说："他已经参加了斗争了"。我很高兴见到这样一个接班人，我更高兴地想：青野先生还会活在儿子的身上。青野先生一定要送我们出门。我和沙汀同志便搀扶着他，立在门前，请那位挂着照相机的华侨朋友为我们留了一个纪念。

这以后不久我们又到外地去旅行，在镰仓，越寿雄先生送了纸来，说是青野先生要我写几个字作为纪念。我自小没有练过字，多年来用惯了自来水笔，拿起毛笔就胆怯，写下去总是歪歪斜斜，连贯行也做不到。然而为了报答青野先生的盛意，我毫不迟疑地俯在和光旅馆饭厅里的餐桌上，摊开纸写下了"坚定的文艺战士，中国人民的朋友"十四个字。饭厅外一片静寂，园子里草木的清香穿过了雨户的缝隙来就明亮的灯光。餐桌上还有几张笑脸，我们的日本朋友和华侨朋友正在为我们的旅行热心地工作。我们这些客人住满了这个幽静的庄园一样的旅馆。这里便是我们温暖的家庭。桌上又浓又香的红茶还在冒热气，日本朋友送来的香甜可口的小点心在灯光下显得十分亲切，它们也在陪伴我们度过这个美丽的春夜。我在这种几乎要使人的心融化的温暖气氛中写下青野先生的名字，忽然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是青野先生能够坐在餐桌前，和我们一起喝一杯热茶，谈几句话，那多好！那多好！

我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中，怎么能忘记青野老人那么坚定、那么深厚的友谊呢？

我们从镰仓到箱根，在温泉旅馆里见到好几位从东京赶来的日本朋友。他们带来了青野先生的亲笔信，邀请我们代表团参加十九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文艺家协会年会的联欢晚会。我们和几位敬爱的日本友人在箱根过了非常愉快的两天，十九日下午赶回东京，六点钟便到了会场。青野先生是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长，他作为主人在会场里亲热地欢迎我们。今天的晚会是为出席文艺家协会年会的会员和他们的家属举行的。日本友人很喜欢这种啤酒会。会上并没有长篇致词，也用不着正式发言，只消把主人和客人简单地介绍一下，就让各人找自己的熟人聊起来，或站或坐，有时谈得高兴也可以认真地谈问题，更不妨倾吐感情，但是也可以碰一两次杯，喝一两盅酒，交几位新朋友。会场里有不少张桌子，桌上除了花和酒，还有小点心。这个晚上不少的人端着酒杯过来跟我们碰杯。有好些人都是第一次跟我们见面，可是喝一杯酒，亲切地交谈几句，就好像认识了多年的旧友一样。当然也有人远远地望着我们，不敢过来找我们讲话，害怕引起便衣侦探的注意。

这个晚会有一个主要的节目“向这一年的七十高龄的文艺家献礼”。我听见宣读名单，有些人是我熟悉的，一九五六年和青野老人同到上海访问的宇野浩二先生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受到尊敬的前辈文艺家都站出来讲了话，他们讲得不多，可是很谦虚，又很诚恳。他们坐在会场的另一面，我和刘白羽

同志端着斟满啤酒的玻璃杯过去向他们各位敬了酒。我五年前在上海接待过宇野先生，我敬爱这一位参加了"松川事件"的英勇斗争、为无辜被告雪冤的文艺老战士。他愉快地跟我们碰了杯，接着非常友好地谈起他上次访问中国的旅行。他和青野先生一样，也希望再到中国，看看最近几年的变化。我们十分盼望这一年内在北京和上海接待这两位老人。根据我当时的印象，宇野先生似乎相当健康，我没有想到不过半年他们两位都永闭了眼睛，不能再为他们热爱的事业尽力了。

晚会上还有舞蹈表演的节目，这是一家大的文艺出版社向年会的"献礼"。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是寻常的。过去在我们的旧社会里，人家办喜事，也有人送来堂会节目。这个晚上的节目不少，出版家可能为它们花去一笔钱，不用说他更有可能在出席晚会的文艺家的身上赚到更大的数目。表演开始的时候，青野先生坐在七十岁文艺家的席上，以后便过来陪我们看节目。芹泽光治良先生一直坐在我的旁边。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和朋友们谈话，常常有人走过来向我作自我介绍或者给我介绍新的朋友。芹泽先生对节目也不感兴趣，他有时也同我谈点别的事情。青野先生讲话少，他好像因为这些节目感到痛苦。说句实话，节目教人非常失望，我们希望在这里看到优秀的日本民间舞蹈，却没有想到尽是这些美国方式的大腿舞。我待在会场里很不舒服。这个地方就是三个星期以前亚非作家东京会议的会场，二十个国家的代表在这里表达了十五亿人民的愿望，庄严地宣布：尊重民族文化是人民的神圣权利。芹泽先生和别的日本朋友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出版社

的献礼，事前没有看过，不知道会是这样的东西。我感谢他们的好意，我也了解出版社老板的欣赏水平；我和这几位日本朋友一样，我也相信优秀的民族文化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腐朽“文化”压倒！我们向主人告辞走出了会场。青野先生也跟着出来，他进电梯以前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十分激动地说他为这些节目感到羞愧。他的正直和真诚使我感动，他的病容使我耽心。我说了两句安慰的话，电梯就把他送下楼去了。

第二天我们代表团还请一位日本朋友向青野先生转达我们的慰问。听说他的身体不大好，我们还以为他不会到机场来。但是他拄着手杖慢慢地走进休息室来了。我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谢意，我说他的身体不好，应当多多在家休息。他笑着回答：“我应当来，我应当来。我不来送行怎么成？我还要到中国去啊。”后来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他一直坐到我们动身上飞机的时候。他讲话不多，他的愁容表示了他惜别的感情。然而他每次看见熟人进来，便带笑地说：“我要跟着中国代表团到中国去。”他一连说了好几次，好像这是真的事情。

我们终于不得不跟朋友们告别了。只有石川达三和白石凡两位先生拿到了通行证，陪着我们一直走到飞机的扶梯口。我跟青野先生分别的时候，我接连说：“保重，保重！我们一定会再见！”他说：“一路平安，我一定要再到中国看你们。”后来我们上了扶梯。我走到机舱口，还转过身向送行的朋友们挥手告别，大声叫着“再见！”，我数不清平台上那些不停地挥动的手，我望不尽那些含着眼泪微笑的亲切的面颜！青野先生也倚在栏杆上向我们挥手。传到我耳里来的那一片动人的

"再见"声中间也有青野先生的苍老的声音，我明明看见他的嘴在动。飞机起飞了。我靠着玻璃窗口还看见青野先生在人丛中不断地摇手！

"再见！"我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的手在玻璃窗内摇了一会儿。于是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三张照片使我想起许多事情，使我走了许多地方，最后我又回到我的书桌前面。烟灰缸里有不少的纸烟头，烟灰堆还在冒热气。我的手有点不灵活了，寒气从我的脚底慢慢地升到膝盖。可是我的心里暖融融的，我觉得屋子外面春天已经来了。多么温暖的友情！青野先生仍然活着。这三张照片一直在放散春天的暖气，而且永远放散春天的暖气。

1961年12月28日。

富士山和樱花*

一

最近读到一则路透社的东京电讯，说是有些日本科学家耽心富士山有一天会“崩塌”，会“失掉它的美丽的圆锥形”。虽然这里所谓“崩塌”，不过是“最高峰的一角垮下”，而且时间是在三五十年之内，但是这样的“预言”总教人感到不舒服。其实我对那些国家的通讯社的电讯素来缺少信心，我绝不会因为这种“危言”大做噩梦。然而一连几天，我只要在忙中安静下来，不读书，不看报，坐着休息，我便会看见那一把蓝天中倒悬的玉扇，那一顶盖满了雪的斗笠。我无法抹去眼前这个美丽的影子。我想念富士山。

我知道富士山这个名字，还是几十年前的事情。那时我很年轻，在成都的老家里常常听见两位到过日本的叔父谈起日本的生活，有一两次他们谈到富士山，还说日本人很喜欢这座山，而且把它当作“圣山”看待。这句话给我留下相当深的印象，可是他们当时不曾描绘富士山的形状，我也以为它和我见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上海文学》七月号。

过的川北的大山差不多，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过广元。总之，富士山并没有引起我的幻想。一九三四年年底到三五年初夏我在日本的横滨、东京两地住了几个月，不曾看见富士山的影子就回国了。我现在颇后悔当初白白放过了从容旅行的机会。但是我回想二十七八年前的心境，我又觉得即使美景当前，我那时也可能视若无睹。我没有理由责备自己。

去年我怀着不同的心情第二次到日本。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天朗气清，飞机快到东京的时候，一位朋友指着玻璃窗口对我说："看富士山！"我把脸贴在窗上，望出去。蔚蓝的天空中浮着白云，云片上面现出雪白的山顶，此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当时只觉得它美，也没有功夫思索它究竟像什么。我的思想正萦绕着那些在东京等待我的友人。只有过了几个月，我在黄山休养，无意间听见朋友念一句日本诗人写的汉诗："玉扇倒悬东海天"，我才想起再没有更恰当的比喻了，我那时看见的确实是这样的一把"玉扇"。

到了东京，我们受到热情的招待。朋友们给我们安排的日程并不十分紧张。日本的主人善于体贴客人，他们懂得怎样教客人过得舒服，过得像在自己家中那样的随便。我们有时间看，有时间交朋友，有时间想，有时间休息。东京变了，我找不到我熟悉（其实也不能说熟悉）的那个城市了。我似乎更喜欢从前的东京。但是过去在这个大都市我有几位朋友呢？我有什么愉快的回忆呢？人也变了。我接触到许多日本朋友的心灵，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即使我不喜欢那些像爬虫一

样塞满了每条大街的各式各样的汽车，听不惯夹杂在漂亮的日本话中间的英文字句，我却不能不称赞纯洁、美丽的樱花，而且更不能不称赞纯洁、美丽的心灵。在那些春天的夜晚，我告别了殷勤的主人，带着友情的温暖回到旅馆的房间，关上门静下来（我们最初住在西式旅馆里，后来住的是纯粹日本风味的客舍，不管我的房门上写着号码，或者挂着“朝雾”、“红叶”、“竹”、“菊”一类的木牌，不论是关上装了弹簧锁的门，或者拉拢纸糊的屏门，我都有一种松弛的感觉），我或者躺在睡榻上，或者盘腿坐在席子上（有时还加上坐垫），我会想起那个美丽的山顶，蔚蓝的背景上现出的雪白的东西。我还会想起那一大片素净动人的樱花。想着美丽的东西，使人心旷神怡。在东京想着这样美丽的山和美丽的花，我觉得我的心跟日本朋友的心更接近，我以为自己更加了解朋友，也更重视我们之间的友情。当这种比酒更浓的友情使我沉醉的时候，我甚至会把这三者揉在一起。据说有些日本人欣赏樱花的“瞬间美”。樱花开时一大片，不到几天经过一夜风雨便是满地落英，人们从这里看到“人生的短暂”。这可能只是少数文人的想法，而且是早已过去的事情。在我的眼里樱花却是开不尽的。一九三五年我在东京看过盛开的樱花，二十六年以后，我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樱花却开得更繁而且更美。所以不仅富士山的美是永久的，樱花的美也是永久的，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美丽的友情也是永久的。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去年那些美丽的春天的夜晚。

二

我刚刚读到东京友人龟井胜一郎先生的优美的文章《北京的星星》，他提起我们去年四月“到富士湖、甲府、松本、长野、金泽等处的旅行”，许多亲切的回忆给唤起来了。我书桌的抽屉里还放着一大叠照片，它们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好的纪念品，我喜欢不断地翻看它们。这些永不褪色的照片是会讲话的。有时夜深人静我在台灯旁边摊开照片，就仿佛听见一些动人的故事。照片上樱花不多，更看不到富士山顶。可是在这次友谊的旅行中我们却饱看了富士山，也饱看了樱花。我至今还陶醉在这种美的享受中，所以会失去推敲字句的冷静，我刚才用了一个“饱”字，其实富士山和樱花哪里是看得饱的？何况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天！那么我怎样会想到一个“饱”字呢？我细细地回想，在那个晴朗的春日，龟井先生陪着我们坐“观光车”、乘游艇，在富士山近旁几乎走了整整一天，有时绕着山走，在车上听见导游员的清脆的声音，把头掉向窗外，眼光越过繁茂的树木，我看见了戴雪帽的山峰；有时在湖上舟中，抬起头便望见白头的山，明镜般的碧绿的水面又映出了富士的倒影，好像有什么精灵在水里微微摇着这把绝大的白玉扇。以后我还有机会几次看见富士山，我也听到了一些关于它的故事和歌曲（年轻、秀美的导游员都是唱歌、讲故事的能手！）。过了一年，故事和歌曲都渐渐地模糊了，只有“雪笠”和“玉扇”般的富士山同长兄似的龟井先生的面颜还时时出现在我的眼

前。尽管我看见的只是富士山的一个面目，尽管我没有机会攀登山峰，尽管我没有能将一两个故事和一两首歌牢记在心上，但是我仍然有这样一种感觉：富士山对我是十分亲近的，我仿佛很早就认识了它。

龟井先生说，他第二次到北京，在机场上和朋友们握手，马上"想起了大家一齐游览富士五湖时仰望富士山的情景"。我还记得去年七月在上海龙华机场第二次迎接他，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我的脑子里也出现了富士山雪白的峰顶，好像我们的旅行还不曾结束。那一回我们在一起只游了两个湖，主人不愿意教客人过分疲劳，在日程上留了余地。我也说，将来找一个机会再来同日本朋友痛快地游一次。我们都相信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留下了三个湖。但是我们去了"万能风穴"。我事前不了解这是什么样的地方。我跟在朋友们后面走下去，看到了冰，感到了凉意，然后慢慢地走上了斜坡。地上尽是滑脚的泥水，上坡下坡都不容易，不小心就会摔倒。可是大家笑得多高兴。我手边还有两张照片，在头一张上面，我俯下头撩起薄大衣正朝上走，另一张上我已经走上了坡，两只手插在大衣袋里。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在笑。龟井先生在我的前面走，他的脸上也有笑容。而且这笑容和我在上海机场上见到的差不多，这便是我们常说的表示心情舒畅的笑容了。关于"风穴"我所能记忆的全在这两张照片上。我静静地望着它们，我仿佛听见一年前的笑声从四寸的照相纸上透出来。我和龟井先生在一起的愉快旅行的确没有结束。"风穴之游"以后三个月，我和他在上海大世界杂技场中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夏夜，看见了他几次的笑容，不仅他在笑，其他四位日本朋友也在笑，我也满心高兴地笑了好几次。这一夜的笑声也只是一个开端，我和日本朋友在一起谈笑的日子将来绝不会少。我还要践约同亀井先生重游富士五湖。不用说，到那个时候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种种人为的障碍都已经消除了。亀井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为了迎接这样的日子早一天到来，他们在继续不断地努力。我感谢日本朋友的厚情，我也要为这一件大事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不曾到过亀井先生的府上，①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省线电车上或者火车车厢里，车子在前进的时候，亀井先生忽然指着窗外告诉我，他的家就在这附近。我来不及抓住任何一个特征，我只记得他的家在树丛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大概不会太远罢。可是现在读到他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他在东京郊外井之头公园附近的书斋里写稿子。同样的静静的夜晚，同样

---

① 我写了这段话，不出两个月便有了登门拜访的机会。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闭幕以后，八月八日的下午我和杨朔同志在亀井先生的幽静、古雅的日本风味的客厅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已近黄昏，可是小小园子里茂盛的灌木和古老的石灯微微带上暮色显得格外动人。亀井先生还拿出他访问中国的新著《中国之旅》分赠客人。的确是一本非常美丽的书。作者还是一位业余的画家，亲自为他的访问记绘了一些朴素可爱的插图。我捧着礼物离开客厅的时候，亀井夫人还为我们点燃了蜡烛，放在石灯里面，让摇曳的烛光送我们走出大门。亀井先生把我们从这里引到“食道横町”的菜好饭香的“秋田家”，中岛和白土两位老友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在楼上一间小屋子里待了将近三个钟头，不仅酒足饭饱，而且无所不谈，既融洽，又畅快，热烈友好的气氛使人陶醉。我常说：“友情浓于酒”，我真为友情所醉了。我至今还因为这个美丽的夜晚感谢中岛和亀井两位敬爱的友人。（1962 年 10 月 24 日注）

的静静的书斋，他的家和我的家中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好像我的窗口就对着他的窗口，我们正在亲切地对谈一样，好像我的窗下院子里开着一大片樱花，好像天空中现出富士山的雪顶。我在上海想念日本的友人，仿佛日本的美好的东西都移到了我的眼前。

三

关于富士山我的知识实在有限。我从日本带回来两样可贵的礼物：一是收在《岩波写真文库》里面的《富士山》；另一件是一幅题作《清澄之秋》的日本画。摄影集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赠品，全是很出色的摄影，既清楚，又好看，有些画面非常美，从富士山的情况、它的历史、它的气象、山上的动物和植物，一直讲到登山的人。在这本摄影集上不仅可以看到富士山的许多面目，还可以看到那美丽的"笠云"。我喜欢这本小书，近几个月中我有时空下来，翻看它，常常感到艺术享受般的满足。可是我现在也不想抄书，我觉得我眼见的比一切的摄影美。《清澄之秋》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举行告别酒会时、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我的。从画题便知道画上有富士山的秋景，雪白的山顶跟我在春天看见的相近，不同的是山顶下的颜色，那几笔说明季节变换的紫色便是艺术家精彩的加工了。我手边还有一幅彩色木刻，是富士三十六景之一的"山下白雨"，这是访问上海的日本友人的礼物。画面上有浅蓝色的天，白色的卷云和高耸的山顶。倒悬的玉扇不见了，只有圆锥

形的顶上还有一点积雪，接下去是好多股火一样的红光，红光中露出数不清的黑点，再下面便是一片浓黑。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富士，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从哪一面我可以看到这样壮丽的画面，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幅木刻，我觉得它比我眼见的更美。我不断地注视它，我忽然想起了一位日本诗人的诗句：

愤怒罢，富士，
要真心地愤怒，
我们民族的山呀！　　——（山岸外史）

像喷火一样的有力的诗句很恰当地写出了今天日本人民的感情。我在那一个月友谊的旅行中也深深地体会到日本人民的“真心地愤怒”。我在仰望富士山峰的时候，常常想起当代日本诗人的诗句。另一位作《富士之歌》的诗人唱道：

很久
我忘了喷火
可是现在，即使在雪层下的胸膛里
炽热的火也在乱窜……　　——（大岛博光）

富士，这座静止的火山，三百十三年不曾喷火了。但是有一天在它充满“真心愤怒”的时候，谁能说从那积雪的山顶不会喷出血红的烈火来照彻日本的暗夜呢？到那个时候，一切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魔鬼，同玷污了这座“圣山”的任何军事基地和打靶场，都会化作“山下白雨”而消失在土里了。我想着这个壮丽的景象，我不觉十分兴奋地高声念起我们的老友

鹿地亘先生的诗来：

祖国的早晨亮起来了！

富士哟，照着晨曦，现着蔷薇色，

灿烂地照耀罢！

诗人的预言才是真正的预言。富士山绝不会“崩塌”，它将“照着晨曦”，沐着火似的红光，显得更加美丽。

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新的富士山的雄姿。

四

我昨天接到龟井先生从东京寄来的信，讲起他已经写完了十三万字的中国见闻记，信里还有这样的一句：“在日本现在是樱花落尽、一片新绿的时候了。”我又翻看他的文章《北京的星星》，我的思想在下面一句话上停留了好一阵子：“我想起了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诸位在金泽市兼六公园的樱花树下散步的一天。”友谊的语言的确是共同的。我的思想和朋友们的思想常常走到同一个地方。我们不论作文或者谈话，都喜欢提到樱花，因为樱花和富士山都是我们友谊的见证。兼六公园中樱花树上早已绿叶成荫，我们的脚迹也早给去年的春雨冲洗干净，可是我们在树下闲步时的愉快心情至今并未减淡。在怀念友人的时候，在把深厚的感情寄托在文字上的时候，我和日本朋友都会看到我们在一起欢聚过的地方。兼六公园的樱花因为有了在树下散步的看花人才显得更美、更令人难

忘。同样，我因为有了三岛一先生作伴同游，而更爱镰仓的街市。但是我对樱花早就有了感情。在我的院子里竹篱边便有两株樱花，这是我七年前用二十元的代价买来种上的。两株花品种不同，却一样长得好，一年一度按时开花，而且花朵不少。今年花开较迟，但即使在花开的时候，我从窗口望出去，篱边也还是一片绿色（篱下点缀了几朵红色和白色的月季）。樱花品种很多，我也见过不少，去年在日本我从京都琵琶湖畔看起，然后看东京宫城外的、青山公墓的，再后去富士五湖，长野县，一直到文化古城金泽市，一路上不知道看了多少种樱花。各地气候不同，花开也有迟早，我们眼前全是盛开的花朵，好像樱花也怀着友情来欢迎我们似的。有时一片粉白，如云似雾，枝柯相接，排列成行，或者花繁似海，树多成林；有时一株两株静静地立在路旁和水边，或者从矮墙内撑起了素白的伞盖。日本朋友对我讲过许多樱花的名字，可是我记住的不过四五种。我说不出我家里两株不同的樱花叫做什么。它们都是先发叶后开花，所以盛开的时候，树上也是绿多于白，跟我在日本见到的不同。我又忘记向几位日本朋友（龟井先生和三岛先生在内）请教，他们到我家里来作客都不是在樱花开放的时节。然而樱花总是樱花，花朵倒是一模一样，它们虽然不能给人引起轻云浅雾的幻觉，可是那种素净的美却是保存着的。我在自己家中有机会一年一度地欣赏樱花，这是一种幸福，我不仅可以重温友谊旅行的旧梦，我还有和日本朋友重聚的快乐感觉。一年来我对日本朋友不知说过多少次："我们之间的友谊像长流的水一样是永远切不断的。"这友谊也像

樱花一样是永远开不尽的。就以我这里的两株樱花为例，它们一年比一年高大、一年比一年茂盛，不过短短的几年，它们就长成大树了。

五

我第一次看到樱花是在一九三五年，在樱花烂漫的一个星期日，我和一位中国朋友带了一些点心到东京上野公园去玩了半天。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两个在一株樱花树下，坐了一阵，又躺了一阵，把带来的东西吃光了。看见日本人带了全家老小，在树下喝酒谈笑，唱歌跳舞，十分高兴，我非常羡慕。可是我们无论如何提不起兴致，尤其是我，前几天无缘无故给刑事们（日本便衣侦探）从宿舍带到警察署、从半夜关到下午四点，即使遇到这样可喜的节日，见着这么可爱的风俗，也不会兴高采烈。去年四月二十一日我重到上野，节日早过，花也落尽，公园里冷冷清清。木下顺二先生殷勤地陪伴我们，同路还有几位华侨朋友。（刑事先生当然是少不了的，他们一直为我们的安全“操心”，人换了，面目似乎也变了，他们对我显得很有礼貌，最后还把我送上飞机，鞠躬而别。）我们匆匆走出公园，我忽然想起当年樱花节的情景，我颇后悔错过了眼前的机会。要是我这次和朋友们一起在公共场所欢度节日，我一定有新的感受和深的体会。短短的一个月中间我们去过不少陌生的地方，到处都有很多陌生人向我们露出笑脸，伸出友谊的手。我没有想到会结交那么多的朋友。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

多的人向我们表示真挚的感情。我们旅行的时候，火车每到一个站，刚刚停定，便有人在月台上打着小旗敲我们座位旁边的玻璃窗，人越聚越多，车窗刚刚向上推起，许多只手马上朝我们伸了过来。热烈的握手之后便是《东京一北京》的歌声，人们在月台上胳膊挽胳膊地唱着，一直唱到火车开动，而且好些人的眼睛里出现了发亮的泪珠。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我怎么不愿意分享日本人民节日的欢乐呢？我只好把这个愿望寄托在将来了。这并非无可奈何的想法。我对将来的信念倒是很坚定的。

我写到这里，正打算停笔，我的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画面。我无法把它记录在稿纸上，它一掠就过去了。我只有这个印象：绿树丛中高高低低浮起一片一片的白云。樱花不会移动，是我坐的小轿车正在旋转下山，樱花便开在坡上。这是我们离开金泽市的早晨从旅馆出发的情景。旅馆在山上，附近有很多樱花，主人为了让我们欣赏带着前一天的微雨、在朝阳里发亮的花朵，吩咐司机从另一条路下山。我们一行十一辆小车沿途饱看风景，从容地开赴车站。我无意间向司机问话，才知道全市出租汽车公司的几百个司机这一天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为了保证按时送我们到站，司机们昨天夜里开过紧急会议将决定了的罢工时间推迟一个钟点。没有其它的理由，我们是从人民中国来的客人，这就够了。他讲话不长，可是讲得很自然，好像在叙述一件极寻常的事情。我在火车站前下车，和这位司机握手告别，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我讲一句短短的“谢谢”，祝他们的斗争胜利；他讲一句短短的“再

见”，祝我们旅途愉快。他的手是那么有力，他的微笑是那么真诚。事情过了一年多，我现在拿笔的手似乎还有他手上的热气。我想到在金泽市看见的樱花，便自然而然地记起那个不知姓名的日本司机的笑容，我甚至想说他的笑容比花美得多。

1962年6月9—16日。

愤怒的内滩*

三个多月前我在文章里谈过了金泽市的美丽的樱花。昨天晚上我无意间翻出石川县的日本朋友去年送来的礼物——我们访问金泽市的纪念品，我非常喜欢这本又朴素又大方的照片册，金黄色麻布封面上印着黑色的“国宝石川门”的图画，右角还烫上了两个白色的汉字：“金泽”。我把照片册搬到面前，我的眼光刚刚落在台灯下十分显目的粗线条图画上，那个文化古城的面貌就在麻布封面上出现了，我仿佛又站在珍贵的建筑物石川门前面，我仿佛又回到去年在金泽市度过的既愉快又兴奋的日子。我带着微笑打开这本金边的大书，翻看一页一页的照片。我好像跟随着这些熟习的照片在旅行。于是我又到了那个荒凉的海滩。

我不是来探访古迹，也不是到海滨拾贝壳，看海景。天空中堆了那么多的灰云，雨还不曾落下，我已经觉得脸上有点潮。眼前是一大片带灰色的黄沙，沙上有一道宽木板的栅栏，还有些长得不好的树木。远处有几个土堆，也看得见孤孤单单的小楼。除了我们一行人外，只有寥寥两行别人留下的脚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上海文学》十一月号。

印。灰色的海面显得很不安静，海水不停地拍打沙滩，仿佛要跑过来迎接我们。在这个被称为“愤怒的内滩”的著名的地方，我只见到寂寞与凄凉。但是我又看看好像要对我们讲话的海，我便不再感到意外了。我明白海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故事。陪我们来这里的一位朋友开口了：“这就是观测所的楼房，”他指着远处摇摇欲坠的小楼说；“弹药库就只剩下这么一点东西，”他又指着那些土堆说。另一位日本朋友用皮鞋拨弄黄沙，一面说：“这里还有一段带刺的铁丝，当初在这一带架起了四千米长的铁丝网，网里面的地方是不准日本人进去的。”这天上午我刚刚看到一张印在明信片上的照片，四个日本孩子，两男两女，站在带刺的铁丝网外，八只小手捏住网上的铁丝，四张小脸上的表情我很难忘记，他们好像在忍住眼泪，更像咬住嘴唇，吞下怒火。我了解这种感情，因为若干年前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然而八年前威风凛凛的铁丝网，如今只能在旧日的明信片上看到了。我也像日本朋友那样，带着轻蔑也带着憎恨，把这段被遗弃了的铁丝用力踏了两下，然后让它仍旧埋在沙里。

“这一带本来还有铁板，就是人们说的‘铁板道路’，在进行斗争的时期中，前前后后几十万人踏得铁板轰轰地响，现在什么也没有了，”那位最先讲话的日本朋友又说。

“连写着英文的兵营的大门也没有了。总之，美帝国主义给埋葬在这一片黄沙里面了，”另一位朋友接下去说。

我暗暗地叫一声“好！”，他提醒了我。灰色的天空仿佛一下子亮起来了。这里就是内滩人民跟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

"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们把凶恶的敌人打得狼狈逃窜，不敢回头。而且正是内滩人民的胜利把我们引到这个海滩上来的。

站在我面前的是当年有名的战士出岛权次(这里的人喜欢叫他做"出岛的阿权")，他是反对基地实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身体相当结实的中年人，虽然留着平头，面容却显得有些消瘦，有些苍老；他的表情既严肃又诚恳。我同他握手的时候，感到他的手劲很大。在他的背后站着他的一位战友，手里拿了一把雨伞，这个忠厚的村里人是副委员长滨田长松。他的家便是当时对敌作战的司令部。一位日本朋友已经说过了："等一会儿到滨田家去看看。"我接着便看到滨田先生脸上谦虚的笑容。

出岛先生简单地对我们讲了一些情况，他讲话慢，声音低，讲得不多，可能是出于客气，也可能是做得多的人从来讲得少。滨田先生偶尔插进一两句。他们的话并不是随口说出来的，在他们的眼前大概又出现了过去的一些场面，他们在这里看见的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他们也可能回想到那些早已逝去了的艰苦的日子。我在他们的声音里听到了愤怒和兴奋。美国兵当初怎样霸占了这一大片平坦的海滩，拉起了铁丝网，安上了炮座，修好了弹药库，建成了营房，铺设了铁板道路……于是整天轰隆轰隆，炮弹横飞。渔民们不但无法下海打鱼，连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这些普通的善良老百姓听见炮弹的呼啸声，看见美国兵耀武扬威的凶恶面目，看到带刺的铁丝网，他们望着亲人一样的熟习的海，想到自己的遭受

损害的生活，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就这样开始了斗争。人们都走出了自己的屋子，有的把写了标语的白布条缠在头上，有的高高举起写着鲜明口号的用白布做的或者用草席编的大旗，到基地前面去示威，坚决反对把“内滩砂丘地”交出去做美国兵的打靶场；或者向村长等人质问，为什么要把本村出卖给美国人。妇女格外勇敢，少女们冒着弹雨，紧紧靠着铁丝网，坐在铁板道路上，年轻妇女整夜不睡地坐在打靶场外。我看见一张令人感动的照片：妇女们坐在砂丘上，当中竖起一面白布旗，旗杆上挂了一盏玻璃灯，一位青年女人背着婴孩、左手打一盏灯笼来参加她们的示威。

“就是这位老人家领导妇女们进行斗争的，她很坚强，很勇敢啊，”出岛先生指着新来的一位穿和服的老太太对我们说。老太太过来和我们紧紧地握了手，她很激动，好像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讲，可是只讲了两三句，眼眶里已经装满了泪水。滨田先生在旁边插了一句话：“她姓南出，已经有三个孙子了。”我才注意到老太太白发满头，背也早弯下去了。她听见滨田的介绍，便带笑向我点了一下头。然后她又朝美军弹药库的废墟望了望。我觉得她的头似乎一下子就抬高了。

内滩渔村的村民们就这样赤手空拳地跟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不用说，斗争是十分艰苦的。可是内滩人民是极其坚强的人民，不管怎样苦，怎样艰难，他们始终坚持下去，绝不妥协。出岛先生坦白地说，他们起初还想单靠本村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后来解决不了，才接受村外的援助。他们还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在斗争的初期，四十多个共产党青年到了内滩

来支援他们，一直住在帐篷里面。斗争逐渐发展，人民的力量也逐渐加强，敌人虽然用了种种手段，也曾引起少数人的动摇，但是斗争的队伍仍然不断地扩大。这个“愤怒的内滩”终于在三年以后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压在内滩人民头上的美军基地就只剩下眼前这一片荒凉。代替美国炮弹的只有海上的怒涛。先前不宁静的海现在开始咆哮了。看见了过去长期激烈斗争、也看到了人民胜利的海，看够了美国军队蛮横的暴行、也看到了他们仓皇撤退的丑态的海怎么能够沉默呢？大海开口了，它在叫喊，它在怒骂，它也在高呼。

我不曾留心什么时候起了风，雨点连续地飘到我的脸上，雨点连续地落在沙里。沙平静地吞下了它们。我的心却十分激动。我也不能够沉默，我也在这里倾吐了我的感情。雨渐渐地大了，刚刚听得见的风声、雨声增加了海滩上寂寞、凄凉的气氛。朋友们提议到村里去，大家开始移动脚步。我掉头朝四周看了看，我真想在这里多留一会儿，让我看饱这满目凄凉的景象，把它牢牢记在心里，我好向人们畅谈美军基地的下场。

我们走出了海滩，我还听见海浪怒吼的声音。我感到一阵痛快，这声音对我显得多么亲切。我现在更了解海的语言了。

到了渔村。人们用友好的眼光欢迎我们。一些人走到我们的跟前，把我们一直送进滨田家。在这个过去的指挥部里我看到一个普通渔民的温暖、和睦的家庭。我一进门，就感到一种令人放心而愉快的友好气氛，好像有一股好闻的香气迎

面扑来一样。我们脱了皮鞋，坐在十分干净的席子上，喝着发香的新鲜牛奶，同主人攀谈起来。席子上或坐或跪有好些人，旁边"火炫"上悬了一把铁壶，一个热烈而融洽的小小的茶话会开始了。

在这里发言的人不少，主客两方面都不感到拘束，有问有答，有长有短。不用说，谈话全是围绕着内滩的斗争进行的。先前出岛先生在海滩上谈得很短、很简单，现在大家你一段我一段就把整个情况介绍清楚了。出岛端正地跪坐在那里，他仍然谈得不多，仍然带着严肃的表情。我放下记笔记的圆珠笔，注意地望着他，我忽然想起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笑容。是，就是这个人！是在那张题作《胜利的日子近了》的照片上！他站在海边刚刚搭好的"渔具小屋"前面，上衣敞开，双手拿着工具高高举起，张开嘴在大声讲话。屋顶上站了七八个人，在那里竖起了几面有标语的旗帜，其中一面大旗上写着："用我们的手死守着土地"；左右两边还有十几二十个男男女女，女的缠白布头帕、举手欢呼，男的把工具高高地举了起来。人们的脸上全带着笑容，出岛显得格外高兴，也显得十分年轻。我忘不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场面。八年来他苍老多了，他的额上现出深的皱纹，贫苦的生活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只有头发的式样不曾改变。但是他谈到人们团结、斗争胜利、敌人逃跑的时候，他谈到他们出去支援别地方人民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的时候，虽然仍是短短的几句话，他的眼睛里却闪出了火似的光芒，我在他那谦虚的主人的面目下看见了勇敢的战士的心。照片上八年前的"出岛的阿权"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

兴奋地看看其他的日本朋友，讲话的和未讲话的，我都看过了，在他们的脸上，我也看到同样的决心和信心。仿佛有一股暖空气从门外流进，整个房间越来越暖和了。

这样的战士是绝不会屈服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树立了一个多么出色的榜样。我们感谢你们，"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说。告辞的时候，我把主人拿出来的纸摊在坐垫上弯下身写了这样的七个字："向内滩人民致敬。"在寥寥的几个字上面，我倾注了我所有的感情。

雨已经住了，灰云仍然留在天空，我在这个简单而整洁的渔家门前，和这里的每一个日本朋友握了手。那些粗糙而温暖的手依次地把我的手紧紧捏住，恳切的眼光向我表示：这不是分别，我们永远站在一起。我带着振奋和感激的心情进了汽车，靠在车座的软靠背上，想象着一些未来的美好景象。我们这一长串的汽车在雨打湿了的、清静的道路上从容前进的时候，我忽然伸直了背坐起来，看窗外。我想起了一个人的名字。朋友们在先前的谈话中常常讲到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直江。他是一个铁路工人。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带着咸菜来支援这里的斗争，就住在沙滩上，吃着自己带来的东西，整天不休息地工作。他终于病倒了，没有能见到胜利的阳光，就在这里死去。人们把他的遗体葬在一个沙丘上，有洋槐树替他挡风挡雨遮太阳，青青的树下还立着一块纪念碑，碑上永远保留着内滩人民敬爱的心意。我们在内滩短短的两个半钟头里面只有一件使我感到遗憾的事：我没有到那个沙丘去，在那位有着伟大心灵的年轻死者的墓前献一束鲜花。……

照片册里只有两张我们在内滩活动的摄影，一张在沙滩，另一张在滨田家，后一张是华侨朋友小韩的作品，还是我自己最近贴上去的。两张照片给我唤起了这么长的一段回忆，我应当感谢它们。照片上的天地虽然小，可是回忆中的世界非常大。我不会拍照，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将那些动人的场面记录下来，而且连记忆也可能让不分昼夜逝去的流水般的时光逐渐冲淡，因此我想起了去年读过的日本作家岩仓政治的短文：《应该记在本子上》。这个题目选得多好！岩仓先生就是说过“美帝国主义给埋葬在沙里了”这个警句的朋友，一年半前我们在一起访问了“愤怒的内滩”，他已经记下当时的见闻发表了。我们的冰心大姐和白羽同志也写过了他们的见闻。现在轮到我来把自己的感受“记在本子上”了……

我兴奋地阖上眼前这本看不厌的大书，拿起闲了几天的“万年笔”，我仿佛在写历史，又好像在写预言，其实我是在写一个美军基地的下场。啊，难道这仅仅是一个美军基地的下场吗？不，当然不是！全世界三十五个国家里面九百多个美国军事基地都逃不了这样的命运：一片黄沙，一堆废墟，寂寞，凄凉。

我的旅行结束了。可是我还在怀念“愤怒的内滩”，我永远忘不了点燃了第一把火的内滩人民。

1962年10月14日。

看了《松川事件》以后*

一

最近我看到日本的进步影片《松川事件》，一连几天我无法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在“松川事件”的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以后，那些残酷迫害和卑鄙陷害的场面还像梦魇一样地折磨着我的心。但是任何时候我都听见日本人民响亮的声音：“绝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影片里的一切在我的眼里显得十分熟习，我认识那些人，我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我同他们做过朋友，我现在还感觉到他们的友情带给我的温暖。我说朋友，不仅指千田是也先生和岸辉子女士，在影片上他们的镜头虽然不多，可是看见他们亲切的面颜，我几乎要说出问好的话来。他们两位一直在为人间美好的事物健康地活着，勇敢地斗争。人间美好的事物很多，不用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一件；教帝国主义彻底灭亡，世界持久和平早日实现又是一件；作为日本人，他们当然更愿意在自己的祖国建设“一个光明、美好的社会”。不单是他们两位，在银幕上出现的那许多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上海电影》第一期。

善良的人，那许多正直的人，那许多勇敢的人都是这样地活着，这样地斗争着的。不论"事件"中的真实人物，或者扮演他们的许多演员，都是勇敢的战士：真实的人物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在社会里坚持斗争；影片的导演和演员们也用艺术武器在进行斗争。影片的摄制费是由工人和农民每人出一百元（合人民币六角多）预购入场券这样凑起来的。劳动人民这种休戚相关的感情在影片上也表现得非常真实。几滴眼泪，两三句简单的话，我们看到了热烈的、鲜红的心。"松川事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据说到去年年底已经有了九十万人），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鼓舞他们在斗争中坚持下去，一直到最后的胜利——全体被告获得无罪释放，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还记得去年四月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时候，在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我们从镰仓去箱根，经过热海，在那里停留了两三个钟头。我本来要去拜访我所敬爱的前辈作家广津和郎先生，到了热海才知道他的夫人欠安，我不便去惊扰他。我坐在屋前草坪上，望着平静的海水，在这风景如画的和平环境里，我仿佛看见了广津老人在"松川事件"中的英雄姿态。我多么想在他的客厅里，听他谈谈那个戴着法律面具的大阴谋和日本人民十二年来英勇的斗争。三天以后我们回到东京参加日本文艺家协会年会的联欢晚会，我听说在会上要向七十高龄的文艺家们献礼，在节目单上我看到了广津先生的名字。我兴奋地等待着。可是他并不曾出席，据说他正在为"松川事件"奔走。再过三天我们便离开了日本。我们带着日本朋友的友情回到中国，朋友们的声音相貌一直深深印在

我的心上。我多么怀念他们。我在影片上见到千田是也、岸辉子伉俪和其他几位朋友，又好像见到了许多敬爱的友人，我更想到那位我渴望见面而终于未得一见的广津先生。"松川事件"的斗争得到胜利，日美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完全暴露，广津老人也会得到安慰和休息了。广津和郎并不是参加这个斗争的唯一的文艺家(在九十万人中间不知道有多少用文艺作武器的，没有他们便不会有这一部艺术片!)，但是他把全副精力献给了这个斗争。他认为揭露美日反动派的阴谋陷害，替无辜的铁路工人雪冤，是作家的庄严的责任。他亲自到现场去从事调查的工作，访问各个被告的家庭，去了解情况，有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又担任"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的会长。他写了一本大书《松川裁判》，还把他著作的版税拿出一半来帮助被告的家属。

我不曾读过这部五十几万字的巨著，可是我听见别人谈起它的内容。作者用许多反驳不倒的事实，证明"松川事件"的被告们都是暗无天日的裁判的受害者。一列火车在松川车站附近出轨，当场死去司机和助手一共三人。日本警察抓住了一个所谓"嫌疑犯"，用严刑拷打强迫他承认犯罪，然后根据这种捏造的口供任意逮捕了十九个工会干部和铁路工人，法庭便根据警察的严刑逼供判决了二十位"被告"的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作者为了搜集那些铁一般的事实，花费了很多的精力，五十几万字的篇幅需要作者付出何等艰苦的劳动。这部长达二十一本的影片《松川事件》更是饱满精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晶，而且这精力和这劳动都是集体的，无数人的。广津

和郎的著作和山本萨夫导演的影片虽然内容不完全相同，可是他们同是那个艰苦而英勇的斗争的真实记录，它们说明：真理必胜，人民必胜。它们不仅是十分出色的艺术品，它们的出现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日本的文艺家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在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不是也见过这种令人振奋的场面么？日本的朋友们不是以这种英勇战士的雄姿获得我们越来越普遍的尊敬么？

所以去年八月的一个夜晚我在黄山从电台的广播中听到“松川事件”全体被告无罪获释的胜利消息，我兴奋得一夜不得闭眼。我首先想到广津老人，我想到了许多日本朋友，我想到了坚持斗争的日本人民，我想到了那些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关了十二年，受尽迫害而终于不屈服的铁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我忽然添了许多勇气，添了许多快乐，我仿佛在他们的中间一样，他们的胜利也就是我的胜利。可是我想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这种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战斗友谊，在“松川事件”中也闪耀着这种友谊的光芒。日本朋友不止一次向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对“松川事件”受害者的热情支援，我们每一次都用紧紧的握手来回答。再没有比这样的握手更能表示心连心的友情的了。

在那个山居的宁静的夜晚，我也想到影片《松川事件》。我当时还不曾看过这部影片，可是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常常听见人谈起它。“松川事件”激怒了勇敢、热情的日本人民，也激动了日本知识界、文化界的良知。我们在日本接触到的各方面人士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个斗争。他们不仅关心那些

无辜被告的命运，他们更关心国家的前途，他们绝不能允许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垄断资本集团再一次给日本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在亚洲犯下严重的罪行。“松川事件”不过是许多更大阴谋和罪行的前奏曲的一部分。日本人民支援“松川事件”的斗争也只是把日本建设成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国家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也只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的一部分，这也只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的一部分。我没有机会在日本看到这部影片的上演，但是我从日本朋友的口中知道了整个影片的内容。影片的摄制过程就包含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献出个人的一切，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团结、不计得失的献身精神，在日本劳动人民和善良的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的极其动人。

现在我看到影片了。我仿佛又在日本旅行，几个月前在东京、京都和别的地方的见闻又在我的眼前重现。影片没有曲折的情节，但是它有强烈的感染力。故事并不复杂，然而非常真实，并且有一种朴素而动人的艺术力量。我承认在两个多钟点里面影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支配了我的感情，交替地唤起了我的喜怒哀乐。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好像有一把老虎钳紧紧地钳住我的心，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可是我看完电影，我的头抬得更高了，我的眼睛更亮了，勇气更大了，信心更足了。日本人民的英雄气概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感到了伟大的团结的力量。

影片表现了真人真事，也表现了日本的真实生活。在今天的日本我看见的主要东西就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在这部

影片上我看到的也就是这个激烈而长期的斗争。我在日本的确接触了很多、很多正面的人物，就像我们在影片上见到的那样的人。但是那些反面人物在我的眼里也并不陌生，而且对我们这里一般中年的观众来说，他们也不会显得陌生罢！那些刑事（便衣警察）、特务、检察长、法官以及躲在背后发号施令企图谋害进步工人的美日反动派都是我们极其熟悉的人物。我们或多或少地领教过他们的本领。二十几年前我在东京也曾见过刑事们的嘴脸。看过影片，我奇怪：他们这些年怎么连一点长进也没有！但是仔细一想我便觉得这也是寻常的事情。他们那种生活方式正是所谓“自由世界”里不可缺少的东西。“自由世界”便是靠他们维持下去的。可能在有些天真的人看来，毫无事实根据便判处人们死刑，这是不可理解的事，他没有想到在肯尼迪作总统的国家里，这种事情更是家常便饭，远的不说，我只提罗森堡夫妇的名字就够了。八年前美国的统治阶级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呼吁与抗议，悍然把两个无罪的人烧死在电椅上，今天在好些美国城镇，对黑人任意执行私刑的事还不断地发生，这便是肯尼迪所夸耀的“自由选择”。不用说，这种为某些人所羡慕的美国生活方式在日本也不是罕见的。通过“松川事件”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松川事件”的斗争虽然得到了胜利，可是祸根并未铲除，阴谋还在酝酿，日后可能还有新的“松川事件”发生，而且就本“案”来说，日本检察厅已经在八月二十一日向日本最高裁判所提起上诉了。谁都知道黑暗绝不会自行消灭，因此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只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黑暗被消灭为止。

光明一定会普照日本美丽的河山，这是我看过影片《松川事件》以后所得到的结论。我真高兴，我愿意同所有的日本朋友紧紧地握手表示祝贺。

1961年12月18日。

二

我终于见到广津先生了。我在东京写的日记里只有这样简单的一句："三点后广津先生偕杉浦先生等五位来谈'松川事件'的情况，"也没有人替我拍一张老人坐在冷气箱旁边沙发上谈话的照片，可是我只要想到八月九日的会见，闭上眼睛便看见广津先生坐在我的面前。他的相貌似乎和我在一些刊物上看见的不一样，他有一种特殊的谦和的笑容。他在我的对面坐了一个钟头，讲话不多，动作也少。"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的斗志昂扬的主将和不屈不挠的英雄在我的心目中是另一样的形象。但是广津先生和我交谈了几句，我便感觉到这一切跟他非常相称。我说他的笑容是特殊的，因为他脸上一直带笑，却又不是那种表示衷心愉快的微笑，我在他的笑容中还看到了一点点歉意和焦虑。原来他还在想"松川事件"重审的事情。

广津先生正是为着"松川事件"到我这里来的。在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开会期间，大会秘书处有人告诉我广津先生想在会后找我谈谈。对我来说，这是意外的喜讯，我当然表示欢迎。我在六日接到通知：广津先生八日上午来王子旅馆。

到了八日早晨我又听说老人有病不能来了，打算把约会的时间改在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耽心这一次我们又会错过见面的机会，因为我的“渡航证”上写得很明白：“在留期间”只有短短的十五天，大会闭幕后剩下来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广津先生又不让我到热海去拜访他。

八月九日下午我从外面匆匆赶回旅馆，在房里坐下不久，便听说广津先生如约来了。一共来了六位客人，我在那个我自己称为“小客厅”的走廊上接待他们。来的有工会干部，有新闻记者，有“松川事件”的两位被告。主客两方虽是初次相见，彼此并不感到陌生。谁都没有说多余的应酬话，大家刚刚坐定，翻译同志打电话到服务台去要的冷饮还不曾送来，我们已经在恳切地交谈了。广津先生简单地说明了来意。我热烈地向他倾吐了我的敬爱的感情。他声音低，诚恳的眼光表示了许多未尽的意思，我虽然在他那似乎有节制的笑容上看出“焦虑”，同时我也看到了“信任”，而且是无限的信任。我的话也不长，但是我相当激动，我的确动了感情，我恨不能将自己的心挖出来交给他，让他看明白我对他有多大的尊敬和多深的友爱。我两三次提到左拉，因为这个十九世纪杰出的法国小说家在“德列非斯案件”中坚持真理，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平反了冤狱，保全了无辜者的生命和名誉。广津先生仿佛一位现代的左拉，可是他的斗争却比左拉的斗争更重要。斗争的结果不仅救活了若干人，保全了若干家庭的幸福，而且把千千万万的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鼓舞他们向着一个崇高的目标前进。我并没有夸大他个人在斗

争中的作用，而且他也不是在事件发生以后，就直接参加了斗争的。我赞美他的态度和他的精神；他那种英雄气概引起我无限的钦佩。我这样地表示我的感情的时候，我在眼前这位外貌极平凡、极和善的老人身上仍然看到了一种英雄气概。

广津先生感谢地笑了笑。“这是大家的努力，我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接着他又说：“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坐在我旁边的小林同志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的时候，他用了父亲般的慈爱的眼光望着她。

有人在敲门。服务员送冷饮来了。小小的方桌上放满了玻璃杯，服务员把一个杯子放在老人的面前，老人微微点一下头，收起了笑容，又说：“目前还有些困难……”他停了停，轻轻地咳了两声。坐在他旁边的工会干部便接下去：“案子明年三月又要重审了……”坂根先生详细地谈起了目前的情况，他正在壮年，精力充沛，声音高，有感情。坐在他左面的便是曾经两次被判决死刑的杉浦三郎先生，杉浦先生背后坐着另一位“被告”，大概是高桥晴雄先生罢，我手边没有他的名片，日记本上也未记下他的姓氏，但是他的面貌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今天翻看《松川事件》中二十位被告合摄的照片，只有高桥先生和我记忆中的面貌近似。然而我那天看见的是一个本来非常健康却让长期的折磨弄成了面带病容的人。杉浦先生的小胡子我一见便认识，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影片的印象。我觉得演员和本人的面貌相差不远。但是在两位“被告”的苍白色脸上我都看到了酷刑拷打和十年牢狱生活的痕迹，这是在

影片上所看不到的。我指的当然不是伤痕，我是说，一个人长期遭受残暴的迫害之后，他那被损害了的健康很难完全复原。他们两位都不讲话，却用了略带停滞的期待的眼光看我们。这样的眼光和带病态的苍白脸色搅动了我的心。他们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像这样地坚持了十三年的斗争需要着多大的毅力！我深深地同情他们，尊敬他们；我更加憎恨一手造成整个事件的美日反动派，我的怒火燃得更大了，同时坂根先生的叙述又在火上加了油。

几个月以后案件还要重审。敌人正在加紧进行新的阴谋。不巧到明年重审的时候，有两个比较好的裁判官任期已满，敌人可能设法换上两个听话的人。那么枉法判刑的丑剧很有重演的可能了。危机并未消除，斗争更加尖锐，不得到最后彻底的胜利，没有一个人能够安心。对于"被告"来说，这更是生死的关头。大敌当前，大家必须加倍努力；斗争激烈，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日本的战士又一次向中国的朋友伸出手来。我紧紧地握着它们。我了解广津先生和其他五位战士所表示的感谢、信任和期望。我那些声音颤抖的答话还不能充分表达我的敬爱和感激的心情，也无法表示我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我希望我的同志般的握手能够代替语言说明这一切。

我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从客人们的发亮的眼光、感动的表情和激动的声音，我又一次体会到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鼓舞的战斗友谊的伟大力量。我多么感谢这一次不寻常的会见，短短的一小时中，我的心海里起了多大的浪涛！我把

客人送下楼，在门外同他们再一次握手告别的时候，我觉得眼前忽然开朗，整个大院子罩着一片灿烂的阳光。广津先生和他的几位朋友谈着话朝左面慢慢地走去。他那中等身材的背影在我的眼里显得相当高大。我跟着它走了几步。他们正走下斜坡。广津先生也不雇一辆出租汽车！刚才我注意到他走路有点吃力，便问起他的健康情况，他还说，他有关节炎，常常腿痛。“先生，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广津先生的影子已经不见了，我还站在院子里朝坡下看。我多么盼望他会回转来，我真想好好地同他谈一会儿，我等待着，我在想他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曾回来，我也知道他越走越远了。

我回到楼上的房间。房里的一切跟客人们在的时候完全一样，只是小方桌上玻璃杯旁边多了一叠书刊。这是广津先生给我带来的宝贵礼物，我兴奋地拿起它们一一地翻看。我坐在先前坐的那张沙发上，我的心渐渐地钻进书里去了。书刊上不仅有广津先生的名字，我还在每一页、每一张上看见了广津先生的面貌，微微张开的嘴上带着他特有的笑容；我甚至听见了他那温和的苍老的声音：“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啊……”这一次我还看到了他那充满信心和毅力的眼光。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轻轻地赞叹一声：“广津先生，……”不知不觉地捏紧了我的右手，好像我还握着广津先生的手一样。

广津先生仍然同我在一起，他要永远同我在一起，他是我的一个榜样。

1962年10月19日。

藤森先生的笑容*

今年上海热得迟，上星期一连下了几天的雨，气候温和，大家都说："这个夏天容易过。"可是从前天起突然暴热，正午前后骄阳当空，树梢纹丝不动，在屋子里颇像在蒸笼中一样。我浑身大汗，坐在书桌前，手里捏着的笔常常不肯落在纸上，我的思想仿佛长了翅膀飞走了。……我的思想飞到了远方，栖息在绿树的浓荫里，于是一阵细雨从树梢落下，把树叶洗得又干净又新鲜，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还有碧绿的灌木，碧绿的草，连雨丝也仿佛染上了绿色……我出神地想着，想着，我渐渐地忘记了额上的汗珠，让它们打湿了我面前的稿纸；我也忘记了窗外烈日的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跟着自己的思想到阴凉的地方去了。

我冒着如线如丝的细雨，走进两旁竹篱的小巷，尽头处有一个人家，旧式的木门大开着，一位瘦小的老人打着雨伞带着笑从门内出来。"欢迎！欢迎！"多么熟的声音。我紧紧握着藤森成吉先生的手。这可能是第十次的握手了，前一天下午我们才在镰仓和光旅馆的门前分别，我仍然觉得藤森先生还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文学》十月号。

是像几年前我在上海初次看见他时那样康健。

藤森先生把我们引进了他的客厅。我，沙汀同志和替我们作翻译的小韩，我们都没有想到藤森先生的客厅这么小，这么简朴。可是我在坐垫上盘着腿坐下来，主人坐在我的对面，中间隔了一张日本小桌，我望着藤森先生多皱纹的瘦脸、稀疏的花白头发、厚厚的花白上唇须和他整个和善的面颜上的笑容，我马上觉得这间陈设简单的屋子对他非常适合。我在这个客厅里坐了将近三个钟头，始终感到舒适，仿佛这里是我常来的地方。在这三个钟点里我不曾离开我的坐垫。我们谈话、喝茶，吃各种各样的甜食。甜食中有用糯米做的，有用面粉做的，都是道地的日本点心，形状同味道也和我吃惯了的中国甜食相近，盛在旧式的日本碟子里面，它们更讨人喜欢。这些碟子有着日本人民喜爱的朴素的花纹。我还记得藤森先生从他背后一个小橱里拿了碟子来分给我们的时候，他用愉快的声音向我们介绍，他的眼睛里露出了喜悦的光辉，他的笑容显得更加和善。我喜欢这些甜食，喜欢这些大小碟子，喜欢这间客厅里的一切，喜欢客厅外仿佛带绿色的雨丝，喜欢小小院子里既幽静又充满生命的一片新绿。我更喜欢这里的人，藤森先生和他的小姐，还有一位他的好友。藤森先生的小姐忙着给客人端茶、送点心。藤森先生和他的友人关心地问起我们旅行的情况。从他们的谈话里我才知道好些不曾见过面的日本朋友为我们的安全和工作方便，暗中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精神。

我三十年前就知道藤森先生的名字，读过他的剧作。现

在我虽然讲不出那些作品的内容，但是我对这位无产阶级文艺老战士的敬意至今还很鲜明。我只记得一件事情：他成名以后还深入生活，当过一个时期的工人。一九五五年我在上海同他第一次会见，我曾向他表露过我的感情。以后同他见面的机会越多，我对他的敬爱也越深。我见到他，好像见到自己的长兄一样。他善良、坦率，同新中国的朋友在一起，仿佛全身都充满友情和好意，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来似的。在座的那位友人向我谈了一些藤森先生过去的情况，我后悔没有能一一地记下来，那个时候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藤森先生的笑容上，他的谈话、他的举止……都是那么朴素，那么平凡，然而又是那么吸引人。他本人抓住了我的心，我反而把关于他的经历的谈话忘记了。藤森先生因为妻子的慢性的病，战前在逗子修建了这所简单的住家，他的夫人就是在这里去世的。对我来说，逗子并不是陌生的地方。一九三五年我住在横滨，后来搬到东京，我常常坐电车到逗子，从这里搭公共汽车或者步行到附近的叶山去看朋友，我在这个地方来来去去，有时还和那位中国朋友在星光下散步到逗子车站，一路上谈文学，谈友谊，却没有想到我所敬爱的一位作家就住在这个城市。藤森先生的生活不会是很宽裕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一天他招待客人，还是由他那个出嫁的女儿来帮忙。但是我在任何时候看见他，都觉得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乐观的人。他坐在我对面，谈得很高兴，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他还谈到他访问人民中国时的感受和日本的一些情况，而且也谈到他正在写的一本新书，几位不受人注意的日本

画家的评传。他的笔始终停不下来，不管他怎样热情地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他从来不曾忘记他的笔和他的藏书。在我们告辞的时候，他把纸门推开，引我们去看他日常工作的地方。书斋中到处都是书，有些书页还是摊开的。小小的房间里容不下它们，让它们占领了走廊。根据我的印象，书斋外相邻的两面都是走廊，走廊可能是乙字形；弯进去，走廊的尽头处挂了一张年轻的日本女人的照片，藤森先生告诉我们，这位善良的家庭妇女是他的母亲，他还低声谈到她的不自然的死亡。这应当是几十年前的事，藤森先生很快就要到七十岁了，可是他的声音里还流露出那么深的感情。我知道他想起了一个悲痛的故事，连忙用话岔开。不久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

短文还没有写完，我意外地到了东京。东京的夏天也很热，我在那个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汽车的大都市里住了两个星期，没有看到一滴雨水（不用说我倒流了不少的汗）。我住在一家带田园风味的半西式旅馆的二楼，窗外是一个日本式的庭院，有水，有树，有草地，有石灯。房里也有乙字形的走廊，正面廊上安放了一张小方桌和三把沙发，布置成一个简单的小客厅。窗台上装了一只冷气箱，开起来整天响个不停。大清早我坐在方桌前，拉开窗帘，便望见一片绿色。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外国代表都住在这里和对面那座较大的西式楼房里，住客不多，两座楼房非常静。旅馆的服务台和餐厅设在对面的楼房里，因此我们这一面特别清静。这倒是一个对写作很适宜的环境，我把未完的原稿带在身边，刚

刚住下，我就对自己说，我至少要在这里写完怀念藤森先生的文章。可是我在东京过了两个星期既兴奋又紧张的生活，连一句话也不曾写出来。我在外面的时间多，不过也有机会在旅馆里接待一些客人，像不辞劳苦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到处奔波的三岛一先生和他的夫人，像为真理坚持斗争的老作家广津和郎先生和"松川事件"被告中的杉浦三郎先生诸位都是我这个"小客厅"里的贵宾。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在廊上听到藤森先生的充满友情的笑声；我想告诉他去年国庆节后我在上海空等他的心情，我知道他参加日中友协的代表团到了北京；我又听说他酷爱中国的绘画，一个人到故宫博物馆耽搁久了，误了飞机，还是第二天赶到西安去的，却没有料到他们到西安访问以后便离开了中国。我还想给他看一张我从上海带出来的照片。这一次我没法去逗子，因此我盼望他到东京来。

藤森先生终于到东京来了。在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我看见了他。他来得较迟，酒会已经开始，大家谈得很愉快，不停地碰杯。我刚刚和一位日本朋友干了一杯啤酒，忽然看见藤森先生站在我面前。"好，我到底又见到您了。"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他满脸笑容地向我问好，同我碰杯，真是说不出的亲热，说不出的高兴！我很想拉住他，同他谈一个整天。可是厅子里站满了人，大家拿着啤酒杯来来往往，我们无法畅快地谈下去，只谈了两三句，就让人打岔了，而且当时我们看见彼此的笑容就很满足了。我忘记向他提起照片的事，更不用说放在旅馆中手提包里的未完的短文。这以后我还见过他一面，就是酒会结束、我们在楼梯口握手分别的时候，但

是他背后站了一长列的人，我们已经没有谈话的机会了。使我高兴的是他的手仍然十分有力，他仍然很健康，很乐观。

这一天我带着酒意回到那个清静的旅馆。晚上整理行装，我又找出了从上海带去的唯一的照片。这是去年四月藤森先生陪我们游江之岛时留下的纪念。在冷饮场的一个幽静的角落，我和藤森先生从容地用吸管喝瓶中的橙汁。我本来坐在藤森先生前面，却转过身向着他，两只手压在椅背上，栏杆外有很多树木，倒是一个很阴凉的地方。照片是林林同志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拍下来的，藤森先生可能还没有见到它。在照片上他仍然是那么和善、那么愉快。他露出微笑吸着橙汁，我却面带倦容拿着玻璃瓶在休息。我们相差十二岁，可是他显得更年轻，更有精神。我静静地把照片看了好久，我在看藤森先生的笑容。我越看越高兴，我终于忍不住微微笑了起来。我这个爱幻想的脑筋又在活动了，我从藤森先生的笑容上看到了许多日本朋友的笑容。无数人的笑容汇集在一起，我不能一一地分开。一张小小的照片上居然容得下那么深的友情！只有亲身体验到中日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力量的人可以讲出许多比这个更动人的故事。我发愿要搜集这些故事，把它们全记在纸上，印在心上。首先藤森先生的笑容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

夏天已经过去，我又回到上海书房里写字台前面，我的汗已经干了。一个半月中间我的脚和我的思想都走了很长的路。我带着一张照片和一篇未完的稿子旅行，现在我可以把短文寄出、将照片放好了。我又见到了藤森先生的笑容，我又

见到了许多朋友的笑容，这些笑容不仅长留在照片上，而且长留在我的心上。

1962年9月12日。

“不死鸟”的雄壮歌声*

参加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离开东京的前一天在金刚饭店举行了告别酒会。我不止一次地对日本朋友们说，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就是在分别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将来更多、更快乐的“再见”。朋友们并没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同样地相信着未来。我们热情地畅谈着友谊，热烈地碰杯，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注视着彼此的笑脸，两国人民的无限光辉的前途把那个不太宽敞的楼厅照得异常明亮。这个动人的场面把我们的心和朋友们的心更牢地拴在一起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送走了朋友们，静静地坐在楼下休息室的一个角上。酒意逐渐消失，友情仍然使我的心激动，我想着一些敬爱的朋友，一张一张亲切的笑脸在我的眼前过去，我在心里唤着一个一个敬爱的名字。我忽然叫出了一声“秋田先生”，不用说，声音低，不会让人听见。我看见一位瘦小的老人，隆起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圆圆的便帽下面露出来密密的银丝，两边脸颊深深地陷了进去，布满皱纹的瘦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他拄着手杖颤巍巍地向我走来，这是秋田雨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香港《文汇报》。

先生。他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仍然十分鲜明。

秋田先生出席了去年四月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椿山庄举行的告别酒会。当时他已经七十八岁了，我们到了东京，刚下飞机，就想同他见面，可是又害怕给他带来麻烦，听说他的健康情况不大好。后来我们在金泽等地旅行的时候，意外地收到了秋田先生向我们问好的电报。我们回到东京，便请日本朋友替我们安排，希望有机会到秋田先生的府上拜访。我等待着日本朋友的答复。我没有料到秋田先生会出席我们的告别酒会，但是老人很早就到椿山庄来了。他笑容满面地紧紧捏住我的手，不让我向他倾吐我积了三十年的感情，却不停地谈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他个人对新中国的向往。他那充沛的热情使人忘记了他衰弱的身体。他甚至表示将来健康情况好转，他还要到新中国进行访问。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好消息，中国文化界中有不少秋田先生的朋友和后辈，“秋田雨雀”这个名字在我们国内常常引起很深的尊敬的感情。椿山庄的酒会也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在椿山庄和在金刚饭店一样，我深切地体会到心连心的友谊的重大意义。我和每一位朋友碰了杯，一次又一次地喝干了友情的酒。我也站在秋田先生的面前，为他的健康干杯，为他过去的成就干杯，为他老当益壮的战斗精神干杯，为我们两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干杯，为我们之间的友谊干杯。我家里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纪念品，我和白羽同志同秋田先生在椿山庄合摄的照片。小小的照片上不仅保留着敞亮的厅堂外春天的阳光，还保留了秋田先生和蔼而愉快的笑容。我当时万想不

到我同秋田先生最初的会见也就是最后的一面。但是酒会结束，秋田先生同我握手告别，我看见他的瘦小的身形消失在人丛中以后，我忽然感觉到我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的确我失去了同秋田先生畅谈的机会，第二天下午我们便到了香港。今年五月我在上海听到秋田先生逝世的消息，还不愿意相信，可是后来读到司徒慧敏同志的文章《不死鸟永远飞翔在人间》，我不能不沉痛地想到我个人的损失。秋田先生的优秀的作品，他的完美的人格和他的“不死鸟”的战斗精神都是永生的东西。只是我再也不能听到他那充满友情的谈话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三十四年前我在巴黎赛纳河畔旧书摊上买到他的《骷髅的跳舞》世界语译本时的喜悦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让他知道我在上海从世界语转译他那三篇短剧(《国境之夜》、《骷髅的跳舞》和《首陀罗人的喷泉》)时的激动的心情了。在他的作品里希望始终不灭，读者的眼前一直亮着前途的灯光，美丽的喷泉也永远不会竭尽。我二十几岁时从他的作品得到不少的益处，他那非常乐观的热情语言和战斗精神一直在鼓舞我前进。我始终没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我的遗憾是很大的。然而在金刚饭店楼下休息室里想起一年前的事情，我绝不能把秋田先生的纪念同悲伤连在一起。

秋田先生的一生是英勇、坚强的文艺战士的一生。在将近八十的高龄他还坚决地表示：“我无论如何都要拿出勇气来战斗。哭不是我干的事情。”他又说：“不管怎样苦，绝不能全都白白地死掉。”这都是秋田先生在他唯一的亲人，他年轻的外孙女上田静江发觉自己受了骗在故乡绝望地自杀以后说的

话。秋田先生关心青年，他发起“不死鸟会”，向日本青年大声疾呼，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坚持斗争，绝不放弃责任，绝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热情地对日本青年说：“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热爱生活，努力改造今天的社会。”他自己七十九年的生活便是一个极其光辉的榜样。他一生遭遇到多少不幸，经历了多少困难，可是他始终昂着头勇敢地、乐观地继续前进，在文艺的道路上，在人生的道路上都是一样。他自己就是一只美丽的“不死鸟”，永远在天空飞翔，歌唱生命，歌唱光明，歌唱人民的胜利。……

代表团的同志们派车来接我回王子旅馆的别馆。我离开金刚饭店的休息室，不少和善的笑脸向我招呼，我仿佛仍然在友情的海洋里游泳。奇怪的是在这些笑脸中间我又见到了那位老人的笑脸。他的纪念始终同我在一起。汽车在世界著名的繁华都市东京的大街小巷中缓缓地前进，我一路上都听见“不死鸟”的雄壮的歌声，它给我唤起了多少美丽的感情。感情越积越多，我浑身发热，心跳得太厉害。我实在不愿意回到那个田园风味的幽静的旅舍去。我真想跑遍东京，找到刚才分别的许多敬爱的日本朋友，我要对他们每一位再说一次：

“让我们紧紧地手拉手、肩并肩、昂起头，向着无限光辉的前途飞奔罢。”

1962年8月24日。

倾吐不尽的感情*

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胜利闭幕，我们快要离开东京了。对这个繁华的大都市我毫无留恋，可是想到英勇的日本人民，特别是想到这里的许多朋友，我不能不动感情。在这短短的五天中我同日本的朋友见面谈话，感到分外亲热。有一天晚上，已经过了十点了，小说家崛田善卫先生到王子旅馆的别馆来看我，坐在窗前冷气箱旁边的沙发上，同我谈了一个钟头。我们隔着一张小方桌谈话，由小林同志担任翻译，她坐在第三面，也就是正对着拉上了窗帷的玻璃窗的一面。我们谈得非常愉快，有说有笑。崛田先生忽然说："你去年访问日本，回国以后写了些文章讲日本的好的一面；这一回你看到了别的，你应当讲讲坏的一面了。……"他说了这一类的话。我知道他指的是世界大会闭幕会上捣乱的事情，他指的是那些捣乱会场的右派打手（动手的人和在幕后指挥的人都算在内，也只有那么一小撮，日本朋友称他们为"暴徒"，我叫他们做"打手"）。我马上带笑回答他：这一回我仍然要写好的一面，因为我看到的仍然是好的多。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文汇报》。

崛田先生不曾出席八月六日台东体育场的大会闭幕会，他只是在报上读到一些消息，他没有亲眼看见那些动人的场面，但也可能是他对一个快要分别的朋友讲几句客气话。我觉得他太书生气了，他是大会的代表，因为站在真理的一边，在小会上受过右派打手们的气，不愿意同那些人坐在一个台上，便错过了很好的机会，所以在他的脑子里打手们的丑恶面目非常显著。他听见我的答话，稍微楞了一下，但是我接着讲下去："那天晚上连我这个从来不会唱歌的人居然也登台表演，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唱了歌。说实话，日本代表的英雄气概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动。"我在这里提到唱歌的事，因为前一天的《赤旗报》上刊出了中国代表团唱歌的照片。我笑了，他也笑了，他那皱缩的眉毛现在伸展开了。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在一处长谈已经不止一次了。去年十一月他访问上海，一个晚上我到他的房里去看他，他把别的日本朋友也找了来，我们一面喝啤酒，一面谈笑。第二天我看见他，他对我说，他在上海过了一个最愉快的夜晚。这说明我们已经很熟，可以带着笑容谈严肃的问题了。他终于同意了我的说法，他发出了笑声，这笑声听起来是很愉快的。

我们并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尽，时间过得太快，崛田先生站起来告辞，他还得坐一小时的电车回逗子去。我送他下楼，一直到大院子里。对面西式楼房的楼下休息室灯光明亮，却不见多少人影，外国代表已经走了不少，这个晚上冷清多了。夜不热，人声也静。我们紧紧地再握一次手，我充满友情地说："我回去还是要写好的一面……"他笑了笑。我们望望天空，

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我看见他那瘦长的身形在黑暗里消失了，才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我仍然坐在先前坐过的地方。放在窗台上的冷气箱继续发出单调的响声。对面的沙发上没有人。我抽着烟，想着崛田先生的话，我回想起八月六日大会场上的情景……

我首先想到了捣乱的场面，那个下午我们走进会场正看见打手们跳上讲坛，吵吵闹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陪着我们到会场里来的几位担任保卫工作的日本年轻朋友（他们都是一、二年级的大学生）在前面大声嚷着"中国代表团来了"，要人们让路。他们的话给我们引来了不少友好的眼光。我们从容地朝主席台走去。我看见打手们在台上讲坛内外散发传单。我们到了台上，打手们还在台口叫嚷。群众在台下大声责斥："暴力团滚出去！"打手们闹得厉害的时候，年轻的日本朋友便挺起胸膛，胳膊挽胳膊，站在我们的前面，用他们的身体保护我们。这一天从下午三点半钟到晚上九点零五分，五个半小时里面，年轻的朋友们一直坐在我们的脚跟前，他们跟着台下代表们的歌声唱了许多歌曲，而且把掌心都拍红了。打手们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少数人孤孤单单留在台上搞不出什么名堂，一闹之后就溜下去了。我起初还以为这些人会退出会场，却没有想到他们就躲在高高的主席台的脚下，等待机会再上台逞凶，更没有料到台上主席团中一部分的日本代表便是幕后的指挥人。就是这些指挥人，我前两天还在会场上看到他们的笑脸，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换来了这些杀气腾腾的凶恶面目；也就是这些指挥人，他们把大会的总主

席和执行主席拉到后台去，他们在大会的闭幕会上还在作最后的挣扎，要把他们少数人的主张强加于大会，他们害怕同群众见面，只好躲在角落里干阴谋勾当。他们把刚刚溜到台下的二三十名打手当作本钱，在后台讨价还价，首先要大会同意他们那个在大会、小会上几次被否决了的所谓"抗议苏联核试验"的"紧急动议"，后来又不让人在大会上宣读起草委员会今天下午投票表决正式通过的《东京宣言》和《建议书》。他们躲在那个角落里横行霸道，不许大会继续举行，说《东京宣言》指出了美帝国主义是和平的敌人，并不符合日本代表的愿望，等等。他们足足闹了五个半小时，什么手段都用尽了，甚至无理地威胁外国代表的安全，要外国代表退出会场。但是这一切阴谋诡计都起不了作用。意见不一定完全一致的七八十位外国代表（还有少数人这一天在广岛）反而团结得十分紧密了，绝大多数日本代表的态度也更加坚定了。

在大会休会的五个半小时中间，会场外有捣乱的人，也有警察（他们明说保护会场，其实也是在等待机会，倘使场内发生激烈冲突，他们便进场解散会议），会场内有少数右派打手，主席台上有少数阴谋家。但是会场里还有来自日本各个地区的一万名代表，在他们的座位旁边竖得有写上地名的牌子。场内的温度是三十度，天热，空气潮湿，会场里又没有吃的东西。然而在等待的长时间里，秩序非常好。起初是各个地区的代表唱歌，有的唱革命歌，有的唱和平歌曲，有的唱民歌、民谣，彼此竞赛，互相鼓励。有时这一县的代表唱完了，提出要求，希望听到另一地区代表的歌声。掌声和笑声时起时落，中

间也夹杂了几声响亮的口号："暴力团，滚出去！""你们有本事，到军事基地走一转再回来！"日本代表接连唱了几小时以后，外国代表也都站到麦克风前唱起来了，最初唱歌的人是怀着感谢的心情、自动走出来的；接着，不会唱歌的外国代表听见台下叫出了自己国家的名字，也就带着笑容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不管是一个人（有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只有一个代表）或是一个代表团，不管会唱或者不会唱，大家都非常高兴，好像在过节日一样。这个时候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团结的力量，我们中国代表团就抱着对大会胜利的信心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向一万个日本代表致意。日本代表的坚定立场和乐观精神对外国代表的确有很大的影响。美国代表团团长柯尔比老太太甚至流着眼泪对在后台称霸的少数人说："对这样好的群众，你们还不让他们开会，你们太不对了！你们不让人在大会宣读《东京宣言》，我来宣读，我找个懂英文的日本青年给我当翻译。"年纪最大的外国代表澳大利亚的莫洛先生也说："你们不让念那两个文件，我不怕，我来念。"好些外国代表到后台去找那些幕后人辩论，严正地责斥了他们。这样一来，那些气势汹汹、指手划脚的阴谋家在这个角落里也变成十分孤立的了。他们终于低下头，闭上嘴，规规矩矩地走到前台，在主席团席位上坐下。大会又一次开始了。

仍然是我一向十分尊敬的友人中岛健藏先生作执行主席。打手们第一次的暴行并不曾吓倒他，他知道打手们还坐在台下等待命令，但是他始终蔑视他们。他刚刚开口讲话，我就看见坐在主席团席位左边一排的几个人紧张起来了，他们

现出了坐立不安的样子。这时有人走上讲坛去宣读外国元首的贺电，刚刚读了两句，台下的打手们就站起来，开始往上乱跳。坐在台上左面的人也都起立，头向前俯，有的用两只手，有的用扇子，向打手们示意：时候还没有到，应当安静地坐下。我注意地望着这几个人，他们当然不是我的朋友，不过我认识他们的面貌，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我看见那个走路不大方便的"活动家"忽然离开座位到后台去了。我等着另一幕丑剧的演出。但是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得到好处。

贺电不长，很快就读完了。轮到大会总主席安井郁先生宣读大会文件的时候，台上一位拿折扇的"导演"悄悄地打开扇子舞了一下。于是打手们一拥而上，并且认真动起武来。讲坛是第一道防线，他们立刻占领了它。桌子和讲台一齐推倒，他们不仅捣毁了它们，还弄坏了麦克风。然后他们直奔第二道防线，夺取主席团的席位。他们集中在安井和中岛两位的面前，打算拿走桌上的麦克风，抢去安井先生手中的稿子。不用说，那几个保卫我们的年轻朋友早已紧张地站起来，想用他们的身体保护我们了。我不能不感谢他们负责的态度和真挚的友情，可是我还看见电波新闻社的藤井先生（电波新闻社有两位藤井先生，去年都到我家里作过客，这里指的是高身材的年轻的一位，不是小说家藤井冠次先生）一直很从容地拍电影，他的镜头正对着那些打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他把打手们的丑态全记录下来了。我当时看见打手们捣毁讲台，看见一些缠着"社青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臂章的胳膊在舞动，后来在影片上才看清楚他们怎样动手打人。当时负责保

卫工作的菊地升先生出来干涉他们，并且保护大会的两位主席，他也给打手们踢伤了。打手们这样闹了不久，台下抗议的喊声早已响成了一片，这一次进步的力量已经有了准备，民主青年同盟的年轻朋友站出来维持秩序，使得打手们无法继续活动。打手们没有能抢到安井先生的稿子，也没有能夺走执行主席用的麦克风，他们动摇不了这一道防线，反而自己垮下来了，他们在一万人的"滚出去"的怒吼声中，狼狈地跳下台去，打起"社青同"的旗子，咕噜着退出了会场。会场里爆发了春雷一样的掌声，人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尽情地欢呼。这些声音还不曾静下来，讲坛上又响起了榔头敲铁钉、钉木板的声音，在一面唱歌一面等待的五个半小时中间，人们作了种种的准备，所以很快就把刚才捣毁了的讲台和桌子全修好了。大家又安静地坐下来，每个人都是笑容满面，充满信心；当然也有例外，坐在左面的几位"导演"脸上不但没有一丝笑意，反而堆满了乌云。"社青同"的领导人也没有同他的团体的成员们共进退，却板着面孔在座位上动脑筋。

大会的闭幕会第三次"开始"了。大会的两个文件《东京宣言》和《关于国际共同行动的建议书》受到了全场热烈的欢迎。接连不断的掌声表示了一万个代表的共同愿望。我拚命鼓掌，我的掌心已经发红、发热，我还觉得我不曾充分表露我的感情，五个半小时的等待并没有给我带来疲劳，我的心已经溶化在一万人中间了。我兴奋地看台下，朝会场的楼上、楼下望，座位上全是人，数不清的手好像是起浪的海洋。我看不出有什么人跟着打手们退出会场。后来听说退出去的人不过一

两百，一万人中间减去一两百，这说明究竟谁是孤立的了。

这时已经过了十点，闭幕会本来还有一项程序：三位外国代表讲话，但是在复会之前由大会总主席同外国代表协商取消了。文件通过以后，我们的施如璋大姐走到麦克风前面，宣读中国七个人民团体写给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慰问信，真是语短、情长、意义深，明确而恳切地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主张。日本代表深深地了解这样的友情，他们用长时间的掌声来接受这样的友情，一句话一阵掌声！当她读到“伟大的、英雄的日本人民万岁”的时候，当她读到“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当她把慰问信和七百五十万日元的捐款支票交给大会总主席的时候，当她同五位原子弹受害者代表握手的时候，连那几个坐在左边位子上一直不鼓掌的丑剧导演人也在拍手了，他们甚至跟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参加了《东京——北京》的万人大合唱，因为我的心已经被突然响起来的动人的歌声吸引去了，我完全没有料到掌声刚刚停止，人们就唱起这首歌颂“美丽的友情”的诗来。并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议，但是每个人心里充满了深厚的友情，感情浓到这样的程度，连从来不唱歌的人也觉得必须唱出自己的感情心才会安静。我唱不成调，也记不住那些日文歌词，可是我的眼眶里有了泪水，我也看见好些日本朋友脸上带笑，眼睛发亮，从眼角滚下来一颗一颗的泪珠。歌声一停，马上又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站在台上，用力鼓掌，我只想到一件事情：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一定会开花结果。一封信、一首歌仿佛就是这一届大会的闭幕词，两国人民的心现在更牢固地

连在一起了。

这以后，年轻、美丽的日本姑娘们代表参加世界大会的日本各团体上台向外国代表献花，大会在《不准使用原子弹》的歌声中闭幕。日本代表们不肯离开会场，他们排成两行，中间留一条路让外国代表先出去。他们仍然在保护我们，也在欢送我们。我高举花束，跟着其他的外国代表走下主席台。左右两边伸过来无数只手，多少带笑的眼睛望着我们，多少亲切的声音说："辛苦啦"，说："再见"。我们同日本朋友不停地握手，不停地说："谢谢"，说："再见"。我的手已经让朋友们捏痛了，可是我非常兴奋，我真盼望这条路没有尽头，至少让我们这样地握手握到天明。我当时是这样想，以后也仍然这样想：这不是普通的告别，人们用紧紧的握手来表示一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友情。

不少的日本朋友把我们一直送上大轿车，许多人跑到车窗外来，同我们谈话，和我们握手。车内车外有一种欢乐的气氛，有一种友好的气氛，人们互相祝贺，现在大家真是在过节日了。汽车快要开动的时候，我们把从会场带出来的花束拆散，将一枝一枝的鲜花分送给车外的朋友。我们大声说"再见"，朋友们在车窗外一面讲话，一面挥手，还有人跟着车子跑了好几步。汽车驶进显得冷清的深夜的东京大街以后，日本朋友的热情的声音仍然留在我的耳边。我仿佛还站在会场内主席台上用力鼓掌，鼓掌。只有车子最后在王子旅馆别馆的院子里停下来，各国代表开始下车的时候，我才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不曾注意到那几个丑剧导演人的下场。这里的"下场"

二字就是“溜出会场”的意思。他们绝不敢在万人注视之下大摇大摆地走出去。我本来打定主意要看够他们的丑态，我还记得康永和同志在台上非常激动地对我说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可是后来我还是忘记了他们，因为我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我看到了那个极其动人的场面：人民的坚强团结战胜了右派的破坏阴谋，一万个日本进步人士亲身体验到中日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伟大力量。在这一天里面，我亲眼见到了胜利，八十几个外国代表亲眼见到了胜利，从各个地区来的一万个日本代表亲眼见到了胜利，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回到旅馆，别的国家的代表们和我们热烈地握手，互相祝贺大会的成功。有人说，自己今天受到了教育；有人说，今夜再也不能闭眼，要好好庆祝这个胜利；有人连声称赞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有人认为应当继续努力保卫胜利的成果。大家异常兴奋，都觉得这一天过得特别有意义。经过了这几个小时的会议以后，新西兰代表，澳大利亚代表，美国代表……一些善良的家庭妇女，有正义感的老太太，热心的和平运动家跟我们在一起显得更亲热了。

我坐在廊上越想越兴奋，我不看表，也没有留意已经点到了第几枝香烟，我忽然发觉夹在左手两指间的烟头快烧到手指了，连忙把它扔在小方桌上的烟灰缸里面。我现在才离开了世界大会的会场。热烈的掌声和热情的歌声听不见了。这周围似乎就只有冷气箱在活动。我感到了凉意，站起来，走到小方桌的另一面，关好了冷气箱。我刚刚在崛田先生先前坐

过的沙发上坐下，便注意到烟灰缸里在冒烟。我把烟头上的火弄灭了。烟灰缸里有几根剩了半截的烟头，那是崛田先生留下来的。我见到它们，就仿佛看见崛田先生坐在我的对面，一边讲话，一边抖掉烟灰，又仿佛看见他那好心的笑容。我想起来，崛田先生应当到家了罢。他在他那所小山上美丽的宅子里，舒适而安静的书斋内，会不会想到我先前的那段谈话呢？他是不是以为我讲的也只是分别前的客气话，我真要把丑恶的印象带回中国去呢？……我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我多么惋惜我失去了同他长谈的机会。但是我一定要把我那些未完的话和倾吐不尽的感情记在纸上，倘使我能够写出我对于正在英勇地进行反美爱国斗争的伟大的日本人民的敬爱之意，哪怕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我也可以安心了，我献出了自己的心来报答日本朋友对我们的无限深厚的友情了。

1962年9月26日追记。

向着祖国的心*

最近一个时期我的工作稍微多些，有时夜深回到家里，我不想读书，也懒得拿笔，便坐在写字桌前，在绿色灯光下，翻看照片。孩子们早睡熟了，整个宅子里就只有我一个醒着。我一张一张地翻过去，人活起来了，花树也随风摇动了，我看见了笑容，也听到了声音。我的眼光可以在一张照片上停留十几分钟。仿佛有人在对我讲故事，我听着，望着，我渐渐地忘记了疲劳。

我年轻时候不喜欢照相。在照相机前或立或坐，我都感觉到手脚无处放。因此我保存的旧照不多，而且在有限的照片上我不是露窘态，便是带愁容。近十年照相的机会渐渐地多起来，然而像最近这样在书桌上和抽屉里放着一大叠照片反复地翻看，却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这些照片都是我去年春天访问日本时的留影。其中有些是我自己带回来的，有些是从日本寄来或者由日本朋友带到北京和上海交给我的，还有一部分则是华侨同胞的赠品。

一位侨居东京的年轻朋友去年托人带来了一大叠照片。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上海文学》八月号。

我到日本访问以前连这位朋友的名字也不曾听人讲过，可是我们一见面就非常熟，我甚至习惯了简单地称他"小韩"。他丢开自己的工作，陪我们代表团走了不少的地方，还给我当了将近一个月的义务翻译。最后他送我到机场，不得不在甬道口和我握手告别，他和多数送行者一样，只能立在平台上栏杆前望着我们上飞机。我在机舱口对着平台挥手，也看见他的手不停地舞动。在他的身边那几个华侨学生早就流了眼泪。要不是机上的人连声催促，我很可能在舱口站上十几分钟。平台上一两百人的声音高呼"再见！"有日本话，也有中国话，我分不清哪一个声音最熟。每张脸对我是同样地亲近，我的眼光刚刚接触到一位"亲人"的面颜，马上又给旁边另一张脸吸引去了。那个时候我差一点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我真愿意长出两只大手把所有的人全抱在怀里。

我今天还珍惜当时的感情，那种恨不得把所有朋友都拉到自己身边的留恋之情。但是我不像当初那样地激动了，近半年来常常怀念个别的朋友，想念得厉害的时候，我只有求助于照片，我多么想再见到许多熟人的笑脸。那位年轻的华侨朋友是业余的摄影家，他用胶卷为我们这次友谊的旅行作了很好的记录。我不曾料到他会给我捎了那么一大叠照片来。照片上虽然没有他的影子，可是我每次翻看它们，我首先就想到这个诚恳而热情的年轻人。在日本我和他天天在一起，却没有畅谈的机会。他为我们的旅行从早晨一直忙到深夜。有时我劝他："早些休息罢。"他只是客气地笑笑。有一次在东京他陪我在外面活动了大半天，回到旅馆，我偶尔听人说，他不

大舒服，下楼去看他。他换上了和服，盘腿坐在“坐蒲团”上，头俯在小桌上面，在明亮的电灯下专心地写字。我又劝他休息，他说不要紧。他放下笔望着我笑笑。在他的微笑中我看到了这样的意思：“日本朋友都那么热心，我怎么能休息？”还有一次在镰仓的旅馆内，一片新绿的庭院里，我们沐着春天早晨的阳光，在带露的草地上散步，我说：“我们走后你也可以得到休息了。”话是无意中讲出来的，惜别的感情马上赶走了我的笑容。他说：“我倒愿意你们多住些时候。祖国的人来得越多，我越是忙，越是高兴。”他讲到“祖国”两个字，声音里充满感情，好像在讲他最亲爱的人一样。用不着更多的解释了。我想起了一个在日本出生的华侨学生说过的话：“我看见你们就好像看见了祖国。”这样的两句话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在访问日本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办完了一天的事情，在床铺上躺下，从容地关上电灯，闭上眼睛，我总觉得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在旁边守住我，保护我，我每晚都睡得很熟。二十几年前我在同样的东京就得不到安适的睡眠，躺在床上，常常耽心门一开，电灯一亮，便有人来把我带走。现在在东京或者别的城市，就在我们住处的附近，我们安稳地睡着的时候，朋友们还睁着眼睛为我们操心。有一天听一位日本朋友谈起，我才知道有不少的人在暗中守护我们，这里面当然也有我们的华侨同胞。这一个月中间我们的体重不断地增加，却看见一些朋友渐渐地消瘦。朋友们在闲谈中甚至流露出如下的感情：这样地瘦下去是莫大的幸福。我起初还以为这是客气的表示，后来分别的日子近了，我突然发觉时间过得太快，我开始暗暗

地计算起和朋友们相处的钟点来，我这才感觉到幸福的说法并非虚语。

在我和华侨朋友相聚的最后两三天里面，我常常想起一位慈母的笑容，祖国母亲含笑地望着她的孩子们。不论是远离膝下的或者就要回到她怀抱里的，对母亲都有同样深的爱慕。为什么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刚刚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那样亲热呢？有些人彼此间连名字也叫不出来，可是感情十分融洽，仿佛相处了十几年的亲人一样。一位华侨女生从横滨来，担任冰心大姐的译员，她们住在一处，互相照顾，真像一对母女。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喜欢这位"女儿"，也跟着冰心大姐叫她小缪。有时我和别的同志结束了一天的活动回到旅馆，换上和服到她们房里小坐，听冰心大姐的讲不完的小故事；有时冰心大姐带着小缪到我的房间来串门。虽然在陌生地方的客舍里，我也感到了和睦家庭的乐趣。我们回国以前的前几天里，有人对她们笑着说："你们分别的时候怎么办？最好多带两张手帕。"其实在羽田机场平台上栏杆前流眼泪的岂止一个小缪！那么多的眼泪！却没有一点悲伤。在小缪带泪的脸上我看出来这样的意思："我一定要回到祖国！我一定要回到祖国！"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性情温和，戴近视眼镜的苍白色脸上总是露着温和的笑容，她习惯了用日本腔讲中国话，可是在和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她话中的日本调子逐渐在减少。她毕业后回国服务的决心是极其坚定的。过几年我一定会在北京见到她。"北京"，这两个字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谈起下次的会见，这个文静的姑娘脸上立刻有了血

色，她的眼睛也在镜片下面亮起来了。对于不曾见过祖国面貌的青年（我在日本遇见不少这样纯洁、可爱的年轻人），天安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都是比仙境更美的地方，北京便是东方的太阳，五星红旗；又庄严，又亲切，永远飘扬在他们的心上。

只有在飞出国境以后，我才了解五星红旗在远离祖国的人们心上占着什么样的地位。远航机刚到东京羽田机场的上空，我从玻璃窗内朝下望，机场上数不清有多少面五星红旗，我只见一片鲜红耀眼的殷红。我的心突然跳得厉害了，我大声说："我们的国旗！"同志们一齐把眼睛掉向窗口。我觉得自己的身上凭空添了一股力量。我真想跑到红旗跟前，一一地亲着它们。

这是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我们的五星红旗。后来听小韩说，这些国旗都是华侨们带去的。祖国代表团的到来便是华侨们的欢乐的节日。以后我们访问其它的城市，走出车站，总有高举国旗的华侨同胞迎接我们。在长野县，一位中年华侨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我终于盼到你们了。"他笑着，眼眶里却亮着泪珠。这个普通的商人并不是文学的爱好者，他盼望的是从伟大的祖国来的亲人。他十年来听见的许多好消息现在有机会得到证实了。

我还记得那个四月的夜晚，日本友人在华侨开设的酒楼为我们举行的宴会刚刚结束，就在这家酒楼（我忘不了它的名字：光荣亭）的三楼上另一个精致的房间里，我们又和二十多位华侨同胞在一起过了一两个钟点。这是令人难忘的聚会，

气氛和睦而又严肃，侨胞都是中年人，对我们讲话非常激动，而又十分恳切。会后听见人说，他们在这里很少见到祖国的亲人，现在同我们在一起，好像接近了祖国。他们有满肚皮的话，不知道应当从哪里开始，因为相聚的时间有限，而我们和侨胞交谈还需要翻译同志帮忙，这里的侨胞只说闽南话和日语。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太多，每个人都有不少的问题，可是商量了一阵，他们只要求谈谈大家最关心的事，那就是祖国的建设和近年来我们农业所遭受到的自然灾害。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们都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他们的眉毛舒展了，笑容显著了，声音不再颤动了。一位华侨朋友忽然兴奋地站起来发问：祖国每年生产多少辆汽车？我没有料到我们讲的数字会使他鼓掌欢呼。我记起来了，这天下午我们从松本市乘观光汽车去长野，半路上看见一辆车头插国旗的漂亮小轿车驶来迎接我们，这一面小幅的国旗把我们一车人引进了长野。车站广场上有不少面大红旗和响亮的呼声在欢迎亲人。小轿车的主人一直站在行列的前头，不停地高呼，不断地鼓掌，欢迎会结束以后，他又自己开车送我们一长串的汽车到旅馆。就是他！他的年纪不会比我的大，可是笑起来，脸上有那么多的皱纹。他生在台湾，从未到过大陆，过去受尽了欺凌和嘲笑，在外国人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和人谈到祖国，只有摇头叹息。因此他听见任何好消息，都是半信半疑。现在我们给他证实祖国一年生产那样多的汽车，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第二天中午我们出席日本朋友的送别酒会，这位热情的华侨同胞也在座。酒会结束的时候，宾主们胳膊挽胳膊围成一个大圈子，上

身向左右摇摆，高声齐唱《东京一北京》的歌。他站在我的斜对面，他的歌声特别响亮，身子摇得特别厉害，唱到最后他甚至发出快乐的叫声，他高兴得忘记了自己。他还用那辆插了五星红旗的小轿车送我到火车站，他一面开车，一面小声唱歌。只有我们在月台上握手告别的时候，他的笑容才完全消失，眼睛里出现了泪水。

拥挤在月台上的送行者中间，有不少的华侨同胞，长野县华侨总会的负责人都来了。他们好像在送别远行的弟兄一样。好几个人对我倾吐他们真诚的愿望："愿祖国一切都好。"列车在一片"再见"声中开出了长野车站。我拿着光荣亭的主妇刚才递给我的长野县著名的点心，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建筑物，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火车头拖着我的心往前走，它不愿意这么匆匆地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在长野县只待了二十个钟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会培养出这么深的友谊。今天翻看照片，我还会动感情，我还想起那一包可口的点心。日本人有许多很好的习惯，他们在礼品的包装上也肯花费心思，哪怕是极普通的东西，递到你的手里，首先教你感到干净、美观。长野县的点心是用糯米做的甜食。我忘了它的名称，但照片上还留着它好看的外形，那是光荣亭会见的留影，主人用茶点、水果待客，房间里一个角上有盛开的盆花，墙上有上海外滩的风景（不用说，那是杭州都锦生的出品）。在这样的欢聚中我第一次尝到了长野县的名点，我的确喜欢它。我把这个珍贵的礼物带到金泽市，在离开那个文化古城的前夕，我听说同行的龟井胜一郎先生爱好这种甜食，就带着它到龟井先生的房间，我

们八九个人用点心下啤酒，有说有笑地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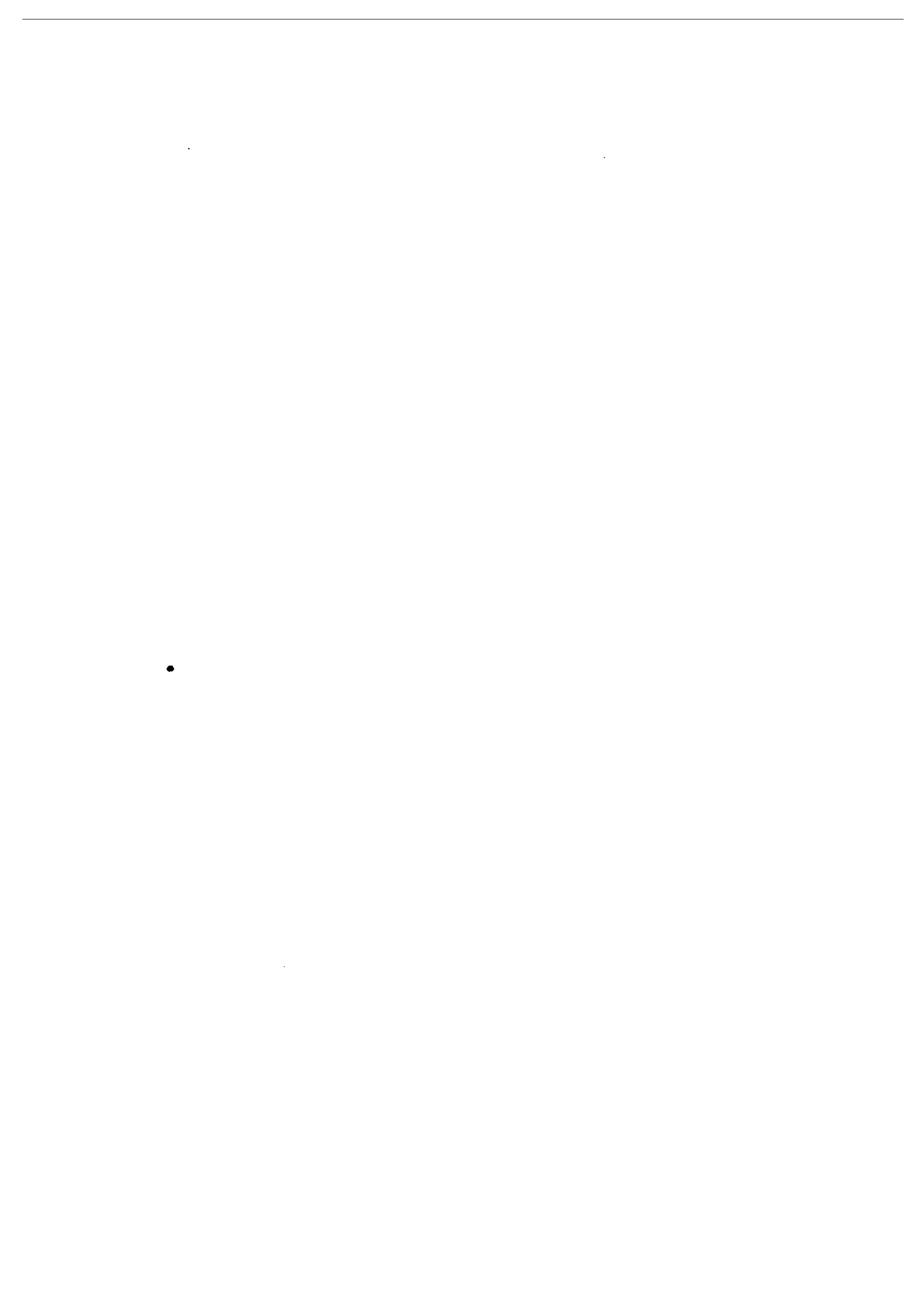
我手边还有不少访问长野县的照片，都是小韩托人带给我的。另外有彩色照片两张，则是代表团中一位朋友的摄影。颜色异常鲜明。两张照片的背景都是长野县犀北馆的大门口。在头一张照片上我站在小轿车旁边，插在车头的一面小小的国旗衬着淡青色的车身，显得殷红耀眼，挡风玻璃上还映出来横斜的树影。第二张是我和六位华侨同胞的合照，我们站在那辆汽车的后面，国旗看不见了，画面上非常素净，汽车的主人站在我的右边，永远是他那种令人注意的笑容。先前在送别酒会上他还和我碰过杯，现在又赶到我们住的旅馆来，准备送我去火车站。昨天我们还是陌生人，今天我们却是心连心的弟兄。我们站在长野县一家日本旅馆门前拍照，脸上都露出幸福的笑容，因为大家都看见了伟大的祖国。照完像我便匆匆坐进华侨同胞的车子，美丽的五星红旗在车头飘动，引着后面十多辆出租汽车前进。那位亲自开车的华侨朋友几次回过头看我，得意地说，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高兴。

在那一个月中间有不少的华侨同胞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到长野之前，在东京华侨总会的盛大宴会上，我亲眼看见一两百个酒杯高高地举起，大家热烈地为"我们最亲爱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祖国"干杯。在甲府市，我们参加了欢迎酒会回到旅馆，当地的几位华侨已经准备好酒菜在等候我们了。真正中国风味的可口的菜点。在一个不算大的房间里，十几个人坐在日本席子上，毫无拘束地谈着大家关心的事情。我们哪里吃得下那么多的东西！可是主人还不断地打电话出去

要菜要酒。看那种豪气，好像要请我们把他们所有的一切全带回祖国去。我们真的把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他们的心带回来了。游子的心是永远向着母亲的。……

这些照片陪伴我度过了许多安静的夜晚。薄薄的纸上好像有讲不完的千言万语，有吐不尽的深厚感情。我看见了亲人的笑脸，听见了热情的语言，接触到燃烧的心。我想起在东海的对岸，我有那么多的朋友，祖国有那么多"心连心的子弟"，我感到幸福，我感到自豪。我望着眼前摊开的照片，忽然起了一种愿望，我愿我的心能够跳出口腔飞起来，飞到日本，飞到华侨朋友的面前，告诉他们我现在所想的一切，告诉他们："祖国一切都好。"

1962年6月底。



贤良桥畔

《贤良桥畔》，一九六四年九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

致江南同志*（代序）

在月光如水的上海的春夜里，我刚刚听完电台广播员报告的国际新闻，我又听到了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捷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了您，在越南南方进行反美爱国斗争的敬爱的诗人同志，我从写字桌上抬起头，眼睛对着墙壁，望着书橱，又仰起头望天花板。其实我不是在看什么，我在想象你们那里明亮的河流同青葱的椰林，我想让越南美丽的河山重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跟随我的心去到你们中间。您一定明白我这个意思，因为在《我的心永远在英雄的人民中间》里（我感谢您在你们的《解放文艺》杂志上发表了我的文章），我不曾说一句假话，我的心的确留在越南。我没有一天忘记你们人民的伟大斗争，也不曾忘记你们为了这个斗争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越来越多的胜利消息给我带来极大的喜悦，我常常兴奋地计算着越来越近的最后胜利的日子。您可以想到我多么高兴地读着您来信中这样的话：

我们和您的心情一样，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您的梦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香港《文汇报》。发表时题为《这样的一天——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

景一定会成为现实。您将亲眼看到不屈的槟榔椰子林和英雄的金瓯河流，您将同您盼望了许久的越南南方的战友紧紧地握手。这样的一天一定不会很远了。

敬爱的诗人同志，共同的坚定的信念把我的心和你们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把我的梦景不停地引向现实。在我这间清静的屋子里，您的热情的语言发出耀眼的光辉，我默默地或者高声地念出您信中的话，在浅黄色墙壁上，在白色天花板上，会接连出现战斗的场面和胜利的场面，会接连出现在阳光下灿烂发光的河流和迎风舞翼的葱茏的椰林，会接连出现一碧无际的稻田和望不断的雄壮的英雄行列……

我没有机会同你们一起工作，一起战斗，我甚至不能到你们的面前，向英雄的人民表示敬意。我只能站在贤良江边朝南方眺望，我立了许久，可是除了伪军伪警，我看不见对岸一个人影。在北方我见到不少一九五四年集结北上的干部，我听见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为革命、为解放、为胜利、为人民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英雄形象在每个越南同志的记忆中，都占着很崇高、最亲密、极显著的地位。不仅在越南北方到处都有人对我谈南方的斗争，中国人民也非常关心在你们那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把你们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这绝不是夸张的话。在上海，我接待过从你们中间来的客人，年轻的诗人青海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我的写字桌的一个抽屉里今天还放着青海同志的诗集《忠实的同志》的英译本，这本印刷精美的小书是一九六二年由越南

南方解放出版社刊行的。这是青海同志送给我的一件宝贵的纪念品，它也是我保存着的唯一的南方出版物。书上还有这位南方诗人在上海留下的笔迹。我经常翻看这本小书，看作者在扉页上的题字，看卷末的诗题，我每次总要念一两首诗：念着它们，我好像到了越南南方；念着它们，我仿佛接触到了英雄人民的火热的心（我后来读在河内出版的《南方来信》，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念着，念着：《母亲望着幼儿》、《你的坟前开放了鲜花》、《香江的歌》、《探望母亲》、《不，他不会回来！》等等……不用说，这些诗您都熟习，而且在你们那里一定流传着更多的人民喜爱的诗歌。我知道您也写了不少的好诗，可惜我只读到收在《两岸歌声》里的两首：《家乡》和《纺车声》。我永远忘记不了您那位参加了游击队给敌人杀害了的、有一对“圆圆的黑眼睛”的、爱笑的邻家姑娘；我也忘记不了那个宁死不肯向自己同胞开枪、却高呼“敌人就在我们背后！”的伪军士兵。今天，我的眼前还常常出现染着姑娘鲜血的红土；在我的耳边“亲切、深情的纺车声”也“永远不断”。青海同志的诗句也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引到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越南南方，在我的心上也刻印下许多令人毕生难忘的场面：——母亲抓住监房的铁格子，望着在外面爬行找妈妈的幼儿，她再也不能给她喂奶了。……敌人杀死了共产党员，“不准任何人埋葬他！”可是他们刚刚走开，全村的男女老幼便用红漆棺材把死者送到墓地。烈士的墓筑在高山上，墓前种了一株玫瑰，花开时节，远近一片浓香，刽子手们打从这里经过，他们凶恶的眼光不敢朝坟前望：坟前鲜艳的红花，仿佛就是烈士的鲜血。

……在横贯古都顺化的香江上，船家女划着小舟送一个不相识的青年战士从前线去另一个地方。他们唱着歌交谈彼此的心情。他们在香江分别，又在香江再见，再见了又分别，可是歌声把他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一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两年前他被捕的时候，留下母亲和妹妹在家里，现在家门前长满了青草，他隔着荆棘篱笆高声呼唤母亲："娘，阿娘，我回来看你了！"可是小院里野草长得像人一样高，房屋空空，不见一个人影。……刽子手们捉住年轻的妻子，对她叫嚷："你的丈夫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向政府投降？"他们逼她，打她。她的回答仍然是一样："不，他不会回来！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们用毒刑拷打，打得她满身鲜血，她快要死了，忽然挺胸站起，眼里燃着怒火，狠狠地瞪着敌人。……

我举出这几首诗来说明：我怎样生活在你们的痛苦和愤怒的中间，怎样生活在你们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定的胜利信心和热烈的团结气氛的中间。我的心跟随着你们经历了那些漫长的、艰苦的岁月，现在它又和诗人一起高唱《欢乐的春天的歌》：

登上山头，仰望广阔的蓝天：
"我们已经壮大，胜利为期不远！"

我举出这几首诗来说明：我们多么重视、热爱从你们那里，从长期坚持战斗、越战越勇、越打越强的英雄人民那里传过来的文学作品。从你们笔下出来的，从你们生活中、斗争中产生的一切，即使是片纸只字，我们也看得像宝物一样：它们

传到我们身边，永远放光发热；它们留在我们的心上，一直培养我们的高尚的情操。

敬爱的诗人同志，我并不是在抒发个人的感情，对于抱着必胜的决心，用血、用生命、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同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人民，每一个中国人都怀着极大、极深的敬意。美帝国主义是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它在我们这里也欠下一笔血债，中国人民一定要向它讨还。它至今还霸占着我们的台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美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谋诡计、任何罪恶行为，都不能使它奴役全世界的妄想变成事实；刚刚相反，这一切正像您所说的那样，"是为它自己挖好葬身的坟墓"。你们抗战救国的力量不断的壮大，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的壮大，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走狗们想尽千方百计、使尽恶毒手段所推翻不了的。它明确地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方的日子不远了！美帝国主义滚出台湾的日子不远了！美帝国主义滚出亚洲的日子不远了！……

敬爱的同志，你们和我们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共患难、同命运、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战友。你们，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对这个正义的斗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连续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支持，也是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持和鼓舞。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都不会忘记你们中间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你们是这样一种人：打不倒，杀不绝，受到酷刑拷问，

打得遍体鳞伤，只要有一口气还要进行斗争；为了祖国的利益，可以勇敢地跳进火堆里去，也不怕给敌人活埋；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站出来接他的班；用最简单的武器也能够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把头号帝国主义打得手忙脚乱，张皇失措，越陷越深，进退两难。这种贯长虹、吞日月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是任何反动势力所抵挡不住的。中国人民、中国文艺工作者都认为，有你们这样的战友，是可以引为自豪的事情。你们的豪迈的声音，一直是鼓舞我们前进的雄壮的号角。

现在，皓月当空，人声静寂，在你们那里应当是一个温暖的月夜罢。我想起了香江上的月光。我的眼前仿佛突然出现了"像年轻女人头发那样闪光"的水面，美丽的船家女摇着桨，唱着动人的顺化民歌，缓缓地经过，我又见到了诗人描绘的场面。我也看见在河内植物园里出现的"香江景色"。在我的案头正摊开一张《越南画报》上复印的照片。在河内举办了"访问南方日"的活动，在那一天，十万以上的河内居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到植物园来"作客"，他们是到一些"南方城市"来"作客"的：这里有"香江"的景色，也有"高原"的风光。植物园门前除了"访问南方日"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大字："我们肉里的肉，我们血中之血。"画报上的标题也是这样。真是，人们的心何曾有一个时候忘记过南方？生长在承天省的诗人素友同志曾经如此激动地唱出了越南人最深的感情：

啊！叫人如何能忘情？

我们心坎深处的南方……

这样的诗句一直绞揉着我的心。今天在顺化，再也见不到美丽的香江景色了。听说“沿江都是海军兵营，每天敌人的装甲汽艇，像一群逐食的恶魔，不断地撕破了平静的江面”；再也看不到“凤凰花开、一片火红的景象”了，“凤凰树都给砍个精光”，为了“便于敌人的军车迅速来往”①，刽子手们、野兽们用刀、用枪、用火毁了一切，连佛教徒也不能幸免，正像另一位家乡在南方的诗人所描写的那样：

美国强盗正把一斤又一斤毒药，
倾泻在人们头顶；
正把枪尖瞄准婴儿的摇篮，
踩在天使臂膀的靴上布满了利钉；
每个村庄都已传下可以随便杀人的命令，
连伪村长也有权杀害好人，
美国旗指向死亡的墓穴，
每棵树丫枝上都吊着尸身！

我怀着充满愤怒和痛苦的战傈的心读了制兰园同志的诗句。然而现在不再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了。连香江上的船家女也早已变成身经百战的游击英雄了。

我又想起了贤良桥畔的明月。宁静的水上随风送来呼唤

---

① 引自一封从顺化寄出的信。

亲人的民歌。月光下，桥显得更长。这座让人用两种颜色分隔开的长桥，它什么时候才能够把南北两岸连接起来呢？它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您、把你们迎接到北岸来呢？什么时候我才有机会通过这座桥到您面前、到朋友们面前，同你们紧紧地握手，倾吐我无穷无尽的尊敬、感谢和友爱之情呢？……

我想着，想着，我出神地望着浅黄色墙壁和白色天花板，仿佛那里就是月光照耀的贤良江，我等待着回答。……我忽然觉得眼前一亮，精神一振，我得到有力的回答了：

这样的一天一定不会很远了。

这是您来信中的一句话。我用不着等待别的什么了。

这样的一天是一定会来的！而且绝不会很远。到了三千万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完全实现的那一天，到了我同您见面的时候，我一定要紧紧拉着您的手谈个没完没了。可是现在呢，敬爱的诗人同志，那么就让我访问越南归来后写成的这本小书，代替我心里的千言万语，向您，向越南南方解放文艺协会主席陈有庄同志，向南方的战友们，也向越南作家协会的同志们，向所有北方的朋友们，向全体英雄的越南人民，表达我的说不尽、讲不完的敬爱之情。请您，请你们接受我这个小小的礼物罢，我们中国有句俗话："礼轻人意重"，因为同它一起，我还献给你们我的心。

让我们两国人民永远携手前进！

1964年5月，上海。

携 手 前 进*

——写给一位越南作家

一

接到您从河内寄来的信，我刚刚读完头一段，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您站在三岛山休养地木屋门前频频挥手的情景，亲爱的朋友，您不会想到我那个时候真想请司机同志停下车来，让我同您在一起再过一个早晨，再谈一个早晨。汽车渐渐地弯下山去，您的脸早已被房屋、树木和山坡遮住了，可是我的手仍然在车窗里轻轻地挥动。我多么希望我这只手能够表达出我当时的心情。

汽车在平坦的马路上开得又快又稳，您认识这位在巴黎开过车的熟练的司机同志，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聚餐，您和我还兴奋地同他碰过几次杯。他和所有的越南同志一样，对中国人民有非常深的感情，待中国来的客人就像待自己的弟兄。一个月中间他开着车子跑了几千里路，到过好些城市，让我们看到不少的东西，学到不少的东西。常常在一天紧张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收获》第二期。

劳动以后，他把小轿车开进了车棚，抖掉了身上的尘土，拿着他那个茶缸到我的房间里来，找热水瓶倒开水沏茶。他和我有着同样的喝浓茶的嗜好。他端起茶缸，带着满意的、友好的笑容走下台阶，这情景至今还很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又去照料他的车子了！"我常常亲切地这样想着。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在车上，每次到了目的地停下车来，他总要把车子仔细检查一遍才肯休息。夜里有时他就在车棚里拉起一顶帐子，睡在他的车子旁边，睡得十分安稳。他像爱护亲人一样地爱护他的车子，他从没有耽误过我们的工作。这一天他仍然很镇静地开着车子前进。他只想早一刻把我们送到河内的宾馆里休息，却不明白友情正把我的心拉回三岛。坐在我旁边的東为同志是和我有同感的，我们不止一次地谈起您。在兴安省第一次的会见中，您就向我们敞开了心，您恳切地叙述了您的创作生活，坦率地说明了一个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道路，最初的徬徨和后来的坚定……我们两个新从中国来的客人都在您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永不熄灭的火。这股火吸引着我们。那个阴雨的早晨我们谈得多么痛快！其实应当说是您讲话，我们记录，您一个人谈了那么多！而且谈得很生动！可惜的是那一次座谈的时间只有三个小时，第二天我们便匆匆地离开了您。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次的分别。我们是在水利模范范氏璧姑娘家乡的对岸上车的。我们要赶到河内去参加招待会，无法等到渡船开来过河去停留几十分钟，只好站在岸边，望望河水包围中那块碧绿的土地，万绿丛中露出了几家屋顶。从兴安陪我们来的同志指给我看那一片长得很好的麻，说麻地外面还

有一道堤，可是我看不清楚。这样茂盛的草木绝不会叫人想到四、五年前那里还是穷苦的地方。范氏璧同志为这个地方的大变化尽了她应尽的力。她年纪轻轻，又缺乏经验，当初动员筑堤，老年人说是"梦想"，还有人说是"胡闹"，她却响应县委的号召，不顾人们的阻挠和父母的责骂，说干就干，边学边干，而且拚命地干，靠着他们十二个年轻人（八女四男）组成的青年队带头苦干，常常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失败了又重来，从不灰心泄气；终于在一个月以内，在发水之前完成了任务。正是这个良好的开端推动了整个地方的工作：水利搞好了，生产增加了，过去每年只生产四个月口粮的穷地方，现在已经办到自足自给了。范氏璧同志被家乡的人称为"脱笼的小燕"，这只"小燕"冲破了封建的笼子飞得那么高，没有人料到她会给她的家乡带来美丽的春天。当初她挨过多少骂，受过多少歧视，但是她不曾跟着保守的父母后退一步。恰恰相反，她用种种办法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前一天她对我们讲她的事迹，她声音不高，眼光向下，那张满月脸带着笑容，仿佛是一位很文静、很谦虚的姑娘。可是人们说她干起工作来，那股顽强的劲儿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她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在省人委办公楼前和大家一起照了相，在宴会上又不断地同我们碰杯。她谈话少，我却见到她多次亲切的笑容。她一身白衣黑裤，装束朴素，讲话朴素，连她的笑容也是十分朴素的。我起初只注意到她的左胳膊有点不方便，比右边那只粗一些，她坐下来，左胳膊下面要垫一方毛巾。晚上我们同她一起去小礼堂看"嘲剧"现代剧《绣头巾》的时

候，我也只知道她看得满意，我听见了她愉快的笑声。只有在第二天早晨她要回家时，我才听说，前些时候，她去海防作报告，骑自行车，把胳膊摔坏了。我问她：痛不痛？她微微摇头，含笑回答：不痛，快好了。旁边有人插嘴解释：她才不在乎这点小伤，仍然照常干活，还是到处作报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她看了插话人一眼，好像怪他多嘴。不过她也不讲什么，还是带着她那谦虚的笑容，一只手拿扇子，一只手拿折好的毛巾慢慢地走下楼，出了大门，去了。

我忽然插进这一大段话，谈那位可敬爱的姑娘，不仅因为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主要的还因为您刚刚脱稿的电影剧本的主角就是一个像她这样的少女，而且也正是您和那位宣教科科长同志引我到这里来，让我看看过去只是在童话里才有的这种美妙的变化，让我把人和土地连在一起，把英雄模范的两只手和劳动的果实连在一起，把优美、朴素的心灵和繁荣、兴旺的景象连在一起。我感谢你们的用意，我的确从兴安省带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和你们握了手上车以后，我很兴奋，而且充满信心：我的脑子里又装了不少可爱的人和不少可爱的地方。

我讲的是第一次的分别。车子开动的时候，我看见了您的眼光。这短短的一瞥！我后来常常记起它。您的眼睛红了，眼光里流露出信任和留恋，也表示了弟兄般的友爱之情。一路上我都在回想：我们同您这次的会见和交谈。……还有那位科长同志，他的惜别的眼光也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虽然那天分别以后，我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但是他那热情的语言，

他那深厚的友情，他那恨不得让我们在两天半的时间里把一切应该看的东西全看到的好意，我到今天还不曾忘记。我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看，您和科长同志也是这样。在五十九公里的公路上，汽车跑得很快，我的思想却不肯跟着车子前进，它一直留在你们的身边。你们坐的小嘎嘶车正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我们越来越离得远，可是心反而越靠得近。雨点落在铺满尘土的公路上，天空中的黑云越聚越厚，关紧了玻璃窗的车里有些气闷，但是我望着车窗外的田野和树丛，我总觉得眼前流着徐徐不断的水，这是我们在这个上午参观过的胡伯伯河同和平河的水。

我在前面刚刚讲过"火"，接着又提起了"水"，我当时的感觉的确是这样。我的感情里并没有矛盾。我一方面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又感到舒畅。和你们在一起交谈，我多么激动，我接触到了你们的火热的心。我看到许多兴旺气象，看到无数展示着丰富生命的草木、瓜果，一片可爱的绿色轻轻地揩着我的眼睛，在阳光下发亮的流水洗着我的眼睛，我的眼前非常清亮。就是这流水改变了这个十年九旱、一涨水便给淹掉的地区的面貌。也就是这许多火热的心创造了奇迹：开运河，搞水利，跟自然作斗争，教土地听吩咐。我们到兴安的那天晚上，主人为我们放映了介绍本省水利建设的纪录影片，我特别喜欢影片的名称：《金水银饭》。离开兴安的早晨，你们陪着我跑了几个地方看"金水"，我立在岸边，出神地望眼前从容流着的水，有的岸边绿树丛生，水也带了绿色，有的地方水面在阳光下发亮，我想起科长同志对我讲的那个瞎眼老人的故事：老

人不相信人力能够改造自然，运河修通了，老人叫他的孙儿带他到岸边去看，他听见水声，高兴得做了诗唱起来："每一个过路人都应当停下来看看这儿……"我多么羡慕那些能做诗、能唱歌的人！（您和科长同志便是其中的两位，我的提包里还有您写给我们的诗，也有科长同志送给我的诗集。）我用什么来表示我的激动的心情呢？我又用什么来表示我的愉快的心情呢？同你们在一起望着"金水"的时候，我是这样地想；跟你们分别后我在汽车里回忆我们的会见和交谈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地想。我在这里用了"愉快"和"舒畅"的字眼来谈我的惜别的感情，因为我从你们带泪的眼光里看到的不是悲伤，而是希望和幸福。我和你们相聚，和你们恳切、坦率地交谈，那些时候我也同样地感觉到幸福，我也同样地感觉到我们面前到处都是希望。我在你们英雄的国家里，每到一个地方，结交一些新朋友，处得好，谈得融洽，往往在短短的相聚之后就是分别，并且还有可能在长时期中见不到面，我向朋友们挥手告别的时候，我也难忍住我的感动的眼泪。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感伤，而且后来仔细一想，我觉得朋友们仿佛仍在我的身边，或者我仍在朋友的面前。我们在精神上始终不曾分离，因为把我和朋友们连在一起的并不是普通的友谊，而是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而是美好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想。所以在那五十九公里的路上，我的耳里一直响着这个喜悦的声音："我有了更多的朋友了。"我有一种充实的感觉，我又觉得自己的力量在增长。

有了更多的朋友，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我指的是有着共

同语言的朋友，在兴安和在其他地区一样，我结交了不少的新朋友，我带走了你们的友情，带走了难忘的印象，我还带走您赠给我和束为同志的诗：

……昨天我们已经相识，
今天的畅谈更难忘记。

亲爱的朋友，我们三个人的谈话还是在炎热的夏天里挥着汗进行的。然而现在已经是我坐在门窗紧闭的书房里也会感觉到寒气的侵袭、我的两腿开始发痠的冬夜了。

二

亲爱的作家同志，我在寄出给您的回信的那一天开始写这篇东西，我并不是一口气写了许多，我只有在怀念友人的时候，在空下来想同远方朋友谈话的时候，才找出这一叠稿纸，在书桌上摊开，仿佛您就坐在我对面，我拿起笔在稿纸上写字，如同我在兴安省人委办公楼那间会客室里同您交谈，或者在三岛休养所木板搭成的客室中对您讲话。但是您看，我写得多慢，我常常写了一段，又不得不把稿纸收起来，因为我有别的事情，后来我还飞过东海，去日本作过一次愉快的旅行。在日本我也有许多敬爱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把我的心常常拉向那里。同日本作家们欢聚畅谈，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快乐。但是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的一个月里面，不断地想起您，也想起越南的作家们。我在奈良和京都欣赏了日本美丽

的秋天的景色；在箱根旅馆窗外一片红叶的舒适的小屋里，我和日本作家有过恳切的交谈；我也曾到一些作家的家中作客，像同自己弟兄在一起谈笑一样，不感到一点拘束；我也曾站在敬爱的前辈作家面前，我们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互相倾吐最深的感情。在那些时候我并没有忘记您，并没有忘记我的越南朋友；我还想起风景如画的下龙湾和三岛山，我也想起干劲冲天的兴安，我更常常怀念处在反美斗争前线的永灵。在永灵，在洞海，接连两个夜晚，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为我们唱了许多中部和南方的民歌。那些优美的民歌不是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便是洋溢着热爱祖国的感情。就在那两个晚上，我们向越南同志们告别的时候，一位区委副书记和一位省人委委员同我们紧紧地握手，大家感情激动地互相鼓励：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这样庄严的决心，这种心连心的友谊，我永远不能忘记。您当时虽不在场，可是我觉得您的心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您早已用别的语言表示了这种决心和这种友谊。后来在三岛和您重聚，您又送给我您刚写成的新诗《美丽的形象——孙悟空》：

…………

中国人民挥动手膀，
千变万化，多少如意棒也比不上。
帝国主义、殖民者都是妖怪，
在革命的巨浪中，正奄奄待毙。
现代的金箍棒

要它们命终。

您好，东方灿烂的太阳，

咱放声歌唱孙悟空，

咱爱中国——友人——英雄。

我没法读您的原诗，只好请年轻的翻译同志把它译成中文，我一边念译文，一边看您的手迹，那些龙飞凤舞的字迹给我带来您的真诚的友谊、热烈的心和革命的热情。这一切已经印在我的心上。我怎么能不想到它们呢？我怎么能不常常想到它们呢？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你们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说，我们在精神上永不分开。访问了日本回来，我更觉得这句话是何等真实的了。

我们的"谈话"中断了将近三个月，我又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折叠好的稿纸，慎重地将它们摊开，好像见到久违了的老友一样，每一行字迹对我都显得非常亲热。我捧着写满了字的稿纸，仿佛握着您的温暖的手，我不觉念起了您的诗句："您好，东方灿烂的太阳……"

亲爱的朋友，您写了多么好的诗，今天早晨，我继续对您"谈话"的时候，窗外草地上正摊开一片阳光，东方的太阳的确十分灿烂。这一轮鲜红的太阳，不仅照在我们的上空，也照耀在你们的上空。你们的前途和我们的前途一样，都是无限光明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句多余的话，因为您和我，我们两国作家，我们两国人民，大家都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常说我们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不用说，眼前的一片光明

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心里不可能有任何的云翳，我们也不会停止向着光明前进的脚步。这一切都是非常真实，就像黑夜必然由黎明来接替那样的真实。但是我在稿纸上写下在我们两个国家里人人都会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感。难道那些跟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走的人、那些跟着现代修正主义走的人敢于昂起头讲这样一句话吗？灿烂的太阳是属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是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

阳光不仅照在院子里的草地上，它还透过玻璃窗把我书桌的一角染成了金色。我的思想从上海冬天早晨的阳光慢慢地移到了三岛夏天早晨的阳光。于是您的形象忽然站在我的面前。我像这样地看见您，已经有过若干次了。我在前面重温了兴安的旧梦，兴安的一草一木、一桥一水、一楼一厅在我的记忆里仍然十分鲜明。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人：那位经常同群众打成一片的省委书记，您曾经同他一起下去视察工作，并且用他的事迹写过小说；那位对兴安省建设事业如此热爱、而且仿佛要把一切他认为美好的事物都让我放在眼底和心上带回国去的科长同志，那两位把青春献给祖国、团结不少年轻同伴、用辛勤劳动改变家乡面貌的谦虚、朴素的姑娘，我在前面只提到其中一位的名字，还简单地讲了她的事迹，事实上像范氏璧这样优秀的“脱笼的小燕”，在越南到处都是，我也见过不少。在田里，在公路上，在轮渡上，在建设工地上，在大街上，在工厂里，她们和年轻男人一样，是劳动的健将，是生产的能手。您熟悉她们，您熟悉今天在越南建设社会主义的

青年男女。您曾经同在西北区开荒的青年们生活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我听人说当时到那里去的作家不止一位，可是只有您坚持下来，后来还写了电影剧本。您告诉我：当初去开荒的人只有一千一百左右，现在去那里的人已经有了几万。您说您想用开荒的题材写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凯歌，还写到妇女的解放。电影剧本的主角是一位在旧社会中受够了父母包办婚姻的痛苦的家庭妇女，她走出家门，参加了开荒的队伍，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劳动，不灰心，不退却，克服了种种困难，渐渐地成长起来，终于成为社会主义的勤劳的建设者；她当了副队长，还帮助那个作风粗暴、严厉的队长改正了自己的缺点，在生产上、工作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我不知道影片《荒山上的禾苗》拍成没有。我希望早日看到它，因为女主角的鲜明的形象已经印在我的心上了。我听您说，您在荒地上遇见了她，她对您详尽地谈过她的身世，您还亲眼看见了她的性格的成长和发展。我在兴安省第一次同您相聚，短短两天半的时间里我仿佛看见了您所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倘使我没有记错，您的第一篇作品好像是《一只流浪的小猫》。这篇小说收在一个短篇集里，集子里一共十二篇文章，被检查官抽去八篇，剩下四篇让当时的省长法国人古索看见，说是排法思想太重，不准出版。后来连原稿也失掉了。像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陌生的。我们和你们一样有过不少惨痛的遭遇，我们同样经历过一个漆黑的长夜，但是在暗夜中从来没有断过反抗的火花，而且为了取得自由和光明，我们两国人民都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帝国主义和反动

派骑在人民头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美国侵略军至今还霸占着你们的南方和我们的台湾，然而我们两国人民一定会把它赶出去，就像您歌唱的那样："妖魔鬼怪听见金箍棒的声音，吓得魂飞魄散，它们碰上孙悟空就会碎骨粉身。"所以在兴安，在三岛，您和我一块儿沐着东方太阳灿烂的光辉，谈起过去的创作生活，您并不为那本遗失的原稿感到惋惜，您的眼睛一直是向前看的。不过您也不曾忘记自己所走过的弯路，您还坦率地对我们谈过那篇小说的内容：主人公对什么都绝望，只相信爱情，但是结婚后又感到生活空虚；有一天他从外面带回来一只迷路的小猫，高兴地养着它，可是妻子不喜欢猫；后来小猫忽然失踪，他回家看见妻子手上有血，邻人告诉他猫给他的妻子打死了；他接连几夜都做噩梦，有一夜他梦见妻子变成了怪物，第二天醒来便拿了一些衣服离家出走了。到哪里去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篇小说反映了您当时的思想感情：不满意现实，却又没有出路，也不曾想到参加革命——这是您自己的解释，它应当是真实的。据我所知，有不少进步的作家正是像您这样地走上文学道路的。但是听了您的解释，我不觉拿过去那个双手都有血迹的妻子同现在这位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的女队长相比，您的确走过了相当长的路。"流浪的小猫"已经死亡了，今天到处都是"脱笼的小燕"和长得非常好的"荒山上的禾苗"。火热的斗争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您通过自己的实践有了更深的体会，所以您会"感觉到作家能深入生活同群众打成一片是莫大的幸福"。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上，

好像有一把钥匙将您的心同我的心都打开了。在这次谈话以后，我看到了一颗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热烈的心。我十分高兴：又多了一位知己朋友。您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热情地谈到作家和群众的结合，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还用一些事实说明：作家丧失了立场，到生活中去，也会以假为真，认臭作香。在三岛我们又从一些现代的作品谈起了作家的道路。作家的面前总是有两条道路：光明的路或者黑暗的路；发展的路或者毁灭的路。究竟走哪一条路，作家必须有所选择。脱离了人民的作家必然会走上毁灭的道路，永远写不出发光的作品。腐朽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已经遭到世界革命人民的唾弃，成了发霉发臭的垃圾堆了。您坚决地主张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乐观的生活，歌颂今天的新人新事，您兴奋地说，在越南和在中国一样，随时随地都有振奋人心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我也有这种无限乐观的心情，不仅因为越南人民在北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表现的劳动热情和在南方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中表现的英雄气概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越南土地上一派光明的气象和越南人民的十分昂扬的精神状态触动了我的最深的感情。那个时候还不曾出现只身打蟒蛇的英雄①，可是我在多数越南人身上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在你们国家里我接触的人越多，我心目中的这个形象也越鲜明。我在您面前、在别的朋友面前谈起越南人民，常常

① 英雄：指越南海阳工人黎文限同志。他去年八月回家休假，听说有“神蟒”害人，便单身荷枪上山，杀死那条长二十八米、腹部大如自行车轮框的大蟒蛇。

称为英雄的人民，这绝不是外交辞令，我是怀着感动的心情、用尊敬的语调谈到越南人民的。这样的人民一定会做出更多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许多访问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越南的作家当然有更深的体会。能够塑造艰苦朴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英雄形象，这是多么好的事！能够塑造英勇顽强跟美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的新英雄形象，这是多么好的事！可惜我不曾学过越文，无法拜读你们的作品。不过我相信在你们的笔下出现的新英雄人物一定能感动千千万万的读者。

我们和越南作家在河内欢聚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们中国作家因为能够和越南作家站在一起共同奋斗而感到自豪。"在您面前我也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常常想起我在革命博物馆内看见的一张照片：越南的作家们在树林中开会，小说家阮庭诗同志正在发言，那是在抗战的年代里，在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的时期，作家们也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就在我第一次和您分别回到河内的那天傍晚，在中国大使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杂技团回国举行的酒会上，我又见到了越南作家协会总书记阮庭诗同志，我向他提到照片的事，那天在一起的除了诗人阮春生同志和小说家阮功欢同志外，还有一位少将同志，碰巧少将同志正是阮庭诗同志当时的领导，于是他们兴奋地谈起了过去紧张的工作。听他们谈得越多，我敬爱的感情也越深。越南的作家不仅是英雄形象的塑造者，他们自己也是英雄。我后来动身去三岛山的时候，春生同志到旅馆送行，我们在楼下休息室里坐了一会，话题转到三岛上面，他说在抗

战的时期他和另一位同志（好像就是阮庭诗同志）奉命到那里破坏敌人的建筑物。另一次我和他闲谈，才知道他在几年前陪中国客人去永灵，汽车发生事故，他的腿部重伤，在医院里躺了九个月。今天他担任越南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的工作，非常活跃，但也不曾搁下他的诗笔。在河内我看见他高高兴兴地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却没有想到前两年他要坐上自行车，也很困难。在河内我接到他送给我的诗集，我羡慕每一个越南人，因为他们都能够毫无困难地欣赏他的诗，我却捧着书没有办法。我到了三岛山上，首先看见像骷髅一样的殖民者豪华旅馆的残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春生同志干的事情，我很想说一声："干得好！"看见它，我想起了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犯下的种种罪恶，我也想到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我更想到越南作家的英雄气概，我真是激动万分。

三

您看，我的笔又回到三岛山休养地上来了。在三岛见到您，是多么可喜的巧遇。兴安是我们离开河内后访问的第一个城市；到三岛只是为了让我们休息，从三岛回河内，我们就准备向越南朋友告别了。我们和您在两个地方见面，中间隔了三个星期，我们的脚一直没有能停下来，到处我们都看见越南人民在热情地建设、在勇敢地斗争，到处我们都体会到中越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兄弟友谊，到处我们都看见越南人民那双又灵巧、又勤劳的手和那颗热烈的鲜红的心。在三岛我和

您一起在山路上散步的时候，我已经积累了那么多、那么深的对越南人民的感情，所以您讲一句话，我能够听出三句的意思，您谈到一位同志，我的眼前会出现几个人的形象。我们谈文学、谈生活，也谈到我们两国人民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话题多，要讲的也多，话反而少了。我们已经互相了解了。我们几次经过殖民者豪华建筑物的废墟，您还向我指点树丛中旧日所谓总督别墅的遗迹，现在就只有这么一点断墙颓壁向过路人叙述从前殖民者荒淫无耻、掠夺欺骗的生活。风景优美、气候凉爽的三岛山已经回到了越南人民的手中。越南同志用自己的双手在满山葱茏的绿树中间，造了好些整洁、简单的木头平房。这里还有游泳池，有球场，有医务室，有俱乐部……却不见一所高楼大厦。越南同志简朴的生活使我感到十分亲切。我们走近了露天游泳池，一阵快乐的笑声随风送到我们的耳边。这样的笑声您我都很熟习，我们哪一天不听到？我和您怀着同样愉快的心情谈着我们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理想，我们边谈边走，我忽然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正向着无限光明的前途走去。……

亲爱的朋友，写到这里我仿佛又看见了您那张和善、诚恳的笑脸，又听见了您那充满友情的声音。您不是在范氏璧家乡河对岸上同我握手，也不是在三岛山木屋门前向我告别。我和您并不曾分别。我们始终在一起，我和越南朋友们始终在一起，一直向着无限光明的前途走去。

上海最近下了几天的大雪，今天看见雪后第一次耀眼的阳光，非常高兴，想起在你们那里正是万花吐艳、百鸟欢唱的

时节，我怀着万分愉快的心情向您问好，向越南的朋友们问好。我的长篇的“谈话”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收好笔，却伸出了手，我的手是伸给您，伸给你们的。让我们乘着一九六四年劲吹的东风携手前进！

1964年2月27日上海。

贤良桥畔*

我们最近访问越南的时候，在紧靠着十七度线① 的永灵住了三天。我们离开永灵的前夕，朋友们在一个小规模的联欢会上为我们唱了不少越南中部和南方的民歌。优美动人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直到夜深，我的思潮还静不下来，在明亮的电灯下，在大开着的窗前，我还拿着分别时区委副书记送给我的贤良桥畔金星大红旗的照片出神。

一连两天我都曾走到耸立在桥畔的三十公尺高的旗杆跟前，头一天因为刚落过大雨，金星红旗还不曾升起，第二天我远远地便看见它迎风招展，鲜红夺目。前一个下午我还在江边白色矮木栏前站了好一会，当时吹起了一阵令人感到爽快的微风，栏前肥大的芭蕉叶随风舞动，浅蓝的江面现出了细细的皱纹。我注意地望着江水，它同越南别的河一样，我在江面上看不到丝毫的裂痕。我抬头望天，天也是蔚蓝的一片，无边无际。我再望对岸，那一面也有几棵同样的树。我几乎不相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文学》九月号。发表时题为《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

① 即北纬十七度线，这就是把越南南方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分开的所谓"临时军事分界线"。

信自己的眼睛：平静的江水明明给人分割成了两半，美丽的土地给切断了，和睦的家庭给拆散了！在桥这一面的土地上，我到处看见绿油油的庄稼、勤劳的农民和幸福的笑容。可是在桥的那一面，却只能看见孤零零的伪装的碉堡同充满谎话的标语和大幅宣传画；还有两三个奇装异服的吴庭艳政权的军官摇摇摆摆地在桥上走来走去。在那一面好像连土地也带上了冷酷和憔悴的表情。

一个整体被人分割成了两块，一部分的土地像孩子似的从祖国母亲的怀抱里给人抢走了，受到凶恶的仇人的虐待，一天天地憔悴下去，就像一位诗人所控诉的那样：

> 对着地图，敌人想把我们祖国撕裂成两半，
> 将我们身躯，撕成血肉模糊的两部分……

许多美满的家庭让人一下子分成了两半（不用说，这又是美帝国主义干的事情！）：妻子在一面，丈夫在另一面；或者父母在这面，儿子在那面——他们只能偷偷地隔岸相望，挥手示意，哪里能看明白亲人的泪眼或者笑容？朋友们送给我的一本小书里有一幅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立在江边痴痴地望着对岸，她望不见久别的丈夫，却对着静静的南岸，频频挥动尖尖的斗笠。画面下印着这样的诗句：“江水啊，你知道不知道她流在肚里的眼泪有一天会变成怒火？”

这三天中间，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被拆散的家庭的故事。我们曾经沿着贤良江走了一大段路，在一个检查哨口，我看见渔船靠岸，船上人交出证件受检查。沙滩上站了好些人，有男

有女，也有小孩，他们牢牢地望着船上的人；还有人把竹子编成的圆形小船放到水上，划了出去。这个星期轮到吴庭艳政权的军官到北岸检查来往的渔船，而且每只北来的渔船上都有吴庭艳政权的便衣军警，因此岸上人始终不能和船上人交谈一句。那些睁大眼睛默默注视的人都是在寻找亲人的。竹子编的小圆船使我想起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他们把小船划到江心，高高举起婴儿，向南岸示意，希望有认识他们的人将他们生儿的喜讯转告住在南岸的父母。我在两个小型工厂里看见一些从南方过来的工人，他们的妻儿都留在对岸。他们当初只身来到北方，还相信根据日内瓦协议两年后便会看见祖国的和平统一。信件往返当时也不曾受到多大的阻挠。可是突然间贤良江上筑起了一堵高高的铁墙：美帝国主义统治了南方，吴庭艳政权充当它的刽子手，日内瓦协议给撕毁了，片面地、完全地撕毁了！今天在北来的人们中间，那些始终得不到家人消息的人，逢年过节常常到江边徘徊，希望能见到亲人一面，即使远远地见到一个影子也甘心。一位锯木厂的工人就对我们谈过他每逢假日到江边散步等候亲人的心情。最初还有会见家属的机会，虽然有伪警在旁边监视，不许交谈；但后来连影子也见不到了。在南方人们正在受苦，在斗争，在遭屠杀，在受迫害，可能他们的亲人还在牢里受刑，可能他们的亲人已经英勇牺牲。美国侵略军正在南方进行所谓“特种”化学战争，连草木也不让生长，牲畜更大量地中毒死亡，何况是敌人视作眼中钉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北上干部的家属！

陪同我们到贤良江边走了两趟的上尉同志是个热情的、健谈的人，他记得不少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南岸一只运沙的船沉没了，伪军强迫人们运沙，却不管人们死活，看见船沉，也不打救；船上两个人一死一活，活的由北岸的公安人员救起来了，他们还把尸首捞起，穿好衣服装在棺材里，放在岸上，通知对岸家属来领尸。可是南岸伪警不许家属过江，他们要求把棺材放在船上送到江中。棺材到了江里，伪军却把尸首取出来，用草席裹起搬上南岸，不让死人睡北岸的棺材。后来死者的家属却跑到岸边，朝北岸连连行礼，表示感谢。人们的眼睛的确是雪亮的。……

到处都有人对我讲一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到处我都见到给美帝国主义弄得家破人亡的从南方来的人。我无法数清有多少流在肚里的眼泪，但是我看到了越来越旺的怒火，我接触到了像火一样燃烧的心。

我到过两个村庄，人们正在勤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不论在地里、山里，路边、江边，我看见的都是繁荣的景象。我站在山坡上新建的平房前面，江上航行的渔船的帆篷时时闪进我的眼里。在这里人们也常常凝望南岸。我有时同人们交谈，他们会指给我看，说那些红色小楼就是枪口对着这里的伪装碉堡。谈得久一些，他们就会大谈活捉南岸派来的特务的故事。我不曾听见南岸的广播，但是据说有时南岸的大喇叭哓哓不休地宣传起自己编造的无耻谎言来，这里人们对面交谈，也会听不清彼此的话。

然而北岸的人也有机会向南岸介绍真实的情况。北岸的

喇叭也不是经常沉默的。在永灵，当人声渐渐静下去的时候，我便听见年轻姑娘们唱民歌，歌声是那么响亮，也那么动人。翻译同志给我们解释，有的民歌描写北方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有的歌唱他们的愉快心情，有的怀念在南方的亲友，有的歌颂南方人民的斗争，有的揭露美吴集团屠杀人民的罪行，有的嘲讽吴庭艳政权的官僚们贪污腐化的丑态……不用说，这是对南岸的广播。越南的文艺工作者很会运用这种人民喜爱的短小形式，他们积极参加了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而且在斗争中尽了很大的努力。朋友们送给我的照片一共有两张，另一张"表现了越南文艺工作者的英雄气概"，我当时的确是这样对永灵的文艺工作者说的。在照片上出现了贤良江的南北两岸和连接了两岸却不许行人通过的贤良桥。南岸静静的没有人迹，仍然是一片冷漠、凄凉的景象；北岸有无数男男女女走向江边；在桥的右面，岸上人密密地排成了一堵墙，他们的眼睛正朝着江面；好几只小船载满了人在江上微微移动，小船离北岸虽近，船上人却面向南方，他们有立有坐，有带乐器，正在对南岸表演节目。吴庭艳政权的军警不许南岸的居民出来欣赏亲人的表演，这些表演船又不能驶近南岸（一半的江水让吴庭艳傀儡政权霸占去了），但是船上充满感情的响亮的歌声一定会送到树丛中、茅屋里，搧旺更多人心中的怒火。我没有在贤良江上见过这样的表演船，可是我听见人常常谈起它们。朋友告诉我，在今年七月中旬，全世界声援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侵略斗争周的一个星期里面，越南文艺工作者要在贤良江北岸搭一座高台，把许多激动人心的精彩节目送给在南方坚

持斗争的同胞。这样的舞台可能同时出现三座、四座，因为在某些检查哨口，江面较窄，而且常有南方的渔船靠岸，人们用歌声唱词传达感情，更容易打动对方的心。

在这两个表面上显得很平静的村庄里，斗争的故事不断地在各处流传。孩子们的锋利的眼光不放过任何一个面孔陌生的人，经常有人守在渡口，许多人睁着眼整夜不睡：大家一致警惕，不让南岸的特务过来捣乱，却小心准备接待从对岸逃出来的亲人。近几年来有不少南方的青年单身逃到北岸，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像这样的爱国青年都受到热情的招待；至于过来进行破坏活动的坏人，却没有一个漏网。

三天中间我的脚踏过“分界线”北岸不少的土地，美丽、富饶的土地牵引着我的心。我的眼光也常常落到南岸，冷酷、荒凉的景象掩盖了对岸的一切（除了奇怪装束的吴庭艳政权的军警以外，我望不见任何一个人）。桥南那根畸形的高旗杆光秃秃显得十分丑恶，我两次经过贤良桥畔，都没有看见吴庭艳政权的三条旗（我后来在清化的戏院里看反映南方人民斗争的“改良戏”《西原的雷声》，在戏里意外地见到了三条旗）。北岸的金星大红旗却像东方的旭日一样升在空中。踏着北岸的土地，炎热的阳光射到我的脸上和身上，仿佛熊熊的烈火。斗争的怒火到处燃起来了。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体会到越南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我的耳边一直响着在和平的建设中、在忘我的劳动中发出来的英雄们的声音：

“我们在这里拿起锄头，举起大锤，每一下打击都打

在美吴集团的头上!”

“在南方坚持斗争的同胞来信说，不管斗争怎样艰苦，我们的心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们一定要战斗到最后胜利，让南方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美帝国主义使用化学毒剂，不让南方的庄稼生长，要把南方变成人间地狱，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要使北方遍地开花，要把北方建设成美好的天堂来接待胜利归来的南方同胞!”

我现在访问的是英雄的国家和英雄的人民，我哪里能有那么多的纸笔记得尽越南英雄们的声音?但是我还要记下一位南方人的心里话:“割掉的土地就像从母亲身边拉走的孩子一样，孩子离开了母亲，日夜遭受坏人欺侮，怎么会长得好!我的心还有一半留在南方。我是‘昼北夜南’，白天在北方专心工作，晚上不断地想着南方的斗争。南方一天不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夜里睡觉也不安稳!”

这位年轻的越南同志讲得多么真实，多么感动人!在永灵夜间常有凉风，蚊帐内还准备了薄薄的棉被，可是我始终睡不安宁。我看得多，也想得多，许许多多在南北两岸发生的故事都到我的脑子里来了。接着我又看见被屠杀的人民的大量的血，和烧毁了整个村庄的大火;我看见美国侵略军的直升飞机坠地焚毁;我又看见南方人民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大步前进。……我看到了介绍南方人民英勇斗争的纪录影片，我听到了南方人民武装接连获胜的消息，我在报上读到了西贡七

十万人游行示威反对美吴集团的新闻，我制止不了我那上升的怒火，我的血又沸腾起来了。我又听到了多么响亮的吼声："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滚出去！"这三天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听见这样的声音；我在每个人的谈话里也听见这样的声音；吹起风来，好像也吹出这样的声音；机器动起来，仿佛也发出这样的声音。我的心里一直响着这样的声音。日里夜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声音越响越高，好像它已经响遍了整个越南，而且要响遍全世界："美帝国主义滚出去，滚出去！"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必定胜利，而且这个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我兴奋地把照片放回到封套里，再郑重地将封套放好。我先前对越南朋友们说过："再没有比这张照片更珍贵的纪念品了，我要带它回去，让中国人民看看这面在贤良桥畔迎风招展的金星大红旗！"

夜更深，也更静，外面大喇叭放送的南方民歌也早停止了。是睡觉的时候了。我终于关上了电灯。但是我的思潮并不曾静止，我的眼前仍然飘扬着那面鲜红耀眼的金星大旗，我的耳边响起了更高的怒吼声："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我想着金星红旗在西贡飘扬的日子，我想着三千万越南人民共同欢庆南方解放、祖国统一的日子，我想象着许多美满家庭欢乐团聚的日子，我真愿意彻夜不眠，守到天明！

1963年7月6日，下龙湾。

我的心永远在
英雄的人民中间*

昨天晚上我又到了贤良江，我又走过迎风招展的大幅金星红旗下，在贤良桥畔立了许久。但是我没有看见对岸那些造谣、撒谎的反动标语和丑恶的宣传画，也看不到桥上服装古怪的伪军。我见到的是唱歌跳舞和高声谈笑的男女青年，我见到的是穿着节日新衣的人们。以前显得空阔、冷清的桥上看不见一点儿空隙。对岸旗杆上飘扬的也不再是吴庭艳政权的三条旗，早已换上了同样的大幅金星红旗；岸边人山人海，人们拥抱、欢呼，人们来来去去。我也挤进人丛中和笑容满面的越南同志们紧紧地握手……

近来我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重到越南。我在梦里看见的不仅是越南人民的建设和斗争，我也见到越南人民的胜利；我不仅见到今天的越南，我也见到明天的越南——统一的社会主义的越南。我为这些美好的梦景高兴。我绝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梦景上面的人。我应当说，报纸上不断刊出的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消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应当说，我的心一直留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我的心一直留在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

在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半年前我向越南朋友告别的时候，我坦率地说出我的信念：全体越南人民共同欢庆祖国统一的日子不远了！

我带着越南人民的雄壮的声音："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方去！"回国。的确，我离开越南的前一天，在河内，从黎明到深夜，在大路和小街，我到处听见这个响亮的战斗口号，我也遇到不少的游行队伍，在每一个示威者的身上我都看见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游行队伍中有好些人是从南方来的。在访问越南的五个星期中间，我见过许多来自南方的人，有干部，有工人，有青年，有妇女，大部分人的家属还留在南方，有些人甚至几年得不到家人的音信，不知道亲爱的人是否已经遭害，或者仍在坚持斗争。从南方不断地传来揭露美吴集团血腥罪行的种种消息，以及各式各样美国方式的屠杀、拷打的故事，人们还可以看到在南方拍摄的照片或者纪录影片。我常常有机会同南方来的人们谈话，这些人愿意多谈南方的斗争，也喜欢传播胜利的消息。南方人民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壮大，斗争越来越发展。刽子手和杀人犯们要使越南南方变成人间地狱，南方人民却把人间地狱变为充满朝气和干劲、充满笑声和歌声的解放区。不管美帝国主义把多少万美元、多少新式武器运进越南南方，不管它用了多少直升飞机、多少水陆两栖装甲车、多少化学毒剂，它始终阻挡不住南方人民前进的步伐，也阻止不了解放区不断的扩大。

我了解越南南方友人的心情，因为有一天我站在贤良江边看对岸，虽然我只见到寥寥几个丑态百出的伪军和一片荒

凉的景象，但是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这是艰苦的斗争，激烈的斗争，然而也是必胜的斗争。尽管眼前是一片静寂，叫人感觉到窒息的静寂，可是我站了一会，看了一会，就觉得土地在动，土地在燃烧。

当然，我不是说土块会移动，会发热起火。我想说的是：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震撼着我的心。我感觉到斗争的力量，它把我的心也拉去了。一直到今天我的心还在越南南方。连我都是这样，何况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家属还留在南方的越南同志！这些敬爱的同志，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不幸的遭遇，一段痛苦的经历，但是同他们接触，我却得到更多的前进的勇气。他们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是那样坚定，他们斗争的意志是那样坚强，那样昂扬。野蛮的屠杀和血腥的镇压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把个人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被美吴集团弄得家破人亡，亲属在家乡长期遭受迫害。这些大仇大恨绝不能使他们垂头丧气，他们总是用兴奋的调子和热情的语言谈起南方斗争的巨大发展和北方建设的辉煌成就。

我住在河内市统一宾馆的时候，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越南作家在餐厅里喝茶闲谈，一位我认识的诗人陪着两个朋友走进了餐厅。他同我们打了招呼，就挑选了一张桌子，和朋友们坐下交谈起来。他们脸上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同我谈话的作家告诉我："他们都是从南方来的，碰到一起就谈家乡的情况，讲最近的消息。近几天南方人民的斗争很激烈，从南方来的同胞们也非常激动，有人连觉也睡不

好。……对我们来说，再没有比解放南方、统一祖国更迫切的愿望了。……一只手上的五根指头给人砍掉了一根，能长得好吗？”他动了感情地加上一句：“住在南方的一千四百万人都是我们的亲兄弟、亲姊妹啊。”

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这几句话时的神情和声音，我体会到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这种决心在越南同志中间是极其普遍的。在鸿广区我有机会同南方来的干部进行座谈，在广平省接连两个晚上我听了不少优美的中部和南部的民歌。不论是在谈话里或者在歌声中，越南同志们都流露出热爱家乡的感情，也表现出统一祖国的决心。同志们把我当弟兄一样看待，对我讲了心里的话。有人描绘南方风景的美丽，有人称赞南方物产的丰富……访问农村的时候人们想到西贡的大米，喝椰子汁的时候人们怀念槟椥省的椰林。我同意这一切的赞词，因为三十几年前我曾两次经过西贡。

越南人民那么深切地热爱自己的土地，他们当然不愿意看见美丽的土地长期遭受敌人的践踏。他们热爱自己的同胞，当然不能让他们长期遭受敌人的残害。

一位家乡在南方的诗人曾经激动地这样歌唱：

半个国土战争，
半个国土和平！
鲜血深深渗透了大地，
面对一张纸，为什么你苦苦思虑不平静？
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

在南方，都有自己奔赴战场的身影。……

制兰园同志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的确，每一个越南人的心都奔向南方，奔赴南方的战场！

我不仅站在贤良桥畔凝望过没有行人的长桥，我还顺着江岸走了一大段路，到另一个检查哨口。在那里的江上，我看见了南方的小小渔舟。我忽然想起那位家乡在越南中部的著名诗人的诗句，不觉小声地念了出来：

啊！横渡江流的同志，
让我的心追随你前进，
让我们重返故乡，
让我们回到香江畔，蒲江旁！
同父母乡亲一起，夺回每一寸土地，夺回我们的城乡！

诗人接着吹起了战斗的号角，表示了庄严的决心：

让我们变成爆炸的地雷，
把敌人消灭在海云坡上！
让我们变成陷阱，变成桩板坑①，
戳死前来扫荡的敌人！

我很喜欢素友同志的激动人心的诗，这是一千四百万南方人民的声音，也是全体越南人民的声音。站起来了的人民

① 桩板坑：在地上挖出深坑，坑内插满锋利的长钉，然后在上面盖着伪装，敌人打这里经过，便会落进坑里，给长钉戳死、戳伤。这是越南人民对敌斗争的一种特殊方法，和捕兽的陷阱相似。

绝不会再躺下去，倒下去。他们是打不倒，压不垮的。他们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愿望。哪怕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装了不少颗“核牙齿”，它也吞不下越南南方，它更吞不了一千四百万的南方人民。首先越南南方人民就不让它继续在他们的土地上横行。越南南方人民已经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这种震惊世界的英雄行动正在扩大，正在发展，它使得敌人心惊，引起朋友尊敬。半年前我站在贤良江边就深深地感觉到这种行动的巨大力量，也仿佛看见那股不断上升的战斗的光芒。

我在贤良江边望南方的时候，吴庭艳弟兄还在西贡耀武扬威，为非作歹，还在南方搜括剥削，屠杀人民。吴氏家族靠着美国主子的飞机、大炮、刺刀、枪弹的保护，流人民的鲜血来建立吴氏子孙的反动“基业”。可是谁也看得出来他们宫殿的屋基正在迅速崩塌，他们拚命替自己挖坟掘墓。果然不过四个月的功夫，吴庭艳、吴庭儒弟兄就像野狗一样地死在美国主子的“刀”下。到了紧要关头，纸老虎连它自己豢养的走狗也不顾惜了，它想咬死走狗来保全自己，它想换一条更有用的走狗、换一个更听话的傀儡来进行更狡猾的阴谋。其实这种如意算盘不过是它的痴心妄想。杀掉两个姓吴的，① 换上一个姓杨的，或者再换上一个姓阮的，去掉一批老走狗，换上一批新走狗，换来换去，除了更明显地暴露它自己的豺狼面目和强盗手段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美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西贡

① 今年五月九日，吴庭艳的小兄弟吴庭瑾也在西贡被枪决了，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下场。（1964年5月注）

政变做不了它对越南南方侵略的延命汤，反而成了催命符。西贡政变以后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一位越南朋友给我开过一张很有意义的账单，我不想在这里列举数字，我只提一件事实：就在西贡政变以后的一个月中间，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同去年前半年中间所获得的胜利相等，而捣毁的"战略村"①的数目又等于一九六二年整整一年中间所捣毁的数目的一半。以后呢？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胜利的消息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飞机被打落的数目越来越大，美伪军被打死、打伤和投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走的是下坡路，而下坡路走起来越滑越急，越滚越快。山崩下来是挡不住的，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方的日子的确不远了。

我在河内的时候，听见越南作家们谈起南方的文艺工作，一位朋友告诉我，离开西贡三十里，人们就能听到越南北方的

---

① 这种所谓"战略村"同集中营差不多。在"战略村"里，美吴集团遍设岗哨，伪军日夜不停地巡逻监视；"战略村"的四周装上了铁丝网和竹篱笆，还挖了壕沟。人们只能按规定时间，从指定的门出入，而且要受到特务分子的严密监视。根据吴庭艳政权新闻机构的报道，西宁省有五个"战略村"，都是用一米半高、一米厚的土墙围起来的。墙外便是一条三米宽的壕沟，沟里还装上铁蒺藜和尖竹桩。在其他的地方，"战略村"的周围有两道用竹竿和布满刺的生竹篱等等做成的篱笆，只有一道闸门，两道竹篱之间还有一条三米宽的壕沟。在"战略村"里"每户人家都编了号，以便于巡夜的'保安人员'控制。人们进出，都必须从靠近哨所和了望台的小小闸门穿过。"在"战略村"里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服兵役。美国在越南南方建立了八千个这样的"战略村"，可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经被南方人民和人民武装力量捣毁。（1964年5月注）

革命歌曲，也有机会看到中国的采茶扑蝶舞和越南北方新的舞蹈。南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干劲很足，成绩也很大。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今天像这样的事可能已经是很寻常的了。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迅速地发展，文艺工作也一定会出现一个非常壮丽的局面。在报上读到越南南方的消息，我总要思索许久，我在想象一些雄伟的场面，我也想到了我的诺言：我曾经答应越南的朋友，在南方解放、祖国统一、金星红旗飘扬在整个越南上空的时候，我一定要赶到河内，赶到西贡去向他们道贺，同他们一起欢度节日。

我的梦景是我心里的话，也是我的信念，它们还是我的愿望，而且是一定会实现的愿望。

1964年初春，上海。

忆越南*

风啊，给我捎个信去，

中国人民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

我离开越南已经半年多了，可是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仍然生活在把我当作弟兄看待的越南朋友的中间。有时我从外面回家，坐下来休息，点燃一支烟，抽了两口，我并不要想什么，然而不知不觉间我又想起了越南。于是我的一双眼睛失去作用，脑子代替了它们：我看见了河内的大街，正是下班的时候，清静的林荫路忽然热闹起来，年轻的男男女女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过去，车连着车，每辆车上坐了两个人，不知有多少年轻人的笑脸在我面前闪过。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说，我喜欢越南的年轻人，他们生活简单，穿著朴素，但是一天高高兴兴，干起工作来劲头很大，对待人又那么亲切、热情。在越南我见得最多的就是这样可爱的青年。我看见他们，便觉得自己年轻了，心也轻快多了，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高兴起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萌芽》第四期。

的确，这些年轻人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一九四〇年我经过海防与河内，就不曾见到这样的青年。那个时候法国殖民者还在横行霸道，虽然日本军队马上就要在海防登陆。殖民者的丑恶嘴脸，我至今不曾忘记。连许多过境的中国人也受到他们的抢劫和欺凌，更不用说生活在自己国土上的越南人了。我曾经亲眼看见海防的海关里有人强迫中国旅客脱下穿在脚上的皮靴，而且任意没收中国旅客箱内的衣物。

现在那一切牛鬼蛇神已经绝迹，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土地上，到处都是新建的厂房，茂盛的树林，长得很好的庄稼。人们愉快地在田上劳动，在工厂里劳动，在矿山上劳动，在工地上劳动；人们下了班吃过饭在大街上散步；星期六的傍晚，或者星期天清晨，人们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跑，到海滨浴场去……每张脸上都带着微笑。我现在看到的是另一个越南。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社会主义国家旅行，我在赶走了帝国主义的人民中间生活，我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国家里作客，我见到的当然是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在河内住的时间比较多一些，不过我也到过海防和别的一些城市。我和好些越南同志谈过话，也可以说，我交了不少的越南朋友。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人，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有着同样的理想和同样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论我走到哪一个城市，访问哪一个地区，我都遇见这样的友人。我常常想起我们那句古话："一见如故。"我有时觉得它非常恰当，仿佛它真能说明我们的友谊；有时又觉得它已经过时，并非我和哪一位越南同志有缘，事实是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非常

深远，越南人愿意把中国同志看做亲人，中国人也喜欢拿越南同志当好朋友。我们和他们是同甘共苦、互相支持的同志和弟兄。

我是和束为同志一块儿到越南的。整整五个星期中间，我们始终在一起活动。他生长在北方，还是头一次过黄河，一走却走得很远，不出十个钟头就到了炎热的南方。在最初的几天里，他常常夸耀他的故乡天气凉爽。后来他便习惯了越南的气候，对这个英雄的国家和勤劳、勇敢的人民发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还带了越南民歌的唱片回国，让那些激动人心的民歌给他唤起许多美好的回忆。在越南访问的五个星期中间，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民歌。在靠近南方的地区，深夜里还听见有人高唱民歌，这是对南岸、向南方的广播。这些民歌传到南方人的耳里应当是亲人的口信、弟兄的呼唤，也是祖国的召唤。每一首民歌都充满了很深、很强烈的感情。不单是在永灵，在较后面的义安市，我们晚饭后在大街上散步，我们逛了百货公司，来回走了将近两小时，一路上我听见一首接一首的优美的民歌，我不懂歌词，可是我总觉得歌声把我的心捏住，一紧一松，歌声里好像也有我的感情。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在许多地方都听见人说出我想说的话，不少越南同志的讲话和行动触动了我最深的感情。一位区委书记对我热情地讲起中越人民的友谊，一位省委书记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的罪行，一位对外文委副主任恳切地谈到坚持真理、保卫真理的职责，一位深入生活的作家坦率地叙述他的创作生活和追求真理的道路，一位南方来

的干部激动地吐露他渴望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有一天早晨我们动身去十七度线，一位家乡在南方的诗人，到旅馆门前送行。快要开车的时候，我和他握手告别，他忽然眼里含了泪水，同我拥抱……我想举的事实实在多。许多人、许多事、许多话，一齐奔到我的笔端，感情激动中我一时无法理出先后，就这样简短地说罢：我每天、每时都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亲人和同志的中间。

在河内和海防访问，我常常想起一九四〇年的往事。那一年我也是在七月里旅行，可是现在见到的一切，那一次似乎完全不曾看见。我们到越南的第二天，越南作家协会的一位朋友同我们在河内西湖边上散步，我们走过那条凤凰树的林荫道，正是红花盛开的时节，一簇一簇茂密的浅绿色细叶上仿佛盖着一幅一幅的红绸巾，有些树上花很多，远远地望去好像绿树顶上燃起了熊熊的火。我喜欢这样的花树。作家同志对我说，他从前上学时对凤凰树有感情，学生们准备考试的时候，凤凰树开了花，花开得久，花还不曾开完，学校就放假了。现在看见凤凰树开花，他常常想起自己少年时期温书的情景。然而他的学校生活怎么能跟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相比呢？……他没有往下讲，不过我也猜得到他这时的心情。接着我们又同去一柱寺和别的地方。我看见几个年轻姑娘拿着书和笔记本在幽静的廊前或树荫下温习功课，她们是那么专心，我们在院里走过并没有惊扰她们。三个星期以后我们经过海防去下龙湾，过几天从下龙湾回河内，我们中途又在海防休息。两次我都看见人行道上凤凰树的灿烂的花朵。我们的车子还经过

一个广场，我忽然觉得眼睛一亮，原来广场上有不少棵大树，绿叶堆上盖满了似云霞如火焰的凤凰花。海防在我的眼里显得十分美丽，也很整洁。可是二十三年前在这里我只看见法国殖民者的罪恶和越南人民的受苦。在河内我见到的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在越南的城市里，不过是一个孤寂的异邦人，我的见闻只给我带来更多的愤怒。我在海防一家华侨旅馆里等待海关的消息，当时的心情我今天还不曾完全忘记。我的行李很简单，在海关没有遇到大的麻烦，可是我也在海关里等候了好几小时，而且有两个和我同船从上海去昆明的旅客，上岸过海关时，一个人给拿走了自己穿的新衬衣，另一个人带的一只热水瓶被扣留下了。他们请旅馆的接客人到海关去交涉，后来缴了罚款，才取回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朋友离开上海比我迟一些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他对我讲起一件令人愤慨的事。他们在海防上岸，经过河内搭火车到了老街，晚上在老街的所谓"廉访所"对护照。同路一个中国学生因为护照上贴的相片是戴着帽子摄的，在对护照时便不曾揭下帽子。可是验护照的法国殖民者发了脾气，厉声叫他脱帽，他不懂法文，动作迟了些，就挨了打。他要保护自己，却因此丧失了自由。据华侨旅馆的接客人说，将来受审讯时这个中国学生可能被判处三个月到半年的徒刑。同路的人以后不曾再见到他，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一九六三年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我仿佛生活在友谊的海洋里面，我常常觉得有许多颗火热的心同我的心

在一起跳动，我过着很兴奋又很愉快的日子。在海防我坐在车里经过燃烧似的凤凰树下，在河内傍晚绕着还剑湖散步，有时我想起二十三年前的旧恨，好像曾经做过一场噩梦，无论如何我没法把眼前这两个美丽的城市同旧时的海防与河内连起来。

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常常吹嘘他们给被侵略的国家带来"文明"。我们对这种"文明"有过很深的体会，越南朋友的体会更深。一切肮脏的、丑恶的、毒害人的东西都包括在这种"文明"里面。过去我们习惯称上海为"罪恶的都市"，其实那许多罪恶都是帝国主义给我们带来的。西方冒险家曾经把上海叫做"乐园"，正说明殖民者在这里进行过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用毒药换走我们的财富，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恩赐。我第一次经过海防与河内，都只住了一夜，见闻不多，但是我有这样的感觉：满天阴云，一片灰色，两座没有欢笑的城市仿佛两个病入膏肓的老人，血已经让人吸完、抽尽，生命随时都会结束。那个时候我的确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这两座城市的。过了二十三年我重来河内、再过海防，我的头发白了，脚步也迟缓了，可是我的心反而更年轻了，两座城市在我的眼里显得十分美丽、非常干净，而且充满生命，它们像两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像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岂止这两座城市，我到过的其他的越南城市全是这样。我不论走到哪里，看到哪里，我都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越南人民正在用紧张的工作和忘我的劳动，建设自己的国家。

越南同志常常谈起北方的建设和南方的斗争，这的确是

值得越南人民引以为骄傲的两件大事。帝国主义者从越南搬走了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可是留下来的却只有一些空屋和无数废墟，此外还有不少的碉堡。有的碉堡只剩下一个或者半个空架子，有的碉堡却完好如新，这说明法国殖民者很想长久赖在北方，但是它终于让越南人民赶了出去。尽管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法国殖民者，至今还霸占着越南南方，在那里屠杀人民，然而它在南方的寿命也长不了，它不肯走，南方人民一定要把它赶走。在不久的将来美帝国主义给南方人民狠狠地打得站不稳脚跟、不得不滚出去的时候，也可能留下更多的废墟。但是帝国主义制造废墟的本领，只能吓唬那些信奉"活命哲学"的胆小鬼。英雄的人民有移山填海的豪迈气概，哪里对付不了人造的废墟！越南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英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也是英雄。他们正是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工业来的。他们在平地上建筑了数不清的厂房。他们用双手制造自己需要的东西。用不着我来宣传越南人的手多么灵巧，他们的手工艺美术品早已闻名全世界。我亲眼看见的是越南人的手有无穷的力量，还不到十年的功夫，他们就可以制造自己使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品。我在河内、海防和其他的城市都看到百货公司里货物充足，顾客盈门。人们买得最多的还是越南生产的日用品，这些商品式样大方、朴素，而且适用。有时我走进百货公司，遇到青年男女拿着纸包有说有笑地出来，看见他们满意的笑容，我也愉快地微笑了。

在国内我常常听见人称赞越南同志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到了越南，我更体会到越南同志很会勤俭地过日子，在衣、食、住、行任何一方面，我都看不到铺张浪费的现象。我喜欢他们那种简朴的生活。但是我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一个多月，我脑子里丝毫没有"艰苦"的印象。他们过得那么愉快，好像什么都不缺少，而且总是充满勇气和信心，仿佛他们懂得一个人物质上的需要非常有限，而他的精力却是无尽无穷。

有一天上午我们从义安市乘车去访问胡志明主席的故居。故居外树荫下一间很小的平屋，门全敞开，进门有一张大长桌，主人接待我们坐在桌前凳上喝汽水。屋角立着一个玻璃橱，里面放了些各国访问者送来的礼品。这里便是前几年新建的来宾休息室，不用说，整齐、清洁；但这么简单，却是我没有料到的。从这里我们经过泥土路，走到了胡主席在那里消磨童年的老屋。我们顺着篱笆绕进去。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茅草顶、土阶、竹栏。阶上一排相连的五间小屋，屋前五幅竹窗帘。院子里灌木丛生，红花竞放。我们进屋参观，我在胡主席从前睡的木板床跟前站了好一会，我想起胡主席一生的经历和他为越南人民所作的一切，还有我听见的关于胡伯伯的种种传说，对这位越南人民革命领袖的伟大形象，我感到十分亲切。走出胡主席的故居，我们又回到休息室，翻看留言簿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景仰者的题词，我觉得这里的一切同和蔼、朴实、平易近人的胡伯伯的形象，非常适合。

我们访问兴安省的时候，省委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本省的一些情况，也谈到他过去打游击的故事。他接待我们像接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话间常常流露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强

烈的感情。在抗战的日子里，他和中国同志有过患难之交。一位越南作家曾经跟着这位书记同志深入群众，检查工作，向我们不绝口地称赞他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得到群众的真心爱戴。我们当时住在新建的省人委的办公楼中，晚上走到礼堂去参加戏剧晚会，阴暗中看到一些简单的茅屋，同行的同志指点说，这是省委办公的地方。我点了点头。原来搞好水利、改变本省贫穷面貌的计划就是在这些茅屋里决定下来的。

我用不着再举别的例子了。

我们访问义安的时候，曾经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海边玩了半天，后来在那里的干部休养所里休息、喝水。休养所相当大，四面台阶上有一间一间的住房，中间是一个大院子，还有一间敞亮的大厅。整个休养所都是用竹子搭成的，阴凉、清洁、简单、宽敞，使人感到十分舒适。主人陪我们坐在大厅里谈这里的情况。台阶上房内屋前都有人，年纪较大的躺在网床里、摇椅上轻轻摇着扇子，也有人抽着烟同妻儿或同伴闲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从河内去三岛小住。三岛离河内不太远，山中气候凉爽，是一个很好的避暑地方。山上过去有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可是抗战期间全毁了，只剩下一些断壁颓垣，让人们记起从前是些什么人在这里享受豪华。普通的越南人是不能到这里来的，他们也走不进那些高楼大厦的大门。现在一般干部都有机会到这里度假日了。他们住的全是用木头搭起来的平房。每所平房里有客室，有浴间，有双人住房，构造简单，陈设朴素，却整齐、干净。坐在客室里木制沙发上，同朋友们围着一张小方桌喝茶闲谈，廊外一片草地，对面山上

绿树丛中露出一座一座美观的屋顶，在这里我感到非常愉快，也更懂得：要使休养的人过得安适、满意，并不需要富丽的洋楼和现代化的设备，它们有时反而不能让疲乏的身体得到休息。

在河内，每天晚饭后我和束为同志都要上街走走，我们住的统一宾馆离还剑湖很近，不多几步就转到了还剑湖畔。湖边有一条电车轨道，不过车辆来往并不频繁。马路上除了自行车，便是行人，大小汽车是不常见的。天气热，湖边是很好的纳凉地方。商店和电影院的门前灯光明亮、人声嘈杂。我们常常站在还剑湖畔大树下，看耸立在水中的龟塔。它有时射出一点昏黄的灯光，有时悄悄地立在那里，还是那一身灰白色，它显得沉着、朴素。水面平静，连微波也看不见，镜子似的微微发亮的湖水让岸边的大树涂上了不少黑影，有些地方一串一串的灯光穿透了这些树影，仿佛要一直射到水底。我们有几次绕着湖走上一圈，才发现这个湖的四周有那么多年轻的笑脸和那么多欢乐的笑声。在这个大城市里我很少看到新建的高楼。可是殖民者留下的每一所外表豪华的空屋都换上了新的、健康的面貌。大大小小的旧屋到了人民手里，都有了新的、充实的生命。美术展览馆大门开着，人们正在欣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图画。书店里很拥挤，年轻的读者那么专心地翻看各种新书，它们都是在越南出版的，品种多，封面和装帧简单而整洁。有一个夜晚我看见河内大戏院灯火辉煌，好些人挤在门前，那一定是为来访问的贵宾举行晚会了。湖滨有卖水果的摊子，也有出售冷饮的茶室，劳动了一天的人

们带着家人到这些地方闲坐一会，或者在湖边纳凉休息。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第二次到西湖。那是在上午，船已经租光了。我们坐在湖滨，看青年们划船。我不懂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们那种轻快的笑声使我高兴。越南同志习惯在热天赤脚穿简便的胶鞋（这是他们在抗战的年代中“发明”的“抗战鞋”，胜利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日子里他们仍然喜欢这种和他们共过患难的胶鞋）；女同志喜欢穿短衫、长裤和木拖鞋，遇着节日也有人穿上颜色鲜艳的民族服装。在西湖有一条年轻人用义务劳动修筑的青年路。从西湖回宾馆，中途我们还逛了新建成的统一公园，这是干部们义务劳动的成果。公园里有不少热带的奇花异卉，入口处还有一个花坛，上面用花草种出北、中、南三大城市的名字：河内、顺化、西贡；顺化和西贡正遭受着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蹂躏。在任何地方我都体会到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迫切愿望。越南同志善于用简单、朴素的方式表示自己最深的感情。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讲过贤良江上的故事。住在贤良江边的人都是这些故事的创造者。其中不少的人一家分住两岸，忽然一下子让所谓“临时军事分界线”完全隔断了。书信断绝，父子不能见面，夫妻各在一方，以前偶尔有隔岸相望的机会，当时无法谈话，更不能互相呼唤，只有借简单的动作代替心里的千言万语。今天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南岸不见一个人影，村子早给迁走了。我看见人划着竹子编的圆形小船在河面上转来转去，等待从南方来的渔船靠岸，痴心盼望有人把他的心情带给几年没有音信的南方亲人。

我们访问了贤良江，回河内的途中，在洞海住了将近一个整天。在可以望见海的招待所里，我们喝了不少清凉的椰子汁。晚上主人为我们安排了同当地业余作家、诗人和文化工作者的愉快的会见。大家坐在阶前喝茶、谈话、唱民歌。一位三十多岁的越南同志站起来，唱了他赠给我们的诗：《治一天椰子林》。治指广治，天指承天，这两个省一直处在被分割的情况下面。诗人看到北岸的椰子林，又想起了南方的故乡，他充满感情地唱道：

南方啊，南方！
好像有万把刀割着我的心！

鸟栖息在椰树上，
黎明飞向南方，
鸟啊！给我捎个信去，
友爱之情在我心里燃烧。

分别的时候他把诗稿交给我，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眼里射出像火一样的光。我懂得他心里的话："下次在南方欢迎你。"我感动地回答他一句："下次在南方见。"这个时候我仿佛已经看见了回到祖国怀抱里的西贡，那么明亮、那么温暖、那么肥沃的土地！三十几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度过几个下午，看够了人民的苦难和殖民者阴险恶毒的行为。我相信就要看到解放后的新的西贡了。

后来在下龙湾，越南同志为我们举行了座谈会，让在鸿基

市工作的几位南方来的干部同我们见面，谈谈他们的心情。客厅外台阶下便是海滩，砂地上长了些大树，几株椰树迎风舞动它们的大鸟翅膀似的绿叶。深蓝色的海水带着白沫上下摇荡，但是像屏风一样静静地立着的是连绵不断的海中群山。我走出客厅，下了台阶，我的心已经让朋友们带到了南方。我站在椰树下面，耳里响着那位热情的年轻朋友的话："你要是能看到我们南方槟椥省的椰林，那有多好！"他哪里是在讲南方青葱的椰林？他明明在讲一千四百万南方人民的鲜红的心。我想着、想着，不觉仰起头去看树上肥大的绿叶，叶子仍在舞动。树上没有一只鸟。只有风。

"风啊，给我捎个信去……"我忽然想起在洞海听到的那首诗，忍不住轻轻地念了这半句。下面还有半句，我没有念出来，就让别人的声音打断了。但是我并不曾把它埋在我的心底，后来我几次遇见从南方来的朋友，我都倾吐了真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被称为"世界第八奇景"的下龙湾住了五天，白天出去参观访问，夜里我睡得迟，喜欢坐在廊前静望月下海景。我常常想，下龙湾离海防这么近，为什么我二十三年前经过海防，不曾听见这个地名？也从没有一个到过越南的人对我谈起它！鸿基的煤我倒是很早就知道，而且它也曾销售到上海。殖民主义者不仅掠夺了越南人民的财富，它还霸占了越南的风景。现在下龙湾回到了越南人民的手中，显得多么美！望不尽、游不完的两万多座大大小小的海中石山，构成了一个童话里的奇妙世界。

鸿基市就在对岸，我们每天至少过海一次。轮渡码头便在招待所的脚下。要是过了海还得走很远的路，司机同志便开了车子跟着我们过去，例如我们去参观鸿基煤矿；否则我们更喜欢散步到码头，等轮渡开过来，到了对岸，再沿着海边的马路走进大街，到工会会所进行访问，或者到“剧场”参加晚会，看反映革命斗争的话剧《矿工之歌》。每一次来去，我站在船头，看船靠岸、离岸，我的眼光总要在大树下白墙上一排红字大标语上面停留许久。我认得那几个越南字，字很大，颜色很鲜明，船靠岸前我远远地就看到了它们，船离岸后，过了好一会，它们还不曾从我的眼前消失。我在别处也看见同样的标语，可是这一处的标语经过半年多时光的磨洗，在我的心上仍然不曾褪色。我常常闭上眼睛，就看见大树下白色墙上那一排红字：“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滚出越南南方的时候眼看就要到了。

最近一个时期，我差不多天天听见电台广播员用昂扬的语调播送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获得辉煌胜利的消息。从越南南方接连不断传来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的心。我仿佛看见了南方人民痛击美伪军队、打得敌人哇哇大叫、狼狈逃窜的雄伟场面。前不久我收到了一位家乡在南方的诗人寄来的信。

……半个国土和平，
半个国土战争！
一只耳朵倾听小鸟的鸣啭，

一只耳朵隐隐听到炮声；
后屋烧起了熊熊的烈火，
前屋里又怎能睡得安宁？
你啊，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切情景！

曾经反复吟诵过上面这些诗句的诗人在信上兴奋地说："我们南方正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因此今年新春大家特别高兴，要是你还在这里，那么我们一起共饮胜利酒，多好！"

亲爱的诗人同志，您看，我的心何尝离开过你们！我也十分高兴，三千万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伟大愿望眼看就要实现了。到了那一天，我要履行我的诺言，到您的家乡，同您，同许多我敬爱的同志们一起共饮胜利酒。

1964年3月6日，上海。

珍贵的礼物*

——致越南诗人春生同志

今天我又找出您寄来的《南方来信》(法文译本)，这本永远发光的书的确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我翻开书，在书页中间又看到由您签名的越南作家协会外委会给各国作家的公开信，信还是我在两个多月前第二次读这本书的时候留在那里的。信里那些充满愤怒和信念、战斗意志和爱国热情的辞句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全体越南人民的心。我不曾早写回信表达我激动和感谢的心情，因为信到时我正在日本进行访问。那些日子里我看到了另一个国家的伟大人民的英勇斗争。斗争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是日本人民和越南南方人民争取独立的目标是一样的，赶走美帝国主义的决心是一样的，而且胜利的前途也是一样的。

我在东京有一天同一位敬爱的日本朋友谈起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他去年七月到越南参加过反对美帝侵略、支持南方人民斗争周的各种活动，他到达河内的时候，我还在那里，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文汇报》。

我们同住在一个宾馆。那是我离开越南的前一天，我知道下午有外国代表团到达，我们在越南电影厂看了从南方送来的纪录片《英勇不屈的南方》以后，回到统一宾馆，我在二楼房间里听见车声，打开玻璃门窗到阳台望下面，隐约见到有人捧着花束走出汽车，也听得出有不少人走上三楼，我却不曾想到客人中有我的熟人。不久您就来邀我到楼下客厅同十几位我熟习的越南同志叙谈。过两个小时我带了酒意回到二楼，惜别的感情折磨着我，它把其他的思想赶走了，我忘记打听三楼客人的姓名，因此错过了同那位日本朋友在河内见面的机会。第二天天刚亮，我便动身去机场。我回到上海，有一天在报上读到河内人民开会支持南方斗争的消息，发现了那位日本朋友的名字，才知道我在统一宾馆二楼阳台上望见的捧着花束走出汽车的人们中间有我敬爱的朋友。后来我又在日本《赤旗报》上看到那位朋友同十位从南方逃出来的男女青少年在一起拍的照片，还读到他那篇激动人心的谈话。他访问过一位二十三岁的姑娘，她五年前被美吴集团逮捕，遭到残酷的拷打，现在身上还有四十处伤痕。又有一位十三岁的少年，美伪军烧毁了他的房屋，杀死了他的妹妹。他和一百几十个人给关在牢里，不给饭吃；水里放了毒药，人们喝了水都死了，只剩下他一个，逃了出来；他逃进山里，后来找到了游击队，才免掉死亡。还有一位十一岁的少年，他早晨在家里听见枪声，跑出去一看，满街都是死人，他的脖子也受了伤，不过总算保住性命，逃到山里去了。晚上他偷偷回家，连一个活人也没有，他只好又到山里去。也是游击队的战士救了他。……报纸的篇

幅有限，那位朋友不可能把他的见闻全刊在报上。我多么希望从他的口里听到更多的越南的故事，他和我同样地关心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而且同样相信这个斗争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可是我们交谈的时间不多，要谈的题目不少，我没法请他畅谈那次旅行的收获，反正我有了在报上刊出的照片。半年来我把那张报放在写字桌的抽屉里，常常拿出来看。十张年轻的脸上并无苦刑的痕迹，微笑中有一种刚毅的表情，相貌平凡，却又吸引人。我敬爱的日本朋友同他们在一起显得非常自然、亲切，而且也年轻多了，经过长期考验的日本老战士站在越南勇敢的青年战士的中间，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我在越南访问的时候，也曾同两位从南方逃出来的青年度过一个上午。他们的遭遇和前面那十位青少年的不同，他们有父母、有妻子，住家离十七度线不远，都是靠捕鱼为生。他们给抓壮丁、拉去当兵，在伪军里混了一个时期，看够了美吴集团杀人放火、欺压人民的勾当，不愿意待在伪军里为非作歹，便趁着请假回家探亲的机会，冒着生命的危险，绕过南岸的岗哨，从贤良江的上游游水到北岸来。其中的一位逃来北方之前还在家中地窟里躲藏了七个月。他临走，妻子还亲手给他缝了一身黑衣服。他动身的时候，年老的母亲送他到门口，妻子在前面探路，送他走了十五里，先到山中，然后他一个人绕到江边，在黑夜游过江来。现在他们两位在北岸已经有了适当的工作，可是他们的亲人仍然在南方受苦，他们没法得到亲人的消息。有时他们怀念家里的人，也曾沿着贤良江走了许久，盼望看见对岸的一些动静。有一位还认出自己的

村子就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然而除了大树，他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我来不及说一两句安慰和鼓舞的话，他便坦率地告诉我：他并不因此感到失望。他说，他一定会见到祖国统一的日子。

其实，不单是这位南方的青年，所有我遇见的从南方来的人都是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不仅坚决地相信着胜利，而且一直在为胜利工作。就在靠近“分界线”的城市里我参观过两家木厂，一家是国营的锯木厂，另一家是木器高级合作社。锯木厂是抗战时期在南方成立的，日内瓦协议签字以后才迁到北方来；木器合作社是由南方同胞白手起家组织起来的。两家木厂的规模都不大，厂房简单，办公室窄小，可是工作效率很高，机器在动，人们在紧张地工作，待运的产品整齐地堆在那里。两个厂的工人中间南方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合作社工人的家属就在对岸，他们多数是渔民，年纪轻，身体好，劲头大，干起工作很出色。前两三年在休假日的下午，他们常常走一段路到长着松林的江边，寻找同亲人见面的机会。在那些日子他们有时还可以望见家里的人，不过船上有便衣伪警的监视，他们连一言半语也不能交谈。有一位年轻人坦率地讲出他们的心情：“未见面时很想念，见了面连问好的话也讲不了，心里更难过。现在见面也见不到了！只隔了一条江，连确实消息也得不到。千盼万盼都没有用。自己下了决心，一定要打破那些可恶的障碍！绝不灰心！要使出全身力量建设北方。相信祖国统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通过翻译的解释，我也能看到他们那颗热烈、坚强的心。我了解这些

年轻的越南人，他们都是说得少做得多的硬汉。

我还访问了一个得过二级抗战勋章的乡。支部书记在山坡上的办公室里接待客人。这个乡还有一半在南岸，如今给分割出去了。房屋是和平恢复后修建的，树木也是和平恢复后种上的，一九五三年法国殖民军砍掉了所有的树木，烧光了全乡的房屋。抗战初期这一面给敌人占据着，南岸人民自卫力量很强大，游击队员常常过江来打敌人，吓得殖民军和伪军晚上不敢出来。后来敌人在北岸也站不稳了，十四个村子中间，十一个成立了人民政权，敌人只好修筑碉堡，躲在其余的三个村庄里面。在斗争激烈的日子里，这个乡的人民也照常进行生产劳动，常常晚上收割了庄稼，运往南岸，在那边打出了粮食，又运回来埋在地下，不让敌人夺去一粒半粒。这个乡的人民为了斗争和胜利，也曾付出不算低的代价，蓝天下眼前茂密的树木和上好的庄稼都是由英雄们的血和汗培植起来的。

支部书记对我介绍了这个乡的昨天和今天、痛苦和欢乐，他的声音里有个人的感情，也有集体的自豪感；他那张被太阳晒黑了的瘦脸上有一种坚定而愉快的表情。从他那略带嘶哑的声音和近似微笑的表情中，我体会到他对祖国土地的热爱和对人民事业的信心。我喝着极浓的茶，我的眼光几次落在白色墙上挂的那些奖旗、奖状上面。几面奖旗和十几张奖状！它们说明这里的人民是抗战的英雄，又是生产的能手，而且在当前对敌斗争中立过大功。

我走出这间简单的办公室兼会议室，站在坡上，朝对岸望

去。这里非常静，江上也很静；南岸还是一样地静，我只看见两三座有着相当漂亮的伪装的碉堡和茂盛的绿树。同我在贤良桥畔望见的南岸比起来，这里又是一番景象。不用说，我见到的也只是表面，书记同志刚才还讲起，去年(一九六二年)本乡的人就捉到二十五起从南岸偷渡过来的敌方间谍。于是我也想起前一天我们一行几个人在山道上、斜坡下走来走去，好几次遇到孩子们猜疑的眼光。我还听说，这一带的村庄里，人们常常不能安心睡觉，连孩子们也知道同老虎“和平共处”是怎么一回事，放松了守卫工作，就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灾难。所以尽管美吴集团不断叫嚷要派人到北方来进行破坏活动，这样的好梦却永远实现不了，他们的人过了江便落在人民的手里，只好低头认罪。……

我同您在河内欢聚的时候，不曾谈起我在永灵的这些见闻，因为这一切您全知道，而且您非常熟习。我每次离开河内去外地访问，出发前您都要到宾馆来送行，汽车开动，您还在宾馆门前频频挥手。我和束为同志动身去永灵的时候，您同一位在南方生长的诗人大清早赶来送行，我刚刚同你们握了手，你们两位突然激动地先后同我们拥抱起来。当时的情景非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里，连制兰园同志眼中的泪光今天还在我的眼前闪烁。我和束为同志当时也很激动，我觉得我更深地接触到越南作家的心，也更深地体会到战斗友谊的意义。我们在车里、在路上，几次谈起你们对祖国和人民的那种极深、极强烈的感情，仿佛你们的心也伴着我们走向十七度线。在那个时候我多么渴望能够为你们祖国的统一事业做一些

事，尽一点力，即使粉身碎骨我也甘心。请原谅，我只是在这里如实地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你们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热情对我有多大的吸引力。今天我在这里向您讲我的见闻，我讲得多简短，而且我只讲这么一点，也不过是想让您和越南的作家知道我带了你们的心回到上海，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早已融在一起，你们的感情也变成了我的感情。所以我怀着怎样激动的心情一读再读您寄来的《南方来信》，这本用血、用生命、用坚定的信念写成的书给我的心带来多大的震动，都是您可以想象到的。

说实话，收在《南方来信》中的一封一封真实的信，对我并不是陌生的，我在河内的时候就听见人谈到它们（不过那时法文译本和中文译本都还不曾出版），而且在越南的五个星期中间，我们没有一天不听到南方斗争的故事，也几乎没有一天不听到越南人民抗战的故事。情况都是一样：敌人凶恶残酷，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但是英雄人民的斗争越来越勇，力量越来越强，胜利越来越大。不论北方或者南方，越南人民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在河内我参观过革命博物馆；在兴安我也见到陈列在本省小型博物馆中的烈士们遗像和抗战胜利品。最近全世界都在庆祝奠边府战役的十周年。在河内革命博物馆那间大型陈列室中，我也曾看到整个战役的全貌。馆长同志对着模型，拿细木棍指点，用充满自豪感的腔调，向弟兄般的外国客人解释这个伟大战役的经过。他的手指灵巧地不断按着电钮，战场的模型上交替地出现了各种颜色的亮光，好像那个不朽的战

役又在我们的眼前开始了。那个由二十一个营和十多个连的法国殖民军据守的、碉堡林立、而且拥有两个大飞机场的所谓“不沉的陆上航空母舰”(还得到一百多架美国飞机的支援),经过越南人民军五十五昼夜英勇的围攻,包围圈越来越缩小,碉堡像钉子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给拔掉,于是来了最后一下毁灭性的打击。在越南土地上横行了好几十年的法帝国主义侵略军,终于给打垮了,他们高举双手低下脑袋乖乖地向越南人民投降。我感到精神振奋,好像在听一曲雄伟的交响乐;我不自觉地昂起头来,仿佛我亲身经历了这个辉煌、伟大的胜利。“打得准! 打得好!”越南人民的光辉战绩给正在前进中的世界人民立下一个光辉的榜样,奠边府的胜利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到今天新老殖民主义者听到奠边府的名字还会胆战心惊。美国报纸已经在惊惶地叫嚷:第二个“奠边府”就在眼前了。就让他们发抖罢,东方早已不是他们的“冒险家乐园”了。

在博物馆里,我还看到帝国主义和反动集团屠杀人民的图片。我也看见英雄、烈士在苦难中留下的各种遗物。纪录片《英勇不屈的南方》放映的时候,银幕上出现了越南人遭受电刑拷打的镜头,和人们中毒死亡、爱国者被活埋、遭残杀的场面。若干年来,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轮流在越南山明水秀、草青花艳的土地上干着剖腹挖心、砍头吃肉的野蛮暴行。博物馆陈列室的白壁上有一张照片: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头子在他的写字桌上放了一个人头骨。还有一张照片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强迫过路人购买挂在架上的人肉。这一

类令人发指的图片，我看到不少，它们要向后代子孙控诉新老殖民主义者灭绝人性的罪行。

在博物馆中我还读到一位“丁夫人”的三首绝命诗。关于“丁夫人”的事迹，馆长同志也不清楚。它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一九六一年初春，我在东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紧急会议，有一天和邓泰梅同志同车，交谈中他向我介绍了丁夫人的三首七绝。其中一首的后两句，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凭借佛灵如再世，愿身千臂臂千枪。”这种不投降、不妥协、同敌人不共戴天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在越南同志中间是极其普遍的。在《南方来信》中，灿烂发光的也正是这种征服不了、抵挡不住的精神和意志。

我感谢您送给我这个珍贵的礼物，让我生活在反美斗争最前线昂扬的气氛中，让英雄人民的心灵之火永远照亮我的眼睛。二十二封《南方来信》都是父子、夫妻、兄弟、姊妹间的家书。我知道它们不过是成千上万封家书中间极小的一部分。美吴集团片面地撕毁了日内瓦协议，把“临时军事分界线”变为永久“分界线”以后，横遭隔绝的一家人，从此音信断绝，相会无期。要从南方寄出一封问好的家信，哪怕只有寥寥几行，也得经过多少善良人热情的手，绕遍天涯海角，遭受种种阻挠，花费很长的时间；有的信交到了收信人的手中，信封破烂，字迹模糊，只有亲人可以辨认；更多的信函在途中失去踪迹，让写信人空等回音。而且有不少的信到达北方时，寄信人可能已经为祖国统一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但是写信的手始终不曾停止，斗争的消息仍然不断地传到北方。心是隔不断

的，感情和信念也是破坏不了的。

一位正在游击区参加激烈斗争的杏花姑娘寄信给她在北方工作的“鸾姐”说：“我把一个沉醉在家乡解放事业中的隆朱姑娘的深情和信念寄给你。”

一位年轻的妻子在“一到夜间家家户户都紧紧关着门，人行道上响起了巡逻队的皮靴声，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察吉普车的声音不时传来”的城市里，写信告诉她在河内的丈夫：“有时临睡前我遮住灯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对她轻轻讲：‘这是爸爸。……’孩子歪着头，把脸贴在照片上，然后仰起脸问个不停。她知道你在河内同胡伯伯一起工作，得意得不得了。啊，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时刻：不管和你相隔多远，你明明在我们身边……”

一位父亲写信给他在北方的“德儿”：“爹娘在南方，你在北方，分别八年，这张小小的纸怎么容得下无限的思念之情！……那天碰着美吴匪徒来‘扫荡’……你娘和八岁的小烈也在这次被打死了。……孩子，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恐怕悲痛会影响你学习的情绪。不过我又想，你今天已经长大成人，明白事理了。我就照直告诉你。德儿！……我们家庭的痛苦，是南方人民、也是越南全国人民的共同痛苦的一部分。你既然爱你爹娘，爱你弟弟，就应当爱我们人民，就应当把仇恨变成具体的行动……”

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写道：“亲爱的雄哥，你接到我的信一定会说：‘唔，是谁的信呀？阿德是哪一个？’请允许我以一个解放军战士的立正姿势向你报告：阿德就是我，就是一九

五三年在靠近石佛寺运河那里把给炸弹炸伤了的你送到医院的那个小交通员。现在我已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亲爱的雄哥，你曾经教导我做一个有用的人。过去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鬼，如今我不只是一个解放军，而且还成为'北村战士'了。啊，我不知道怎样说才能够使你完全领会到塔梅草原的老乡协同我们打了显赫胜仗以后的欢乐心情。……"

一位老战士告诉他抗战时期的战友："今天我们还要坚持向凶恶的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继续分担正在被美吴集团残酷屠杀的同胞的痛苦。……一个干部落在敌人手里，受了重刑拷打，死去活来，可是他绝不开口。敌人烧起了一堆火，说：'假如你真是共产党员，你就走到火里去证明它。这才像个共产党员！'他答道：'我也知道火能够烧死人，我也同你一样愿意活下去，不过要是我的牺牲对革命有利，对人民有利，我是不怕火的。'他说完就走进火堆里去，这一来连刽子手们也吓得发呆了。……你们相信罢，越南南方的革命一定会成功。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含着欢乐的泪水抱吻个不停。"

我还要从一位槟椥省解放区干部的信中摘抄两段："黎明时候，站在萍大海滩上，你会听到隆隆的汽艇声，你会看到几百只安装上发动机的打渔船，一队一队地在蓝色海面上撒网。早晨的太阳放射着红艳、温暖的光芒。天气凉爽，阵阵海风送来海水的咸味。绿油油的甘蔗地，一村接一村，一望无际。

"美丽、富饶、英雄的槟椥，不怕牺牲、在艰苦斗争中屹立的槟椥，将有一天迎接从北方来参观它清凉的椰子林和高过人头的甘蔗地的亲人。槟椥的姑娘们将用清脆的歌声赞颂黎

明，赞颂自由、和平的生活……”

敬爱的朋友，我真想把二十二封宝贵的家信完全抄录在这里，信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震撼心灵的力量。那许多动人心魄的英雄事迹，那种至死不变的战斗意志，那种永不褪色的坚定信念……是一股越燃越旺的革命烈火，它会使一切正直的心灵燃烧。我想起了你们著名的诗人素友同志的《槟榔来鸿》：

> 哥呀，千言万语，叫妹怎么说得尽！
> 滚滚鲜血汇成多少条河！
> 要是能够啊，妹将立刻寄给你
> 泥土一把——它喷着斗争的烈火！……

二十二封家信就像槟榔省的泥土，每一行、每一个字都喷着斗争的烈火。正像你们所说的那样，这些信把我“带到美吴集团控制地区的恐怖生活中”；让我“站在南方人民群众的身边，目睹嗜血成性的魔鬼所进行的‘扫荡’和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这些信还把我带到南方人民自卫武装的战士们正在那里守卫和战斗的最前线；这些信也引着我跟随大批被捕的爱国者进入监牢，看见他们在野蛮的酷刑拷打下，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这些信还引导我“从城市走到乡村，从平原走到山区，走遍整个越南南方，亲眼看见英雄的人民怎样忍受种种艰难困苦，为保持祖国的荣誉，为建设解放区的幸福生活而战斗”。

你们怀着强烈的愤怒和真诚的愿望向全世界正直、善良的人呼吁，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作家和诗人呼吁，你们充满热

情的响亮的声音一定会得到热烈的响应。任何一个把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当作自己首要责任的作家、诗人都不能脱离人民的斗争。正直、善良的人也绝不会同刽子手站在一起，或者睡在血海旁边做“和平竞赛”的好梦。让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放胆进行“特种战争”，是全世界进步人类的耻辱；让三千万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继续受到阻挠，将来连我们的子孙也不能宽恕这种怯懦的行为。敬爱的朋友，您不看见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地方，千千万万只手正向着你们伸过来吗？您不看见千千万万颗心正在为你们的事业燃烧得通红吗？而且，不用我提，您也知道，越南人民也全知道，六亿五千万兄弟般的中国人民正和你们紧紧地站在一起，而且永远和你们紧紧地站在一起。每一个中国人都坚决地相信：你们的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

你们说得好：“正义永远是无敌的，非正义的黑暗势力迟早总要灭亡，——这是我们从这些浸透了血和泪的信中体会到的一条最深刻的真理。”

是的，你们的正义事业是永远无敌的。让那千方百计阻挠它的黑暗势力早日彻底地灭亡罢！我用什么来答谢您寄赠珍贵礼物的厚意呢？我热烈地拥抱您，拥抱每一位越南同志，每一位屹立在反美爱国斗争最前线的越南英雄！敬爱的朋友，人民的诗人，我等着您写出最好的诗来歌颂三千万越南人民的胜利，唱起最美的歌来表现三千万越南人民的欢乐！

1964年5月，上海。

越　南　人*

最近接到一位没有见过面的越南朋友的信。他生过病，刚从医院出来。他在河内工作，可是在信末他不仅写下河内的通信处，还郑重地写出他南方家庭的住址，又加上一个说明：他那个村子离某某火车站只有两公里，仿佛我马上就要到他的村子去作客，他现在告诉我怎样可以尽快地找到他的家。

这位朋友的确邀请我到他的家乡去作客。他在信上写着，他的母亲还住在南方的家乡，他说："我母亲的头发一定白得多了。"他就在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写信给住在南方的母亲描述他激动的心情，他还告诉母亲，在他们母子团聚的日子，他要邀请一个朋友去看看他的家乡，并且同家里人一起到芽庄（他那个省的省会）海滨去休息几天。……

他的信写得非常恳切，字里行间流露出写信人的欢乐的心情和坚定的信念，好像他在讲一件不久就要发生的事情。最后他严肃认真地写道："这个时候不会很远了。"

在有些人看来，"不会很远"只是一句极其普通的表示希望的话。可是从我那位朋友的笔下出来的却是许多胜利的消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收获》第四期。

息。这半年中间有好几位越南同志在信里对我讲起“不会很远”的话，有的说：“在一起共饮胜利酒的时候不会很远了”；有的说：“你亲眼看到槟榔椰子林的时候不会很远了”；有的说：“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方的时候不会很远了”；有的说：“你同你盼望了许久的南方战友紧紧握手的时候不会很远了”。写信人里面有一位今天还在南方坚持斗争的诗人，他便是在南方解放区出版的《解放文艺》杂志的主编江南同志，他的信是今年三月下旬通过越南南方解放电台发出来，由河内越南作家协会抄寄给我的。去年六月中旬我在河内访问越南文学院，那里的一位女同志向我介绍了南方的文学情况，还谈到诗人江南同志的活动，她说，每个星期六可以听到南方解放电台的广播。前一天另一位同志对我谈南方的斗争，他也提起诗人江南和青海的名字。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见到了青海同志。这次我在河内又结识了不少的诗人朋友，同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到家人团聚般的欢乐。我也曾这样想过：要是江南同志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谈谈他亲身经历的战斗和胜利，那有多好！我当时绝没有料到有一天我会通过南方解放电台收到江南同志的信。在那个时候这仿佛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对我讲过“不会很远”的话。

一年前我在越南访问，到过好些城市，见过很多的人，我指的不仅是我访问过的各个单位的主人，不仅是越南的作家、诗人、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还有我等待轮渡载汽车过江的时候在渡口见到的在树下路旁或者小店门前候船的越南同志。我提到渡口，因为公路桥在抗战时期炸毁很多，有的已经

重建，有的正在修筑，也有不少江上，车辆、行人就靠轮渡来往。但是殖民主义者在越南留下的废墟并不曾阻止越南人民前进。我坐车经过不少渡口，和在不同岗位上工作的越南人在一起等候轮渡，后来又一块儿走上轮船，站在大小汽车旁边，仿佛随着船在水面上缓缓地移动。这些人多数是挑担子的农村妇女，但也有一些军人和干部，他们坐车朝南走，或者向北去。这些不认识的越南同志有时也对我讲一两句话，还有人用中国话同我交谈。我至今保留着这样一个印象：我见到的无数相貌平常的男男女女都是精力饱满、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的，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他们，他们是用坚定的步伐走向胜利的人民。

我不论走到哪里，到处遇见家乡在南方的同志，到处听见人们谈论南方的斗争。美吴集团对南方佛教徒、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进行血腥镇压的消息接连地传来，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有一天人们含着眼泪、抑住怒火，对我谈起广德法师的事情。在西贡，年老的广德法师走在游行示威的佛教徒行列的前头，到了一个广场，游行队伍停下来，广德法师端坐在广场上，吩咐别的和尚在他的全身浇上汽油，他亲手擦燃火柴，在法衣上点火，慢慢地烧死自己，不曾发出一声呻吟。然后一位和尚出来当众宣读一篇抗议美吴集团压迫佛教徒的罪行的悼文。那个短时期里，在南方佛教徒中间，自焚成了风气，为了反对美吴集团的黑暗统治，几位出家人争先恐后地牺牲自己。不用说，在南方，斗争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武器从原始的到现代化的也是应有尽有，南方人民的武装力量在斗争中

发展得很快，南方人民更擅长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打击敌人。广德法师那根小小火柴点燃的火使我又想起烧遍整个越南南方的斗争的怒火，火越烧越旺，不止是在南方，也在北方，而且燃烧到了我的心上。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我的心不断地受着火的考验。我的心好像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拉向越南南方。

我住在永灵区人委招待所的时候，那里客人不多，有些房门紧紧地关着。夜晚很静，也不太热，房间前面走廊栏杆下是一个种花的小小庭院，房间后面有一个大院子。等到向贤良江南岸宣传的大喇叭静了下来、优美动人的民歌终于在远方消失以后，我的心仿佛也跟着歌声去了南方。在第四个夜晚，热情的区委副书记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送别联欢会，约了六位业余文艺工作者来和我们见面、交谈，他们还为我们唱了不少新编的和传统的南方民歌。联欢会就在招待所的会客厅里进行。最后大家一次两次地握手告别，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走出了会客厅。明天大清早我们就要回头往北走了！夜深人静，我的心翻腾得厉害，我在放下帐子的床上辗转反侧，这些天来听到的和看见的一切一齐涌上我的心头，逼着我想，逼着我问自己，逼着我回答。为了维护自己的理想，为了打击敌人，为了斗争的胜利，甘愿用极大的痛苦考验自己，毫不迟疑地交出自己的生命，对于这样的人，我不能不设身处地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拿自己的心去比他们的心。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再也忍受不了，便掀开蚊帐，下了床，走到廊上。廊上亮着一盏电灯，阶下有些小虫在

叫，同来的人都睡熟了。我站在廊前，深夜的凉气使我发热的头脑清醒了些。我顺着走廊绕到后面大院子里去。院子里没有树，也没有草，平日就显得空阔，现在不见人影更加空阔了。我在砂土地上走来走去。天空是那么大，那么黑。我很惊奇：怎么四周这样清静，我心里却又响着这么多的声音？我仰望南方的天空，整个天是一样的颜色，倒还是北方的星星明亮。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在这个城里，在附近的乡村，有多少人整夜睁着眼睛守卫在北岸，保卫着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也知道在南方，人们正在受苦、受刑，流血、牺牲，斗争、胜利。在南方，这是一个多么不平静的夜晚，墨色天空下有一片多么大的战场！每一个角落里闪起火光，响起枪声，到处都有爆炸声响。南方的英雄人民，男女老少，个个抢先奔赴战场，为了消灭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为了争取祖国统一的事业，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换取胜利。……

我走着，想着，我的眼前出现了黎文八的形象，他多么年轻，看起来还像一个小孩，有一天他用煤油浸透的棉花裹住身子，点起火冲进敌人的汽油库，让自己的生命和敌人的汽油同归于尽。这是抗战时期在南方发生的事情，后来集结北上的干部、战士们，脑子里还很鲜明地印着这个“活的火把”的不朽形象，在北方人们常常用尊敬和亲爱的声调提起他的名字和事迹。……我好像看见了被称为“越南女儿”的陈氏里，这位年轻姑娘长期受到美吴集团的残酷迫害，受过电刑、针刺、刀剐、火烧种种毒刑拷打，她几次死去活来，可是从不向敌人屈

服。她终于活下来了，而且得到当地人民的帮助，带着遍体鳞伤（至少有四十多处！）安全地到了北方，继续为祖国统一的事业尽力。……我好像见到了二十七岁的黎光咏教授，他是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西贡被吴庭艳政权的“特别军事法庭”判决死刑的。这位留学美国的诗人亲身体验了“美国生活方式”以后，回到祖国南方，便参加了爱国青年们的反美斗争。那天宣判后，他从容地对审判官说：“我唯一的遗憾是我被捕得太早了。我做过的事情太少，还配不上越南人的称号。如果我还不曾失去自由的话，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美国匪首！”……

我想到很多的人，也想到很多的事；我不曾见过那些人，也不曾见过那些事；可是我的思想一转到南方，那些人和事迹全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非常熟习，非常亲切，不像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也不像是从书刊上读到的。不是寥寥几个人，是许多、许多人；也不是一件两件事，是数不清、说不尽的事迹。我走了一会，想了一会，我的思想后来集中到黎光咏教授的半句话上面：“越南人的称号”，“配得上越南人的称号”。我回到房里，回到蚊帐中，我仍然在想这半句话。“越南人！”黎光咏教授被判死刑以后用自豪的语调在“法庭”上高声叫出来的这个称号，在我的耳里越来越响亮。这并不是静夜里我自己的心声，这是积累在我的记忆中的无数越南同志的声音。我突然记起来了，我在每一位越南同志的谈话中都听到同样的一个光荣称号：“越南人！”

在这个只听见虫声的“分界线”上的静夜里，我充满感情

地接连念着："越南人！""越南人！"仿佛不是我用自己的声音在念这三个字，好像是越南同志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在表示自己的感情。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贤良江的南面，无数的南方英雄正在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伟大的史诗，用智慧和勇气为万代子孙争取幸福和光荣。面对着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最凶恶的敌人，南方人民从来不屈服、不投降、不放弃战斗。他们不怕痛苦、不怕困难、不怕死。尽管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用火烧、刀割、剥皮、吃肉、剖腹、挖心种种惨无人道的毒刑对付他们，也不见有一个人放下武器，背叛自己的事业和人民。今天在世界上还少见到像越南南方人民所经受的那样惨痛的遭遇，像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犯下的那样灭绝人性的罪行，像越南南方人民所进行的那样艰苦、英勇的斗争和所取得的那样辉煌、巨大的胜利！尽管世界上还有一小撮听见美帝国主义叫嚷就"害怕得发抖"的人，他们到处兜售"活命哲学"，甚至公开宣传："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可是越南南方的英雄们用自己宝贵的血揭下了他们的面具，让人们见到他们丑恶的原形。在越南南方，连小孩也知道为了保卫原则，宁可"丢失脑袋"。他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尽管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在南方杀害了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可是更多的人拿起武器出来反对它们。越南人是杀不怕的，杀不绝的。他们要向敌人讨还血债。现在是美帝国主义看见越南人就"害怕得发抖"的时候了！越南人！这是多么受人尊敬的称号！这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的称号！这是胜利的象征！成千上万像黎文八、陈氏里、黎光咏那样的英雄的确"配得上越南人的称号"！他们

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脑袋丢了，原则大放光彩，人民的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连美帝国主义最新式的飞机、大炮、火箭、装甲车和化学毒剂也挡不住越南南方人民前进的脚步，何况“几个苍蝇”的“几声抽泣”！……

在永灵，我不仅在贤良桥畔望见了南方，我还见到许多家乡在南方的人，听到许多动人的故事，了解许多事情，关于这些我在一个月前知道的还是非常有限，可是它们对我却有很大的吸引力。今天我记不清楚了，我在什么地方见到一些图片，有一幅是南北两岸交换邮件的情况。我曾指着图片发问，有人向我解释，这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的事。本来按照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越南应当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举行全国选举，那么集结北上的抗战干部和战士就可以同分别两年的亲人团聚了。没有想到停战后美帝国主义凭空挤了进来，霸占了整个南方，扶植起吴庭艳的傀儡政权，片面撕毁了日内瓦协议，把越南分割成两个部分，企图永远占据南方。从此“临时军事分界线”变成了一堵无情的铁墙，贤良江水被人硬切为两半，连一座贤良桥也分成两截，一个乡村也劈成两块。南岸江边的居民早给逼着迁到了别处，本来朝夕见面的家人亲戚，现在也无法知道彼此的生死存亡。相隔咫尺，却不能交换一张字条，美帝国主义就这样横暴地剥夺了越南人同家人亲友通信的权利。我听到了好些贤良桥的故事，我还亲眼看见有人在铁桥南半段外栏上面涂油漆。本来按照日内瓦协议，桥身应当漆成一色，每年一次由南北两岸轮流担任油漆工作。可是美吴集团违反协议，单独将南半段桥身漆成了另一种颜色。

南半段一向用美国的上等好漆，我回国后听说前不久一个永灵的青年漆工走上桥，准备油漆北半段的桥身。南岸的伪警得意洋洋地向他吹嘘："你们休想用上这么好的漆！你们永远漆不上同样的颜色！"但是这一次永灵的青年漆工下了决心：祖国一定要统一，一座桥绝不能有两种颜色。他认为这也是战斗。他终于在几天里面配制出来了同南半段用的同样颜色的好漆。漆工们把北半段桥身漆好以后，那个崇拜美国的伪警看见大吃一惊，只得尴尬地向青年漆工承认："想不到河内也能生产出这样的好漆。"这不过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每一个故事都说明同样的事实：越南是一个整体，祖国统一是全体越南人民的共同愿望。

"但是越南人是不会听凭美帝国主义任意摆布的，"我回到招待所以后，又和年轻的翻译同志谈起通信的问题，翻译同志严肃地这样回答道。"通信一直在进行，南方的来信始终没有间断。即使贤良江变成水泄不通的铁墙，寄信人也还有别的办法让一封一封的家信送到亲人的手里。这些信上都不曾贴邮票、盖邮戳，各种各样的热心人担任了传信的工作。许多信还到过巴黎、香港、纽约、新加坡……绕了一个大弯，花了不少的时间，才到达河内；还有不少的信躲过了伪警的搜索，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一个乡村传到另一个乡村，最后穿过了'分界线'的铁壁到了北方，有的信纸已经损坏，有的受潮，字迹模糊，但是在亲人的眼里，连片纸只字也是有血有肉的东西。从南方这样寄来的家信不是几封、几十封，而是几万封。它们不仅是收信人的无价之宝，而且在北方得到了很多的读者，

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到处发生很大的作用……”和我一起旅行的翻译同志在越南外文出版社工作，他告诉我，经过一次征集和编选，人们把一小部分的信件编印成书，还用了一个又朴素、又恰当的书名：《南方来信》；中文本的翻译工作早已完成，正在排印。我这时忽然想起：他也曾为这个译本尽过力，他自己早些时候还对我说，书印出来要为我寄一册到上海，当时不是有人来找我谈话，便是我要出去参观，总之，话题给打断了，我也就忘记问起书的内容。现在才知道他讲的是这样的一本书。他说：“一共有二十二封信，它们都是用血和泪写出来的，没有一句话不是心里的话，没有一件事不是真实的事情。尽管写信的人不是作家，可是他们在信里表示了非常真挚、丰富的感情。他们的信都是写给自己最亲爱的人读的。他们有感情，有生活，有信念，有理想。每封信都真实地表现了我们越南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胜利信心。”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强烈的感情，我在他年轻的脸上看到了越南同志常有的自豪感，我也十分激动。我虽然静静地听他讲话，可是我明明感觉到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红线把他的心和我的心拴在一起，而且不断地在两颗心的四周绕来绕去。他继续往下说：“这是一本振奋人心的爱憎分明的书。这是一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教科书。这是我们南方骨肉同胞用自己在战斗中流出的每一滴鲜血、用自己为祖国统一事业献出的宝贵生命、用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鲜明的阶级感情写出来的书。这里面有革命烈士们给万代子孙留下的豪迈的遗言，这里面有向世界人民发出的热情的呼吁；这里面有美帝国主义杀人放火的血淋

淋的罪证，这里面有英雄人民的胜利的欢乐；这里面还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至死不变的革命热情……"我倾听着这些热情的话，我感觉到那根红线仍然在两颗心的周围绕动。我虽然在这里运用了自己的想象力，可是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我说的两颗心不仅是他的心和我的心，我也指每一个越南同志和每一个中国同志的心。革命人民心一条，这句话可以说明一切。使越南同志的心如此激动的理想和感情，也使我的心同样地激动。我还不曾读到翻译同志讲的那本书、那些信，可是我的心已经跟着书中人到了南方，处处流血，村村起火，一边是荒淫无耻和野蛮屠杀，一边是英勇战斗和辉煌胜利。我的心和南方人一起在所谓"战略村"的变相集中营中、在监牢里、在海岛上受尽毒刑拷打，不少的人从容地交出生命，却没有一个低头屈服；我的心跟着南方的人民战士们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用各种简陋的武器，痛打长着"核牙齿"的老虎，消灭成群的敌人，解放大片的土地，不止一次深深体会到英雄们"打了胜仗以后的欢乐心情"。对于我，越南南方显得更亲近，更宝贵，更可爱，更充满生命，更牵引我的心，更激起我浓厚的感情。

翻译同志那天的谈话并没有我现在引用的这样多，我把后来别人对我讲的话也揉在一起了，在我的记忆里我已经分不出哪些是他讲的，哪些是别人讲的，可能还有我自己想讲的话。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明确的：我和他、和别的越南同志有同样的想法，也有同样的感情。

另一个夜晚的情景在我的脑子里仍然十分鲜明。那就是我从永灵回河内、中途在洞海停留的一夜。我已经在别处谈过那个非常动人的联欢会。十多位刚从农村回来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唱了不少南方的民歌，诗人们先后朗诵了自己的新作。诗题歌意不出南方的斗争，歌声中充满了昂扬的斗志，但也流露出不太淡的乡愁，同志们好像见到了久盼的亲人，没有拘束地在倾吐自己的感情一样。我们大家的确十分亲切、融洽、愉快地在一起度过了两个多小时。晚会就在我房间外面放了不少桌椅的廊上举行。气氛越来越热烈，宾主间的友情也越来越加深，到晚会结束，我们还不愿意分别，握着彼此的手，不想放开，声音颤动地互相勉励：要跟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到底！仿佛有一种准备上战场攻打共同敌人、不得胜不收兵的心情。

洞海的夜并不凉爽，比在永灵更热，招待所虽然不小，又全是平房，而且建筑在河边，可是房里相当闷热，我的心情还很激动，我不想休息。我一个人坐在廊上喝着带花香的浓茶。我的思想还在刚才分别的越南朋友的心上，我在体会他们的心情。他们昂扬的斗志，他们深浓的乡愁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院子里树木茂盛，我闻到南国的花香和草木香，一首一首南方的民歌又在我的耳边隐隐地响起来，好像有人用针在刺我的心。夜怎么这样静？我忽然念出了几句诗：

今天
我站在北方的土地上，

按着胸膛，

谛听心在呼唤：

南方！

啊，神圣的南方！

这是我在河内常见到的济亨同志的《忆故乡的溪流》中的诗句，我们的两颗心一下子融在一块儿了。我才明白原来有千根丝、万根线把我的心不断地拉向“神圣的南方”！我多么愿意长出一双翅膀，越过美帝国主义在贤良江上建筑的铁墙，马上飞到贤良江对岸南方的土地。我想起了另一位诗人在贤良江口淞门写的诗：

我愿有两片宽阔的嘴唇，

吻尽祖国的边疆；

我愿有一双长大的臂膀，

抱住整个遥远的南方！

我不曾见过《浪拍淞门》的作者，但是我到过淞门，念着这样的诗句，我深切地了解越南同志深浓的“乡愁”。这不是乡愁，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这是越南人共同的感情。要从越南人的心上挖去这种深厚的爱、这种强烈的感情，是绝对办不到的！美帝国主义这样地试过几年了。它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越南人，真正做到了所谓“血流成河、尸骨堆山”，可是正像诗人济亨所歌唱的那样：

南北之情

汇成一股巨浪，

任何暗礁也挡不住它的去向。

胜利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越南人。越南南方是永远属于越南人的。“越南人不能走在越南的土地上”（《浪拍淞门》）的日子不会长久了！我静静地坐在廊上，望着院中花树的暗影，想着南方，我的心跟随那股“巨浪”到了南方，我仿佛看见了南方广大解放区的明朗的天空。我想到了不久就要在河内举行的“支持南方斗争周”。

可是使得整个河内怒吼起来的那一个星期刚刚开始，我就离开了越南，我只看到从南方送来的大型纪录片《英勇不屈的南方》，我只听到第一天游行群众整日不断的雄壮的口号：“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那天我和越南同志们又谈起南方的斗争，他们要我相信斗争虽然艰苦，但是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甚至在嘉林机场分别的时候，我们用留恋的眼光对望，用力紧握彼此的手，我和朋友们都想到南方，想到胜利，我们兴奋地定下在南方重见的约。对那位同我在一起工作了五个星期的翻译同志，我还叮嘱他不要忘记让我早日读到那本“浸透了血和泪”的书，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寄给我《南方来信》的中文译本。

这位热情的年轻朋友并不曾失信，他果然寄了书来。他不但寄给我《南方来信》，前两天我还收到他们出版社今年的中文新书《两岸歌声》。我已经听惯了贤良江两岸的“歌声”，它们伴着我旅行了一个多月，我念着这些情深意真的诗句，我的感情常常融化在三千万越南人民的感情中间：我痛苦，我憎

恨，我愤怒，但是我充满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我从越南带回这本书的法文译本，每当我在静夜怀念越南友人的时候，或者我坐在收音机旁边听完从越南南方传来的胜利消息以后，我常常翻开书，念两首诗，或者读两封"南方来信"，这些令人毕生难忘的英雄的"歌声"，这些真情流露的亲人的"家书"，它们又带着我的心飞向英勇不屈的南方。

这样，我终于读到我盼望了几个月的《南方来信》了。我那位年轻友人关于这本小书所说的一切是多么地真实！我在这些家信里面找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一个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世界，这就是一年来我的心朝夕在那里飞翔的越南南方！那样的生活！那样的斗争！那样的人民！

然而我收到的第一本《南方来信》并不是那位年轻朋友寄来的，却是越南作家协会外委会寄给我的法文译本。越南作家协会还写信给全世界进步的作家和诗人，要求他们参加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要求他们把《南方来信》介绍给各国人民，让更多的人知道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在越南南方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残暴罪行。在这封公开信里，越南的作家和诗人庄严地说：

> 我们自豪地通知您，我们的南方同胞团结得像一个人，而且我们，北方和南方的全体越南人，在争取祖国统一的神圣斗争中团结得比任何时候更紧密。

《南方来信》便是有力的证据。每一封信即使是妻子写给丈夫，或者未婚妻写给未婚夫的，也都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

越南人民团结得比任何时候更紧密，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些“南方来信”不止是二十二个越南人的家书，它们是全体越南人响亮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仅会响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会传到子孙万代，让千千万万人了解越南南方人民为了消灭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吃人野兽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让这个激烈、艰苦、英勇、坚决、而且战绩辉煌、捷报频传的正义斗争鼓舞着至今还在新老殖民主义铁蹄下挣扎、苦斗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越南作家协会的呼吁一定会得到全世界进步作家和诗人热烈的响应，一定会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致的响应。远处不说，在我们中国，《南方来信》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读者中间正起着有益的作用。正如许多人所说，这是一本控诉的书，一本战斗的书，一本教育的书，一本胜利的书，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一本活的书。这个“活”字是我用的，我说“活”，不仅因为信中讲到的为斗争献出生命的烈士们要永远活下去，信中所阐明的真理要永远活下去，写信人为之战斗的事业要永远活下去，而且这些信本身也要永远活下去。贯串全书的为集体利益奋不顾身的精神和为维护真理战斗到底的决心甚至在千百年以后还会大放光彩。

《南方来信》并不止一集，听说第二集的中文译本短期内也可以印出，以后当然还有三集、四集……，但是它们已经不需要介绍和推荐了。它们仿佛长了有力的翅膀，可以飞到任何地方，一切的阻碍都拦不住它们。用不着我在这里作详细的解释，让我借用越南同志在别处讲过的几段话罢：

从水深火热的南方，发出了对侵略者和它的走狗有力的控诉。从英雄的南方，唱起了对不屈的人们胜利的赞歌。

国界是拦不住诗歌的。它也可以越过任何“分界线”。它使作者和远方的读者彼此接近，并且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团结起来。这个事业就是：斩断在我们南方和平土地上制造种种罪恶的血手。……

我们南方人民的革命正像滚滚巨流，任何力量、任何阴谋也不能阻挡。我们正在战斗，我们一定胜利！……

明天，我们将迎接史诗般壮丽的凯歌：歌颂人民的胜利，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自由、真理的胜利。

——《两岸歌声》的序言

和越南人民这种满怀信心的豪迈语言对照起来，美帝国主义今天扩大侵略战争的疯狂叫嚣却显得多么空虚、无力。这只能说明它的软弱。让美国军人自己来发言罢，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在越南南方坠机丧命的美国空军上尉驾驶员向克这样说：“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我们在这里保不住面子了，因为已经没有面子可保了。”他又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难受和沮丧……”这便是美国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发表的美国军人写给妻子的家信。而我刚才讲到的《南方来信》呢？随便举一个例罢，一位年轻妻子小菊在给她丈夫的信里写道：“近三年来，咱们区的老乡好像都变得年轻了。现在，人们虽然还要战斗、反抗敌人的‘扫

荡'，还要刻苦干活，但是都看到了明天。正如你来信所说：在漫漫的长夜里，出现了曙光！"这又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小菊写信的日期是去年三月二十五日。今年一月到五月在越南南方又有一百多万人得到了解放，单是这一件事就可以说明斗争形势的巨大发展，所以我会收到江南同志的信，所以有人邀请我到他南方的家乡去作客，所以好些越南朋友（江南同志也在内）在来信中都写了"不会很远"的话。

我相信越南同志，他们说"不会很远"，一定"不会很远"，因为越南南方是属于越南人的，掌握那里命运的当然是越南人，绝不是美帝国主义。

让美帝国主义去叫嚣罢！奠边府战役正是越南人打出来的。有了第一个"奠边府"，难道就不会有第二个"奠边府"吗？美帝国主义也应该听听越南人的声音：

> 坚决战斗罢，
> 砍掉美吴的杀人魔掌！
>
> ——《两岸歌声》

吴庭艳的魔掌已经砍掉，现在轮到——美帝国主义了。时间是不会等待的！

1964年7月6日，上海。

越南人民庄严的答复*

一种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正在越南南方发生，成千上万的佛教徒、大中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遭受着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卖国集团的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杀害，受拷打，大批地关进监牢，生命毫无保障。对于这种无比凶残的罪恶行为，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强烈的抗议。全世界人民一致热烈地支持两位主席的严正声明，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旗帜举得更高了。

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吴庭艳集团蹂躏越南南方土地、屠杀人民的罪行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他们已经欠下了好几年的血债。两个半月前一位越南朋友为我抄下了一张账单：

十六万人被杀害；

三十七万人给关在一千所监牢里面；

六十八万人受拷打负伤；

三十七万人给关在四周围着铁丝网的所谓“战略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上海文学》九月号。

这里记的数字还是以前的旧账，倘使加上今年的新债，那就更可观了。在白纸上写黑字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想到每个数字后面都有大量的鲜血、无数残酷的暴行和极其深切的仇恨，我拿起笔，手在发抖，心也在打颤。面对着视死如归、坚持斗争的英雄人民，我不能不动感情，我决不能袖手旁观；面对着嗜杀成性的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我不能不感到憎恨，一定要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越南朋友对我讲过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也有机会在好些地方见到剖腹、挖心的照片。单单用"野蛮屠杀"和"剖腹挖心"的字眼来控诉美吴集团的暴行，还嫌太轻。美吴集团干的罪恶勾当比这些更残忍、更毒辣，他们在越南南方土地上长期进行所谓"特种战争"，喷洒大量的化学毒剂，使得草木不能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人和牲畜接连中毒死亡。①美帝国主义真是要在越南南方人民死亡的废墟上，建设美国方式的"文明秩序"的！为了建设这种"文明秩序"，美帝国主义不断地把人和钱送到越南南

---

①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有人从槟椥省写信出来说：

"那天我同阿和在A地，亲眼看见敌人的飞机喷洒化学毒剂……敌机飞过时，正在八大娘家院子里玩的孩子们都呛得咳嗽，大人也在叫嚷呼吸困难。从田野上突然传来惊叫声：'乡亲们，飞机在撒毒药啦！……'整个乡都骚动起来了。有的人在找寻儿子，有的人在盖水缸，有的人用毛巾浸水遮住口鼻，有的人给孩子擦上葱蒜汁和椰油防毒……

"村头响起了游击队的枪声。敌机突然升高，它再也不敢低飞了，可是它仍然继续向下面喷射毒剂。天空一片混浊。树木、房屋、学校和碉堡顶都盖满了白色毒药，也有一些黄、红、黑色的毒药。

"许多人中了毒。四大爷瞎了眼；六大爷吃了生芥菜嘴巴肿起来了；正在撒网捕鱼的才哥中了毒掉进河里了；吉哥的小孩走到沾着毒药的草丛中，两只脚都

方，把化学毒剂和新式武器送到越南南方，肯尼迪政府甚至大言不惭地吹嘘十八个月①里面就可以建成这种“文明秩序”。他们的确为这个计划、这个目标用尽了力气：他们每天花一百万美元来屠杀越南南方人民，连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或是整批地屠杀、毒害；或是一个一个地用酷刑拷打：割舌、断臂、剖腹、挖心；或者一把火烧毁一个村庄；或者用化学毒剂毁灭一大片田地。我在纪录影片上看到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年轻的越南人遭受电刑拷问；美国顾问和吴庭艳政权的士兵一块儿放火焚烧民房，把农民全家赶到“战略村”去；十几个越南革命者双手反绑在背后被押到刑场，给活埋在挖好的大坑里面。……我不想描绘更多的情景，这一类的镜头还是他们那一边的人摄下来的“纪念品”，但是只要看到一两个这样的场面，只要听到一两个这一类血腥镇压的故事，人一生也不会忘记，更不会宽恕。

所谓十八个月的期限到去年年底就届满了。肯尼迪政府

肿烂了……

“这时敌机还在邻乡吼叫，可是路上已经响起了互相呼唤声：

“‘王大娘呀，去不去参加斗争？’

“‘等一等……’

“‘妈，记住拔一棵沾毒的芥菜一起带去……’

“‘阿八，费点力气，把那只中毒的鸭子也带去……’

“学校那边已经响起了‘打倒美吴集团！’的怒吼声。许多人为了赶上示威游行队伍，边跑边穿衣服。队伍越来越长了。……”（1964年5月摘录《南方来信》）

① 一九六一年美国制订了所谓斯特利-泰勒计划，妄图在一九六二年年底以前把越南南方一千四百万人民全部关进一万六千个“战略村”；要在十八个月内“平定”越南南方。所谓十八个月是从一九六一年七月算起的。

是不是已经在越南南方建成了美国方式的"文明秩序"呢？没有！完全没有！而且他们已经厚着脸皮把期限延长到十年了。这就是说，他们要永远赖在那里，用不断的屠杀来消灭越南南方人民，等到人民杀尽死绝，他们便可以永远霸占越南南方。但是八个月又过去了。肯尼迪政府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固然他们建立了更多的"战略村"，杀害了更多的越南南方人民，烧毁了更多的村庄，让更多的老百姓挨饿受苦，制造了更多的孤儿寡妇……。可是同时更多的直升飞机被打伤打落，更多的美国顾问死在森林中，"战略村"成百上千地被人民武装捣毁，侵略者的泥足越陷越深。直升飞机救不了他们，凝固汽油弹和火箭救不了他们，化学毒剂救不了他们，水陆两栖装甲车也救不了他们，任何新式武器都救不了他们。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南方的处境只有越来越坏，而且还要继续坏下去。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内部已经为着这件事情发生了争吵。大凡做生意的人，哪怕是做人肉买卖的（在越南，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反动派的确干过这样的事，我在博物馆里见过图片，听过说明），心思总是一样：生意亏了本，股东就会叽哩咕噜。美帝国主义几年来花了那么多的钱，送掉那么多的武器，甚至赔上不少美国人的生命（其中还有少数美国顾问是给那些不愿意残杀同胞的伪军士兵打死的），请问它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首先，它欠下越南南方人民一笔更大的血债，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此外，还有一张账单①，也是那位越南朋友抄给

---

① 这还是一九六三年上半年的旧账单，现在数字又增加了。（一九六四年五月注）

我的：

解放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完全控制区）占整个南方农村的百分之七十六；

解放区面积占整个南方面积的四分之三；

解放区人口占整个南方人口的一半，即七百万；农民分到了土地七十万公顷……

账单很长，我用不着再往下抄，单单这几笔就够了。越南南方人民真是了不起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英雄人民！钢铁一样坚强的南方人民用简单的土造武器粉碎了敌人的残暴镇压和猖狂进攻，把美吴集团打得落花流水。解放区越来越扩大，人民武装力量也越来越强大。我在纪录片上、在照片上都见过不少欢乐的场面：解放区的人们在大搞生产，大搞水利；年轻人和儿童在课堂里用功念书；文工团团员为群众表演歌舞，数不清的优美动人的民歌仿佛传到了我的耳边。……在解放区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越南南方人民在不断地前进。越南南方人民雄伟的、坚定的步伐是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新式武器所阻挡不了的。事实上除了核武器以外，凡是用得上的武器，美帝国主义都在这里用过了。哪一样能够帮忙它解除进退两难的困境呢？现在它竟然在动"有限的核战争"的念头了。不用说，这又是它的如意算盘。其实谁都知道它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在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人民面前，美帝国主义不管它长了多少颗"核牙齿"，它终归是一只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前途就只有一个：滚出去！

我不久以前访问过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好些地方看见路旁法国侵略军修筑的碉堡。法帝国主义曾经在这些坚固的碉堡里作过垂死的挣扎，但是终于垂头丧气地滚出越南了；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物虽然不能为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但是它们不断地提醒人们：帝国主义的确是一只纸老虎。这许多残破的建筑物好像是一座一座的墓碑。美帝国主义不会比它的前辈有更好的命运。

这些日子里美帝国主义正在装模作样，企图让人相信吴庭艳集团最近变本加厉屠杀人民的罪行与它无关。但是这种推卸罪名的谎言是没有用的。谁都知道没有美国政府的钱和武器，吴庭艳集团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美帝国主义必须对在越南南方流的每一滴血负责，它必须对吴庭艳集团的每一件大小罪行负责。不管它如何狡辩，三千万越南人民绝不会宽恕这样凶恶的敌人！

我遗憾我没有机会踏上越南南方的土地，我只是隔着贤良江望了望它，我看见一片冷漠与荒凉，几个在桥上来去的穿着类似美军军服的伪军官兵很像是舞台上的丑角。但是我见到了不少一九五四年从南方来的干部，① 他们激动地对我谈起南方的斗争，眼睛里射出强烈的怒火，我才体会到他们的心还深切地想着十七度线以南的如此美丽的土地，和如此勇敢、

---

①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后，为了遵守日内瓦协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干部和战士离开北纬十七度线以南的家乡，集结北上，他们的家属都留在南方，还以为两年后根据人民投票实现和平统一的时候，一家老小便可以欢乐地团聚。

坚强的人民，我才体会到他们的心和那边人民的心始终是连在一起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越南朋友的话："都是同一个母亲身上的肉，怎么分得开呢？"在下龙湾海滨椰子树下我遇见一位热情的南方人，他亲切地对我说："我将来一定要请你到南方去喝椰子汁，我们那边的椰子林真好。"接着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又加上一句："我们多么渴望祖国的统一啊！"

这后一句话我已经从许多人的口中听到过了。每一位越南朋友都对我讲过这样的话。这是三千万越南人民共同的愿望。倘使不是美帝国主义出来破坏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越南人民的这个愿望早已完全实现了。但是美帝国主义能够长久赖在越南南方吗？美吴集团能够用屠刀把南方从越南母亲的身上永远割去吗？回答只有一个：不能！

我离开河内的前一天，天刚亮，临街的窗下就响起了人们的脚步声，几十个人高声大呼："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这是游行示威的群众在喊口号。这样的小队游行整天就不曾断过。到夜深我站在窗前，还看见人们拿着小旗从街角转了出来。这是支持南方斗争周的第一天，我听见了成千的游行者雄壮的呼声："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我感谢越南同志们用这么响亮的战斗口号送我回国。……

就在我这张写字桌上面，收音机在报告"国际新闻"，电台广播员的熟习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西贡，越南南方学生坚持斗争，继续英勇地抵抗美吴集团的疯狂镇压；

在世界各地，人们纷纷严厉谴责美吴集团的暴行，要求美国侵略军队撤出越南南方；

在华盛顿，美国总统肯尼迪傲慢地重申他永远霸占越南南方的决心。……

然而三千万越南人民庄严的答复是绝不会改变的："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呢，我们热烈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坚决同越南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1963年9月10日，上海。

后　记

去年六月十日我和李束为同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我们在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生活了五个星期。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越南同志接待我们仿佛在接待自己的弟兄。我们看得不少，也学到很多；我们生活得好，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越南的灿烂的阳光和友好的气氛是我们最好的养料。在兴安省和鸿广区，我们看到了越南人民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一连串巨大的成就；在贤良桥畔，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越南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也更具体地了解了南北两岸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英勇斗争。我们同越南文艺工作者有过多次亲切的会见和坦率的交谈，谈得多，谈得深，谈得恳切，也谈得融洽；我们同越南文艺工作者接触越多，了解越深，情谊也越厚。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和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友谊访问越南，我们也带着越南人民和越南文艺工作者的友谊回到中国。事实上我们带回中国的，不仅是这种死生不渝的深情厚谊，我们还带回来：越南北方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表现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辉煌出色的成就，我们也带回来南方人民在反对美伪集团、争取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顽

强的战斗意志和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虽然通过这次访问，我看得多，学得多，收获大，感受深，可是我写出来的却只有这么几篇文章，距离我所想写和我所应当写的还差得很远。我没有能把我对越南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友爱之情表达出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我感到遗憾。但是动笔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感情太多，太深，它们争先恐后地奔赴笔端，我的笔一下子变得很重，我反而因为难于找到使我满意的适当句子而踌躇；同时我又有另一种感觉：在这短短几篇文章里，寥寥几万字中间，我也记录了一些我的真实的感受和见闻，我也保留了一点我的真挚的感情。倘使这些文章能够把读者的心带到越南，让他们生活在友谊的海洋里面，让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越南人民得到更多人的崇敬和热爱，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我想借这本小书印行的机会，向越南各方面的朋友表示最深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束为同志和我的殷勤的招待、热情的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没有在这里列举他们的大名，我愿意把这些对我显得格外亲切的姓名牢牢记在心上。我还要感谢越南对外文委的武国威同志和越南作家协会外委会的阮春生同志，我也要感谢陪同我们进行参观访问的陶同志、担任翻译工作的陈同志和汽车司机阮同志，没有他们几位的帮助和照料，我连这本小书也写不出来。

最后我还要说：我爱越南，我爱英雄的越南人民。

巴　金 1964年6月，上海。



爝火集

《爝火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序

一九五九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我国建国十年来文学创作的选集，要我参加这个工作，我考虑了将近一个月，才决定编选一本《新声集》。我在一篇短短的序文里说："时代太伟大了，生活太壮丽了，我这管无力的笔，我这些简单的文字，也多多少少沾了这个时代、这个生活的光。"我绝对想不到过了七年这些文章会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

明年是我国建国三十周年的大庆，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编一套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又约我参加，我这次欣然答应了，因为经过前几年大会小会的批斗之后，我反而有了这样的信心：我至少比有些人更爱我们的时代，更爱我们的生活，更爱我们的国家。我在这本新的散文集里保留了《新声集》中选过的大部分文章。今天的读者不妨回顾我所反映的那一个时期和那一段生活，看看我的文章究竟是歪曲，是攻击，是抹黑，还是热情的歌颂！这些文章和我那几年的遭遇就是对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控诉。

这个集子是三十年的散文选集，可是集子里只有不到二十年的作品，因为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整整十年中间

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在那个时期，不仅是我一个，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地被迫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还不说许多人丧失了生命，我的爱人萧珊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锻炼的。尽管由于这次的"大革命"我失去了最亲爱的人，我仍然要赞美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成果。只有通过这个伟大的革命，我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通过这个伟大的革命，我才懂得我们过去的确"只有封建传统，没有民主传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据我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反封建。去年八月我写了《家》的重印《后记》，我说这部小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并不是在说假话，当时我实在不理解。但是今天我知道自己错了。① 明明到处都有高老太爷的鬼魂出现，我却视而不见，我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知。

"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我为它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因此我更有理由重视它的伟大的成果。

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我。现在是"四五"运动的英雄们的时代，这些青年英雄的革命精神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希望。它像一支火炬，照着我们新长征的道路。我祝福这些新时期的年轻人！

1978年11月26日。

---

① 其实连买卖婚姻也并未在中国绝迹。

忆 个 旧*

离开个旧将近两个月，想不到我的心还在那个地方。先前在游船上听见湖畔树丛中送过来的新闻播音，我还有一种在个旧的街上听广播的感觉。我在旅馆庭院中望门前缎子似的西湖水，也好像在金湖宾馆的院子里遥望灿烂发光的金湖。在湖滨散步看见停泊的挖泥船，我就想起个旧的金湖多么需要一只这样的船。听说云锡公司已经向大连厂订购了，却担心不容易运到那里。我在个旧仅仅住了六天，对那个城市我知道的实在有限，可是我却像怀念故乡那样地常常想到它。三个星期前我到上海吴淞区参观张庙一条街，看见那里的工人宿舍就想到个旧工人住的楼房。我访问北京二龙路人民公社的食堂，看见灵活巧妙的切菜机，就想起我在个旧参观红河州农业机械工业展览馆时见到的那些同样巧妙适用的切菜机。这两个月中间我到过好些地方，见过好些新奇事物，握过数不清的温暖的手，我的心一直受着春雨的灌溉和春天阳光的照耀，我过了多少兴奋欢乐的日子！可是我从个旧市带走的温暖和热情至今还在我的身上和心上发光、发热。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六月五日《上海文学》六月号。

我还记得就在那个展览馆里，一位弥勒县年轻的胖姑娘笑着要拿一个白糖做的猫一样大的雄狮送给我，我没法带着这个宝贵的礼物坐飞机回上海，只好心领了。我只听说个旧市是一座锡城，却没有想到整个红河自治州的物产多么丰富。再过几年铁路通了，铁路多了，那个时候老住在一个城市的人也会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祖国是多么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连脚步不出上海的人也知道个旧并不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市，它是中国的一颗发光的宝石。

三十年前我就听见人讲起个旧。我在上海认识的云南朋友似乎全知道它。其中一位年纪比我大的留日学生曾经在那里住过一个短时期，他带着憎恨和愤怒对我描绘那些人间地狱的情况。我把从朋友们那里得来的一点一滴聚在一起，再用自己的想象串连起来，于是在我的脑子里有了一个“死城”的面貌。从前有人把个旧叫做“死城”，因为它是阴风惨惨的人间地狱。在那里有枪的人就高人一等，徒手的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忠厚老实的农民被招工者骗到矿山来，给戴上脚镣，由矿警押着爬进矿洞去挖壙，背壙。也有人孤单地走过矿山就被带枪的人抓起来，关进“伙房”当“砂丁”。有一次两个卖鸡蛋的人路过矿山，就被一个姓黄的老板差人抓住，鸡蛋抢走了，两个人都当了“砂丁”。有一个姓滕的老头因为儿子两年没有消息，到矿山来看亲人，遇见那个姓李的老板，就让狗腿子捉住，钉上了脚镣，一干就是半年。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生活比我的想象丰富得多。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到我的笔下都变得干枯了。我早就应当到那里去看看“砂丁”的生活，可是

解放前我一直没有机会。

解放后我亲眼见过春回大地的景象，又看见不少起死回生的奇迹。所以我也做过春满锡城的好梦。个旧的春风轻轻地拂去我脸上的尘土，金湖用发光的笑脸欢迎我的时候，我心里多么高兴。"死城"的确变活了。

我过去的想象好似一场噩梦，什么也不曾留下来。只有老阴山和老阳山还高耸在我的眼前。但是它们也变了。过去两座光秃秃的山现在却装饰了那么多的美丽的建筑物。我住在从前的乱坟堆中间。不，现在没有乱坟堆了，这里是一座现代化的洋楼，一所美观、舒适的招待所：金湖宾馆。金湖就在门前，也有人叫它做个旧湖。这个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以前这里并没有湖。矿山上缺水，当"砂丁"的要洗脸就不能喝汤。解放以后工人当家作主，事业的发展的确说得上一日千里，采矿选矿都需要大量的水。人们利用一九五四年的大水造成了这个人工湖，也解决了一部分用水的问题。倘使金湖再得到疏浚，湖水一定更加清澈、明净，城市的面貌也一定更加美丽了。

我就在金湖宾馆住下来。早饭前和中饭后我喜欢在门前院子里散步。有两次中饭后的锣鼓声把我引到门外：一次是二三十个青年男女工人穿上新衣服，笑容满面地捧着决心书，表示要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做高举红旗的标兵；另一次我却只看见一个行列最后几个人的背影。晚上我也常到京剧院去看戏。戏院里有上千的池座，观众大半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也有抱儿带女来的。谁都想得到，在大闹技术革新的日子里，连

好戏和好演员也吸引不了太多的观众。但是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们在台上演得很认真，他们的喜怒哀乐抓住了观众们的心。有一夜我和五位工人同志坐在前排为杨八姐责骂昏君的正义言辞和英雄气概接连鼓掌。他们中间有先进工作者，有老工人，也有从小被骗到矿山、戴过脚镣下洞的老“砂丁”。赵坤同志先前还感慨万分地谈起他许多惨痛的故事，现在却出神地欣赏年轻演员的精彩表演，他的脸上现出愉快的笑容。年轻的梁兴福同志捧着瓷杯在喝茶，他也高兴地笑了。他不曾尝过脚镣和鞭子的滋味。但是他在劳动的时候看见了不少从垅渣里挖出来的脚镣，这些脚镣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铁铸的，有的却是用铁丝扭成，有的镣上还带着枯骨。好像每一副脚镣都在传播受难者的沉痛的控诉。梁兴福同志虽然没有赵坤同志几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但是他也懂得“回想起旧社会苦难的过去，就会觉得新社会更加美丽、可爱”。他意气昂扬地表示要“鼓足干劲，来建设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过去的“砂丁”哪里有这样伟大的抱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悠闲地坐在戏院里喝着茶看皇帝出丑！

在我一九三二年写的小说里，个旧是一座死气沉沉、一片惨雾的城市。现在我亲眼看见的却是万里晴空，阳光遍地，满街振奋人心的标语和亲切动人的壁画。人们唱着歌在劳动，人们唱着跃进歌曲去上班。过去充满吵闹和吆喝声的赌场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陈列日用百货的大楼和供应精神食粮的新华书店；过去充满叹息和呻吟的“伙房”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一幢一幢三层楼的工人宿舍，矿山上那些过去的“蛇洞”没

有了，代替它们的是宽大的坑道，和开阔的露天矿场。头上顶清油灯、额边插刮汗片、手上拄一根木棍、肩上前后扛两个坑包、穿一身麻布衣的“砂丁”也没有了；现在有的是昂头挺胸的青年和壮年的工人，他们或则只身掌握水枪朝山上的泥土猛射，或则驾驶电铲车用那巨人手臂似的武器铲平整个山坡，或则用风镐、电钻在竖井里坑道壁上打眼、埋药爆破，或则在坑道里驾驶电动车或指挥缆车和飞兜把矿砂运走……我走遍矿山，只有在公私合营的“建设坑”上，看到一点过去留下的痕迹。但是这仅有的土法采选的遗迹马上也要消灭了。工人们正在干劲冲天地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今天的矿山上不但人们免除了笨重的体力劳动，连马也要得到解放了。我下过一个井，由一位检查安全的工人引我走了不少路。在离地面两百公尺的相当宽的坑道里，马拖着运矿砂的铁轨车缓缓地来来去去。这些马一直在地底下劳动和休息。我在井里还看到不曾坏的马房。在整个矿山劳动的马一共有三百匹。老厂的厂长告诉我，已经拟好计划在短期内就要把马群全抽出来；不用说今年还要把大批的工人送到别处去，让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厂长是一位朴实的好干部，他讲得很谦虚。其实谁也看得出更美丽、更光辉的远景。人们常说平地起高楼，在这里一座一座新式的工厂接连地修建起来。谁能说几年以后的个旧是什么样子？一九五四年春天访问过这里的一位客人疑心自己找错了地方。他当时参观过这里唯一的小小炼锡厂。可是在他的眼前炼锡厂忽然变成了美丽的湖！却在另一个地方耸起来一百公尺高的烟囱，一座规模巨大的炼锡

厂出现了。锡水在细长的铁管里畅流，那么驯服地听从工人的指挥。这哪里是他梦想得到的！在个旧和在我们祖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不仅变化多，变化大，而且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数不清的人在为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努力！到处都是热浪滚滚的沸腾的生活！

我常常惋惜自己不曾好好地安排时间，要了解像个旧这样的城市，六天的确太短了！然而我即使看得不够，我却想得很多。我离开个旧的前一天，中饭后一个人走到金湖边，在那里站了许久，望着好像有万条金色小鱼游来游去的湖水，我在想象未来的金湖和未来的个旧，五年，十年，二十年……我想着，想着，忍不住独自笑了起来。未来的确太美好了！我们不需要大胆地设想，也可以为这个遍地黄金的锡都安排一个无限光辉的前途！眼前这个小小的金湖有一天也会像西湖那样地美丽，那样地全国知名！

我想得太远了！我正要收回我那跑野马似的思想，一抬起头，忽然看见对面老阴山上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形。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貌，却看得出他那一身矿工的服装。我来个旧以前不知道过去有这么一个人，可是在这里的几天中间不断地听见人谈到他的事情。这就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在这里被捕、后来在蒙自就义的共产党员李鑫。烈士的名字给灰色的老阴山涂上了光彩，使金湖的水显得更加灿烂。就在这座湖畔高山的马拉格矿里他充当一名矿工，为革命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帮助工人成立了秘密工会，他根据民间曲子编写了《走厂调》，描写当时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工人的情况。……我没法讲完

他那许许多多英雄事迹，因为我知道的实在不多。有一天傍晚，我在有花有树的文化馆里参观“矿工今昔陈列室”，我了解过去矿工的生活愈多，我愈不能不佩服李鑫的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这个从北京回省的大学毕业生，当过昆明工业学校的教员，为了要去矿山开展工作，他经常到河边用砂石擦足，一直擦到出血，还脱光衣服在大太阳下面烤晒。他天天这样做，到后来脚上结起了厚茧，全身脱皮发黑，不再像知识分子了，他才换上破衣到马拉格去当矿工。他在矿山上从来不曾露过破绽，也没有人怀疑他不是真正的工人。要不是矿工们的觉悟同活动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要不是有熟人认出他来，他也不会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捕。关于他的被捕，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到当时的锡务公司去背米，公司总经理的佣人看见他，认出他是工业学校的李老师。那个姓陶的总经理做过昆明工业学校的校长，佣人那时也在学校当校工。姓陶的马上把李鑫找来盘问。李鑫虽然早已改名换姓，可是那个坏蛋手边有一张他们过去在昆明穿西装合照的相片，坏蛋拿出一身西装要他穿上，然后再用照片一对，就把他逮捕了。也有人说，特务到处找寻李鑫，后来在这里认出了他，把他传到公司一问，就抓起来了。在蒙自他和另外三位同志一起受审，同赴刑场。他们死得非常勇敢，一路上不断地向群众宣传：“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党……”

老阴山上并没有烈士的塑像，可是每个工人的心上都有这样的一座纪念碑。连我这个远方来的访问者听到了李鑫的故事，也一直牢牢记在心上。我望见老阴山，就会想到他那个

巨大的身形。我后来怀念个旧，也会想到他那个巨大的身形。其实李鑫并不是身长丈二的金刚，然而他的人格放射出万丈光芒！

在那个晚上，就是在我离开个旧的前十个小时，我在金湖宾馆的饭厅里看完了描写“砂丁”的生活与斗争的电影《锡城的故事》。我承认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在银幕上没有看到李鑫的形象，我感到遗憾。

1960年5月11日在杭州记。

大 寨 行*

半年来我常常听见人谈起大寨人的事情，也读过几篇描绘大寨风光的好文章，我们动身去大寨的时候，在火车上、汽车上，我一直在想象大寨的面貌。我曾经在电视机的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在大寨拍摄的镜头，可是我还不能把它们连起来。我只是反复在心里念着几条沟的名字：白驼沟、后底沟、赶牛道沟、念草沟、小北峪沟、麻湟沟、狼窝掌沟……深沟变良田，究竟是怎样变法？变出来的梯田又是什么样子？我一时也想象不出。人们说解放前在大寨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都冲光"；"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现在大寨人居然把这样贫穷的山区改造成亩产七、八百斤粮食的好地，而且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打石头、自己垒碲筑坝、自己挑土担水、自己辛勤劳动，完成了这个改造大自然的变化的！这次为我作向导的友人到过大寨两次，对大寨人有相当深的感情，他谈起老党员贾进才和领着社员冲锋陷阵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脸上就露出亲切的微笑，他们的名字常常挂在他的嘴上，他还可以一口气讲出二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收获》第一期。

三十个名字，从现在的党支书讲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接班人，仿佛他们都是他极熟的朋友。"陈永贵对人说贾进才永远是他的老师。他也常常谈到他所喜爱的牛海贵。牛海贵今年才十四岁，这个孩子很可爱，阶级观点非常明确。"我的友人热情地称赞道。我已经听人讲过牛海贵的事情：今年春天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访问大寨，战士们纷纷到社员家作客，一位战士不明情况误入富农的家，牛海贵看见，马上进去对战士说："解放军叔叔，连长叫你！"战士走出来，他便说："叔叔，这是富农家，你进去干什么！"战士激动地紧紧握着孩子的手表示感谢。以后牛海贵的故事就传开了。据说这一类的事在大寨并不是罕见的，外面的人要是能在大寨住上十天半月，每天早晨端着饭碗，蹲在那棵大柳树下，听社员们议论，就可以听到许多的好人好事。我的友人接着又讲了牛海贵的另一件事情：牛海贵和一些年纪相差不多的孩子参加劳动，他干的活较重而且干得多，伙伴们给他多评工分，他坚决不要，他记工分的时候，自己的工分并不超过一般孩子的。"牛海贵同孩子们的谈话，给永贵听见了，他很喜欢这个贫农的孩子，他说：'好了，这又是棵好苗苗。'永贵什么困难都不怕，就怕没有好的接班人。"

在路上这位友人不仅谈了牛海贵，还介绍了好些大寨人的事迹，他谈得愈多，我想见大寨人的心愈切。他的话和我在别处听到的故事汇集在一起，扭成一根绳子，拴住了我的心，把我的心拉向大寨。从阳泉市到昔阳县的路上，我坐在嘎斯车里驾驶座旁边，高耸的白杨不断地往后退去，阳光逐渐柔

和，砖墙上现出大字标语："学大寨之志，走大寨之路……"我的心跟着车轮向前跑，我不仅在想象大寨的面貌，我还在想象大寨人的面貌。影片上贾进才打石头的镜头又很鲜明地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报刊上陈永贵同社员们一起垒石堰和他向儿子媳妇讲家史的照片也在我的脑子里重现了。我很惋惜错过了同陈永贵见面的机会：昨天在太原市尚未正式开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览会上，我才听说他前一天到过展览会场，当天就动身去晋南参加会议，一时不可能回家。我无法改变行程，便拿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大寨人是那样多，反正一次见不全，这次见不到，下次再来。但是陈永贵一张额上布满皱纹、笑容里露出决心、既结实、又坚强的瘦脸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离大寨愈近，我愈觉得这张脸就在前面带路。我们在昔阳县吃过晚饭，坐嘎嘶车去大寨的时候，车子过河跨沟，一路上摇摇晃晃，土路上车迹左弯右拐，有些地方还有积水，路旁有地有树，地里长着一片玉米。车子正在坡上吃力地跑着，我忽然听见前面车声，不远处树丛后面转出来一辆载满了人的卡车，后面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司机同志说，这是参观团，从大寨回县里去的。卡车慢慢地擦过我们的车身。车上差不多全是包着白头巾的农民，也有两三个戴干部帽的，他们带笑招呼我们。我那位友人说："别的公社里来的参观团，他们在县里听了报告，再到这里来看庄稼，每天都有几百人，县里住不下，还要住到阳泉去。"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过去了，还有一辆正从坡下爬上来，我数了一下，一共九辆，都是挤得满满的，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的，大家站在车上有说

有笑，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

卡车车轮扬起的尘土散落了，天色渐渐黯淡，路上再也见不到车辆，也不见行人，山沟里很静，只听见我们车子前进的声音，枝叶微微舞动的大树和生气勃勃的、直立的玉米苗不断地过去，可是卡车上参观者的笑语声仍然留在我的耳边。我看见了新建的瓦房，我看见了从台阶上走下来的人，我不知道有多么高兴，我到了大寨了！

我们下了车，走上台阶。夜已经来了，窗户里漏出金黄色的灯光，推开门我便看见悬垂在屋子当中的电灯，在山村看到明亮的电灯，我真高兴。热心的主人把我安顿在一间相当大的屋子里，屋里有几张木板床和两张白木方桌。后来我和朋友谈起，才知道这三幢瓦房是公社新建的（公社准备搬来），这些屋子中间有办公室，有宿舍，也有临时客房。一位从县里下公社来帮忙整理材料的同志招待我们喝了水，我那位朋友便约我到社员家去串门。我们下了台阶，往左慢慢走上坡去，走不多远，便望见一排点着电灯的石窑洞，有的洞门大开，门前有人讲话。我们顺着土路往上走。土路高低不平，路上堆了些石块、泥土和石灰，可能还有木料，我在阴暗中看不清楚。一个年轻人挑着一担水经过我们面前，从小路朝坡上走，我不曾注意到他从哪里来，也分辨不出他往哪里去，我只看到他穿一件暗红色的球衣，我还听见朋友招呼他，向他发问，他边走边回答，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没有听明白他们在谈什么，朋友还讲了一句话，意思是：等一会到你们家去。接着朋友告诉我："这就是明珠。"我答了一声："哦，"连忙掉头去找那个挑水青

年的影子，却什么也看不见。我从今天早晨上火车起，差不多花了大半天的功夫想象大寨的面貌，现在走近灯光明亮的窑洞，却糊涂起来了。我问朋友："陈明珠不就是陈永贵的儿子吗？"朋友高兴地答道："就是永贵的独养子。你知道永贵教育儿子的故事吗？"我已经听人讲过这样的故事，而且不止一次了，可是我愿意多知道这一类的故事，便让朋友讲下去：明珠初中毕业，他母亲让他升学，永贵想叫他回乡参加生产，后来还是把他叫回来了。明珠刚刚回来的时候，劳动并不积极，他母亲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十分疼爱。他念了几年书，从来没有光着脚走路，有一天永贵和他一块儿去锄谷子，他下田不脱鞋，永贵就说："你看老的、少的，哪个人穿着鞋袜锄田？做啥不像个啥还行？脱了！"明珠只好脱去鞋袜。那是三伏天，地下滚热，明珠劳动了一天，脚底烫起了泡，一拐一拐地回到家里，他母亲看见怪他父亲心狠，说："就这一个儿子也不心疼！"永贵说："这有啥！这是好事。好儿一百个也不多，赖儿一个也不少。"永贵始终不肯放松对儿子的教育。后来明珠当了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和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都是青年中间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是永贵的第三代接班人。去年八月遇到特大水灾，一连下了七天七夜的暴雨，永贵在县里开会回不来，大队长当家，大队副支书把年轻人组织起来救人救粮，陈明珠和贾吉义两个冒着大雨到处跑，他们爬进塌了的窑救出一家七口人。仓库漏水，窑顶裂缝，他们两个冲进去，用口袋装仓里的粮食，一口袋一口袋地推到门口，让门外的人背走，第一生产队队长梁便良给他们打着手电，大队长贾

承让睁着两眼盯住窑顶，等到大队长叫声："撤！"他们两个刚跑出窑门，轰的一声，窑塌了。

我们谈着话，慢慢走过石窑洞的门前，这一排灾后新建的窑洞很整齐，很干净，从两家开着的带窗的门内射出来温暖可亲的电灯光。我的眼光挨到洞内雪白的窑顶和用大石块垒成的拱形门洞，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不断滴水的窑顶和裂痕逐渐扩大的门洞上面，我仿佛听见轰然一响，又好像看见两个人影从黑洞里奔出……我吃了一惊，忽然一声带笑的招呼在旁边响了起来，原来一位老大娘在门前向我们问好。老人家瘦脸上堆满笑，洞内一个小女孩立在桌前，一盏电灯照出雪白的墙壁，炕上铺着彩色的塑料布，锅上正冒着热气，靠墙放了不少的东西，我一眼望不尽，也记不全，我的思想刚从一年前塌下的土窑洞给拉回到现在这个又白又亮的石窑洞，我只觉这间屋子宽敞舒适，仿佛什么也不缺少。我满心愉快地同老大娘打过招呼，就和朋友往前走了。走过了这一排石窑洞，朋友带头转上坡去，阴暗中我看见一棵大柳树，长在两面的新瓦房中间，原来大寨人的"小广场"就在这里，这时社员们扛着镢头从上面下来，这么迟他们才收工回家。一路上我听见好些人招呼我那位朋友，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都亲切地说："你来了？"这些充满友情的声音使我感觉到山区凉夜的温暖。我忽然发觉我们已经走到先前那排石窑洞的上面了。人们正在山坡上修建瓦房，就在石窑洞顶上，瓦房快建成了，夜里收工，所以我在下面看不见。这便是我听见人讲过的"大寨的二层楼房"，那么陈永贵住的窑洞就在这附近了，我们现在一定是到

陈永贵家里去。

我的猜想果然不错。我们走进一个院子，到陈永贵住的窑洞门口，看见虎妮在炕前同一个小女孩讲话，小女孩亲昵地偎在她的身边。她听见我那朋友的声音，便转过头露出笑脸表示欢迎，招呼我们进去。朋友开始同她交谈，我看看陈永贵的这位老伴，又看看这个旧窑洞。这位身材细长、面容削瘦的中年女人的事情我知道一些；连这个窑洞在我的眼里也显得很亲切。这是他们在土改时期分到的住家，墙壁并不怎么白，可是屋子收拾得十分干净，墙上还有我熟悉的照片和奖状。我抬起头便望见陈永贵的充满信心的笑容。听虎妮讲话，我知道她去太原治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时期，才回来不久。在旧社会她的生活太苦了，她十岁死了母亲，十一岁跟着父亲逃荒到大寨，有一天她一个人走到村外要饭，找不到路回来，她父亲还以为她给狼吃掉了，第二天到处寻找，在山洼洼里找到了她。她父亲看见这样讨饭度日实在不行，才把她许给陈永贵。陈永贵当时是一个扛长工的贫苦小伙子，啥也没有。他自己讲过："我七岁到大寨。原来我也不是大寨人，我父亲在离大寨两里路的地方当长工，就用篮子把我担到了大寨。我八岁放牛，九岁放羊，十一岁起当小长工。"他还说："那年是旱灾，四十天没下雨，那时候我家是五口人，卖了三口，剩下我爹和我，后来我爹上吊死了，就剩下我这个小长工。"他同虎妮一起过了多少苦日子！两个人一年三百六十天能吃上一斗黑豆、四十斤麸皮和八十斤粗糠就算很不错的了。可是再大的困难也吓不倒、磨不坏这个性格刚强的铁汉，他拉着虎妮一块走上

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他主动给八路军带过路，送过信，解放战争中他又报名支援前线，到火线上背过伤员。解放后他们夫妻一起斗地主，搞土改；后来组织互助组，办合作社，成立人民公社，治山治沟，抗灾救灾，陈永贵事事都得到虎妮的帮助和支持。当初陈永贵同全村最穷的五个老汉、四个娃娃组织"老少互助组"的时候，有人笑他，也有人劝他，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强劳动力不参加那些有劳力又有畜力的"硬户头"组织的"好汉互助组"，是"自找亏吃"，不合算。可是他坚决地说："我不能撇下穷兄弟们不管！"他入党前就有这样坚定、鲜明的阶级立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当时党支部书记贾进才的密切注意，贾进才好久以前就在留心这个"好苗苗"了。有一次斗过地主以后，斗争果实分配方案宣布了，陈永贵向贾进才提出质问：为什么富裕中农贾家也分到斗争果实？贾进才答道："有人说他家是军属，应该照顾。"陈永贵就说："斗地主，分果实，是为了让穷兄弟们翻身，贫下中农的血汗怎么能分给富裕中农呢？咱们可不能再叫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我看你没有站正立场，这件事应该纠正。"贾进才听到这样的批评，反而十分高兴，他想："永贵是个好样儿的，他立场站得稳。他正在申请入党，敢给我提这样的意见，这就说明他没有私心。闹革命，掌帅旗，就得要他这种人！"贾进才不仅做了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他还建议支委会改选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他自己改任副书记，他还说："咱们入党，闹革命，为的是共产主义，怎样对党有利，咱就怎样干。"贾进才就这样由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支部委员，成为一个坚决服从领导、一贯积极工作的优秀

党员和模范社员。

我在陈永贵的家里，听虎妮谈话，看他们一家的照片，看他们收养的小闺女出神地望着在炕上酣睡的一只大白猫，我的思想老是绕着贾进才和陈永贵的事情转，两张脸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闪来闪去。后来朋友建议我们到明珠的屋里去坐坐，我也想看看下一辈的房间，便走出了窑洞。屋子就在旁边，是一间小小的瓦房，布置得比上一辈的房间漂亮，有一个红漆描花的衣柜，大概是结婚时候添置的家具罢。墙上挂了好些照片和奖状；桌上放着不少的书，里面有毛主席的选集、农业技术书籍、《红岩》和一些反映农村变化的小说；桌上还有一架手风琴，原来大队的团支书陈明珠还是搞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又是本地剧团的首席乐师。我们在这间整洁的屋子里待了不到十分钟，我想起了一件事：一年前抗灾的时候，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承富的两眼窑洞都给冲塌了，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住在人家一间破屋里不方便；陈永贵刚从县里赶回来，知道这种情况，就让儿子媳妇搬到他的窑洞里住，他自己却睡到大队部去。这间舒适的屋子暂时就让给贾承富一家了。贾承富安顿好了家，干活、扶苗、救庄稼，格外有劲，而且动员小队人马全部出勤，一个也不少。……要是我去年这时来看看多好！这些大寨人为了集体的利益把自己的什么东西都分给别人，让给别人！

我们没有等到陈明珠，又听说过一会贾进才要去找我们，便抓紧时间去拜访劳动能手梁便良。梁便良过去是"老少互助组"里的娃娃头，现在已经长成一个结实的壮汉，他有个外

号叫“铁扁担”，而且是个下地最多、干活最重、坚决不要补贴工分的好干部，大家都说他是陈永贵的第二代接班人。他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听说他吃过饭也要下山去看我们，我倒愿意趁这个机会先到他家里拜望。

梁便良住的窑洞同陈永贵家一样，只是墙上没有那些照片，炕上有三个小娃娃在玩。梁便良蹲在地上劈木条，一边和我们谈话，一边干活。他把木条劈成细条子放在一处，说是给大队修建房屋搭屋顶用。我们谈了几句，我知道他要把两堆木条劈光，才吃晚饭，担心谈话多会妨碍他干活，便告辞走了。

“大寨人都是这样爱劳动，他们收工收得迟，回家也不肯休息，”我们走出院子以后朋友又称赞道。“梁便良当过几年大队长，现在是大队支部委员兼第一生产队队长。他是干部中工作最忙的一个，可是他每年要做三百五十个以上的劳动日。他最肯吃苦、出勤最多，而且总是抢着重活干。每年队里讨论干部补贴工分，他总说：‘我不要，我作下的劳动日足够我用。’去年抗灾他同大队长贾承让、副支书贾来恒一起指挥临时组织起来的抢救队，救人、救牲口、救仓库，都是一连七天七夜不睡觉。雨停了，队委会决定把倒伏的玉茭（玉米）苗扶起来，他头一个下地去。”我边走边听朋友讲，梁便良的面影一直在我的眼前，这个三十几岁的生产队长貌不惊人，讲话不多，看起来又粗又老实，却又浑身是劲，而且有一股用不尽的力量。“铁扁担”，这个外号不简单，人们称赞他什么困难都挑得起，并不是虚话。其实大寨大队的干部哪一个又在困难面前退却过呢？社员们说得好：“我们大队的干部都是硬铮铮的铁汉子”、“顶

天立地的好汉”。从陈永贵起，包括梁便良在内的六个党支部委员都是这样。像贾进才那样的普通党员、普通社员也是这样！

我们又走过大柳树旁边了。阴暗中只见大团黑影，但是我熟悉大寨这棵过去的“苦人树”。这个山区的一切大小变化它都看得清清楚楚，在旧社会这里是拷打穷人的刑场，一个贫农的女人在路上拾着地主丢掉的一穗玉米，让地主知道了，拿她在这棵柳树上吊了半天，她回到家里不几天就死了。在新社会，这里是人们称为“饭场”的小广场和会议处，大寨人有大大小小的心事，都要到这里来讲给大家听。大柳树不知道听了多少豪言、壮语，多少捷报、喜讯，多少笑声、歌声。“苦人树”如今变成了“乐人树”，它是大寨人最忠实的朋友，大寨人的精神面貌如何成长，它是最好的见证。我一定要好好地认识这棵了不起的幸运的老树。第二天上午雨刚停，我们便踏着泥水上坡，又到了这里。这一次我看清楚了大柳树的面貌，树干不太粗，可是枝叶非常茂盛，似乎有点臃肿，却有着那么旺盛的生命力，我见过的垂柳不算少，像眼前这棵树的确够得上一个大字。我老早就听说大寨人每天端着饭碗到这里来边吃早饭，边议论、谈心。有人说这种“饭场会”像杆秤，是好是坏，都要在大家面前称一称：什么对，什么错，要分得清清楚楚。昨天夜里我本来打好主意，早早起来端一碗饭到这里听听大寨人的豪迈的议论，接触那些鲜红的心，却没有料到半夜就下起了雨，而且一连下了几个钟头，我到了这个著名的“饭场”，只看见冷清清的一棵大树。我仔细地看看它，我走到树下摸摸

它歪斜的树干，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好像它不是树，是我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想见陈永贵连一面也见不到，可是这棵树，它不知道见了陈永贵多少面，一千次！一万次！……不止陈永贵，还有许多、许多大寨人！站在这棵树下，我有不少的感想。我羡慕它，我喜欢它。我看见它，仿佛见到全体大寨人，仿佛读到大寨的历史，从旧大寨变成新大寨的一部斗争史。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寨展览馆就在近旁，在那间瓦房里陈列着图表、照片、模型、图画和实物。展览品虽然不太多，可是它们生动地说明大寨人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我在展览馆里看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解放前全村一九一人，当长工的四十五个，讨饭的二十一个，冻饿死去灭门的六户，现在全大队八十户、三六五人都有吃有穿；解放前遇到好年成亩产粮食也不过一百四十斤，去年遇着特大洪水，每亩地产量也不少于七百斤。走进展览馆，我就看见光荣榜：大幅红布上贴着劳动模范的放大像。陈永贵、贾进才、梁便良、贾承让、贾来恒、赵启福的照片在我的眼里显得格外亲切。赵大和、宋立英的姓名上面空出一块地位，说是照片拿到太原去放大，还没有送到。这个展览馆是新近布置的。我想起来了，我离开太原的前一天遇见一位十二年前在朝鲜认识的朋友，他在山西省文化局工作，刚从大寨回来，他说最近在大寨帮忙布置展览馆，还要整理一些材料带去。那么我回太原，还可以在他那里看到一些新的照片。模范饲养员赵启福的照像我在《山西日报》上面见过，他同一头他心爱的牲口在一起显得多么愉快！关于治安委员赵大和，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览会上看过

介绍他的事迹的图画。他在旧社会是吃穿都顾不上的赤贫户，在新社会却是一心为公的干活能手。在初级社时期，他听见富农分子扬言要杀害陈永贵，便偷偷跑到陈永贵家门口站岗放哨，他一连站了七夜，后来被陈永贵发现加以阻止，他才肯回家睡觉。赵大和有个堂兄弟叫赵小和，他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这里没有他的照片，问起来才知道他今年因公牺牲了。有一年秋天他赶着队里的牲口驮粮食，正走到崖边，一匹大马闪了腿，眼看就要摔到崖底下去，他连忙跳过去抢救，马得救了，可是他的右腿却给压断了。人们慰问他，他感动地说："集体的马自己不爱护，让谁爱护？我受了点伤，可给队里救下了一匹马。"陈永贵要送他到太原去医治，他不肯，起先自己弄弄，说是骨头接好了，陈永贵请来接骨医生给他检查，并没有接上，便重新接过，过了半个月还是觉得不对，又请了一位老医生来检查，才发现：接错了，没办法了。赵小和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不甘心做个瘸子。他听见老医生的话，独自想了一阵，便央求赵大和替他约来几个力气大的年轻人。他不让陈永贵知道，自己安排好：两个人抱紧他的腰，两个人按住他的右膝盖，两个人拉住他的脚，他亲自指挥，喊到"三"，大家一齐动手，痛得他浑身大汗，连假牙都咬碎了，可是他没有叫一声痛。这一下真的把已经长好的接错了的骨头拉开了。老医生还不曾走，刚吃过饭，又让赵大和请了来，看见这情况，连声说："我给人接了三十年骨头，还是头一次碰到你这样的人！"老医生重新替他接上断骨，两个月后他又出去赶车了。今年他赶车在路上出事，队里为他开了追悼会，陈永贵谈起他的事迹，几

次流下眼泪。站在大柳树前面，我不能不想到这个为集体献出生命的铁汉子。赵小和后来被人称为“爱社迷”，但是从前他有过另一个外号：“爱家迷”，大家都说他自私自利的思想比较严重，社里让他买羊，他买了病羊回来；让他放羊，他只顾割荆条编筐子，把队里的羊放成了瘦羊。像这样的事还有许多件。就是在这棵大柳树下，在这个“饭场”上，他受到社员们一次、两次、三番五次的批评和规劝，终于改变过来了。原来他父母早死，他十二岁给地主放羊，羊卖到别县，他也跟了去，二十四岁才回到大寨，那时土改已经结束，他没有能参加诉苦、斗地主，因此觉悟程度比别的贫农低。然而他后来一旦认清了方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党朝前奔，甚至为集体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没有机会到赵小和同志的墓前献花，可是我肃然对着眼前这棵有无穷生命力的巍然的大树，我好像站在他的纪念碑前面一样。这棵柳树不仅看到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社员的成长过程，它对他的成长还起过作用。所以有人把在大柳树下举行的“饭场会”称为“洗澡塘”，说是“许多人在这里用社会主义的温水，洗掉从旧社会带来的污垢，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人”。

党支部委员宋立英是大寨的穆桂英，人们称她“常不闲”。她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又是出色的妇女劳动能手，每次治山治沟，她总是带着妇女领先。她是在苦里长大的，从前在地主家当丫头，后来嫁给贾进才，现在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昨天我们上坡时遇见她和她的一个女儿，在暗中我只听到她们的声音，我那朋友对我讲出她们的名字，她们已经走远了。在光荣榜

上看到宋立英的名字，我想起了有关她的一个故事：几年前她带着大寨的姑娘们去县城赶会，到了晌午，她们拿出自己带的粗面干粮吃起来，别人看见就挖苦她们说："大寨人吹他们粮食一年比一年打得多，为啥社员赶会带粗面窝窝头？"有人说："模范单位的社员进城赶会，连一个烧饼也买不起，啃粗面窝窝头，多败兴呀！"她们扫兴地回到家，气得不得了。陈永贵知道这件事，便对她们说："你们赶会带粗面干粮，不是给咱大寨丢人，是给咱大寨增光。论咱家当，谁买不起个烧饼吃？可是不能千日打柴一火烧！粮食打多了，要支援国家，要扩大生产。在咱村里你们个个像小老虎，出了村却像小老鼠，连几句闲话也顶不住！"宋立英比贾进才、也比陈永贵年轻，在旧社会和他们一样地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陈永贵这番话正说到她的心坎上，说得她心情愉快地笑了起来。陈永贵这一类的话大柳树听到的一定很多、很多。我听人说，去年春节别的大队杀猪宰羊过大年，大寨只杀了两只羊包羊肉饺子。富裕中农说："先进有啥优越性？看人家过年是啥气派！"陈永贵便说："咱不能丰收年吃个饱，遭了灾靠国家救济。要比气派，咱和他们在生产上比。今天咱富裕了，就忘了过去的穷，就是变质。人活一世，只图个吃吃喝喝有啥意思！"这不是陈永贵一个人的意见，这是大寨全体贫、下中农的想法，这是大寨人的响亮的英雄的语言。在大寨，人们这样说，也就这样做。从贾进才、贾承让和贾来恒的口里我也听到了这一类表现大寨人的革命红心的话。

我已经见到贾进才、贾承让和贾来恒了。昨天晚上贾进

才、贾承让和梁便良到我的住处来，我们同去公社的一间办公室，在那里喝水抽烟，从九点谈到十一点。今天早晨雨快要停的时候，大队长贾承让又同支部副书记贾来恒到我房里谈了一个多钟头。贾承让是社员公认的"好管家"，又是合作化以来的老会计。一九五九年小学毕业生赵素恒当大队的会计，小伙子工作认真负责，可是喜欢钻在办公室里，总是借口"顾算帐就顾不到劳动"，不肯下地。陈永贵常说："干部脱离了集体生产劳动，就和群众隔了一层皮，靠社员养活自己，不就成了新的剥削阶层，还谈得到啥社会主义方向？"陈永贵工作很忙，可是他经常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在春季阴雨的日子里，他晚上回家常常浑身滚得像泥人一样。他对赵素恒说："咱大寨可没有不参加劳动的干部。"小伙子却想：当会计有补贴工分，少劳动有啥关系！后来支委会经过研究，仍然叫贾承让担任会计，让赵素恒做他的帮手，到劳动中锻炼去。贾承让白天下地干活，却利用中午、晚上或下雨天办公，工作好，劳动也好，这些年他没有算错一笔帐，人们称他做"万笔清"。赵素恒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成了工作好、劳动好、思想好的干部。一九六二年贾承让当了大队长，赵素恒又当上了会计。去年暴雨成灾，陈永贵在县里开会没有赶回来，贾承让指挥抢救工作，七天七夜不休息，两眼熬得通红，两腿泡肿，而且一条腿又碰破了，却始终不吭一声。昨天晚上我们也拜访过他的家，那时他还不曾回来，窑洞里墙上挂着省和专区的奖状，称他为抢洪救险、生产自救的模范。同贾进才和贾来恒比起来，他显得高大些，健壮些。他们嘴上常挂着微笑，他却闭紧两片厚厚的嘴唇。可是

那张忠厚朴实的长脸使人相信他是一个什么任务都能够完成的硬汉。有人说，他不仅是好管家，他还精通十八般武艺。他自己也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回他在地里检查种谷，看见一个富裕中农社员地耕得不大好，就提出批评，那个社员知道自己技术比他强，当下就说："我不行，来，你给咱种！"他事后想起来，觉得这是对他的讽刺，但也是活的教育。从此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真正做到了说耕就耕，说种就种，说锄就锄。大寨的干部就是这样！

雨住了以后，我们走出屋子，下了台阶，在坡前一个空地上同贾承让、贾来恒两位照了相。副支书贾来恒和梁便良一样，也是"老少互助组"里的娃娃。他后来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复员军人，在几年的部队生活中他练就了一身本领。他很重视社员的思想工作，他抓这个工作有办法、有耐心，而且细致、深入；大柳树下和社员们家里都少不了他的脚迹。其实在大寨，不止是他，不止是陈永贵，每个支部委员，每个党员都要做思想工作，一个人负责三五户，深入群众了解思想，在地里边劳动边谈，在饭场会上边吃饭边讲。陈永贵说过："饭场就是战场。"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打了数不清的胜仗。这个相貌和善、笑容满脸的中年人脖子上经常挂着他的烟袋同烟荷包。他不仅善于做政治工作，他还是垒碆的能手，去年灾后修治冲坏了的地，他的成绩也很大。暴雨中带着队里年轻人四处救人的也是他，他自己还钻进一座塌窑救出了一位老大娘。我们和他谈起这些事情，他坐在木板床上，两手抱着腿，谦虚地微笑，说他做的事并不比别的大寨人多，他的思想也是逐步提

高的。

昨天谈到夜深，贾进才谈得最多，梁便良谈得最少。贾进才，这个实干、硬干、苦干的老英雄，不像贾来恒那样有口才，但是他那些朴素的话里有一种感人的力量。据说他平日讲话不多，这一次谈到自己的心情，他可能有些激动。他的话我不全懂，可是主要的意思我都明白。他说："我入了党，就要革命到底，我让陈永贵当支部书记，不是换班躲避，是为了把事情办好。"他又说："我让出一个位置，支委会就多一个新生力量，对工作有利。"他说来说去，总说陈永贵、贾来恒他们为集体办事办得好，他自己能力差。他不是谦虚，他的态度很诚恳，他是在说心里话。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当初他让出党支书的时候，村里地主富农在外面挑拨说："大寨姓贾的这么多，为啥偏偏让独门独姓的陈家来掌权？"有些人相信了这种怪话，他知道了，马上警觉地向大家解释："姓贾的也要分开看，地主富农和咱们不一家。我倒姓贾，可是解放前给姓贾的地主剥削了半辈子。只有阶级兄弟才是亲人，陈永贵和咱都姓'共'，是咱真正的一家人。"他讲得多好！我望着他那张被山风吹红皱了的瘦脸、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因微笑（连他的笑容也很谦虚，仿佛他因为自己能力差在抱歉似的）露出的残缺的牙齿，我也很激动。我想，这个小老头子，他为集体、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怎么还这样谦虚？他是大寨的第一个党员，第一任党支书，可是他交出领导工作以后，既不松劲，也不泄气，更不摆老资格，处处服从支部的领导，全心支持陈永贵的工作，要他作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叫苦，也不叫累。不

论叫他放羊放牛，或者开山凿石，他都干得很好。他开起石头来格外有劲，也格外有办法。人们谈起贾进才，一定要提到金石坡，金石坡村外沟里有个大石坡，足足有一亩半大小，外壳光溜溜的，就像一个乌龟壳。对这个石源丰富的大石窝，许多人打过主意，可是它那个“乌龟壳”硬得像铁板一块，一般石匠师傅都不敢下手。有人说：“要打开这个石窝，顶少也得要半年功夫。”陈永贵对贾进才说：“老伙计，还是你来开罢。”贾进才便带了两个助手（有一个就是赵大和）去，干到第七天，石窝口子就打开了。旁人看见便连声赞叹：“大寨人真是‘洪福齐天’，县里修水库都没有打开的石窝，倒让他们打开了。”贾进才听见，马上说：“不对，这不是‘洪福齐天’！只要你有决心，山呀，水呀，石头呀，都得由你摆布！”凭着贾进才这颗红心，他一个瘦小的老汉居然打开了一个石头宝库。凭着这颗红心，他不怕苦，不怕痛，长年累月，流血流汗。冬天打石头，他的手指冻得像红萝卜一样，手上裂开了一道一道的缝；石头不但冰凉刺骨，而且像铁锉，又像钢刀，手碰上它的棱角就会出现一道口子；他用的工具是他从前当长工时、地主专门为他制下的足足有三十八斤重的大榔锤。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背着榔锤和凿子上山，一直干到天黑。手上裂缝越震越大，痛得厉害，他毫不在乎，涂点油再干。捎来的饭冻硬了，别人劝他烧把火热一下，他边吃边说：“咱这苦里生苦里长的人，没有那么娇嫩，出上几身汗，冷饭就变成热饭了。”社员们感动地对他说：“老贾，你把那大一点的好石头打上一块，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给你立块碑！”他哈哈地笑了起来：“共产党闹革命，可不是图名

求利。……狼窝掌三十二条大坝，哪一条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纪念碑！”大寨人三次修治狼窝掌，哪一次少得了贾进才用血汗打出来的石头。去年遭灾以后到今年春天他开出的石头又有两万多抬。社员们都说：“我们新修的每一道碲、每一道坝上都有贾进才打出来的石头，每一块石头上都有他的手印和汗水点子！”

我坐在这个人的对面，听他诚恳的谈话，仿佛看到了他那颗通红的心，我不能不感动。他向我告辞，我忽然想起朋友先前对我讲过的故事：解放军某部英雄八连访问大寨，战士们挨着次序上前向贾进才敬一个礼，要求看看、摩摩他的手，他们怀着敬意称赞这双手是“铁掌”，是“英雄的手”，是“改天换地的手”，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我同他握手以后，也要求看看他的手，摩摩他的手。他含笑地把右手伸到我面前，掌上结满了一层一层的老茧，又让厚厚的死皮裹了起来，好像树皮那样的粗糙。这只手就说明这个人为革命，为社会主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作出了多么出色的贡献！我越是敬爱他，也越是为自己感到惭愧。我拿什么同他相比呢？我的掌上连一个茧也没有！

会计办公室也在这里，我们离开展览馆，不几步便到了这间小小的瓦房，大柳树就在门外空地上。房里一张办公桌，四壁挂了不少的照片，都是英雄八连访问大寨，战士和社员在一起活动时的照片。还有英雄八连送的锦旗。在房里我见到了会计赵素恒。我们没有打扰他的工作，只是看过四壁的照片以后，我们请这位年轻的好干部在大柳树下和我们一起拍了

一张照，因为凑巧从县里来的摄影同志也在这里。和大寨人一起站在大柳树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今后我只要看见这张照片，就会想到我在大寨见到、听到的一切。我愿意大寨人的豪迈语言长留在我的耳边。

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我们到饭厅去的路上意外地遇见了一个小孩，我那朋友亲切地拉住他向我们介绍："他就是牛海贵。"孩子带笑接着说："放牛的牛，上海的海，陈永贵的贵。"我注意地看他，他不像十四岁，很瘦小，但是看起来相当结实，他讲到陈永贵的名字，脸上有一种自豪的表情。我们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他走得很快，我望了望他的背影：我在心里念着几个人的名字：贾进才、陈永贵、梁便良、……这样一代一代地接下去，大寨的革命事业也会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发展，再发展……光辉灿烂，永无止境。

下午，天晴正了，我们在房里待不住，虽然路上还有泥水，虽然太阳还不曾露面，我们还是趁早上山，说是去看看大寨梯田上的庄稼，也看看大寨人的脚迹。我们又从那一排整齐的新窑洞前面走过，还看见人们在沟的另一面修建同样的一排石窑，拱形的门洞大半砌好了，粗大的青石块在灵巧的手里非常听话，仿佛它们全是按照砌窑人绘的图样打出来的。我们又看到了大柳树。路上的雨水渐渐地干了，可是我上坡的时候，脚踏在泥上还立不稳，忽然一只有力的手拉住我的左膀朝上一拖，我到了坡上，听见我那朋友在后面唤着"宋立英"，原来这个面貌清秀、身材瘦小的中年妇女就是大寨的第一位女英雄，她的声音我昨天已经听见了，我怀着谢意和敬意回头朝

下看，浅蓝色布衫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她的背影消失了。可是在坡上我又见到了她的大女儿贾秀兰。昨天我也遇见过这个年轻姑娘，现在看看，她有些像她母亲，她身材细长，穿一件深红色花布短衫。她同我那朋友讲话，朋友要她带路同我们一起上山看庄稼，她笑笑，说有事情，不肯去。朋友说她喜欢唱歌，听她讲话的声音我就知道她是大寨的好歌手。她和社员们一起干活，休息的时候，她同别的青年唱起歌来，唱着《大寨山上红旗飘》，唱着《社员都是向阳花》，唱得大家高兴地鼓掌。大寨的青年真幸福！贾秀兰比她的父母幸福，她年纪轻轻，便能够毫无顾虑地唱出自己无限欢乐的感情！

我们一行几个人由县里来的那位同志带路，先到康家岭，然后到合作沟，又爬上狼窝掌，再经过教育沟下来，最后走过那排尚未完工的新石窑，从一座住人的小庙旁边的便桥上跨过沟，回到我们的住处，一共走了两个小时。我讲不出我们走过的路线，我只能说我们绕了一个小圈子。这一次我站在山沟那一面看见漂亮的“二层楼房”了。我们上上下下走的都是松软的黄土路，即使爬山翻沟，带路人也有意不让我们走陡坡险道。一路上大家不住口地称赞：“庄稼长得好。”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苗，长得很整齐，比我还要高一点点，每一株都有两颗穗或者三颗穗，看样子都是籽粒饱满，玉米苗间隔不太密，中间夹种得有瓜和豆，也都长得很好，我仔细一看，地里还开着黄花。有一些坡地、梁地上种的是谷子，中间还长得有小豆和高粱。我们还看到陈永贵种的棉花试验田，地不多，可是棉花长得好，枝上结了不少可爱的棉桃。我们兴奋地

往前走。我不时抬头望远处，一道一道的梯田，一片一片的庄稼；我一伸手，凉凉的叶子贴在我的手背上；我站在坡上路边，我的脚下就是大片的微微舞动的绿叶，绿叶丛中露出一小团一小团的红须。我们转来转去，到处都是兴旺的景象，我看不到一点特大洪水灾害的痕迹。后来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停下来休息，有人指着旁边不远处一小块荒地，说："那块地本来和这里一样高，去年遭了灾塌下去了。"我朝那里多看两眼，可能是大寨人有意留下那块地来教育后人。究竟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发问，当然也没有人回答。不过最后我们走过教育沟的时候，我觉得有了答复了。教育沟在合作沟下面，当初修治白驼沟，垒石筑坝，花了一个半月的功夫，把山沟变成一块一块的耕地，一道一道的梯田。大寨人从此认识了集体的力量，便把白驼沟改称"合作沟"，特地把下面一小段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旧大寨是啥样子，所以也取了一个适当的名字："教育沟"。沟里寥寥几棵树，地上土里夹石，长了点荒草，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了。

在合作沟的坡下我们遇见了贾进才，他陪着从别处来参观的农民到坡上地里看庄稼。他看见我们，便咧开嘴打招呼，显得又高兴，又亲切。他们登山如走平地，不像我们，等到我慢慢上去，他们已经不见了。我站在坝上，看看写着"合作沟"的木牌，听说去年的洪水把这些地冲垮了，我现在见到的好地是英雄八连的战士和社员们共同劳动、重新修治好的。那么"合作沟"这个名字又有了新的意义了。

著名的狼窝掌就在上面，坝高、坡陡、路滑，我那朋友已经

去过两次，他劝我不要上去。但是到了合作沟，不上狼窝掌，总觉得好像不曾到过大寨似的。我说："上去罢。"靠着一位同志的帮忙，我还是上去了。多么壮的玉米苗！我顺着田边坝顶走到木牌前面，注意地看牌上三个大红字：狼窝掌。我只看了一眼，突然感到精神振奋，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英雄故事又来到了我的心头，不用说我并没有功夫去想一九五五年冬天以来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因为我站在大寨人亲手用大石块垒起来的坝顶上，拦住了别人的路，路窄，我只好继续小心向前，绕到另一面。我们站在坡上往远处看，一道一道的坝，护着一块一块的梯田，顺着蜿蜒曲折的山势，一层一层地高上去。我知道坝一共有三十二条，可是我究竟看到了多少条，我没有数，我只有一种惊奇的感觉：多大的工程！多大的干劲！我不由自主地赞叹一声："大寨人！"在每一条石坝上，在每一块梯田上我都看见了大寨人的英雄气概！这许多条坝都是筑好了又给冲垮，冲垮了又重筑，一连筑了三次才算是站稳了，去年的特大洪水都没有能冲垮它们。听说头两次治沟，都是筑二十五条坝，填几万方土，可是这些簸箕形的梯田都没有能挡住山洪。一九五七年第二次坝冲垮、土冲走以后，富裕中农不愿意再干，阶级敌人又乘机散播流言蜚语，可是贫、下中农全心支持陈永贵，坚决要干下去，他们说："咱们不能让敌人高兴，不能给集体经济脸上抹灰！"他们说："怕吃苦的是地主，是富农！"贾进才首先上山。在冷风刺骨、双手冻裂的天气里，每天天刚亮，大寨人拿着工具，斗志昂扬地进沟上阵。当时全村只有六十几个劳动力，出工的人却有七十多个。他们接连在

冰天雪地里干了二十七天，筑了三十二条石坝，坝身比前两次筑的更高，全用石灰浆灌缝，而且把冲走了的几万方土重新垫起来。在大寨人的眼里、手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狼窝掌。我们顺着教育沟走下来的时候，一路上我就在想近几年在这里发生的振奋人心的事情，三十二条像绘出来一样的整齐的石坝异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每一条坝上都有一颗大寨人的红心。三战狼窝掌的战斗已经过去了，抗灾保粮的战斗已经过去了，大寨人在取得一次接一次辉煌的胜利以后，仍然艰苦朴素、勤劳勇敢地继续前进。尽管他们的口粮加多了，生活改善了，尽管每亩地产粮从一百三四十斤增加到八百多斤，尽管社员中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户头都有存款，而且家家有存粮，大队还有储备粮，可是大寨人还是一样地省吃俭用，继续苦干硬干，为着更高的目标战斗下去。他们初步计划要为亩产千斤粮战斗，要为每户平均有八十棵经济树、一百棵木材树战斗，要为把一百亩旱地变为水浇地战斗。等到这些目标全达到了，他们又会定出新的目标来。一句话，永无止境。这就是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这就是大寨人的英雄气魄。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呢？我刚刚这样一想，贾进才的回答就到我的脑子里来了："为的是共产主义。"他们的信心和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刚刚这样一问，陈永贵的答复又来了："上有共产党、毛主席的好领导，下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还有咱们大家伙的冲天干劲——有了这三件法宝……咱们敢和天老爷比高低！"最后半句是一位老社员李喜庆接下去说的。他们说得多么清楚！正是有了这三件法

宝，正是为着共产主义的前途，大寨人去年遭到那么大的洪水灾害，窑洞和住房塌坏了大半，地冲垮了两成多，他们毫不灰心丧气，却挺起腰、咬紧牙、下决心要向大自然讨还这笔债，要做到：一不减少产量，二不减少社员的口粮，三不减少卖给国家的商品粮；还要做到：不向国家要一文救济费，不要一斤补助粮，不要一样救灾物资。头一天公社来电话，拨给他们一笔医药补助费，他们说："我们又没伤人，钱给别的队罢。"第二天再来电话，拨一笔安置费，他们又说："我们安置得了，还是给别的队罢。"第三天又来电话："你们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一千元救灾费。"他们仍然说："我们能克服困难，就不伸手向国家要钱！"连公社拨给他们的五十张席子，他们也不要，说是"大寨有苇子，我们要用，自己编"。大寨遭了灾，可是大寨人的共产主义风格不倒。他们要把方便让给别人。他们自己能走过去，就不要别人搀扶。大寨人绝不讲空话，他们说得出就全做得到。这一次大寨人又打了胜仗，把洪水抢走的东西全部夺回来了，而且还一直在乘胜追击！我眼前的新窑洞、新瓦房、电线杆、电灯、电碾、电磨……都是大灾以前所没有的。我跨过了便桥，人们告诉我，将来小庙、便桥都要拆去，山沟也要填平，这里要变成大寨的新广场。我兴奋地想，过几年再来，我一定不认识这个山区了。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没有见到一块自留地，并不感到惊奇，昨天晚上我就听见梁便良谈过了：对大自然作斗争连寸土也不肯让的大寨人却不愿意在自留地上花费时间，但是任土地闲着对集体也没有好处，结果还是交给集体种，集体收，每

人每年分粮食、分蔬菜；社员们都满意这个办法。

我们回到对面泥水渐干的路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挑着担子迎面走来，他带笑招呼我那朋友。多么和善的笑脸！他走过去了。朋友看看他的背影，边走边高兴地说："他就是李喜庆老汉。"我回过头去，连背影也看不到了。朋友昨天在火车上讲过李老汉的事情：大寨遭灾后，在社员大会上他第一个拿出八百元存款，他说："咱们是集体，是公社。他们的房子塌了，我有钱闲在那里，大家住不上新房；我把钱借给大家盖房，心里就痛快了！"有人问他："你不是要上北京看天安门吗？"他答道："我银行里还存着四百元。"原来这个老贫农一心只想到首都看天安门，有一次他和同伴路过北京，在换车的空隙，他从车站向天安门走去，他可能走错了路，好久还不曾走到天安门，又担心赶掉回山西的班车，只好扫兴地回到车站。他存了路费打算在农闲时候专门去北京，看看国庆节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他这份心事。这次他带头借出存款，社员们都热烈地响应，结果大队收到了一万元以上的借款，再加上大队的一笔储备款，大寨人按计划修成了崭新的石窑和瓦房。这是去年的事，听说今年大队购买化肥，李老汉又借出了两百元。他一定是这样想：不用急，等到大寨建设好了再上北京罢。不错，他是大寨人啊！我多么希望这个"敢和天老爷比高低"的老英雄早一天看到天安门！

我回到了住处，听说县里派车来接我们，晚上我还要在县里广播室听陈永贵报告的录音，这是他不久以前在县里向内蒙参观团作的一篇长达六小时的报告的录音，据说他讲得非

常好，非常生动。见不到陈永贵本人，听听他的讲话，听听他的声音，我会带着更深刻的印象回上海。我们在房里休息一会，我又踏着门外松软的泥土走到台阶口。台阶下停着三部卡车，两部车上站满了人，人们正在爬上第三部车。我看看那些人的面貌和表情，我觉得我们昨天在公路上遇见的好像就是他们。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向着他们挥手，我旁边一位同志说："今天本来要来好几批，上午下雨，都没有来。明天来参观的人一定很多。"

我走下台阶，看看车迹，我自言自语："又一批参观者走了。"我感到留恋。县里的小嘎斯车还不曾来，我便顺着昨晚和今天走过的路来回走了一阵，看看那些住了人的和正在修建的新窑洞，看看高耸的山头，看看山上的几棵青松，看看远近那些好庄稼。灰云已经散去，浅蓝色天空下，远处的石坝和梯田显得像图画一样地美丽。我看见昨晚见到的那位老大娘，我看见正在垒石头砌窑洞的壮年社员们，我看见那个会唱歌的贾秀兰的背影，我正在踌躇要不要上坡去再看看大柳树，但是车轮声、喇叭声突然响了起来。车子到了。我只好转身回去。

嘎嘶车开出大寨的时候，我仍然坐在前面驾驶座旁边，怀着谢意频频挥手，向那位从县里来的同志和公社的几位干部告别。我没有能向大寨的英雄们吐露我敬爱的感情，我感到遗憾。我多么想和他们中间任何一位再见一面，可是我知道他们这时都在山上、地里紧张地劳动，为集体的事业尽全力。那么再见罢，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寨人！我没有什么东

西留给你们，我却带走了你们通红的心，让这颗永远像火一样燃烧的心照亮我的眼睛，也照亮我的路！

1964年10月26日在上海追记。

一 封 信*

××同志：

你托人带来的信，我并没有见到。在“四害”横行、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有些人宁愿埋下头扫自己门前的雪，担心多咳一声嗽冒犯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和他们那些在上海横行了十年、无恶不作的余党，就要大祸临头。“四人帮”是复辟派，他们学某些中外古人学到了家，过去我只能在书本上读到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一些事，现在我都亲身经历了；有些事则是过去我不相信会有，而现在我的朋友终于遇到了的，如杀人灭口、借刀杀人之类。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在日记本上写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写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我知道我只有隐姓埋名地过日子，让人们忘记，才可以躲开黑帮们的大砍刀。他们用种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对付我，处心积虑要使我以后永远不能再拿笔。总之，他们肆意践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国民党特务张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

春桥公开说，对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在这之前，张春桥在一次报告中曾经得意地说，上海文艺界有不少人认识周总理，他已经向周总理打过招呼，不要管上海文艺界的事情。张春桥还说过，上海作家协会里没有一个好人。姚文元也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报告中点我的名，说我搞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仿佛一切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切无政府状态，连他们搞的在内，都要我来负责。总之，我的命运给抓在他们这伙黑帮的手里，由他们任意摆布，连敬爱的周总理也不能过问。但是不管“四人帮”如何狡诈、恶毒、阴险，他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跟前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我居然活到现在，能够亲眼看到他们的灭亡。有些熟人曾经几次问我：“你什么时候得罪过张春桥？他为什么那样恨你？”他们都替我担心，认为我翻不了身。我起初也不明白张、姚们对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后来才逐渐了解，因为我在三十年代见过张春桥，知道他是个不光彩的人物，知道他的一些底细；因为我看过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演的话剧，还听见人讲起她的一些事情，也知道她并没有同鲁迅先生一起战斗过；因为我认识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知道他是个叛徒（这是公开的事）。我还知道张、姚两人都是忽东忽西、时左时右，都善于摆出理论家的架势，把人一棍子打死，我曾经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公开提过抗议。他们的棍子没有打死我，他们就割断我的政治生命，把我赶出文艺界。张春桥得意地一再叫嚷：“像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他们允许我搞翻译，好像做得十分宽大，还给我留下一条生路。其实我翻译出来的书他们也不会允许出版。

离开文艺界，我还是要工作，还是要为人民服务。我牢牢记住雷锋同志的话："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几年中间我常常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搞文学创作，在旧社会写作了二十年。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章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我最后一部长篇的最后一句又是"夜的确太冷了"。我的作品里充满了忧郁、痛苦的调子。二十年中间我写了那么多的痛苦和黑暗。我在旧社会里接受了种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贯串着我的全部作品。我没有给读者带来光明，指明出路。我自己不断地诉苦、呼号，我不断地在黑暗中摸索，用我的痛苦折磨读者。这就是我的痛苦的经历。我对读者的确欠了一笔还不了的债，我每次回顾过去都感到内心不安。为了这个，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我都心甘情愿，何况我还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写过坏的东西。严肃认真的批判使我头脑清醒，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同志，今天在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又回顾了这一段痛苦的历程，我真是万分激动。正是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震撼了我的灵魂，给我指明了金光大道。我还记得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他的亲切的笑容和有力的握手。在这以后不久，敬爱的周总理又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会所里向文艺界宣讲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亲切、生动地介绍延安文艺界深入生活、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苦口婆心想把大家引上光明大道。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总是希望更多的人参加革命，从来不把人一

棍子打死。连我这个在旧社会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教育。我开始懂得：文艺应当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学作品应当提高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成为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洪亮的声音使我的脑子开始清醒。接着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站了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在人丛中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春雷般的热烈欢呼，从下午三点起接连六个小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毛主席洪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我离开阳光照不到的书桌，第一次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如此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我感觉到心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上天空，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溶化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我不住地在心里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在旧社会中受尽欺凌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谁不曾有过这样的感情呢？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今天的读者是工农兵群众，是新社会的建设者，他们也向我伸出手来，欢迎我到他们中间去，让我在斗争生活中进行改造，用我那枝写惯痛苦和黑暗的秃笔为新社会服务。我就这样地继续写了十七年。我没有好好地

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我辜负了周总理多次的关怀，我有时也到斗争生活中去，但对自我改造要求不严，有时只是走马看花，有时住得稍微久一点，思想感情有了一些变化，也交了朋友，但是一回到书房，旧的习惯又逐渐恢复，新交的朋友又完全疏远，始终浮在上面，因此十七年中间作品写得很少，质量又差，而且我脱离了斗争生活，创作的源泉枯竭，终于写不出作品，成为“空头文学家”。今天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对自己的错误看得更加清楚，回顾过去，悔恨万分。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我的身上也起了作用，产生了影响。十七年中间我的笔底下再没有忧郁、痛苦的调子了；不管我那些文章怎样软弱无力，但字里行间也或多或少地闪耀着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一再鼓励，一九六五年夏季还让我去越南采访，回国以后在周总理为庆祝斯特朗八十寿辰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同我碰杯，鼓励说：“你比我先走了一步。”我们的好总理为了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花费了多少心血。今天我谈这些往事，周总理的声音、相貌仿佛还在耳边、眼前，我的笔表达不出我的感激之情。

××同志，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他们这伙黑帮把我赶出文艺界，只许我搞点翻译，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想到鲁迅先生生前勤勤恳恳介绍世界文学名著的情景，我也有了勇气和信心。四十一年前，我曾经告诉鲁迅先生我要全译赫尔岑的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倘使我能够在我生命结束之前实现这个诺言，这将是我莫大的幸福。回忆录的

前几卷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情况。我越译下去，越觉得“四人帮”和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尼古拉一世相似，他们妄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数先烈为之洒热血、抛头颅的新中国、在上海创造一个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的黑暗、恐怖、专制的时代，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了。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一举粉碎了，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人民，也挽救了已经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的文学艺术事业。如今全世界的眼光都注视着中国，全世界的希望都集中在中国。面对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哪一个中国人能无动于衷，哪一个中国人能不奋发起来呢？

“四人帮”已经垮台，新组成的党中央，为党除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这是大快人心的大喜事。在文艺界横行十年，把持一切、垄断一切的“四害”虽然扫除，但是余党还在，流毒更深，必须认真对待。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结帮营私，横行霸道；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存心搞乱思想；他们信口雌黄，篡改历史；他们的文风今天还有市场，他们传播的歪理也未受到系统的批判。倘使不把他们搞乱了的思想彻底澄清，不明确划清是非的界限，不把他们插手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搞清楚，文艺就不可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更谈不到繁荣创作、

贯彻"双百"方针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就是批判"四人帮"的有力的武器。"四人帮"搞的那一套都是和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是如此。首先，"四人帮"就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们只许一花独放，对创作方法也要横加干涉，万事都由江青一个人说了算。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四人帮"公开宣传干革命不需要文化，他们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鼓励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间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四人帮"却大搞一出戏主义，大搞特殊待遇，把文艺作为升官夺权的阶梯。毛主席指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四人帮"却割断历史，对一切文化遗产都认为"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决裂"。他们把革命导师一再赞扬的揭示政治和社会真理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和"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的作品，一律说成是封资修的黑货。江青甚至张冠李戴，把崔颢的《黄鹤楼》说是李白的诗，把《醉打山门》里的《寄生草》说成是关汉卿的作品，她还自吹是"半个红学家"，"对司汤达颇有研究"，真是不学无术，恬不知耻。以上只是举几个例子，至于组织大写、硬写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利用文艺干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那更不用说了。总之，"四人帮"在文艺界横行了十年，干尽了坏事，要彻底批判他们散布的反动谬论，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

把他们颠倒了的思想弄清楚，这个工作十分艰巨、繁重。但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文艺界才能够大踏步前进。我相信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为武器，深批猛揭“四人帮”，把这场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就一定能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同志，一拿起笔，我就给你写了这许多。我又恢复深夜工作的习惯了，我心情振奋，像二十八年前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样。夜很静，我心里却极不平静，我真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我想起了大庆人，我想起了大寨人。我不能不想着他们此时此刻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所作的一切。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最优秀的儿女。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感到光荣。我听到了新的大跃进的鼓声，它像千军万马奔腾一样。一个光芒万丈的英雄时代开始了，一种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开始了！现在是百花齐放的伟大时刻，尽管目前还有各种的困难，还有各样的阻力，但是八亿人民在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奋战，以勇往直前的雄伟气魄、钢铁意志和革命热情，能够克服一切，完成一切。我们有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这是无上的幸福。八亿人民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让我们为着这个事业奋斗一生、为着这个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吧，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1977年5月18日。

第二次的解放*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上海文艺界欢聚一堂，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我参加这个充满战斗团结气氛和胜利信心的大会，十分激动，心情舒畅。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谈我自己这些日子里的思想感情。这是我十一年中间写的第一篇文章，在“四害”横行、乌云翻滚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发表文章的机会，更没有想到给“四人帮”及其余党夺走了的笔又回到我的手里，我深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在我从事文学工作的生活中，的确有两次解放。第一次就是我最初学习毛主席光辉的《讲话》的时候。我不是一下子就理解这部光辉著作的深远意义，也不曾充分理解改造世界观的痛苦的磨练。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文学作为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这样一条道理；我第一次看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我第一次明白文艺工作者应当到工农兵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我也曾离开阳光照不到的书房，丢开自己那枝沾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文汇报》。

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笔，虽然在思想改造上，在写作上都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前进的步子迈得不大，但是我并没有回头走旧路，也愿意遵循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走下去。正是光辉的《讲话》把我从旧思想的泥泞中解放出来，使我能够用我的笔歌颂新社会、歌颂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三个多月，我从上海到北平出席第一次文代会。参加文艺界这样的战斗、团结的盛会，我是头一次。我后来写了我解放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一封未寄的信》，是作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国统区的一个作家向在毛主席的光辉《讲话》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解放区的文艺战士倾吐敬爱的感情。我说："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你们却把文艺带到了山沟和农村，让无数从前一直被冷落、受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我好像被四面高墙关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你们却仿佛生了翅膀飞遍了广大的中国，去散布光明。"我又说："你们是不知道骄傲的。可是今天我却感到骄傲了。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我才觉得做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一桩值得骄傲的事情。"我理解的可能很浅，我的言词也并不恰当，尤其是"骄傲"二字，但是我敬爱的感情却是真实的。我在旧社会写了二十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七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的那些作品里，人们不断地受苦，接连地死亡，眼泪好像就没有尽头！想到那些阴暗的日子，我真是不寒而栗！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洪亮的声音驱散了重重暗雾，天安门前如林的红旗和几十万群众的齐声欢呼使我看到中国人民的光辉灿烂的锦绣前

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个从旧社会来的作家离开他过去走惯了的路，用他的写惯痛苦和哀愁的笔来歌颂人民的欢乐和胜利，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农兵中间去。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生活了一个时期，也有一些感受。我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起初有些胆怯，担心自己不能够适应环境，又担心不熟悉新的生活，无法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更害怕不能理解战士的思想感情，写不出作品，无法缴卷。总之，不是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两意，并且顾虑不少。可是我一旦到了战士中间，便发觉一切顾虑都是多余的。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的大家庭，精神上受到的冲击当然很大，然而同时我感到温暖，受到教育。指战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来自祖国，对我特别亲近。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恨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的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鲜花一样开遍朝鲜的山野。这些从祖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譬如用身体堵枪眼，用身体掩护领导和战友，节约口粮分送给当地的老弱幼小。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制止不住内心的斗争。我不断地同自己身上的"私"字斗。我住下去，每时每刻都受到教育。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我不再想到写作，只是想到学习，开始交了朋友。我离开以后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那个革命家庭吸引了我的心。

倘使我能够长期坚持下去，那么我在改造思想方面多少可以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我一共只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决心动摇，安于现状，于是熟悉的又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质量也不高，更谈不上反映斗争的实际、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建国后十七年中间，为了表示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为了不辜负文艺工作者这个光荣称号，我总想献出自己的微小力量，给新社会添一小块砖瓦。但是我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说过错话，写过坏的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审查，我认为冲击和批斗都是对我的教育，良药苦口，却能治病。我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垃圾，不扫除干净，就会发臭。我只有在受到多次的批判之后，才感觉到头脑清醒，才重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在我接受审查的期间，我曾经反复学习光辉的《讲话》。过去学习，联系自己不深，或者甚至不联系自己。现在却自然而然地联系到自己身上，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犯错误的原因：不坚持工农兵方向，不深入斗争生活，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讲话。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两大问题，毛主席在光辉的《讲话》中讲得清清楚楚，可是我离开了毛主席光辉著作就忘得干干净净。的确在学习光辉《讲话》的时候，我常常自怨自艾，责备自己过去不认真学，一再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但是，就在这同时我也发现自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的江青和自称“正确路线代表”和“左派”的张春桥、姚文元并不是什么“旗手”、什么“左派”，他

们搞的那一套都是和毛主席的教导、和光辉的《讲话》背道而驰的。他们大搞唯心主义，大搞形而上学，用概念代替生活，不向工农兵学习，不团结人民，不许百花齐放，不搞普及，大搞特殊化，一个剧组演一出戏，一个演员演一出戏，演了英雄人物就享受特殊待遇，文艺工作者不深入斗争生活，却关在高楼大厦里闭门造车……等等，等等。总之，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作所为，没有一样是遵循伟大领袖的指示，没有一样是符合《讲话》的精神。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大胆妄为，无所顾忌，强迫人们大写、硬写所谓走资派，搞阴谋诡计，把文艺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们搞的是“阴谋”文学，因此必然脱离生活，关起门来，鬼鬼祟祟，暗中炮制。他们绞尽脑汁炮制不少作品，使用影射手法、讽喻手法，转弯抹角，暗箭伤人。为了陷害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他们挖空心思，把十八般武艺全使了出来。同志们，这哪里是文艺，这哪里是文学？他们炮制出来的“文艺”不是文艺，他们炮制出来的“文学”也不是文学。他们就是扼杀文艺的刽子手。“四人帮”是靠棍子起家的。多少年来，张春桥、姚文元就到处挥舞大棒、打棍子，他们篡夺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以后，篡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以后，就大肆陷害、迫害一切反对过他们的人、一切知道他们底细的人、一切不听他们指挥的人，以及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总之，一切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人。他们陷害、迫害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考虑的周密、手段的毒辣、方法的巧妙真像叛徒江青十分崇拜的基度山伯爵对待他的仇人那样。我自己也深有体会，他们妄想一棍子把我打死。我在最

近那篇文章里讲过一点情况。他们对我用的方法是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最后是断送我的政治生命。同许多朋友谈起来，我觉得我受到的迫害比别人轻得多。但是这种种精神折磨已经弄得我睡不安宁，我常常梦见自己受到妖魔迫害挥动手臂保护自己，在干校的时候，我经常梦中大叫，有时甚至摔下床来。有人说我自己“心中有鬼”。对，我心中的确有“鬼”。“鬼”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杀人不用刀的刽子手。张春桥公开叫嚷我不能够再写文章，还假意地说要成立新文史馆来收容像我这样的人。这无非是想让我活埋在那里面，他可以少掉一个眼中钉。同志们，个人的遭遇毕竟是小事。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一九七六年，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的时候，天空乌云翻滚，日月无光，人们的心上压着一块大石头。每个人都捏紧拳头咬紧牙关，免得漏出一句担忧或愤怒的话，招来大祸临头。但是大家坚定地相信已经站起来了的八亿中国人民绝不再低头，绝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绝对不能得逞！

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真是乌云扫尽，日月重辉。阳光灿烂地照耀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我们的河山显得格外壮美。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新的党中央的周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朝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八亿人民齐声欢唱，八亿颗心齐向我们的首都北京。人民，我们的多么可敬、可爱的英雄的人民，

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在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整体，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向前迈进。新的大跃进已经到来。这是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的必然结果。文艺必须在这个大跃进中发挥它的作用。打倒“四人帮”，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在会议期间我又一次学习了毛主席光辉的《讲话》，我增强了信心。不管我的笔多么无力，我的声音多么微弱，我也要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让这样一滴水落到奔腾的汪洋大海里面。

1977年5月27日。

望着总理的遗像*

十一年中间我只写了一篇文章。这第一篇文章刚刚发表，那天我开了一整天的会，傍晚回家，感到疲劳。有一位陌生的中年人来找我，说是从北京出差到上海，住在我家附近的招待所里，一两天就要走了，只是因为我在文章里用感激和怀念的词句讲到敬爱的周总理，他冒着小雨来找我谈谈。这是一位贫苦出身的北方干部，他在我的屋子里坐了一会，我们谈起来像熟人一样。后来我送他到门口，才问清楚他的姓名，可是我感觉到我是在同一位亲近的朋友握手、告别。

这是一件真事，这样的事情在一年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对一个连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人像弟兄一样地倾吐自己心里的话，不怕他、也不怀疑他会利用这些话来陷害自己，只是因为他触动了自己最深的感情，只是因为我们的心上有着同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这说明今天的上海和一年前在王张江姚"四人帮"及其余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完全不同了。我还记得去年八月一位北京朋友避震南下，经过上海，来到我的住处表示对老友的关心。他知道我的地址，可以不经过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文学》第八期。

批准就找到了我。他告诉我两年前另一位朋友从北京来要找我谈话却遭到拒绝。当时我们都有多少心里话要向彼此倾吐，可是话都给咽在肚里了，我们只谈起彼此的健康。那个时候朋友们见面常常谈的一句话就是"保重身体"，因为这样的话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的确只有活得久才有希望看见"四人帮"的灭亡。有时我在街头遇见多年不见的熟人，紧紧握着彼此的手半天只讲出这样一句，这一句话里有多么深、多么复杂的意思啊！但是就在那一次，朋友告诉我，他瞻仰过总理的遗容，总理瘦多了……他说得短，说得尽可能少动感情。可是他的声音颤抖，他的眼光向下。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万恶的"四人帮"为了诬蔑、攻击、陷害我们的好总理，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使用了手里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写小说、编历史，含沙射影，借古喻今，甚至明目张胆在总理的光辉形象上投掷污泥。全国人民看在眼里，他们忘不了这个深仇大恨。敬爱的总理离开我们的时候，竟然有人不许我们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不让送花圈。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公开地悼念自己敬爱的总理，我们的报刊不能报道人民的悼念活动，不能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人们冒着严寒站在十里长街长时间等候，只为了用泪眼看一看总理的灵车，唤两声"我们的好总理"。多少人痴心梦想灵车在中途停住，总理从车上走下来。夜深了，孩子们还把身上戴的小纸花一朵一朵地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几百米长的柏树墙上。……这些在人们中间流传的激动人心的真实故事竟然也变成了后来被追查的"谣言"，因为悼念总理构成了一种罪名。有的单位甚至记下

人们在总理逝世时表现的哀痛，准备将来算帐。我有一个朋友为总理戴黑纱超过了三个月，一直到清明节以后才把黑纱拿掉，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别的熟人替她担了多少心。“四人帮”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荧光屏上谁不脱帽，谁表现得特别奇特，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当反动文痞姚文元挥舞刀斧乱砍乱杀的时候，我只能在心里发出无声的诅咒，却不敢在大庭广众之间公开表示自己的真实的感情。我多么为自己的怯懦感到惭愧！那天听到北方朋友的话以后，静下来时我望着总理的遗像出神，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总理讲啊。晚上我梦见自己也跟随瞻仰遗容的群众，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我也看见总理瘦多了。我睡在床上，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用手搔自己的胸膛，有一团火在我的心里燃烧，有多少小虫在咬我的心。我痛苦地问：为什么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还不能减轻这个伟大人物的病痛？在那个时候我怀着深仇大恨诅咒这一伙无恶不作的黑帮。我知道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怀着同样的深仇大恨咒骂他们，我知道真理的光芒是翻滚的乌云掩盖不了的，我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敬爱的周总理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改变颜色，我相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的好总理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于是我又看见了我们总理的亲切、慈祥的面容，我又听到了我们总理的愉快、爽朗的笑声，总理并没有离开我们！我回忆起过去多次看见总理的幸福日子。一九四一年春天在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我第一次和总理见面，他那

紧紧的握手和亲切的笑容给我驱散了雾重庆的寒气。从这个时候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年中间我听过总理多次的报告、演说和谈话，我受到总理多次的接见，我后悔不曾把总理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不论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解放前的上海，新中国诞生后的北京，总理那些恳切、明确的言词里总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总是闪耀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总理和知识分子接触较多，他亲切交谈、谆谆教诲，有时鼓励，有时批评，有时还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引导听话的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含着眼泪谈起我们的总理，像谈起自己敬爱的长者和亲密的朋友，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因为他苦口婆心把他们引上改造的道路，让更多的人参加革命，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听见总理讲过几次，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他在谈话中间一提到毛主席就流露出敬爱之情。我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我就是通过总理的教导开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年尾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打了败仗，衡阳的守军投降敌人，于是开始了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撤退，日本侵略军跟踪进入了贵州。湘、桂、黔三省的难民历尽艰辛，向四川奔逃，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封锁消息，谎报胜利，不让人民了解战事的真相，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重庆的文艺工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逃跑政策愤慨万分，但又束手无策，无人领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这个时刻，总理应邀出席我们的座谈，我们都把总理当作亲人一样，求助于他。他坚定明确地用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鼓励我们，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胜利抗击敌

人的具体事例说明敌军貌似强大，实是虚弱。他还给我们指出了继续抗敌的道路，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刻看到光明。他的态度恳切，话语明确，通过一个晚上的交谈，他把他那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了。我们感觉到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巨大力量，在危难的时刻他可以领导我们前进。我们不再像先前那样彷徨无主了，大家坚守各自的岗位，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投降、逃跑阴谋作斗争。在日本投降后，总理又应邀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会所里向我们宣讲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用生动亲切的言词介绍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还举出一些我所熟悉的作家的名字，并讲到他们的进步和成就，例如欧阳山和他的描写新人的小说《高干大》(我熟悉他过去的作品)。这两次座谈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给我打开了新的广阔的眼界。知识分子改造的光明大道摆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改变生活；解放区作家的新生活吸引我，我也想丢开我的写惯了痛苦的笔，可是我不能同旧的生活决裂，又害怕痛苦的磨炼，不能毅然决然地走上新路。但是我已经接触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它终于把我引上了新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我就换上新的笔，开始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曾家岩总理办事处门外安置了不少特务，总理进出都要受到监视，但是总理坚定沉着地同敌人战斗了八年，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一九四六年有一个晚上，总理在文协讲了话，最后出来，走上张家花园通大街的一级一级的石板坡，后面只有一个陪同他来的同志，总理披着一件旧的黑

大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在他的身旁。重庆的夜使人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四周非常静，再看不见一个人影。总理脚步稳定地慢慢上坡。我问他什么时候去南京，他告诉我明天去。他说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然而还是要谈下去，这样可以向人民揭露他们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活动猖獗，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真有点替总理担心。但是我知道总理在任何危急紧张的情况下都能够沉着应付，他从来不为个人的安危操心。我想起一个朋友讲过的话，她有一次同总理一起从重庆飞回延安，中途遇险，在紧急关头，连带的行李都抛下去了，总理却非常镇静，他只顾照应别人。她说："在周副主席身边，即使遇到危险，你看见他又坚定、又从容的表情，也感到很安全。"在快到最后一级石梯的时候，我说："斗争很艰巨，希望多多保重。"总理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坚持斗争，人民一定胜利。"上了坡，我看见他同另一位同志都上了车走了，我突然觉得十分孤寂。我感觉到我多么敬爱这一个人，这样一位完全没有私心的人，在他的身边我也感到十分安全，听他谈话，我一切个人的考虑都消失了。无论在困难时期，或者在胜利时期，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建设时期，总理始终是精神饱满，意气昂扬，光明正大，坚持原则，进行工作，进行战斗。他那些恳切、明确而充满信心的言词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九五〇年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出发前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已经是午夜了，总理还对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有些刚从外地到京的

代表对抗美援朝的意义还认识不清，担心“这个时候派出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建设”。总理侃侃而谈，指出苟安不能得到和平，火烧到门口，我们也无法关门建设，更不能隔岸观火。总理还激动地谈到朝鲜人民同我们的血肉相连的革命友谊。最后他还分析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的本质。总理谈得如此生动、有力，我听着，听着，仿佛见到一片晴空，非常明白，一切顾虑和疑惑都消失了。那一夜我坐在后排，总理进来的时候没有看见我，还拿着名单问我来了没有，见到我又问起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我从中南海出来，凌晨的寒气使我感到一阵冷，可是我心里却十分暖和，好像看见了几小时以后就要上升的朝阳。回到旅馆，我就拿起笔开始写我那封《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呼吁：“落在朝鲜土地上的千万吨炸弹是对世界文明的严重威胁，朝鲜人民的苦难激动着全世界善良人民的良心。……作为有良心的作家，我们有责任团结人类，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创造新的世界文明而奋斗。”一年半以后我自己也到了朝鲜战场，深入斗争生活，在朝鲜人民中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中间连续生活了一年。我常常亲切地回想起总理的那一次谈话，我又一次感觉到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事情正是像总理所“预言”的那样进行的。在朝鲜生活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无数的年轻战士一心为公、有人无我的思想感情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最近我还在写歌颂这些年轻英雄的短篇小说。

几年后，一九五七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总理在中

南海接见文艺界，我又是坐在后排，他没有看见，又提起我的名字，要我坐到前面去。这一次总理谈得特别亲切，他鼓励知识分子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同过去决裂，他再三告诫，反复解释，甚至以自己为例，讲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兄弟的事情，用亲身经历来勉励我们。他出身剥削阶级，但是他同家庭彻底决裂了。他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不要重视自己少年时期的印象，当时见到的房子，地方，见到的事物，以为很大，后来再看见就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分析自己过去的一些印象，的确是这样。总理总是鼓励人朝前看，不要留恋过去。他鼓励知识分子丢掉包袱，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和总理握手告别的时候，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的笑容和他的紧紧握手含有多大的关心！

我还记得一九五五年四月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那个时候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记者包乘的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空中爆炸，这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安放定时炸弹造成的破坏事故，目的是妄图暗害出席万隆会议的总理。我当时在印度新德里参加一个会议，我们这个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团是在十天以前包乘印度飞机从香港机场起飞的。会议闭幕，我们准备包乘原机飞回香港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总理要我们等候通知，准备改道直接飞回昆明。总理在会议繁忙、斗争紧张的时候，还关心我们这些人的安全，作出这样具体的妥善安排，我们都很感动。我常常感觉到他关心的不止是某一个人，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全体干部的事情都时时萦绕着他的心。一九六五年年底在总理为斯特朗八十岁生日在上海举

行的宴会结束后，总理留下来同参加宴会的几位歌唱家谈话，要他们再唱一遍《长征组歌》。总理说："我很喜欢听。"他明亮的眼光里流露出很深的感情。我不禁想起他以前在一次报告中提到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老班长的一段话，那段话是："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让她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总理说："我每次听到这段话就要流眼泪。"他说话时声音微微颤动，他动了感情，他又想起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了。总理对人民真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这次总理还向歌唱家们解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歌词的深刻意义，他同他们一起唱起来，还作手势，和司徒汉同志一起指挥。他这样喜爱《长征组歌》，他病重期间，在医院里想再听一次《长征组歌》，可是"四人帮"不让人给他送《长征组歌》的录音磁带去！就是在这次的宴会上，我又见到了总理，他同在座的人都碰了杯。他到了我前面，陪同他走来的陈丕显同志说："他刚从越南回来，"总理点头笑道："我知道。"他的鼓励的笑容使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最后一次和总理谈话，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招待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外宾，总理到得早。他和我握手，笑着说："你先到了？"我说："总理，您太忙了，也不休息一会儿？"总理说："我习惯了，不觉得忙。"我看见他的和蔼的笑容，就想起三年前，春节农历初四，总理在上海泰兴路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吃晚饭的时候，邓颖超同志说："这些年总理从未休息过，只有这次因为痔疮出血才休假

几天。"其实这哪里是休假？总理召开座谈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也是为了工作。我们的总理，哪里有过一天的休息？招待宴会后第二天我又看见总理了，那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上，大会结束，总理和陈毅同志有说有笑地离开了主席台，他的脚步稳健，声音洪亮。望着他的背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患了心脏病需要随身携带硝酸甘油了，我更想不到这会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关于总理的回忆是说不尽、讲不完的。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讲了几件事情。十年前我在小报上看到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一次报告，当时窃取了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职权的张春桥杀气腾腾地说，上海文艺界有一些通天的人，因此他已经向总理打过招呼，不要管上海文艺界的事情。从此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就给剥夺了看见总理的权利，也就完全落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手里，由他们随意摆布了。我是绝不甘心的。然而个人的遭遇毕竟是很渺小的事情。我们更关心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和敬爱的总理的健康。十年来我天天盼望能再看见总理一面，再听一次总理的教诲，我愿意接受总理的批评，向他保证我要认真改造自己。但是我从报纸刊出的照片上看见总理一天天地瘦下去，病容越来越显著。前年九月总理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外宾的照片给全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焦虑。有什么办法能够挽救总理的光辉的生命？谁也不能想象总理会离开我们。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日子一天天在逼近。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愿：想一切办法让总理活下去，尽一切力量减轻总理的病痛。然而"四人帮"及其余

党不是这样想.他们想方设法陷害总理，迫害总理，破坏总理的治疗。总理在病中不但要为国家大事和人民生活操劳，而且要跟疾病战斗，要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战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聆听新近发表的毛主席词二首的朗诵，他还反复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说明我们的好总理在忍受巨大病痛的时候，对共产主义的事业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

去年一月九日凌晨，电波传来的哀乐终于使我的希望破灭。我还记得，我刚刚打开收音机，意外地听到了哀乐，我愣了一下。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的我的儿子马上惊呼了一声“总理！”，再也讲不出话来。这个在新中国生长的青年也和老一辈的人一样热爱我们的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我们不能离开你！”人们哭着，喊着。我们的总理为八亿人民操了那么多的心，总理给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注入了那么多的心血，每个人的幸福生活里都有总理的无限的关心。八亿人民用什么来表示我们热爱总理的感情呢？八亿人民用什么来表示我们对陷害、迫害总理的“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呢？……

我去年和那位朋友见面的时候，我和少数几个熟人经常谈起总理的时候，我静下来想起总理为了我们这些人的进步和改造花费多少心血的时候，我想到这位大公无私连骨灰也献给祖国大地的伟大人物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怒火烧着我的心，我反复地问：用什么来表示？用什么来表示？我们究竟用什么来回答总理临终前反复唱的“团结起来到明天……”呢？

回答终于来了。八亿人民的心愿实现了。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给一举粉碎了。这一伙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妖魔鬼怪全给打翻在地上，再也翻不了身了。八亿人民也决不让他们翻身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地，万众欢腾的歌声又响遍全国。人们可以心情舒畅、毫无顾虑地倾吐自己的感情。人们在报刊上、在讲台上、在会场里畅谈总理的丰功伟绩，在舞台上、在银幕上、在荧光屏上尽情歌唱怀念总理的深情，演员淌着眼泪，听众也淌眼泪，泪水流成一片，演员还是要唱，听众还是要听。人们在交谈中常常含着眼泪讲起总理，到今天还是这样。像这样的事情过去哪里有过？这些流不尽的、感情真挚的眼泪，像一根带子把八亿人民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了。这些眼泪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表示对我们总理的无限感激和无限敬爱。我们没有权利在敬爱的总理的遗像前面流下悲伤的眼泪。总理一生坚决捍卫的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将由新的党中央高高举起，毛主席亲手开创、总理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八亿人民团结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团结得像一个人，迈着坚定雄伟的步伐奋勇前进。

我又一次翻开纪念总理的书册，望着总理的遗像，我止不住满眶热泪。我再也听不到敬爱的总理的教诲了。但是我一定要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心才能够平静：对于千方百计迫害、陷害总理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无限光明，无限美好。我们总理的骨灰长留在伟大祖

国的江河、山野，他的光辉形象将与山河共存、日月同辉；子孙万代将牢牢记住他的英名。

1977年7月10日。

“最后的时刻”*

近年来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有一些记得很牢的事情也渐渐地模糊了，仿佛有一把板刷蘸着水在我的脑子上面擦洗，要使我忘掉一切。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情景是永远擦洗不掉的。不久前，我在一次会上讲过：“就是在‘四人帮’对我的精神折磨使我感到日子难过的时候，我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热爱也始终是坚定不移的。”这绝不是虚假的话，可能由于这种感情，也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才不曾走我的一些朋友走的那条路，正直、善良的老舍同志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位。十一年了，有一个情景经常在我的眼前闪过或者在我的脑子里浮现，我在梦中也曾重见到它。那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上。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主席台上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坐在一起。陈毅同志准备讲话，拿错了稿子，总理连忙给他换了过来。总理侧过脸，我在后排看见了总理的友好的笑容。我一直在看他们两位。我看见他们健康、精神饱满，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感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上海文学》第一期。

到幸福。陈毅同志讲完话，总理带头热烈鼓掌。大会结束，总理和陈毅同志有说有笑、感情十分融洽地离开了主席台。老舍同志坐在我前面一排，他离开时也在望总理的背影。这是这一年中间我和老舍同志唯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我更想不到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我们敬爱的总理，我最后一次看见我们敬爱的陈毅同志。

十一年过去了。前些日子一个朋友从北京给我送来总理最后的遗像。总理坐在沙发上休息，他的面容安静而严肃，一位伟大人物在思索自己的国家、人民和人类的光明的未来。这是我们大家经常看见的总理，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总理，这是我们大家热爱的总理。他沉思之后有多少话要对我们讲啊！每天我望着这幅遗像，我就仿佛听见总理的响亮的声音："鞠躬尽瘁！"据说这照相是某个外国代表团得到总理的同意拍摄的，这是总理最后的一幅单人照片，有人因此称它为"最后的时刻"。可是在这消瘦的面容上我看不到任何病痛的痕迹。有的是力量，有的是信心。敬爱的总理，他的一生，他的全部思想感情都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了，哪里有丝毫个人的考虑？哪里会想到个人的病痛？有一天夜里，在荧光灯下，我立在像前，出神地望着，望着，我忽然觉得总理张开了口，我好像听见了笑声，一下子我的脑子里又浮现了十一年前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情景：总理是那样健康，那样精神饱满，在他旁边坐着满面笑容的陈毅同志。我们的总理并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中间，陈毅同志永远和总理在一起。

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一起的场面，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我

们几个熟人谈起“陈老总”，连声音里也充满着强烈的喜悦，好像在谈自己最信赖的好朋友。建国以来陈毅同志一直是总理的好助手，一九五八年总理把自己担任了九年的外交部长的重任交给陈毅同志的时候，我们在会上热烈地鼓掌赞成。我和陈毅同志没有私人的交往，但是我衷心地爱着这个人，他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的一生是完全献给中国革命的；他完全做到：忠诚坦白，光明磊落，坦率直爽，没有半点虚假。作家协会召开大会的时候他代表总理对我们讲过话；代表团出国的时候请过他给我们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他畅谈跟随总理出国访问的详细情况；他那一连几小时从不使人感到冗长的报告，他谈自己怎样犯过错误怎样改正错误的毫不掩饰的讲话，他那明确、尖锐、辞严义正、语言生动的答记者问，他那反映了他的全人格的感情充沛的诗词吸引着每一个人。在他的身边我感觉到心情舒畅，同他谈话好像他是一位和善的兄长。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候像一团火，会烧掉你一切的私心。同他接近时我觉得他像一块水晶，让你什么都看得清楚。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衷心愉快的笑容。有一次在北京，任白戈同志拉我跟陈毅同志一起到郊区川剧团的住处看演员们排练小戏，陈毅同志像一个普通老百姓坐在同乡的演员中间，欣赏他熟习的节目。他看得那样高兴！我常常回想起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次报告中讲的一个故事：抗战开始前后，陈毅同志奉中央命令去收编一个游击队伍。他戴草帽穿长袍，又没有带证件，别人把他当作国民党特务绑起来，押送到一个地方。一路上他受到敲打，他却很镇静地对他们说：“不要打我

壳好不好？”后来发现他真是党派来收编队伍的人，那个队伍的负责人抱着陈毅同志痛哭，向他请罪。他并不计较这个。后来那个人跟着他打仗干革命很勇敢，也很忠诚。故事很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细节可能有一些出入，但陈毅同志讲话时的感情至今还使我的心激动。我怎么能不热爱这样一个真诚的人呢？怎么能不热爱这样火热的感情，这样博大的心呢？

我们敬爱的总理常常向外国朋友介绍陈毅同志是一位“元帅”和一位“诗人”，这两个称呼里含着多么深厚的感情，这是陈毅同志用战斗的一生换来的光荣的称号。就是这样一位全国人民热爱的“元帅”和“诗人”，却一再受到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迫害、诬陷、折磨和侮辱。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名字，有些“四人帮”控制的小报上不断地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一九七二年一月我还在上海市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一个寒冷的早晨，广播室转播了陈毅同志追悼会的实况，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不能相信生龙活虎一般的陈毅同志会离开了我们。但是报纸来了，我明明看见毛主席佩戴黑纱面色忧戚地站在灵前。总理悲痛地念悼词。我不敢想象总理当时的心情，我不由自主地一一回忆我见过的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一起的欢乐场面。我暗暗地咒骂那些在这一段时间里公开做报告、散布流言、诬蔑陈毅同志的坏人。他们胡说什么“老右派”、“黑大炮”、“不会打仗”，这真是一派胡言，信口雌黄！陈毅同志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是上海全市人民有目共睹的。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

领导下，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建设和改造倾注了多少心血。上海人民对他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恶狗的狂吠丝毫减少不了日月的光辉。但是看见狼犬咬人，却不能站出来打狗，我多么恼恨自己。海边的冬夜非常冷，寒风震摇着干校的茅草屋，我越睡下去越感到阴冷。我想起“四人帮”对这位伟大死者的种种迫害，想起他们在“九大”期间逼着正在患病的陈毅同志深夜到上海小组接受“批判”，让反革命流氓陈阿大带头对他进行围攻，想起陈毅同志最后几年的遭遇和心境，仇恨像一团火烧着我的心。陈毅同志是被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害死的。陈毅同志身体结实，也很坚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陈毅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大腿盘骨受伤，有一次伤口化了脓，很厉害，没有药，只有万金油，他把大腿绑在树上，叫人拚命挤，挤出了血水，扯些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子一点一点塞进伤口，旁边的人都不敢看下去，他却毫不在乎。他就是这样一个钢铁汉！一九六六年六、七月我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经常见到陈毅同志，他是那样健康，那样生气勃勃。有一天晚上开会到夜深，我在旅馆里遇见他，天气很热，他摇着葵扇，揩着额上的汗水，像一个和气的胖老伯伯，我笑问他：“陈总，还不睡呀？”他笑答道：“我来看看。”他关心我们的会议，自始至终给了最大的帮助。他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共同庆祝大会的成功。当时传说有人想破坏会议，他坚决地严加制止。他谈起这件事情，眼里射出威严的光芒，声音是那样坚定。在任何时候他的爱憎是非都是十分鲜明的。还有一次，在五十年代中期吧，北京中

山公园卖茶的地方忽然想出新办法，让顾客为自己服务。我和朋友去喝茶，自己也动过手。不久陈毅同志到了那里，他笑着说："既然让顾客为自己服务，就用不着服务员了，你们都可以回家去。"后来这个办法就取消了。像这样一个身心非常健康的人，像这样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像这样一个敢于带着"十万旧部"去"斩阎罗"的人，怎么会在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突然死去呢？说"突然死去"，因为普通老百姓都不知道陈毅同志身患重病，消息给封锁了，我们不知道陈毅同志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我只能暗暗地祝他身体健康。没有想到正是在他病重的时期，上海的"四人帮"的御用喉舌却还在批判他，毁谤他，一个余党做报告，另一个余党随声附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诽谤中伤，血口喷人，这是流氓干的丢石灰包、投西瓜粪的下流勾当。他们唯恐陈毅同志患病不死，就想用各种手段把他气死、逼死。这伙人面的东西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出席追悼会、表示沉痛悼念以后，还胆敢在死者身上投掷污泥。固然这一切都是徒劳，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伟大的死者不可能复活了！他生前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和侮辱，我们将用什么来洗净、来补偿呢？我用力咬自己的嘴唇，为的是不要发出呻吟和咒骂。风继续摇撼茅屋不时发出痛苦的响声。一屋子的人都睡着了，我得不到一声回答。

六年又过去了。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六年，总理离开我们也两年了。回顾六年前的情景，我觉得好像隔得很远似的。在"四害"横行的时间里，一天仿佛有一年那样地长，每

个人心上都压着一块大石头。但是作恶多端、万人痛恨的“四人帮”终于被彻底粉碎了。真是大快人心！阴霾扫尽，日月重辉。我们捧着《陈毅诗词选集》，我们唱着怀念总理的歌。这些日子我常常在想：要是陈毅同志活到现在多么好，要是我们的总理活到现在多么好！我只要这样一想，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的那个场面，总理和陈毅同志有说有笑、边走边谈的背影。我望着“最后的时刻”这幅遗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浮现了这同样的场面，这同样的背影。他们仍然活在我们中间，而且永远活在我们中间。照片的拍摄者使用了“最后的时刻”的标题，其实总理并没有“最后的时刻”，陈毅同志也没有“最后的时刻”，他们永远没有“最后的时刻”，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精神要永远活下去，他们将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而名垂万代！

就在那一天我最后一次见到老舍同志的时候，他对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说到“总理和陈副总理”，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极深的敬爱的感情。这个声音今天还在我的心里激荡。我也有这样的感情，再长的时间也不能把它擦洗掉。它没有“最后的时刻”。它将长留人间。

1977年12月15日。

永远向他学习*

——悼念郭沫若同志

听完北京来的长途电话，我不相信郭老已经离开了我们。离京的前一天（就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我和两个同志到北京医院看望郭老。我们知道郭老的病情，只希望能站在病房门外远远地看看他。可是这个愿望也没有能实现。我们见到了于立群同志，她告诉我们，郭老病情严重，医生不让见客；不过这两天病情稍有好转，他还想到文联开会的事。走出医院的时候我们衷心祝愿郭老早日恢复健康。这不单是我们三个人的祝愿，在刚刚闭幕的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同志们都说出了这样的愿望。

整整一天我的眼前一直现着郭老的笑容。我不能把死亡同郭老连在一起。在我的脑子里郭老永远是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永远是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还是在十二年前，在上海机场送他回北京的时候。那一个多月我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到上海，他始终精神焕发地活跃在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一期。

亚非几十国作家的中间。他坚持战斗，坚持学习，也从未放松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工作。不少文化界、知识界的同志跟他一起参加过各种国际会议。在反帝、反殖的国际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最大多数，受到普遍的尊敬。他那豪放、热情的谈话和演说打动了五大洲人士的心。人们常常讲："你们的郭沫若！"我跟他一起参加过一九五〇年在华沙召开的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一九五五年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我因为有这样一位"团长"而感到自豪。在国际斗争的讲台上他的声音十分洪亮。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战士、诗人和雄辩家：智慧、才能、气魄、热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我想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五十几年前我读他的《凤凰涅槃》、读他的《天狗》，他那颗火热的心多么吸引着当时的我，好像他给了我两支翅膀，让我的心飞上天空。《女神》中的诗篇对我的成长是起过作用的。

我每一次同他接触，虽然时间不同，情况不同，可是我觉得他那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一九六六年八月亚非作家在上海举行最后一次大会，会前郭老在旅馆里关门伤了手指，他在包扎后出席会议，虽然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但在会上他仍然从容自若，和外宾热情交谈。最后他回北京，我们到机场送别。望着他那精神饱满的和善的笑脸，我感到依恋，这个时候我对自己未来的遭遇已有一种预感，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听到他那洪亮的声音，再看到他那和善的笑容，我为这个苦恼着。

这以后我就开始经历那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奇怪的遭遇。我真的再也听不到他那洪亮的声音，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脸了。在痛苦难熬的日子里，我想到许多我所敬爱的人，我想中国还有他们在，我就应当好好地活下去。这些人中间就有郭老。在“批林批孔”的初期，我看到一本所谓《学习材料》的油印本子，上面尽是“四人帮”围攻敬爱的周总理和诬蔑攻击郭老的反革命言论。叛徒江青一再威胁郭老，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张牙舞爪地说他找过郭老两次，“谈不通”。短短的一句话让我又一次接触到郭老的火热的赤子之心。我真担心他的安全。可是面对着“四人帮”的阴谋陷害，郭老始终“岿然不动”。“四人帮”这伙跳梁小丑也奈何他不得。他却亲眼看见了“四人帮”的覆灭，而且对准这伙狐群狗党的要害投出了他那锐利无比的投枪：“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我还记得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的日子里，我多么激动地反复吟诵这首《水调歌头》，短短几十个字就画出了群魔的鬼脸。他们永世也翻不了身！

战士、诗人、雄辩家的雄姿在我的脑子里更加鲜明了。……

郭老终于离开了我们。没有能在医院里见到他，我感到遗憾。想到今后再也听不到他那振奋人心的新演说，读不到他那气势磅礴的新诗篇，我感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他那精神饱满的笑容始终印在我的心上。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是当之无愧的。要向他学习，我还得走长远的路。一九二一年我开始读他的

《女神》，一九七八年我最后读他的《科学的春天》。五十八年来他走了多少路程，不论是在书斋、或者在战场，不论是在中国、或者在日本，在世界各地，他的足印是十分明显的。五十八年来他从未停止战斗，从未放下他的笔。像这样一位勤奋的文化工作者在我国是不多见的。直到最后一息，他始终保持着那一颗燃烧的心。一九二〇年他放声歌唱："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一九七八年他热情高呼："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精力虽然衰退，热情却从未衰竭，心灵之火永远在熊熊地燃烧。在文联全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应当是他的遗嘱吧。他豪情满怀地要求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精神上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有什么理由不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呢！"我要永远记住他的话，永远向他学习。

1978年6月14—15日。

衷心感谢他*

——怀念何其芳同志

去年七月，我在上海得到其芳逝世的消息，想起好些事情，很想写一篇短文倾吐我的感情。我特别感到难过的是前不久沙汀同志还来信要我也劝告其芳爱惜身体、注意劳逸结合。我来不及写那样的信就听说他住进医院了。十几年中我们只互通过一次信。他在报上看见我的名字(十一年中间的第一次!)，写了一封信托报馆转来，开头就说："读到你的文章，很高兴，你又拿起笔来了。"最末一句是"很希望不久还能见到你"。我绝没有想到这是他怀着深厚友谊在向我告别。我多么后悔我为什么不回答他一封长信，详细叙说我十几年的遭遇和今后的打算。连他托我代买的维尔特的诗集我也没有能够办到! 我的情况他可能不清楚。但是他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我的耳里：他被揪去批斗，他离开了干校，他回到北京带病工作，他到四川搜集材料准备写小说……还有他几次发病的情况。这其间报刊上也常常出现他的名字，更多的时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候是有人用"四人帮"的鞭子抽打这个读者熟悉的名字。那些时候我真替他担心。"四人帮"垮了，枷锁一个接一个地给打碎了。我听说他夜以继日地奋笔写作，看见他一篇一篇的作品发表，他给我的信还提到部分的译诗计划。我了解他的心情，也为他的成绩感到高兴。我在去年五月的世界语版《中国报导》上看到一幅其芳的近照。采访的记者说他虽已年过六十但仍然精力充沛、生气勃勃，五、六个小时的访问中他谈得很多，而且很高兴，他在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的影响和教育。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还是那个刚刚听过毛主席讲话的三十岁的年轻人。这是多么可敬、多么可爱的精神状态！可是看照相，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在那位笑谈着的老人身上保留着多少"四人帮"迫害的痕迹！听牟决鸣同志说他不知休息地带病写作，每天写到深夜，一直到发病进医院。他的确是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到最后一息、战斗到最后一息的。遗憾的是他留下多少未完成的遗作，多少来不及实现的计划！

文章并没有写成，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已经忙乱起来了。我没有时间把几十年的回忆理出一个头绪，我怕我写不好、对不起亡友。关于其芳的种种回忆经常在我的脑子里活动，想起来又忘记，以后又忽然泛起。我第一次看见其芳是在一九三二年，他还是一个穿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大学生、诗人。以后我为他编印出版了几本集子。从《扇上的烟云》① 到《鸣

① 《扇上的烟云》：其芳的第一本散文集《画梦录》(1939)的代序。

咽的扬子江》①，再到《夜歌》②，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光明，在“那长长的道路，那艰苦的道路”上他留下的脚印，我看得十分清楚。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重庆再看见他，我仿佛见到一个新人。他陪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去（我还记得他到民国路来接我，从容地告诉我怎样躲开特务的注意），他向我介绍延安的一些事情，他给我送来解放区生产的小米和红枣。一九四九年上海刚解放，他就从北平来信很关心地问我的情况。不久我到北平出席全国文代会，他看见我显得多高兴、多亲切……这些片断的回忆给过我多大的鼓励和温暖，倘使把它连串起来，就可能成为一部动人的小说。

好几位朋友在不同的时期对我称赞过其芳。他一九三八年从成都到延安是和两个朋友同去的，朋友们住了一段时期，后来都回到大后方去了，他却留了下来。同去的朋友谈起这件事至今还流露出钦佩之情。另一个朋友说其芳初到部队，夜间行军，路上把眼镜丢了，生活上发生困难，他还是平静地坚持下去。再一位朋友说其芳到农村参加土改和贫雇农同吃同住，真正做到了打成一片，农民都叫他“老何”……关于其芳的事我听到的并不止这么一些，但也用不着在这里多引了。在他的身上还能看出《画梦录》作者的丝毫痕迹么？

其芳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好典型，我始终保留着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

解放后我和其芳的接触不算多，但也不太少。他给我印

---

① 《呜咽的扬子江》：其芳的第三本散文集《还乡杂记》的第一篇。

② 《夜歌》：其芳的第二本诗集，第三版起名《夜歌和白天的歌》。

象最深的另一件事，就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敢说、敢想、敢争论，辩论起来不怕得罪人，不怕言词尖锐。有一次我听见一个朋友婉转地批评他，他不接受。他说，有意见就应当讲出来；要分清是非，就要把话讲清楚；不能因为怕得罪人，有话不讲；话讲出来，错了改正就是。……我当时也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我有这种不正确的想法：为了团结人，何必这样认真？不用说，我没有讲出来。但是从此我就没有得到安宁：讲不讲的问题始终不曾解决。每当我听见了面面俱到、不痛不痒的讲话，或者看见人为了"明哲保身"什么话也不讲，不然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睁起眼睛信口随说的时候，我就仿佛挨着皮鞭的抽打，我就想到其芳，我深感自己同他差得太远了。

一年很快地过去了。其芳的声音相貌仍然鲜明地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还是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今天我多么怀念他。这一位"永远这样奔波、永远不能给自己造一个温暖的窝"①的人，他是为了发展和繁荣祖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献出了个人的一切的。他在一九三七年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一定要坚决地、勇敢地活下去。"②在一九四二年他又歌唱道：

> 我是命中注定了来唱旧世界的挽歌
> 并且来赞颂新世界的诞生的人。③

他是说到做到、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他的确是一个冲

① 引自《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见《夜歌》。

② 引自《我和散文》(《还乡杂记》代序)。

③ 引自《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见《夜歌》。

锋陷阵、死而后已的文艺战士。

我还记得在《中国报导》上发表的访问记中，其芳对采访的记者最后讲过这几句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三十五年中间，我主要是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工作，很少写诗写散文。要是可能，我将来还要写诗、写散文、写长篇小说。"他念念不忘他计划中的"诗、散文、长篇小说"！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对我们来说这是多大的损失。因此我们更加珍惜他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作品。昨天我还含着眼泪重读他的诗《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为了它给我唤起的崇高的感情，我衷心地感谢他。

1978年7月。

怀念金仲华同志*

昨夜我梦见仲华，他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反复地说："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打来？下次不能再这样啊！"他笑了起来，我也一笑，就醒了。在这间灭了灯的屋子里，在铺着草席的矮矮的床上，我睁大眼睛朝左右望。只听见窗外一片虫声。我才知道自己做了梦。

我的确欠仲华一次电话。十二年前那个晚上，他像平常那样打电话来，唤声"老巴"，便亲切地向我问好。我老实告诉他：我可能马上就要"靠边"，请他不要再来电话。我说，等我的问题解决，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他没有再讲什么，只答应了一声"啊"。这一声含着多大失望的"啊"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记住我的诺言。我常常考虑将来怎样跟他再通电话。我当时还相信会有那一天，我多么急切地等着那一天。在痛苦难堪的时刻，这样的等待也是一种安慰！可是不到两年我就听见仲华的噩耗。"牛棚"里的日子好像是醒不了的一场噩梦。我想，这也许是谣言吧。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也不曾完全失去信心。可是有一天我无意间走过仲华的门前，房屋已经换了主人，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什么机关在那里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文汇报》。

办公了。

仲华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每当我拿起电话听筒，我就想起这位等着我的电话的老友。我到哪里去找他呢？

仲华的死是完全出人意外的。我今天还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死。我真想念他。他是那么善良，那么正直，那么乐观；他那么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他的工作，——一根红线贯串着这一切，那就是他对党的感情，他一直是靠拢党、紧跟党的。和仲华在一起，我总觉得他没有一点私心。若干年来我没有听说他讲过一句错话，并不是他讲话过于谨慎，同熟人在一起他常常谈笑风生，他思想上没有疙瘩，心里没有尘土。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他还对我说过几次："要紧跟着党啊！遇到什么事情我总是听党的话。"的确，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他都积极参加。对十七年中的国际斗争和对外宣传他也作出不少贡献。他是国际问题的专家，他做工作非常认真、精神贯注；工作面广，他却能从容应付。不管工作怎样繁忙，他晚上总要看书学习，剪贴材料，一直到最后的日子。在国外他团结了不少的反帝战士，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他每次接到出国的任务，总是衷心愉快地通知我。完成任务回来他谦虚地谈旅行的收获，但也流露出轻松的感觉。我也替他高兴，因为我知道他是尽了自己的力量的。

朋友们都喜欢同仲华接近。我听见人讲过："仲华像一块吸铁石，吸引了许多人到他身边。"他善于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他待人亲切，真诚，同他在一起交谈我感到愉快，有益。他不是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也不善于表现自己，可是他知识丰

富，态度恳切，他也虚心听别人谈话，向别人学习。六十年代中有一个时期我们一些专业作家每星期六下午在文艺会堂举行漫谈会，交流经验、讨论问题，也找人谈一下生活的体会和出国访问的见闻，出席的人都是自愿参加的。仲华便是我们的座上客，他很赞赏这种心情舒畅、没有拘束的气氛。他不仅参加我们的交谈，他还详细介绍了他带着艺术团访问西欧的情况。可是这个漫谈会后来也间接受到批评，无形中解散了。我对他谈起这件事，他淡淡地一笑，说："到我家里来谈吧。"在他家里，我们是无话不谈的，他并不限制我们，却常常把话题引到大路上去。我忘记不了一件事情：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下旬一个夜晚，我和仲华在华沙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会场，这一天从早晨六点开会开到午夜，在闭幕之前我们到场外喝一杯咖啡休息，大家都很兴奋，谈起各人的感受和今后的工作，他说："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前进吧，"然后脚步轻快地回到会场。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他还表示过这样的意思。这些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斗争，可是我始终落在他的后面。他那善意的笑容过去给过我多大的鼓励，今后也将督促我前进吧。

仲华的生活相当简朴，五十年代初我到他家里，看不见一张床，他晚上就睡在三用沙发上。他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他爱他的母亲，这是朋友们都知道的事。我最后一次看见老太太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出头了，身体还非常健康。仲华那时主动地到郊县农村锻炼，她很关心地谈起他的生活。她很担心在她之后有没有人来照料她的儿子。我望着这位白发老

人，我没有忘记我在这个家里吃过多少次她亲手做的菜，仲华对朋友提起这些美味就感到自豪。这样一位母亲，她爱儿子，关心儿子，她全心全意地照料他，让他把全部力量放在工作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家里，除了母亲和儿子以外，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外孙女，仲华很喜欢这个小宝贝，她是这个家庭的一朵花！但是我"靠边"以后不到半年就听说小外孙女同外公"划清界限"到北京去了。这在当时是极其平常的事，我的女儿就不得不跟我"划清界限"，而且我也希望她跟我离得越远越好，免得她受到牵连。然而对于正直善良的仲华，对于这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这是一个多大的打击啊！我虽然为仲华担心，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经受得住，而且我已经自顾不暇，到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地步了。

仲华是不该死的，他是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而死亡的。用不着我来谈他的死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倘使他能活到现在，他会在我们的新长征中做多少事啊！今天他的骨灰给安放在适当的地方，恢复了名誉，他可以毫无遗憾地安息了。但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不能不想起梦里的那句话："下次不能再这样啊！"当然不会有"托梦"的事。只能说这是我"心有余悸"，热爱生活的人给逼着走上死路，高龄老母来不及看到儿子沉冤的昭雪，这个惨痛的教训怎么能够轻易忘记？和仲华分别了整整十二年，对着他的沉默的骨灰，我有一肚皮的话，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倘使骨灰会讲话，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一句：坚决把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1978年8月。

等着，盼着……*

——怀念陈同生同志

近年来有一个时期我大清早出门，刚刚在十字路口拐了弯，就看见前面不远处一个熟人的背影，他拄着拐杖缓步向前，一个年轻人扶着他。我睁大了眼睛，前面没有熟人的影子。我并不惊奇，我知道这是我的幻想。这个幻想把我折磨了好几年。我始终不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像雾一样地消散得无踪无影。

我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街口最后一次看见陈同生同志的。那是在十一年前的一个早晨，他拄着拐杖走路，他的儿子扶着他。我想不到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老了，病了。可是大清早还得去“上班”，去接受审查，接受批判。他还是像往常那样笑了笑，问我一句：“身体好吗？”说一句：“要保重啊！”我和他一起走完了这一条街，一起上了无轨电车。可是我们并不走成一排，也没有交谈什么。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仿佛四处都有耳朵，四面都是眼睛，我多说一句话就会给朋友带来麻烦，给自己带来苦恼。在“几次点名”和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解放日报》。

"无限上纲"的情况下，我对自己的前途不敢存多大的希望。但是对同生同志我却祝愿他长寿，他对人民有过贡献，又是一个坚贞不屈、临危不惧的革命者，我相信他一定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我们分手的时候，他的亲切的笑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已经被一纸"勒令"剥夺了宪法上承认的一切公民权利，给关进了"牛棚"。"牛棚"里并不寂寞，一些三十年代开始从事写作的老知识分子挤在一处写"检查"，写"交代"，有时候不交出一份材料就不许回家。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我想起同生同志的笑容便感到一股暖意。我记得他说过"只要下定决心就会熬过去"。这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初他在北京谈起过去监牢生活时说的话。他在敌人的监牢里度过了难忘的岁月，严刑拷问和刑场陪绑都不曾使他低头屈服。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英雄事迹，我却从未听见他自己谈过。平日同他接触，我见得多的还是他那亲切、和善的笑容。对待朋友他是那样谦虚、那样善良、那样热诚地帮助人。尽管敌人的残酷迫害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却永远乐观，永远生气勃勃，谈笑风生。他好像有使不尽、用不完的生命力。

在"牛棚"里我常常想到他，他的笑容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的大声谈笑仿佛就在我的耳边。想起他，我仿佛得到很大的支持。我甚至相信我能够再看见他。我真的盼着，等着。

然而不幸的消息来了，说是同生同志"开煤气自杀"。我不相信。而且说"他是在隔离审查中自杀的"。我更不相信。我说，既然是"隔离审查"，怎么能够到煤气灶那里去呢？一个朋友笑了笑，说："你要讲道理，那么你明明是一个人，怎么一

下子就变成了‘牛’呢？”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似的，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明白了：什么事都是可能的。那么我恐怕再也见不到同生同志了。

但是他的声音相貌始终不曾离开我。特别是我受到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的时候，我给揪出去接受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批斗的时候，我就在他的笑容和笑声里找寻安慰和支持。我终于照他所说的那样下定决心“熬过去”了。我越活下去，求生的意志越旺盛，眼界也越开阔。我一直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记得一个朋友对我讲过，同生同志在国民党的监牢里坚持斗争，受到残酷迫害，带着遍体鳞伤出狱，人们以为他不久于人世，可是他很乐观，很坚强，不但活了下去，而且做了不少的革命工作。那个朋友和他再次见面，不禁大吃一惊。

我是在抗战时期在桂林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我的脑子里始终保留着这样一个鲜明的印象：他有一颗火热的心，你同他接近，他恨不得把心也掏给你，用他的火点燃你的热情；他身上好像有一种吸力，把许多人吸引到他身边，同他在一起，人感觉到轻松、自如；他坦白、真诚，喜欢敞开胸怀讲话，据说四川人善于讲话，喜欢讲话（我是一个例外），他是道地的四川人，有他在，就会出现生动活泼的场面；有人说他是“三十年代的活字典”，他知道的事情多，经验丰富，记忆力又好；他善于了解人，肯帮助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总之，他团结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是有一天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他，每个人都可以谈出他一些优点和特点。大家都会怀着感激之情想念他。

但是这些特点和优点竟都成了他的罪状。他自己讲过，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别人不会放过”他，更重要的是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林彪、“四人帮”那一伙就把他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们一定要去掉他。我后来听说他挨了多次的打。据说有一次他回到家里，他的爱人看见他的伤痕流下了眼泪，他反而安慰她，劝她向前看。又听说，他自己对人讲，他决不会自杀，仿佛他对别人安排的“自杀”已有所预感。再后我又听见一位朋友说，在他去世的前一两天，她同他一起挨批斗，在等待揪进场去批斗的时候，他对她说：“我们只要想到连陈老总也受审查，也挨批，我们就不会埋怨了。”和这类似的话我还听到一些。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他始终是乐观的。他是不会自杀的。他不要死。

然而，他确实死了。说他自杀，家属不相信，朋友也不相信。但在那个时候，林彪、“四人帮”的余党和爪牙说了算。他们封住了人们的口，却封不住人们的心。我小时候听过杀人灭口的故事，绝没有想到在六、七十年以后会看到具体的事例。血淋淋的现实给我留下深刻的教训。人死了，口并不曾“灭”。同生同志的一言一行长留在人们的心中。十载沉冤终于得到昭雪，可是“自杀”的谜到现在还没有揭开。我常常在想：难道一九六八年发生的事情就追查不清？难道一位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老干部的死亡就成为司芬克斯的谜？……我还是等着，盼着。……

夜已深。我坐在荧光灯下写字，仿佛听见时间在窗外水流似地过去，夜越来越冷，我没有丝毫的睡意。我想起了白白

浪费掉的十年的大好时光；我想起了我敬爱的亡友，这个有着火热的心的人，这个一心只想到别人的人，这个为革命献出一切的人。他带着遍体伤痕坚持斗争，决心要活下去，而终于给安排了伏在煤气灶上"自杀"的结局。我设身处地想象他怎样度过那一段时间。……

我从玻璃橱里取出一个陶瓷台灯架，放在桌上，仔细地看它。我仿佛又见到了同生同志。这是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个傍晚最后一次到我家里来时带来的，他说："这是朋友给我送来的，现在转送给你。"我收下了它。这时他已经靠边，而我也快要失去自由。我送他走出大门，觉得依依不舍，仿佛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要走长路似的。我回到房里，拿起台灯架，注视着，想了解他送这礼物的心意。"喜鹊闹梅！"这不是说明他的乐观的心境吗？我对自己说："下次他来，一定要问个明白。"但是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在"四人帮"粉碎两年后的今天，"喜鹊闹梅"的台灯架安然无恙，可是我敬爱的朋友呢？我只看到一幅留着胡子的遗像，和一盒不会讲话的骨灰。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一个光辉的生命就这样地结束？不！不可能！他明明在我的眼前，他那颗火热的心还在发光，它在控诉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1978年11月11日。

一颗红心*

——悼念曹葆华同志

今年六月初我离开北京的前夕，跟葆华通了电话，我说这次来不及了，下次到京一定去看他。他说他等着。八月中旬我又去北京，却只呆了两天半，来去匆匆，连电话也没有接通。我失了信。我抱歉地想：下次见面，我要好好地向他解释。可是我回上海不到两个月，电报来了，讣告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倒经常担心葆华的健康和安全。我还记得一九七三或一九七四年，一位北京朋友几次来信说葆华向他打听我的消息。他还说葆华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又患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他在什么地方遇见了葆华，这位老人摸索着吃力地走路，见到他拉着他衣袖絮絮地问我的情况。他的原话不一定就是这样。可是一连三四年我的脑子里始终保留着这样一个印象：孤零零一位老人拄着手杖在小胡同里歪歪斜斜地走着，仿佛随时都会让寒风吹倒似的。我多么想念他，多么感谢他。然而我不敢给他写一封信表达我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一月《战地增刊》第一期。

感情，我害怕给他带来更多的灾难。但是不写信我又怎么能放下心？谁能回答我这个疑问：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然而这种好像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所描写的日子，好像是意大利诗人但丁所描写的生活终于过去了，像噩梦一样地过去了。今年三月我在北京见到了这位老友。我到了葆华的家，坐在他的小小会客室里同他闲谈。

完全和我所想象的不同，他望着我微笑，显得很高兴，声音还是十几年前那样，人也不老，看不出病容，原来他的眼睛经过手术除掉了白内障之后，视力基本上恢复，他可以看书写字了。他是那么乐观，那么愉快。我也是十分高兴，坐在椅子上感到非常舒适。我忘了他的病，忘了时间的限制，我有一肚皮的话要对他说，我有十几年的遭遇要让他知道。在这个非常关心我的朋友的面前，我有什么不能倾吐的呢？他好像也有很多话要找我谈。我想，我们在一起就很幸福，话慢慢地谈吧，反正有时间。我们谈了一般的情况。这只是一个开头。他仍然像十几年前那样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写作。他要我把"第二次解放"后我所写的文章全部寄给他，他叮嘱我的女儿一定要办到。他还讲起他读到我的《一封信》时的激动和喜悦。因为还有别的约会，我只在他的屋子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在交谈中间我开始觉察到他兴奋后的疲劳，他还说，医生担心他感冒不让他出门。我同他分别的时候，他一再叮嘱我下次一定要"再来"。我爽快地答应了他。我相信我能够践约，我也相信他还能够活相当长的时间。

我太单纯了。我太粗心了。我忘了林彪和"四人帮"在人

们身上制造的内伤还在溃烂，他们散发的毒气还在毁坏人们的健康；有人说我“焕发了青春”，却没有注意到我心上的伤口今天还在出血。我本来以为两三年就可以肃清流毒，打扫一次就能够除尽尘土。这只能说是个人的愿望。这两年中我又失去了不少的良师益友，杀害他们的刽子手仍然是林彪和“四人帮”，葆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怀着极其热烈、极其深厚的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他愿意多做工作，他愿望贡献自己的一切，他要活下去，他愿意长久地活下去。但是他的健康已经被摧毁了。他挣扎，他斗争，他想创造奇迹，结果却得到突然的死亡。

我失了信，“下次”我没有去看他，从此就失去了同他交谈的机会。近十一年中间他的一些情况还是他的子女在来信中告诉我的。他们说，他为了找参考书曾带着孩子去中国书店，用一只手扶着书架，另一只手支起眼镜框，眼睛几乎贴着书脊，一本一本地挑选。他们说，他除了患糖尿病和心脏病外，两眼也先后失明，几乎无法阅读书报。他在黑暗中闭目吟咏，摸索着写下四十多首诗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他把抄录这些诗的小笔记本藏在贴身的衣袋里，只拿给最信得过的朋友看，有时他还亲自朗诵。他们说，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首都人民悼念总理的革命行动遭到镇压后，他再也无法平静下去，他说：“那些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孩子们，都给抓起来了，父母还在家里等他们回来。”紧接着他又说：“我要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我也会走上街头这样干。”他们说，他基本上恢复了视力以后，又拿起十年前已经全部译完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通

信第五集》译稿对照原文重新校订。就在他逝世前十天，出版社的同志来告诉他这本书已列入出版计划。他听到这个消息，连夜整理译稿，拿着散乱的篇页一一查对原文。这一夜他一共起来七次翻看手稿，眼睛看不清楚，脚站立不稳，手拿着稿纸发抖。就这样他一连工作了好几天，心脏病发作，他服了药又继续干下去，一直坚持到把全稿整理完毕。他们说，他去世前一天晚上他还说要校对另一部译稿（席勒的《美学书简》）。临死前一个小时他还兴致勃勃地说："我的书已经列入国家计划，要早日交稿，如果身体吃不消，每天看五分钟，也要坚持下去。"说完他便走进里屋坐在藤椅上休息。阿姨出去取报纸，她回来看见他还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眼镜，好像要看什么文章，可是头歪垂着，他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

这就是葆华的最后。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除了译稿外，他还留下四十多首歌颂周总理、讨伐"四人帮"的革命诗篇。他翻译过、校对过不少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高尔基的文学论著。倘使不遭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他对社会主义祖国深厚的爱，在"四害"的眼里，也成了罪名。笔给夺走了，他的身上却添了各样的病。眼看着十年的好时光白白地过去，他带着内心的创伤，渴望追回它们。然而已经来不及了，留给他的就只有短短的两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作为对我"失信"的惩罚，我永远等不到"下次"了。

人应当永远向前看。可是我怀念葆华，却不由已地想到许多过去的事情。我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认识他。他当时在编

辑一家报纸的文学副刊，他写诗，翻译西方文艺评论。我们一见就熟，但相知不深。我和靳以经常同他开玩笑，他从不发脾气。抗战初期我听说他到了延安，又读到他在那里写的诗。一九四九年我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见到了他。他的声音、相貌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精神面貌不同了。我们又熟起来，这一次才是真正的"相知"。他仍然热情，坦率，而且谦虚。他爱讲别人的优点，有时候也讲些好人好事。他的生活简单朴素。解放初期我到他的宿舍去，他拿带点青色的小米干饭款待我，在那一段时期中他们都吃这样的伙食。可是他总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他对我的工作和写作一直很关心。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打着"拔白旗"的招牌带头批判我的时候，我在塔什干开了会回到北京，他几次来旅舍看我，同我长谈，要我正确对待这次的批判。一年后我在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听说我为自己的选集写了一篇序言，里面有欠妥的辞句，大清早就跑来找我，劝我把它删去。其实我已经听从了另一位朋友的劝告，抽去了序言，我反而觉得他有点罗嗦，不愿意同他多谈。他似乎没有觉察出来，还热情地谈一些事情。过了一阵，我才明白，他替我担心，是怕我犯错误。因此一九六二年他读了我那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也替我捏了一把汗。他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篇发言稿我受过几十次的批斗。批斗多了，人倒变得聪明了。批斗完毕，我吐一口气坐下来休息，我不能不想念葆华，这个经常给我的心带来温暖的老友。我还想到另一位朋友，我也替这位朋友担心，他终于给迫害致死，至今没有听说给他恢复名誉。他的爱人瘫痪在

床，见到熟人眼泪汪汪。同这一对夫妇比起来，葆华还算是幸运的，他看到了林彪和“四人帮”的垮台，而且在最紧张、最困难的日子里写了几十首讨伐“四害”的诗。现在我才知道在那些时刻他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听到什么就告诉家里的人，连有人为我组织了全市性的电视批判大会，他也知道。他对孩子说我的日子难过，比他苦。说实话，我当时还以为他比我更苦呢！但是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和精神替朋友们担心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不断地刺激我的神经，我也在挣扎，我也在斗争，为了不让自己发狂。一旦静下来，我精疲力竭、灰心绝望，朋友们的影子一齐奔到我的眼前，我仿佛听到许多人的亲切的、鼓励的声音。于是我又振作起来。我对自己说，我绝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十年的没有工作的日子，十年的没有朋友交往的日子，并没有使我在精神上崩溃。林彪和“四人帮”的枷锁锁不住我的思想。任它海阔天空，它也要飞去，因此在精神上我并不是孤独的。我能够活到现在，我得感谢我的朋友们。四十五年前我写过这样的话：“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今天重读这几句话，我还十分激动。这些年我听说朋友们一个一个地死亡，总觉得好像自己的生命之水也跟着他们流失。最近每隔几天我得去一次龙华公墓参加朋友的骨灰安放仪式，仿佛死者排着队等候昭雪。我站在亡友的遗像前默哀。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这样的浩劫是怎样发生的？有一天我总会得到明确的回答。没有参加葆华的追悼会，我感到遗憾。对于如此关心我、满心希望我不断进步的一位老友，我有多少话

要说啊！现在我却不得不把它们全咽在肚里了。

葆华一直是向前看的。在最困难、最阴暗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失去信心。他有一首诗讲他自己：

一颗红心走西北，
出没烽火四十年。
山腰挥锄辟天地，
窑洞点灯翻经篇。

炮火轰杀不知死，
灵魂改造似登天。
世界战鼓又催紧，
扛着红旗列队前。

这是他在几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摸索着一字一字地写成的，的确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下他的笔，他死而无憾。可是失去了这样一位朋友，对我是多么大的损失。林彪和“四人帮”的余毒并没有肃清，外伤和内伤还在把人拉向死亡。他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他的生命是不会这样地完结的。他活在他的诗篇上，也活在他的译著里，更活在朋友们的心上。他那颗红心仍旧在燃烧。

我们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我们绝不会忘记过去十一年的惨痛教训。从背后来的匕首、两旁射来的暗箭和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必须认真对待。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奋勇前进。我骄傲我有像葆华这样的朋友，

在“四害”横行、“小报告”到处飞、卖友求荣成为风气的日子里，在他自己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他对我的信任始终没有动摇。我重视这种友情，我绝不辜负这种友情。

1978年12月15日。

后　　记*

集子编成，序也写好，刚刚交出去，我就知道彭德怀同志恢复了名誉，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也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那篇文章曾经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批判。我记得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上海某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他们所掌握的罪证就是《会见彭总》。现在我把这篇散文收进集子，放在卷首，请大家看看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和爪牙们讲的是什么歪理！

《会见彭总》是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在朝鲜战地写成的。文章发表后，好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写作的经过，一九五八年四月我在《谈我的散文》里讲了一些有关这篇散文的细节。但是文章收进集子时，我却不得不把那几段话完全删去，因为《会见彭总》已经给打进了冷宫。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会见彭总》的沉冤得到昭雪，我那几段删去的文字也有权重见天日。让我把它们抄录在下面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当代》第三期。发表时题为《爝火集·后记》。

……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譬如我在朝鲜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就是一口气写成的。虽然后来修改两次，也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我想就以这篇散文为例，简单地谈一谈。

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一个半山的坑道里写成的。我们一个创作组一共十七个男女同志，刚到"志政"[1]的时候，分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睡到半夜，我们住处附近落了一颗炸弹，因此第二天下午"志政"的甘泗淇主任就叫人把我们的行李全搬到半山上的坑道里去了。洞子很长，有电灯，里面还安放了小床、小桌，倒有点像火车的车厢。山路相当陡，下雪天爬上山实在不容易。搬到坑道里的那天晚上，我们参加了"志政"的欢迎晚会。我在二十日的日记里写着："十一点半坐宣传部卓部长的小吉普回宿舍，他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员下来接我。我几乎摔倒，幸亏通讯员拉住，扶我上去。"一连三夜都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里有一句"好不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的确是好不容易啊！

二十二日我们见了彭总以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了彭总的谈话。在会上大家还讲了自己的印象和感想。同志们鼓励我写一篇《会见记》，我答应下来。我二十五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黄昏前上山回洞。八时后开始写同志们要我写的《彭总会见记》，

① 志政：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

到十一点半写完初稿。”第二天（二十六日）我又有机会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听了彭总一个半钟点的讲话，晚上才回到洞子里。这天的日记中又写着：“根据今天再听彭总讲话的心得重写《会见记》，十一点写完。”二十七日我把文章交给同志们看过，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参考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几句，譬如“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很渺小”等等，便把散文交给新华社了。二十八日彭总看到我的原稿，给我写了一封短信。他这样说：

>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许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

彭总这个修改的意见提得很对，他更恰当地说出了当时的情况和我们大家的心情。我看见彭总以前，听说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刚看见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位长者。后来他坐在我们对面慢慢地谈下去，我们的确有一种同亲人谈话的感觉。这封信跟他本人一样谦虚、诚恳、亲切。他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太苛刻。一个人的确应当对自己严，对自己要求苛。单是这一点，彭总就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了。

彭总的信使我很感动。我曾经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编造了什么来恭维彭总呢？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做文章，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

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景，就好像那天回到洞里遇见一位朋友，跟他摆了一段“龙门阵”一样。连最后“冒雪上山、埋头看山下”一段也是当时的情景。全篇文章从头到尾，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但是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更激动人心。我的笔太无力了。那一天（二十二日）我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

> 我们坐卡车到山下大洞内，在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者对子弟。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说：“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又问“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我们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是坐车过来的。”他带笑地纠正道：“不，还是跨过的。”彭总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全面。谈话中甘泗淇主任和宋时轮副司令员也进来了。彭总讲了三个小时。接着宋甘两位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最后讲到了“欢迎”。彭总接着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的心头是欢迎的。”会后彭总留我们吃饭。我和彭总讲了几句话，又和甘主任谈了一阵。三点吃饭，共三桌，有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洞中相当温暖。回到洞内，五点半起放映了《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两部影片。晚会结束后，坐卓部长车回到宿舍的山下。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白朗同志在山下大声叫通讯员拿电筒下来接我们。山上积雪甚厚，胶底鞋很滑，全靠通讯员分段拉我们上山。回洞后休息片刻，看表不过九点五十分。……

从这段日记也可以看出我的文章写得很简单。它只是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地讲会见的事情，从我们坐在办公

室等候彭总讲起，一直讲到我们回宿舍为止。彭总给我们讲了三个钟头的话，我没法把它们全记录在文章里面，我只引用了几段重要的。那几段他后来在欢迎会上又说了一遍。我听得更注意，自然也记得更清楚。第二次听他讲话，印象更深。所以我回到宿舍就把前一天写好的初稿拿出来修改和补充。我没有写吃饭的场面，饭桌上没有酒，大家吃得很快，谈话也不多。我把晚会省略了，晚会并无其他的节目。我只有在电影放完后离开会场时，才再见到彭总，跟他握手告别。在我的原稿上最后一段的开头并不是“晚上”两个字，却是“晚会结束后”一句话，在前一段的末尾还有表示省略的虚点。我想就这样简单地告诉读者：我们还参加了晚会。我的文章最初在《志愿军》报上发表，后来才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往国内。可能是新华社在发电讯稿的时候作了一些删改：虚点取消，“晚会结束后”改为“晚上”；“花木兰”、“跨过鸭绿江”，连彭总戒烟的小故事也都删去了。在第九段上，“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下面，还删去了“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上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的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这些句子。这些都是我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想到的，后来我的确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但是新华社的删改也有道理：至少文章显得“精炼”些。

上海的夜突然冷了起来。抄完几段过去不得不删去的文

字放下笔，手不灵活了，我想起了在朝鲜战地过的那些日子。彭总的英雄形象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好像我刚刚跟他握手告别回到半山的洞子里似的。他还是那么亲切，那么诚恳，那么平易近人。想到他已经离开了我们，我感到悲痛。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为人民立下的功勋却将与世长存。

巴　金 1978年12月20日。

附 录

附 记*

我在最近出版的《爝火集》的《后记》中提到彭总一九五二年三月写给我的一封信，原信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被当时上海作协的造反派抄走了，以后下落不明，一直到不久前一位在文化局工作的朋友在乱纸堆中找到了它，上个月(十月)它又回到了我的手里。过去我对它重视不够，没有存放在不易发现的地方，它给抄走以后，我才感觉到，这是多么大的损失。两年来常听人谈起彭总的生平事迹和他最后的遭遇，也读过一些怀念他的文章，朝鲜战地的旧事时时涌上心头，他的音容笑貌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二十七年前的印象并不曾欺骗我，今天我仍然像过去那样地敬爱这个朴实、真诚、刚直、勇敢的将军——革命者——人，而且更加强烈地敬爱这个没有半点虚假的战士。

我把失而复得的彭总的手迹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它应当给保存在那里。在那里它更安全，而且发生作用。原信中短短的六七十个字就绘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的精神世界。我们真应该向他学习。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一月《解放军文艺》一月号。发表时题为《彭德怀同志致巴金同志的信 · 附记》。

《解放军文艺》的编辑同志要发表彭总的手迹，并且转载我那篇《会见彭总》的文章和说明文章写作经过的《燔火集·后记》，我感谢他们。我更高兴，他们是根据发表在《志愿军》报上的《会见彭总》的原文转载的，就是说这里转载的是未经删节的全文，这次我只改动了几个字。至于以前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会见彭总》中删去了一些什么，我在《燔火集·后记》里已经作了说明。

巴　金 1979年11月21日。

致 树 基（代跋）

树基：

你希望我为第十五卷写点什么，我理解你的想法。其实第十四卷的卷末就需要一篇较详细的说明，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躺在医院里周身疼痛，坐卧不安，即使并不糊涂，也难使用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理出一个头绪，何况我当时的确做过怪梦，经常发出各种叫声，白天坐在小桌前面，拿起笔也写不了几个字，把这些字连贯起来，似乎比登天还难。我没有为第十四卷留下什么，我不想看见梦痕。其实把我和徐开垒同志的《对话》移到前面就说明为什么来一个大转折，换一支笔写新社会，新人，新事嘛。固然是“歌功颂德”，但大半出自真实的感情。我接触了新的生活，见到了新的人，尽管我不熟悉他们，我控制不住自己，我要在他们身上汲取力量，不少热情的场面点燃我心里的火种，就这样，一本一本的“豪言壮语”产生了。我使用豪言壮语不仅鼓舞别人，也在激励自己。起初我还注意“节制”，珍惜这种感情，也爱惜自己的文章。后来经验多了，才懂得写文章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五八年写的《法斯特的悲剧》没有收进《赞歌集》就说明一切。同样《谈〈洼地上的战役〉》给刊物编者修改成“大批判”的文章，加上一些不是我自己的句子和顺手给人戴上的帽子，我反而去信称赞编者负责。难道

这也不是在保护自己?!

我翻阅过去某个时期的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使我精神振奋。但是回想当初写作的情景，我不由得皱起眉头。我是在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一篇文章发表后，只要有三两个读者出来说话，表示不满，或者刊物编者要我表态，我就给吓得马上低头哈腰承认错误，心想我认错，你就可以不讲了。关于《法斯特》我给《文艺报》编辑部的信就是这样，我希望《文艺报》以后"不再讲"《悲剧》的事，让我过点安静的日子。到了"文革"时期，我的"邪书"十四卷受到批判，大街闹市竖起专栏，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就脸红，就胆战心惊。我不敢承认自己是"邪书"的作者，甚至后悔写了那些"邪书"。后来我反复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境？我很奇怪，在如临深渊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的豪情？只有在完成五卷书（《随想录》）的工作中我才明白：越是空虚越需要装饰。印好的书不会自己消亡，印上我的名字在市上发卖，我应当负责。我绝不存心吹牛，究竟讲了多少真话，不妨用五卷书来衡量，用不着我一一地指明了。

巴　金 1990年4月12日。